

中国国家博物馆 编

# 文物中国史

6

隋唐时代



山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国家博物馆 编

# 文物中国史

6

隋唐时代



山西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物中国史·隋唐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编.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3.12

ISBN 7-5440-2647-7

I.文…II.中… III.①中国—历史—隋唐时代—普及读物②文物—中国—  
隋唐时代—图录 IV.①k209②k8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24449号

《文物中国史》由山西教育出版社与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联合出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享有本书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

---

# 文物中国史·隋唐时代

---

编 者: 中国国家博物馆

出版发行: 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迎泽园小区2号楼)

总 责 编: 王宇鸿 张金柱

责任编辑: 樊爱香

助理编辑: 薛海斌

复 审: 刘立平

终 审: 张金柱

装帧设计: 孟 孟(香港)

排版制作: 陈先英(香港) 李秋云(香港)

责任印制: 林佳年(香港)

印 刷: 深圳中华商务安全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万福工业区)

版 次: 2003年12月第1版 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全套定价: 800.00元



# 《文物中国史》编辑委员会

---

主 任：朱凤瀚

副主任：李 季 董 琦

委 员：王冠英 信立祥 孙国璋 高世瑜 王冠倬 刘如仲

编 者：

史前时代：李 季 安家瑗 孙其刚（绘图：郑 婕）

夏商周时代：李维明

春秋战国时代：王冠英 韩 钟

秦汉时代：陈成军 王永红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孙国璋 邵小萌

隋唐时代：高世瑜 胡晓建 梁 丰

宋元时代：黄燕生 陈 煜

明清时代：苏生文 王 芳 李雪梅

编 务：王永红 董 青



# 前言

这部《文物中国史》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中国历史与考古的专家、学者们合作撰写的一部图文并茂的著作。设定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正在学习中国历史的年轻人或对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各界人士。在读者阅读本书之前，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先向读者说明。

一、顾名思义，所谓“文物中国史”，是以文物为线索来讲述中国历史，这当然与一般主要依据文献史料讲述历史的著作不同。文物是历史文化遗存，每一件文物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历史的实物见证，或称物化的历史。透过文物，我们可以更真实地感受历史。所以阅读这部《文物中国史》，要比读一般的历史教科书更生动，对许多重要历史问题的体会也会更深刻、更切近真实，因而也更适合青年人阅读。这是我们编撰本书的原因。

二、本书的作者都是在博物馆工作的专家，有着比较丰富的文物展览工作经验。所以，我相信读者读这部书，会有走进一座恢宏的历史博物馆的感觉。精心选择的、优美的典型文物图像，附以简练的文字介绍，使读者既可以了解历史，又可以领悟与欣赏文物，增加许多文物知识。这应该是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当然，据我所知，类似的著作在中国内地、香港以及日本都出版过，体例并非本书首创，但是由于本书作者们均具有博物馆专家、学者身份，故而本书在文物选择之得当与诠释之准确方面，应该是同类书很难达到的。

三、本书虽不属于学术专著，但是，从将文物、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结合，通过文物去研究、阐释历史方面看，本书显然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我认为，以文献研究为主的历史学只能称为狭义的历史学，如何将其更好地与考古学相结合，使二者真正成为历史科学研究的双翼，这个问题虽已开始受到历史与考古学界的重视，两



种学科的交流、融合也不断产生着新的成果,但是目前大学历史学科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似仍未能充分重视从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两个方面全方位地培养学生,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对于促进历史学科教学的发展,特别是进一步合理化、科学化是有裨益的。

四、作为一部带有一定通史性质的著作,尽管是以文物为主述线索,仍需要有自己的科学的体系,使读者能够看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较系统、较完整的过程。这是我们在确定这部著作体例时十分注意的。要保证体系的科学性,一个首要问题是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本书没有采取以往较常用的以原始、奴隶、封建社会等经济社会形态名称划分中国古代史发展阶段的做法。这首先是因为这种较传统的划分方式,固然有其理论依据和合理成分,但近年来中国史学界众多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中国古代经济形态的发展做了更深入的探讨,并与世界范围内其他古代文明发展历程进行比较研究,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了许多新认识。而且,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应是由各段社会形态特点的差异来决定的,仅以经济形态的一些变化来划分并以这些名称来概括也是不完全的。社会形态的划分,应综合考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方面。中国古代社会长时间处于独特的地理、自然、人文环境中,其发展在总体上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些共同规律,但同时又有许多自身的特点。鉴于中国古代文明作为世界几大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尤其是其从未间断过的悠久历史、广阔的地理分布,与在世界文明史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历程,无疑应该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模式之一。所以,关于中国古代史科学的分阶段、分期问题应该从这一高度做更深入的研究。本书以分卷的形式,每卷包括中国历史上一个时段。虽然并非是对中国古代史做上述意义的分期,而只是从本书编撰方便出发设计的,分卷亦即分时段仍尽可能吸收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的多年研究成果,充分考虑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以若干王朝相聚合为一历史时段,与纯粹的王朝体系是不同的。被归为同一时段亦即同一卷的历史时期,在社会经济与政治形态、社会结构及思想文化发展方面均大致有其可以区别于其他时段的特点。



五、本书虽带有一定的通史性质，但是是以典型文物为线索展开叙述的，文字也要求简练。这样就不可能在每一卷中都像通史著作那样，对政治、经济、文化及事件、人物等都叙述得那么系统、详备，而是要突出时代特色，在叙述清楚各时段历史背景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以及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基础上，注意选择本阶段中那些最能体现社会进展，对中国历史进程乃至对整个世界文明史有较大影响的内容展开叙述，并不要求面面俱到。希望通过这样的编撰方法，使读者能够在熟悉文物的同时，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基本内容有一个较清晰的印象。

六、作为以文物为线索来展述历史的著作，最理想的是所要叙述的每个重要史实，皆有典型文物来体现。本书虽致力于此，但显然难以完全做到。所以采取了如下方式，即凡史实能与文物结合、有典型文物表现的，即多着笔墨，以合乎本书之主旨，而无文物可表现之重要史实，则出于上述通史体例要求而必有所交代，但行文则略为简练。

说明了以上几点，相信会有助于读者理解本书的内容。专家、学者们一般都有体会，写稍普及的著作其实更难，既要专业用较通俗流畅的语言表述出来，同时又要准确、深刻，所谓深入浅出，实非易事。本书各卷作者致力于此，为能使读者满意，已花费了相当的精力，但不尽理想之处与疏误仍在所难免，我谨代表本书编委会与作者诚恳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教。

朱凤瀚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五日



# 目录



第一章 盛世序曲	2
第一节 大势所趋	3
第二节 周隋禅代	4
第三节 平定江南	6
第四节 北除忧患	9
第五节 扬国威·徕远人	12
第六节 大厦倾倒	18



第二章 隋朝治国之策与发展繁荣	22
第一节 厘革制度	22
第二节 兴文教、开科举	26
第三节 走向繁荣	29



第三章 大唐帝国的兴衰	44
第一节 晋阳起兵	45
第二节 扫灭群雄	46
第三节 宫门喋血	48
第四节 贞观善政	50
第五节 武周革命	54
第六节 开元全盛	57



第七节	山雨欲来	60
第八节	“安史之乱”	62
第九节	内忧外患	64
第十节	末世烽烟	68
第十一节	帝国末日	72



第四章	臻于成熟的唐代典制	74
第一节	严密的官制	74
第二节	科举之盛	78
第三节	修订唐律	80
第四节	均田制与租庸调制	81
第五节	赋役改革：两税法	83
第六节	府兵制的兴衰	84



第五章	百业俱兴的唐代经济	88
第一节	农业兴旺·仓廩丰实	88
第二节	百工千行·争奇斗艳	93
第三节	都市繁荣·商业兴隆	108





## 第六章 民族融合 华夏一统 116

- 第一节 天可汗与突厥 116
- 第二节 回鹘与高昌故城 118
- 第三节 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 122
- 第四节 德化南昭 125
- 第五节 渤海国：车书本一家 128



## 第七章 丝绸之路——东西方交流的桥梁 132

- 第一节 无数铃声遥过碛 133
- 第二节 众教东来 138
- 第三节 玄奘西天取经 144
- 第四节 被遗忘的使臣 147
- 第五节 遣唐使与鉴真东渡 148
- 第六节 海上丝绸之路 152
- 第七节 异域风采 155



## 第八章 灿烂的唐代文化 160

- 第一节 文坛异彩 160
- 第二节 艺苑群芳 169
- 第三节 学术宗教 189
- 第四节 科技发明 195





## 第九章 多彩的社会生活 202

第一节 衣食住行 202

第二节 文化娱乐 215

第三节 婚丧礼俗 223



## 第十章 晚唐余音——五代十国 228

第一节 从乱世纷争走向统一 229

第二节 经济重心的南移 246

第三节 科学文化的新发展 257

参考书目 264

图片索引 266





# 文物中国史

中国国家博物馆



# 第一章

## 盛世序曲



在中国历史上，隋朝（581—618）是一个重要时期，但是因为国运短促，被后继者唐朝的光芒所覆盖。其实在史学界，如同“秦汉”一样，“隋唐”往往并称。通常把“安史之乱”作为唐朝前、后期的分界线，而隋朝是与唐玄宗以前的盛唐连在一起的。中间虽有隋代末年的离乱，经唐初的休养生息，很快又恢复到承平盛世。

从隋到唐，这是一个持续发展上升的历史时期。公元581年，隋文帝建国；589年，隋朝灭掉南方的陈，统一全国，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数百年的分裂局面。这个开创历史新纪元的王朝，尽管享国不长，却能承前启后，厘革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整套相当严密的统治机构，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制，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继之而起的唐朝则全面承袭隋制，又加以调整改革，从而走向近三百年的辉煌。隋代的

“开皇之治”与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一起，成为这一时期鼎盛局面的集中体现。

特别要提到的是隋代开凿了大运河。这项工程贯通南北，规模巨大，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成为以后历代漕运的要道，极大地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和繁荣。大运河赢得了开万世之利的赞誉，让后世受益深远。

隋朝只存在了三十八年，但已显示出极强的自信心，其统治者积极开拓和巩固疆土。其疆域最盛时，东、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新疆且末），北至五原（内蒙古五原南）。隋朝还在“混一华戎”、“无隔夷夏”的民族开放政策下，与周边民族和邻国主动开展外交往来，重新打通了汉朝开辟的西域丝绸之路，不仅给唐朝留下了一个疆土广大的统一国家，而且成为唐朝空前开放的起始



点。

然而，这样一个迅速崛起的新兴帝国，却因暴政仅历二世而亡，为后世留下了前车之鉴。

强大、繁荣、短暂是隋朝的特点，它为后来的大唐盛世开了一个好头。

## 第一节 大势所趋

中国早就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说法，这与中国分裂与统一反复交替的历史进程有关。伴随着这种进程，华夏民族就像



女子骑马俑

隋

1956年湖北武汉出土

通高37.5厘米

女俑骑于马上，左手牵缰绳，右手作握鞭状，形态生动逼真。



滚雪球一样，越聚越大。

自东汉政权被推翻后，中国先是在军阀混战中走入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局面；接着，北方诸民族纷纷南下中原，天下从此大乱。然而历数百年的民族冲突、交往与共存，南北方各民族的经济生活、文化语言、生活习惯等逐渐与汉族接近而趋于一致，民族之间的隔阂与成见也逐渐磨合或消失，有不少入居中原的少数民族的名称，在以后的文献中不再出现。有人统计，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北方的乌桓、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融合于汉族的人口，约有三百万之

多；南方融合于汉族的山越、蛮、俚、僚、獠等族，人口也在一百万以上。历史正悄悄沿着由分到合的方向缓慢行进着。

到了这个阶段的后期，南北对峙的局面也发生了变化，这时的军事抗争，已不再是民族间的对抗，而是统一战争了。特别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统治时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国力大大增强。577年，北周攻灭北齐，紧接着兵伐陈国，取得了长江以北的全部土地。尽管周武帝英年早逝，但是他的文治武功使统一不再是遥远的企盼，由乱而治、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逐渐明朗。

## 第二节 周隋禅代

隋文帝（541—604）姓杨名坚，弘农郡华阴（今属陕西）人。父亲杨忠是北周的开国功臣，位至柱国、大司空，封随国公。杨坚承袭父爵，又因灭北齐有功进位柱国；其后在仕途上平步青云，先后担任了上柱国、大司马、大后丞等要职，既是皇亲国戚，又是关陇集团上层的显赫人物。北周武帝宇文邕死后，昏庸暴虐的宣帝宇文赟即位。他用法严苛，甚至对劝谏已过者滥施酷刑，外至群臣，内至宫女，被杖打、诛杀的人很多，以致内外恐惧，人人自危。威望日隆的杨坚，也因“震主”之嫌，险遭横祸。580年，宣帝病死，即位者静帝宇文阐年仅七八岁，对于蛰伏已久的杨坚来说，机会终于来了。随着他由幕后走到前台，北周的气数也将尽了。

杨坚在蛰伏期间，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发展自己的势力，在笼络争取北周军事贵族支持的同时，大力提拔了一批有识之士作为辅佐，逐渐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强而有力的政治集团。杨坚利用宣帝死、静帝

董钦造鎏金阿弥陀佛铜像

隋

1974年陕西西安出土  
陕西省西安市文管处收藏  
通高41厘米

此铜像为一佛、二菩萨、二力士五尊造像，制作精美。隋代金铜造像遗存很少，此造像弥足珍贵。







嵌珍珠宝石鎏金蝶头饰

隋

1957年陕西西安李静训墓出土

长11.7厘米，宽8.3厘米  
此头饰造型为一繁茂花丛，花丛上一只飞蝶嬉戏，花叶上镌刻的脉纹清晰可见，金丝编织的飞蝶尤为精工细巧，头饰上满缀的珍珠宝石透露着华贵的气息。

年幼之机，在内史上大夫郑译等人的策划下，矫诏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为了防止周宗室诸王反叛，杨坚以赵王宇文招将嫁女于突厥为由，把北周在外的藩王征召到京城，加以控制。这样，杨坚轻而易举地掌握了北周军政大权。

反对杨坚的地方势力，以相州总管尉迟迥为首，发动武装叛乱，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相继起兵响应。尉迟迥为北周重臣，拥兵数十万，又北通突厥，南联陈朝，一时声势至为浩大。杨坚速派韦孝宽率重兵进攻相州，并以王谊、梁睿分别进击郧、益两地，很快就平定了三处叛乱。尉迟迥兵败自杀，司马消难投奔陈朝，王谦被捕斩首。这一胜利巩固了杨坚的政治地位，接着他便以谋反罪名大杀北周宗室诸王，为其登基铺平

道路。此后，杨坚先是由随国公进封随王，位在诸王之上，接着演出了一场“受禅”之戏，最后废静帝自立。这一年是581年。杨坚曾



隋文帝像

明人绘



为随国公、随王，因忌“随”字有忽停忽走意，遂以国号为“隋”，改元“开皇”，定都长安，史称隋文帝。

### 第三节 平定江南

#### 一、南征伐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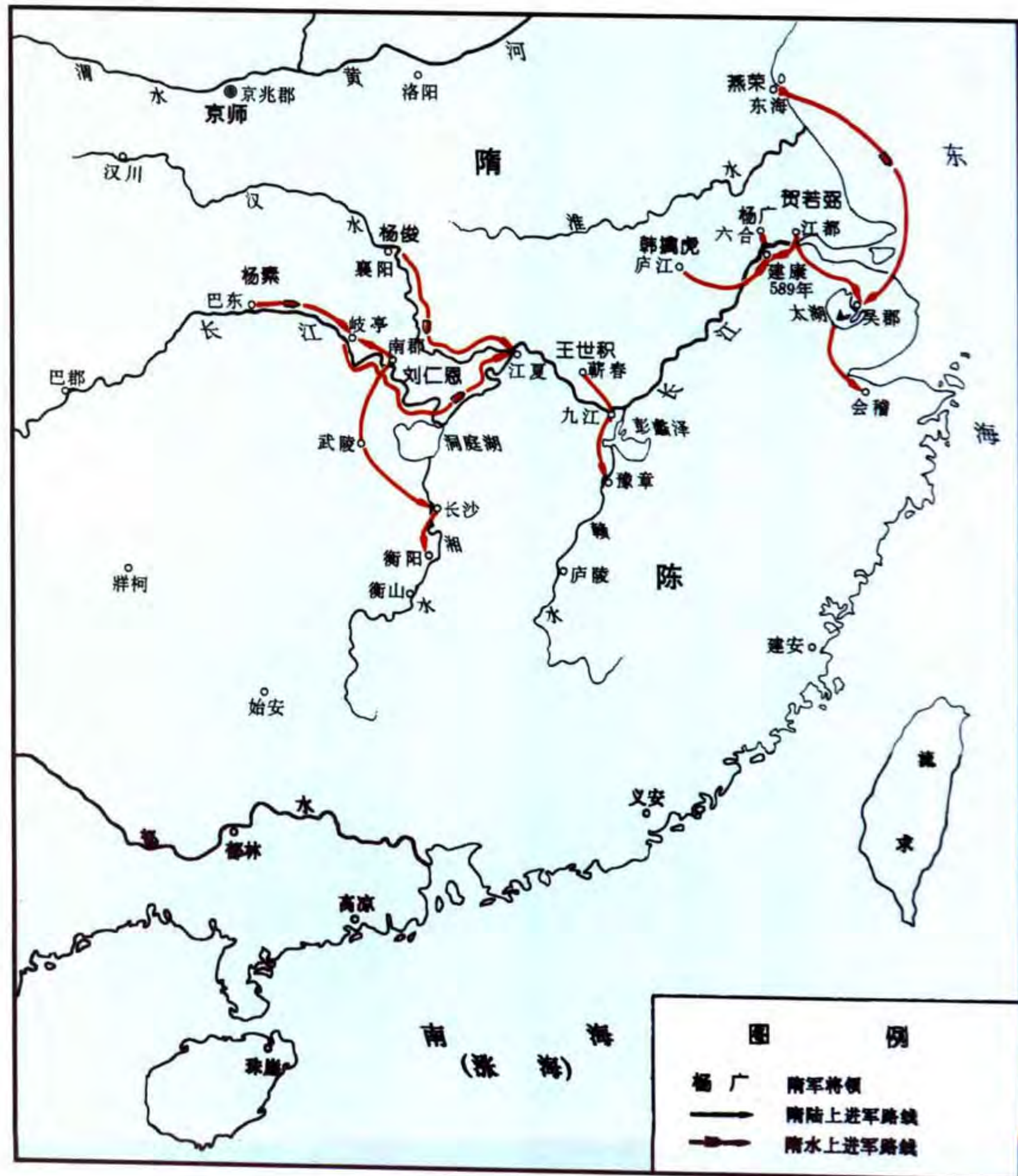
隋文帝在建国之初，就有并吞江南之志。但是当时北方强邻突厥经常入境侵扰，成为隋王朝最大的忧患。为此，隋暂时缓和

同南方陈朝的关系，主动遣使于陈。尽管陈后主态度傲慢，形于言表，隋文帝仍委曲求全，以维持与陈的正常关系，以便集中力量先对付突厥。

面对突厥的入侵，隋在反击的同时，修筑长城进行防御。后来，隋文帝接受长孙晟的建议，采取“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策略，利用突厥的内部矛盾，进行分化瓦解，使其陷入内部纷争，无暇南顾。隋朝的北疆安全了，完成统一大业的时机终于到了。

此时，隋文帝并没有急于采取行动，而是做了充分周密的准备。他在广泛征求群臣

隋灭陈形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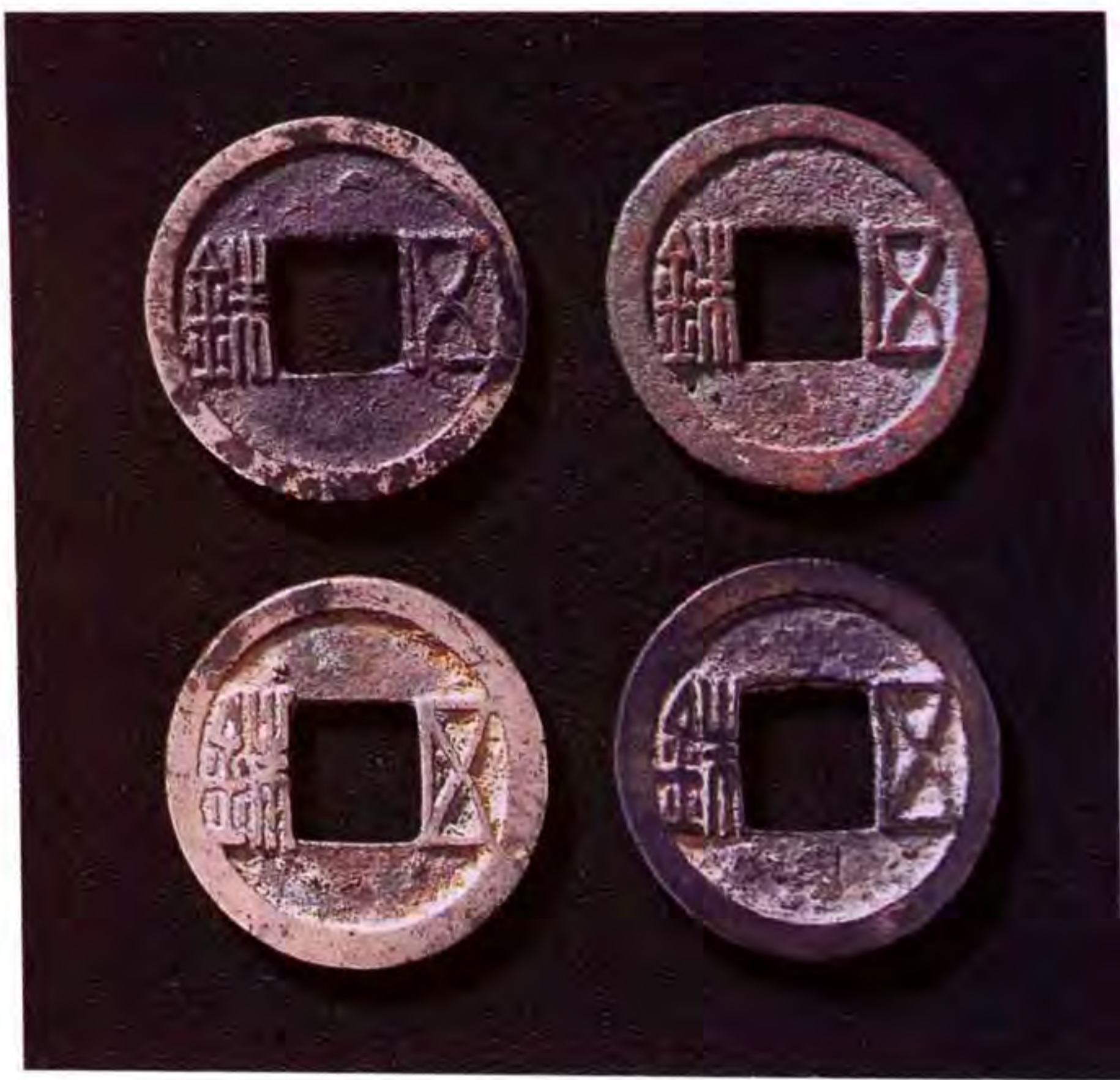


的平陈之策后，任用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广陵（今江苏扬州）；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庐江（安徽合肥），伺察陈国动静，并秘密准备渡江。又用杨素为信州总管，在永安（今重庆奉节）督造战船，造成五牙大楼船，可容纳八百人，船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船身前后左右设置六只拍杆，均高五十尺，用于拍击倒船。小一点的黄龙战船，亦可容纳百人；其余平乘、舳舻等小船无数。

灭陈之前，隋先废掉了南方的后梁。后梁是梁武帝长孙萧詧建立的割据政权，西魏灭萧梁，便扶持这个小小的后梁国。以后的周、隋亦承袭西魏在该国设置总管，以监统其国。后梁都江陵，民少兵弱，号令不出国门，实为傀儡政权。587年，隋文帝诏后梁帝萧琮入京，随后派军队进驻江陵，废去后梁国。后梁宗室萧瓛、萧岩等投奔陈朝，为隋伐陈制造了口实。

开皇八年（588）三月，隋文帝下诏伐陈，历数陈后主的罪恶，并抄写三十万份，散发江南各地。十月，命晋王杨广、益王杨俊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杨广出六合（今属江苏），杨俊出襄阳（今属湖北），杨素出信州（今属四川），刘仁恩出江陵（今属湖北），王世积出蕲春（今属湖北），韩擒虎出庐江，贺若弼出吴州（今江苏扬州），燕荣出东海（今江苏连云港），统兵五十一万八千，在东起沧海、西到巴蜀的长江沿线对陈发起了总攻。

面对隋军南下，陈后主仍然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隋开皇九年正月初七（589年1月28日），贺若弼、韩擒虎两军秘密渡江，分别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和采石（今安徽当涂）发起突袭，并迅速向陈的都城建康合围。陈将萧摩诃被俘，任忠投降。隋军直捣朱雀门，城内百官纷纷逃散。都城陷落时，陈后主和



张贵妃、孔贵嫔一起藏到景阳殿的枯井内，正月十二日被隋军俘获。长江上游的杨素和刘仁恩亦率水军顺流东下三峡，大破陈军，乘胜至汉口，与杨俊会合。这时，建康已破，杨广迫使陈后主以手书招降长江上游诸将及岭南女首领冼氏，至此，南方全部平定。

## 二、江南平叛

隋文帝统一全国后，立即将在北方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施行于南方，如改革江南原来的地区行政系统，并省州县；撤免陈朝原有的地方官吏，改用北方的隋官代替；清查户口，改变选官制度，废除江南世族的刑法特权，等等。这些措施严重危及了江南地主阶级的利益。开皇十年（590）底，隋文帝灭陈统一全国后不到两年，江南盛传隋政府要把世族地主迁徙入关的流言，因而引发了大规模的反隋叛乱。

婺州（今浙江金华）汪文进、越州（今浙江绍兴）高智慧、苏州（今属江苏）沈玄

隋五铢钱

直径2.3厘米至2.5厘米  
隋初币制混乱，不但大小、轻重不一，而且币质低劣。隋朝建立后新铸五铢钱，质量精良，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全国货币统一，既方便了百姓，也促进了商业发展。



## 青瓷武士俑

隋

1952年湖北武汉出土

高6.3厘米

俑所穿铠甲为明光铠，始创于三国。其特点是在胸前、背后都有左右两片金属圆护，能反射阳光，故名之。明光铠到北朝末年日趋流行，至唐朝已成为最主要的铠甲装备。



恹等首先举起反旗，皆自称天子。随后，原陈朝旧境内大抵皆反，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或称“大将军”，或称“太守”，纷纷起来攻陷州县，屠杀隋官，来势凶猛。隋文帝派大将军杨素前往江南平叛。隋军渡江攻占京口，而后转攻晋陵（今江苏常州）、无锡，活捉沈玄恹，又以火攻高智慧设在浙江钱塘东岸的大营，高智慧从海上逃跑，投奔福建的王国庆。隋军亦分水、陆紧追不舍。其中史万岁统领的隋军走水路，转战千里，历七

百余战。另一路大军由杨素亲率沿岸追击，也经百余战，在乐安（今浙江临海）讨平汪文进，在温州击破沈孝彻，后攻入泉州，王国庆弃州逃跑，高智慧走投无路投降。

在平定江南叛乱中，隋的江南政策也开始由强硬转向怀柔，如平定岭南少数民族首领王仲宣等的叛乱时，隋文帝派裴矩巡抚岭南，赢得了当地声望甚高的冼夫人的支持。冼夫人因拥隋有功，被册封为“谯国夫人”，其孙冯盎被封为高州（今广东阳江）刺史。至





彩绘陶甲马俑

隋

1982年陕西西安出土

通高27.1厘米，长20.5厘米  
俑戴盔披甲，其坐骑亦披挂  
铠甲，为当时的重装骑兵形  
象。重装骑兵在南北朝已流  
行，这与当时少数民族长于  
骑兵作战有关。

今琼州海峡两岸还有不少冼夫人庙，每年仍有纪念活动。

南方叛乱的平定及隋对南方政策的转变，都有利于这个新兴王朝的巩固和统一。

#### 第四节 北除忧患

581年，隋王朝刚刚建立，正雄心勃勃地瞄准江南的陈朝、准备一统天下时，北方边

境却频频告急。勇猛剽悍的突厥族屡屡南下侵扰中原，对新建立的隋王朝构成了极大威胁，迫使隋不得不转过身去，对付这个来势汹汹的北方强邻。

突厥源出于铁勒（另一说为匈奴的别种），于552年攻灭柔然，建立突厥汗国，其首领自称“伊利可汗”，并从此开始了扩张战争。突厥西破哒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其疆域最广时，东至辽海（今渤海），西达西海（今里海，一说咸海），南



到阿姆河南，北至贝加尔湖。西魏、北齐、北周都慑于其威，争相结交。特别是周、齐，为结援于突厥，巩固自己的统治，每年几乎是倾府藏厚赂之。

581年，隋代周而立，停止了对突厥的厚赂，突厥与中原割据政权周旋而获巨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因此，其首领沙钵略极为敌视这个新建立的中原王朝；沙钵略的妻子是北周静帝的宗女千金公主，对隋代周心怀怨恨，也极力要沙钵略为其娘家报仇。因此，突

厥屡屡南下侵扰中原，成为隋王朝最大的忧患。

面对突厥的侵扰，隋最初的反应是加紧北部边境的设防，修筑长城，发兵屯驻北境。但是由于准备不足，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屡为突厥所败。沙钵略曾亲统各部族组成的四十万大军南下，致使武威、天水、安定（今甘肃泾川）、金城（今甘肃兰州）、上郡（今陕西郿县）、弘化（今甘肃庆阳）、延安等地人畜被掳掠一空。后来，曾在北周时

#### 陶武士俑

隋

高 34 厘米

1959年陕西西安李静训墓出土

二俑全身披戴盔甲，右手拳间有孔，似原执有兵器，左手按一方形盾牌，盾牌中心有一黑彩兽面饰。隋朝因战事较频繁，对盔甲等军事装备很重视，这促成了隋代军事手工业的迅速发展。





出使过突厥的长孙晟提出了“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计策，主张利用矛盾，对突厥进行分化瓦解，以求各个击破。隋文帝采纳了这一计策，遣元晖出伊吾（今新疆哈密）联络达头可汗（室点密之子），与其通好。长孙晟则走黄龙（今辽宁朝阳）拉拢契丹、奚等部，并游说处罗侯（沙钵略之弟），以孤立沙钵略，使其东西受制。这些努力取得了成效。沙钵略率军入侵长城，并在武威、天水、延安等地大肆掳掠后，本欲继续南下，却因达头可汗不从径自引兵离去，只好退兵，而隋军乘机分路出击，大破突厥。

战后，突厥内部矛盾更趋激化。沙钵略袭破阿波可汗居地，阿波逃归葱岭以西的达头。贪汗可汗因与阿波关系密切，而被沙钵略废其可汗封号，也归附了达头。这样，达头可汗、阿波可汗、贪汗可汗结为联盟，于583年正式脱离沙钵略而独立，其领地尽有今新疆和中亚大部地区。自此，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彼此攻伐不断。

584年，沙钵略在众叛亲离、内外交困的窘境下，被迫遣使隋朝，称臣纳贡。此后，沙钵略在隋朝声援下，击败阿波军，更加深了与中原王朝的友好关系。587年，沙钵略死，其弟处罗侯立，称叶护可汗，在隋朝声援下，再次大败阿波军，并生擒阿波。588年，处罗侯死，沙钵略子雍虞闾立，号都蓝可汗。其堂弟染干，称突利可汗，居北方。隋朝再施反间计，嫁安义公主与突利，并给其优厚礼遇。都蓝大怒，断绝了对隋的朝贡，并与达头结盟合兵袭击突利，突利大败，南迁臣降于隋。599年，文帝封突利为启民可汗，命长孙晟于朔州筑大利城（今内蒙古清水河境），作为突厥汗庭，以安置启民及其部众。不久，因启民部落归附者越来越多，隋又于夏、胜二州之间（今陕西靖边及内蒙古准噶尔旗一



带）水草丰美的地带给予安置，任其畜牧，很快就人口滋生，羊马遍满山谷。

同时，隋派大军出塞，大破达头、都蓝军。都蓝败后，被部下杀死。后来窃据漠北的达头也屡为隋军所败。至603年，由于铁勒等部造反，归附启民，达头丧失部众，逃奔吐谷浑。启民则在隋的扶持保护下，尽有东突厥故地，并与隋朝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从而使隋朝获得了十余年的边境安宁。

隋朝与突厥的关系由战而和，由对立而趋友好，不仅获得了边境的和平与安宁，而且深化了民族关系。由于北方诸民族都隶属于突厥，与突厥关系的转变自然带动了诸民族与隋王朝之间的友好往来。

#### 武士骑俑

隋

1980年山西太原斛律彻墓出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收藏

通高29.5厘米

斛律彻是当时隶属于突厥的铁勒族人，卒于隋开皇十五年（595年）。此俑头戴卷沿帽，腰佩剑，下着红色窄腿裤，乌靴，右臂弯曲，手握缰绳，左手置胸前，拳心有孔，原持物已无存。马身佩饰也十分齐整。



## 第五节 扬国威·徕远人

开皇末到大业初是隋朝的极盛时期，国家统一、强盛，经济持续发展，社会财富大量积累。这对于性情“宏放”、有“掩吞秦汉”之欲的隋炀帝来说，可谓生逢其时。大业元年（605）炀帝即位后，除了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建设外，开始着手实现恢复汉、晋西域旧疆的大业，开边拓土，恩威并施，经略西域，并第一次提出了“混一夏戎”和“无隔

夷夏”的民族开放政策。在全国设立了管理周边少数民族的“四方馆”，同时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向周边和外国派出使者，主动引导诸民族到中原来活动，接待外国的留学生，在京都大宴来自各国的使团、商人及其他宾客。尽管人们对于炀帝的过分炫耀和极度糜费颇有微词，但是，对于后来唐朝民族关系的充分发展及对外交流黄金时代的到来，隋朝确实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 一、经略西域

关于西域，有狭义、广义两种说法。狭义西域，是指中国境内的新疆地区。广义西域，则是包括今中亚、直到地中海东岸的广大地区。这里讲的经略西域，主要指狭义而言。

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打通了中原内地到西域的道路，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东汉以后，由于中国基本上处于分裂状态，与西域的往来自然也受到影响。隋朝建立时，西域地区主要有两个强大的势力：一个是强盛的西突厥，另一个是迅速崛起的吐谷浑。当地的诸小国和其余部族都依附于这两大势力，这不仅对隋王朝的安全形成威胁，而且阻断了中原与西域的商业交通。到了炀帝时期，东突厥与隋和好，经略西域就成为当务之急。客观上讲，隋朝经略西域促进了该地区的商业交通和经济的发展，对隋朝的民族关系、对外交流也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隋王朝与东突厥关系密切，因而西突厥与中原关系疏远，并时有冲突。到大业初年，处罗可汗抚御无道国人多叛，为铁勒所败。隋朝乘处罗众叛亲离之机，遣使以处罗生母向氏“本中国人”的名义招降处罗。大业五年（609）炀帝西巡，伊吾、高昌诸国都来朝

武士像

隋  
1987年宁夏固原史射勿墓出土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  
人物高156厘米  
武士像深目高鼻，蓄有络腮胡须，为典型的胡人形象，但衣冠服饰是当时中国流行式样。墓主史射勿是迁入中原的中亚史国人，为隋朝右领军骠骑将军，死于隋大业五年（609）。





见，惟独处罗可汗不往。炀帝遣使召他会于大斗拔谷（甘肃民乐），处罗借故推辞，炀帝大怒。当时正好达头之孙射匮可汗（居处罗西）遣使入朝求婚。炀帝采用裴矩的离间分化之策，封其为大可汗，并鼓动射匮攻杀处罗。大业七年（611），射匮大败处罗。处罗向东逃走，被迫降隋。炀帝隆重接待处罗并与其和亲，封为曷萨那可汗，赏赐甚厚。同时将内徙的处罗部众一分为三，一部分安置于甘肃靖远，一部分安置在山西静乐，而命处罗本人带五百精兵随从炀帝左右。这样，直到隋末西突厥再未入侵中原。西突厥衰落后，过去受其辖制的西域诸国纷纷倒向隋王朝，恢复了与中原王朝的交往。

吐谷浑为鲜卑慕容部的一支，原游牧于今辽宁锦县西北一带，后向西迁至今甘肃、青海一带，以吐谷浑为族称，兼并当地诸羌人部族，逐渐强大。隋朝刚建立时，曾多次寇边，进犯河西走廊。炀帝即位后，拟经略西域，发展对西方的商业交通，遂于大业五年（609）西巡中亲率大军到浩门川（青海大通河）击败吐谷浑，降其部众十余万人。其首领伏允逃奔党项，其故地自西平（青海乐都）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王朝所有。隋朝在这片新开拓的土地上设置了河源（青海兴海东南）、西海（青海湖西岸）、鄯善、且末四郡，征发天下轻罪徒移居此地戍守，并大开屯田，以保护通往西域的商道。直到隋末大乱，伏允才得以乘机复国，复其故地。

隋炀帝继位时，东突厥与隋关系密切，北方无忧，经略西域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当时西域商人多到张掖与中原交易，炀帝派裴矩驻张掖掌管通商事务。裴矩深知炀帝早有经略边疆之心，所以他到达张掖后，便有意地、广泛地和西域商人接触，了解西域

诸国的山川、风俗、物产、交通及社会等情况，然后根据收集到的这些材料整理写成《西域图记》一书，入朝上奏炀帝。

此后，炀帝在西巡中迅速征服了吐谷浑，尽有其地。不久，伊吾土屯设（突厥守伊吾的官员）背叛西突厥降隋，献千里之地。伊吾归隋，阻断了铁勒南向扩张的道路。为了报复，铁勒南下攻占伊吾，迫之臣服。炀帝速遣薛世雄和裴矩率军一举平定了伊吾，于大业六年（610）置伊吾郡。次年，裴矩又进离间策，直接导致了西突厥处罗可汗臣服入朝。至此，西进的道路扫清了，西域诸国皆归附于隋。当时遣使入朝者有三十余国（一说四十余国），民族关系大为改善。



骑骆驼俑

隋

1980年山西太原隋斛律陵墓出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收藏

通高45.5厘米

骆驼俑高大健壮，双峰间驮有丝绢、皮囊等物，其上坐一胡人，头戴圆毡帽，身着圆领窄袖衫，左手持缰，右手正持饼进食。这是行进于丝绸古道上的胡商形象。



## 虞弘墓石椁浮雕

隋

1999年山西太原出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收藏

墓主虞弘是中亚胡人，曾奉茹茹国王之命出使北齐，遂定居中国，历北齐、北周、隋三朝为官，卒于592年。其墓早年被盗，葬具仅存一汉白玉石椁。石椁呈中式殿堂建筑，内外却布满了充溢胡风的雕绘，具有浓厚的波斯、中亚文化特色，对研究丝绸之路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有重要意义。

自汉以来的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经魏晋南北朝的一度低沉后，又开始活跃起来，这对商业的促进尤为显著。当时的长安、洛阳，有大批西域商人，西京长安的两市内“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隋书·地理志》），异常繁华。隋朝广招来者，一律厚礼优待，以至于诸番往来相继，而州县疲于接待迎送，耗费极大。最典型的是大业六年（610），西域各国使者和商人云集洛阳。炀帝为了炫耀国之富庶，征召天下有奇技者，集中于洛阳端门大街的百戏场上演奏百

戏，仅奏乐者就有一万八千人。同时令百官及民众皆穿艳丽服装，列坐棚阁观看，通宵达旦，烛火通明，整整半月才罢，花费巨万。为了博得西域商人的好感，炀帝下令将市树木皆用帛缠饰，市内商人必须服饰华美，广积珍货，所有店铺都设帷帐，盛陈酒食，对路过的西域商人悉邀请就坐，任其酒足饭饱而分文不取。像这类的炫耀声威，付出了极大的经济代价，也招致了后人的批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认为：“糜费以万万计，卒令中国疲敝以至灭亡。”

以音乐而言，在隋代的“九部乐”中，西域音乐就有五部。随着西域音乐的受宠，西域音乐中使用的曲项琵琶、类似竖琴的箜篌、短小细秀的盛箎、形制小巧的羯鼓等诸多乐器也为时人所喜爱。特别是隋炀帝重用龟兹音乐家白明达，大造新声，从而使龟兹乐一统天下。这种状况直到唐代仍有增无减。最能反映中西文化融合的是西凉乐。它是龟兹乐与传统中国音乐的奇妙混合物，是用龟兹琵琶和古典石磬这样一些看似极不谐调的乐器来演奏的。作为一种中原与西域结合的新型音乐，在当时不仅被人们接受了，显然还受到喜爱。

这个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西方钱币，有东罗马金币和波斯萨珊王朝银币。这两种钱币在当时中东、近东、东欧等地区曾是国际通用货币。其中东罗马金币出土于陕西咸阳底张湾隋独孤罗墓，为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二世时金币。正面是一王者的半身像，头戴盔，身穿交领铠甲。右手持地球，球上站立一胜利女神，左手执盾牌。背面为一戴盔披衫女神，坐于宝座上，右手执枪，左手托一地球，球上有一十字架。正反两面的周边均有拉丁文铭文，内容主要是赞美王者的颂词。在金币边缘上还有一小孔，







牵驼纹“胡王”字锦

隋

1964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收藏

长19.5厘米，宽15厘米

此锦为平纹经锦，锦面胡人执鞭牵驼的图案恰是当年西域胡人跋涉在丝绸之路上的真实写照。

看来这枚金币后来曾用作系线佩戴的坠饰。与东罗马金币相比，在中国境内发现的萨珊银币，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地点上都要多些。这可能与萨珊银币在6世纪曾经通行于中国河西地区有关。除了在新疆出土的萨珊银币外，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白道城（约6世纪末）、陕西西安李静训墓（608）、陕西西安张家坡401号隋墓（6世纪）、陕西耀县寺坪隋塔基（604）、河南陕县刘家渠隋刘伟墓（584）等也出土了十余枚不同时期的萨珊王朝波斯银币。萨珊银币一般由模子压印而成，其正面为戴冠王者像，背面是波斯国教祆教（拜火教）的祭坛、圣火与祭司的组合图像。铭文为钵罗婆文，内容也是给王者的颂词。尽管在中国境内出土的这类外币不一定是作为流通货币使用，可能用作墓葬的随葬品、礼佛的施舍品，或是私人的收藏品、装饰品等，但是均可作为当时中西交通发展和物质交流的实物证据。

1957年，在陕西西安西郊发掘了一座隋代墓葬。墓主人是个九岁的小女孩，叫李静训，死于608年。她的父亲是隋光禄大夫岐州刺史李敏。她自幼为外祖母养育，外祖母是北周宣帝的皇后，而外祖母的父亲就是隋文帝。这座墓的葬具十分别致，石棺的形制就像是一座小小的宫殿，在殿顶雕刻的覆瓦上刻有“开者即死”四字，这咒语守护了亡灵千余年后，还是没能挡住后人的好奇和执著，秘密终于被揭开了。墓中出土的随葬品有140余件，其中有大批制作精美的金银器和玻璃器，包括一枚菲鲁兹王时期（459—484）制作的波斯萨珊王朝银币。这枚银币边缘上有一小孔，显然是用作可系带的装饰品。另有一对形制大体相同的高足金、银杯，是中西亚的输入品。有专家认为，高足金杯是拜占庭时代的制品。死者佩戴的一副金手镯，上面嵌有绿松石和玻璃珠，形制也很独特，是从印度传来的。最为精美而神秘的是



## 东罗马金币

查士丁尼二世时期货币

1953年陕西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

直径2.1厘米，重4.4克

此金币正面是国王正面半身像，周边铭文意为“我们的主上查士丁尼二世，祖国的父亲”。背面为一戴冠女神像，其坐下铭文是“印铸于君士坦丁堡”。环形文意为至尊们的胜利，末尾“E”字为铸币厂局记号。



一件金项链，以多股金丝编成金链连接起28粒多面金珠，工艺极为精致。每粒金珠由12个小金环焊接而成，每个小环外缘饰小焊珠一圈、大焊珠5颗，上面还嵌有10粒珍珠。这些工艺曾盛行于古代两河流域、埃及和希腊等地。在项链上部镶嵌的宝石上，有一凹雕的大角鹿像，也是这个项链最具标志性的装饰特色之一。凹雕技术最早源于古代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而在宝石上凹雕大角鹿像，在当时的中亚极为流行。在金项链上还镶嵌有多块青金石，青金石色泽典雅华美，古代埃及王朝、波斯帝国的皇室以及古希腊、罗马的上流社会都喜欢把它用作装饰品。阿富汗在古代是这种青金石的主要产地。此外，金项链的下部有一组精美的垂饰，其中心位置上是一个圆形金饰环，环上依次饰有金色的小焊珠和白色的小珍珠各一圈，环心嵌有一颗红宝石（有说是鸡血石），这种装饰工艺也来自西方，不是中国固有的。至于这个金项链究竟产于何地，尚无定论。有人认为它产于阿富汗或巴基斯坦地区，但一般则认为它是从西亚、中亚传入的。

李静训墓中还出土了一批玻璃器，有瓶、杯、盒、蛋形器、管形器（可能用作笔

杆）及珠饰品等共24件。世界上最早的玻璃器出现于西亚。在古埃及和罗马，高级玻璃器的价值甚至超过黄金。中国最晚在战国中期已能制作铅钡玻璃，即用氧化铅和氧化钡作为助溶剂而制作出来的玻璃，西方流行的则是钠钙玻璃，可知中国古代制作的玻璃是自成体系的。然而中国古代玻璃器工艺不如西方发达，所以常将西方传来的玻璃器视为珍宝。特别是在六朝时期，许多西方玻璃器输入中国，上层社会往往用玻璃器来斗富，以示豪华。“玻璃”名称的正式使用是清代以后的事，中国古代一直称为“琉璃”。随着西方玻璃器的输入，其制作工艺技术也传入中国。在隋唐时期，以高铅玻璃为主，同时也出现了钠钙玻璃，制作工艺上也采用了西方的吹制法和铁棒技术。李静训墓出土的玻璃制品，除珠饰品外，还有1个玻璃盒、2个蛋形器、1件管形器、2个玻璃瓶、2个玻璃小杯。经专家鉴定，全部为中国自产，均为无模吹制成型，前4件为高铅玻璃，后4件是钠钙玻璃，而且采用了铁棒技术，大多制作精致，器壁最薄的只有0.1厘米。其中一件玻璃扁瓶，为钠钙玻璃，无模吹制成型，质料好，气泡和结石都很少，制作工艺精细，从



底部疤痕看，采用了铁棒技术。此瓶的质地和工艺水平都已接近西亚玻璃，然而器形却是当时西亚玻璃制品中所没有的，为传统的中国造型，应该说这是一件中西文化合璧的产物。

## 二、海东、南海

隋代的对外交流，除了通过繁忙、喧闹的西域通道外，还通过东、南的陆路或海路与周边邻国保持着往来。

在海之东，主要是朝鲜和日本。当时朝鲜半岛长期分裂为高丽、百济和新罗三个国家，三国与中国间经常有陆、海两路的往来。到新罗统一半岛南部前，三国都曾派遣留学生赴中国学习。中国也很早就有人移居朝鲜半岛生活。朝鲜半岛的文化相当发达，在文字、甲兵、佛教（通过中国传入）信仰以及婚娶礼仪等方面都大略同于当时的中国。中国与日本的往来，大多通过朝鲜半岛。由此可知，朝鲜半岛与中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过了朝鲜半岛再向东，就是日本了。隋朝通往日本的道路，通常是由山东渡海至百济，再由百济渡海到日本。所以日本派出使者（遣隋使）来中国前，接受中国文化大多是通过朝鲜半岛间接得到的。隋朝时，日本推古天皇朝（593—628）曾先后四次（600、607、608、614）派出遣隋使来中国。隋朝也曾派使巨斐世清赴日，并受到隆重接待。天皇接见斐世清时说：我听说海西有大隋，礼仪之国，故遣使朝贡，……希望了解大国惟新之化。随同遣隋使前来的人中，有留学生和僧人，可知遣隋使来华，主要是求取佛经和汲取中国文化。被选派的人，多为隋以前从大陆经朝鲜半岛迁去的汉人及其后裔，大都懂汉字，通晓汉语。他们有的在长安学习



嵌珍珠宝石项链

隋

1957年陕西西安李静训墓出土

周径4.3厘米，重91.25克



长达二三十年，如清安、玄礼、僧旻等，学成回国后大力介绍中国文化，对646年的日本大化革新起了重要作用。

这里还应提到海东南的“流求”，即今日之台湾。东汉、三国时台湾称夷洲，隋朝时改称流求，此称沿用至宋元。亦作“琉求”、“留求”、“瑠求”、“琉球”。隋朝大业期间，隋炀帝积极拓边，于大业三年（607）派羽骑尉朱宽、海师何蛮出使流求，以“求访异俗”。三年后，再遣虎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州（一曰“周”），率万余大军自义安（今广东潮安）渡海至流求。当地土著居民初以为



玻璃瓶

隋

1957年陕西西安李静训墓出土

高16.3厘米，口径2.8厘米，  
底径5.6厘米



商旅到来，纷纷至军中交易，可知当时大陆与流求已有商旅往来。自此以后，海峡两岸的关系更加密切，东南沿海特别是福建一带移居台湾者日益增多。据《隋书·流求传》记载，当时台湾的土著居民仍主要以渔猎为生，并有文身食人之俗。定居下来的大陆移民则以从事农业为主，他们成为流求的早期开拓者。

当时隋朝的交州（越南河内）、广州这两个通商口岸称为交趾郡和南海郡，因所处近海，盛产犀、象、玳瑁、珠玕等奇珍异宝，吸引了众多商人前来。这两地虽然人口不多，但却相当繁华，成为岭南二十余郡中的两大都会。隋朝与南海诸国交往中最重要的事件是：607年，炀帝派常骏和王君政出使赤土

（马来半岛南部），受到赤土王的热烈欢迎，不仅以三十艘船来迎接，还赠予金芙蓉冠、龙脑香等大量礼品。赤土王又遣其子那邪迦随常骏等回使中国。隋炀帝大业年间，南海诸国与中国通使往来的已有十余国。

## 第六节 大厦倾倒

### 一、炀帝其人

隋炀帝（569—618）杨广是隋文帝杨坚第二子。十三岁时就封为晋王，并先后任并州（治今太原）总管、淮南道行台尚书令等要职。在渡江伐陈时，杨广为隋军主帅。灭



陈后，晋升太尉。不久江南叛乱，文帝为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控制，派杨广为扬州总管，镇江都（今扬州）。开皇二十年（600），西突厥达头可汗入侵，又以杨广为隋军主帅，率军抗击，得胜而还。此时三十二岁的杨广已是出将入相，屡建功勋，声名冠于诸王。

这时，杨广为了争夺太子位，矫饰言行，博取父母欢心；并笼络权臣杨素，取得其支持；又利用文帝夫妇对长子杨勇的疑忌，收买东宫幸臣姬威作密探，用谗言诋毁杨勇，挑拨父母和杨勇之间的关系。终于在开皇二十年，杨勇被废为庶人，杨广取而代之。仁寿四年（604），杨广与杨素合谋杀死了病中的隋文帝，然后伪造文帝遗诏处死杨勇，登上了皇位。

杨广即位后，即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举措。他下令搜集整理大量文化典籍，并建馆收藏；恢复学校，创立科举制。他对开皇时期所定各种制度做了一些修改，影响及于后世。如唐代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每部设一侍郎，专门管理手工业的少府监（从太府寺分离出来）都是沿杨帝的改制而来。在经济上，赋役比之开皇时又有所减轻，因府库盈溢，杨帝曾下令免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规定男子二十二岁成丁等。大运河的开凿，促进了南北交流和经济发展。在法律上，他废除“十恶”之条。他还经略西域，开疆拓土，巩固统一。在他执政期间，首次提出了“混一夏戎”的思想，在全国设立管理周边少数民族的“四方馆”，还在“无隔夷夏”的开放政策下，积极开展对外交流。这些措施对隋朝的强盛繁荣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史称大业五年（609）“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但是，强盛的隋王朝最终也毁于炀帝。他即位后，大兴土木，广事征调，到处巡游，



挥霍浪费。大业元年（605），大规模营建东都洛阳，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大业元年至六年，先后役使三百万民丁修建运河，男丁不够，以妇女充任。大业三年发丁男百万修筑驰道、长城。在他统治期间，前后强征的役丁不下一千万，死于役者无数。同时炀帝几乎年年远出巡游，南至江都，北出榆林，东北过涿郡，西抵张掖。每次出巡，从行者就有数十万人，舟车仪仗，极尽奢华。所经之处，要整修道路，修建离宫别馆，五百里内皆令献食，吃不了就地埋掉。无止境的徭役需索，导致“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最终，炀帝在四面楚歌的社会反抗中结束了一生，

隋炀帝幸江都图

选自明人绘《帝鉴图说》





黄釉陶壶

4世纪至7世纪

1963年吉林集安高句丽墓出土

高33厘米，口径26厘米，底径12.6厘米

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古代少数民族之一，主要生活在鸭绿江和浑江一带。前1世纪朱蒙在辽宁桓仁一带建立高句丽政权。3世纪移都国内城（吉林集安），427年迁都平壤。此壶的器形与当时中原地区的壶相似，黄釉陶器的烧制工艺也是从中原地区传入的。

隋朝大厦也随之倾倒。

## 二、征伐高丽

高丽位于朝鲜半岛北部，西晋灭亡后，乘机入据辽东，奚、契丹、靺鞨等族均受其控制。北周时，高丽统治者高汤被周武帝封为辽东郡公、辽东王。隋文帝即位后，改封高汤为高丽王。隋朝灭陈后，高汤惧怕隋以兵力相加，遂治兵积谷，采取守拒之策。高汤死后，其子高元即位，联合靺鞨万余骑侵扰辽西，遭隋军反击后，遣使谢罪而罢。隋炀帝即位后，欲恢复辽东故地，便借口高丽王高元不肯入朝，于大业七年（611）下令出兵征伐高丽。此后，炀帝在全国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先后发动了三次大规模进攻高丽的战争。为供军需，炀帝派官吏在东莱海口督造战船三百艘。工匠被迫立于水中昼夜赶工，自腰部以下溃烂生蛆，十人中有三四人

死亡。在河南、淮南、江南等地制造兵车万余辆，又强迫江、淮以南的民夫自带船只向涿郡运送军粮，船只连绵千余里；征调河南、河北、山东民工于陆路运送军需。山东诸郡负担尤重，用牛车向边镇运米，牛车征完了又征人力小车，路途遥远，征发频繁，数十万人来来往往，昼夜不息，途中死者尸体相枕藉。

第一次征伐高丽的战争是在大业八年（612），隋兵一百一十三万余人，从涿郡出发，直奔辽东。水军由来护儿率领，从东莱出发直指平壤。高丽军据城守御，顽强抵抗。隋炀帝本以为大军一到高丽就会投降，严令诸将，凡军事进止，必须奏报，不得专擅，若高丽请降，不得纵兵进攻，待旨而后行。高丽守军每遇危急便声称投降，待隋军请旨回来，守军补充修整完备，又坚守拒战。最后隋军大败而归。

第二次对高丽的战争是在大业九年（613），由于兵力不足，首次下令募民为兵，称为骁果（这支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新军，后来成为国家实际依靠的主力）。这次征伐，隋炀帝允许诸将便宜行事，不必事事奏请。在辽东城双方攻守二十余日，正当高丽守军危急之时，隋朝贵族杨玄感在黎阳起兵，进攻东都洛阳。炀帝慌忙下令撤军，而高丽军乘势追击，隋军军资器械损失惨重，再度无功而返。

大业十年（614），隋炀帝第三次征伐高丽。当时起义烽火已遍及全国，强制征发的士卒也大量逃亡。虽然来护儿的军队在卑沙城（辽宁金县东大黑山）打败高丽军，准备进攻平壤，高丽因困敝不堪，亦遣使乞降，但是终因国内形势危急，炀帝只好班师回国平息内乱。此后，隋王朝风雨飘摇，高丽王借势拒不听命，炀帝气怒之下，又谋第四次出



师，然而已力不从心。

关于隋与高丽的冲突，以往普遍认为，始于隋平陈统一全国后迫使高丽图谋自保，或是中原兼并扩张和穷兵黩武。近年来，有学者通过隋初高丽侵扰辽西的史实，及对此前后中原王朝与东北诸族关系变化的分析，认为以往的观点忽略了高丽在东北地区政治活动中的主动与进取因素。但是不论如何，对高丽的战争是引发隋朝社会反抗的直接导火索，最终使隋王朝再无回天之力。

### 三、风起云涌的社会反抗

大业七年（611），隋炀帝发出征高丽的诏书后，山东、河北一带作为出兵高丽的基地，兵役、力役最重，加之当年发大水，淹没数十郡，农民起义首先在这里爆发了。山东邹平县农民王薄自称“知世郎”，作《毋向辽东浪死歌》，反对用兵高丽，号召农民不要为隋炀帝送死。当时逃避征役的人多归附于他。王薄起义后，今山东西北部与河北交界一带的农民也纷纷聚众起义。大业九年（613），正值炀帝第二次征高丽时，杨素之子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河南浚县东北）督运军粮，看到“百姓苦役，天下思乱”，遂乘机起兵，并声称起兵不为个人富贵，而是“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当时许多遭运的民夫因不堪劳苦，参加了他的队伍，隋朝一些达官贵戚子弟也前往归附。一时声势

很大，打到洛阳城下时已聚众十余万。炀帝慌忙从辽东撤军前往镇压。不久，杨玄感因久攻洛阳不下，转而西行，欲取关中，途中兵败身死。杨玄感起兵扩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裂痕，客观上为农民起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614年至616年间，农民起义由黄河下游向全国发展，迅速扩展到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乃至珠江流域和闽江流域，先后在全国各地兴起的起义军不下一百支，参加起义军的人数达数百万。各路起义军由分散作战逐渐走向联合，形成了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起义军，杜伏威、辅公柘领导的江淮起义军三支主要队伍。隋炀帝在调集人马残酷镇压的同时，不顾廷臣劝谏，于大业十二年（615）第三次巡游江都。这时，一些贵族、地主、官僚已感到隋朝必亡，也纷纷起兵自保，或打着反隋旗号，割据一方。因中原大乱，炀帝不敢北归，张罗着修建丹阳宫，欲保拒江东，但是随从的骁果卫士多是关中人，怀念家乡，时有逃亡。大业十五年（618），隋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发动兵变缢死炀帝，隋王朝的统治到此结束。在以后的混战兼并中，从太原起兵的李渊、李世民父子攻占长安，并相继镇压削平了各地的起义军和割据势力，建立了唐王朝。





## 第二章

# 隋朝治国之策与发展繁荣

### 第一节 厘革制度

隋制是在综合了前代各种制度的基础上，加以沿革、厘定而成的。其突出特点就是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隋制不仅直接为唐朝所继承，科举制、六部制及隋律等，后世加以变革，一直沿袭或影响到了清代。

#### 一、三省六部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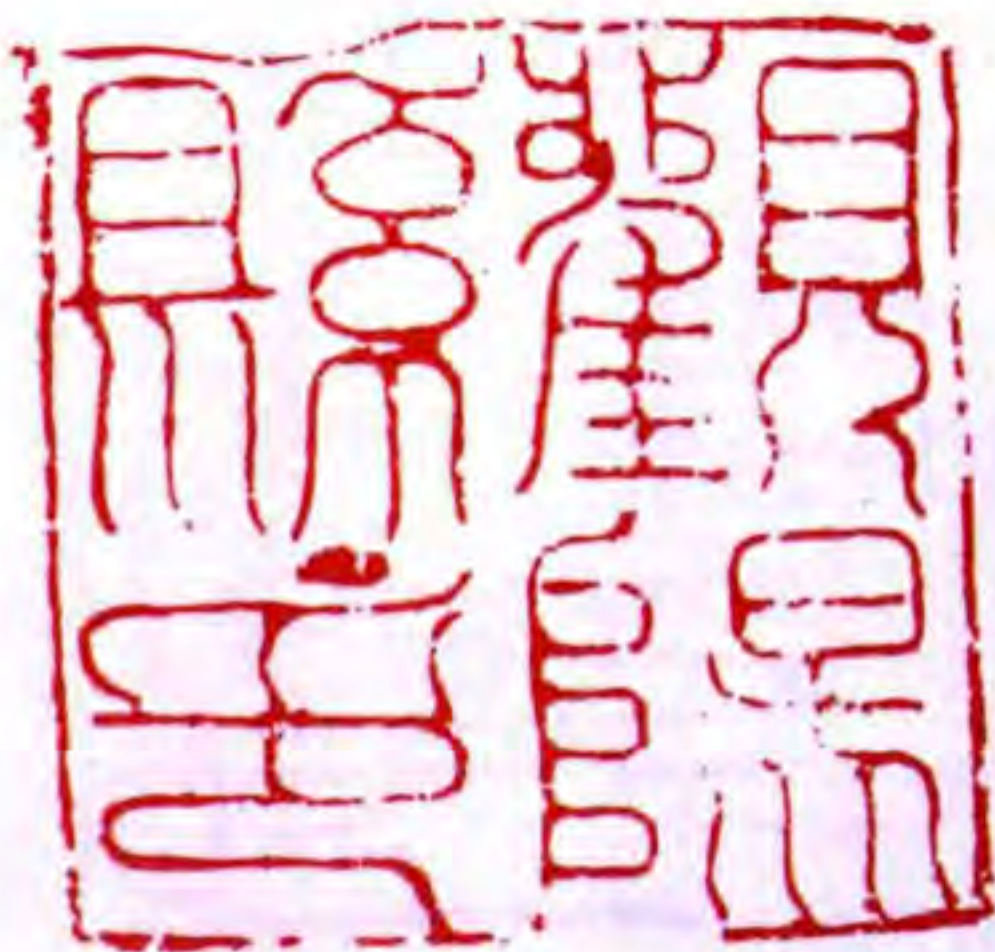
隋文帝即位不久，即废除北周官制，恢复汉魏旧制。实际上是集东汉以来历朝官制发展变化之大成，建立了以三省六部为核心的一整套政权机构。三省包括内史（后改为中书）、门下、尚书，分别负责草拟、审核、执行各种政令。三省长官内史令、纳言（后改为侍中）、尚书令同为宰相，以确保皇帝的统治权力。尚书省总理全国政务，下设吏、

礼、兵、都官（后改为刑）、度支（后改为民）、工六部，分掌官吏考核、礼仪、军政、刑法、户口钱粮、营建等方面事务。三省之外，还有秘书、内侍二省，分掌图书、宦官；御史、都水二台，负责监察、水利；太常、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国子、将作等十一寺，分别管理礼乐、刑罚、国宾接待、仓储、手工业、学校、营造等具体事务。三省六部制的确立，体现了中央集权制的加强。

#### 二、中央任免地方官吏

隋文帝改革行政制度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废除汉代以来地方州郡长官可以自行征辟僚属的制度。581年规定：凡九品以上地方官员一律由中央吏部任免，也就是将大小官员的任命权全部收归中央。地方官员由吏部任命在北魏末和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但州郡长官辟属的制度并未废除，隋朝彻底解决





隋观阳县印

统一后的隋代官印体制加大，百官通用，促成了官吏不必佩印、印归官府保管的改革。同时，隋代印文完成了由阴文向阳文的过渡，字体上体现了向小篆回归的特点。

了这一问题。隋还进一步规定，官员每年由吏部进行考核，根据考绩实行奖惩、升迁或黜落。此外，州县的辅佐官员三年一更换，不许连任，而且全部选用外地人担任，以此打击士族地主的政治特权，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同年，隋对地方行政机构也进行了改革。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州、郡、县三级制，至隋朝建立时，州、郡、县数量庞大，以至地无百里，就有数县并置；户不满千，竟由两郡分领，地方官吏众多，国家开支糜费。为了改变南北朝以来形成的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局面，隋政府按照“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原则，大规模精简整顿地方行政机构，把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隋炀帝即位，又改州为郡，恢复了秦汉的郡县两级制。另设司隶和刺史十五人，为专职监察官员，分部巡查，以纠郡守。这些改革裁减了冗员，节省了国家开支，同时提高了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

### 三、《开皇律》

鉴于北周后期刑罚苛滥，致使内外离心的状况，隋王朝一建立，隋文帝就命高颉、杨

素等人修订齐周以来的刑律。在“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指导思想下，新律废除了宫刑（阉割）、枭首（斩后悬挂首级）、轘（车裂）和鞭刑等酷刑，并准许有冤者逐级上告，直至朝廷。583年，隋文帝见刑部处理的罪案仍多至万件，认为犯罪人多是因为法律太严密，令苏威、牛弘等进一步修订，于是又删除死罪81条，流罪154条，徒、杖等刑千余条，最后定留仅剩500条，而且规定，凡死罪，地方不能自己决定，必须上报中央大理寺复决。这就是《开皇律》。《开皇律》共有十二篇，分别为：名例律、卫禁律、职制律、户婚律、厩库律、擅兴律、贼盗律、斗讼律、诈伪律、杂律、捕亡律、断狱律。

《开皇律》颁行后，隋文帝严令各地官吏学习法律，并定期到京城考试。因此，当时官员多明晓法律。隋炀帝即位后，于607年再次修订刑律，而成《大业律》。《大业律》基本上是《开皇律》的沿袭。尽管隋文帝后期，特别是隋炀帝时期刑罚日益严酷，皇帝个人的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以致有法而不行，但就隋律本身而言，与前代相比确实具有“宽平”、“清简”、“疏而不失”的特点，对后世的法律影响极大。



#### 四、均田制与租调力役制

均田制始于北魏，北齐、北周沿用，隋统一全国后，又将均田制推广到江南。隋朝曾数次发布均田令，最早是582年，隋在前代基础上重新颁布了均田和租、调的新令。除了授予贵族官僚大量土地外，新令规定：男丁（十八岁至六十岁）每人授田一百亩，其中永业田二十亩，死后可以传给子孙；露田八十亩，死后交还国家。妇女授露田四十亩。一夫一妇为一床，每年要缴纳租粟三石；调绢一匹（四丈）、绵三两，或布一端（六丈）、麻三斤。丁男每年还要服役一个月。583年，隋文帝在宰相苏威建议下，减轻赋役。下令把成丁年龄由十八岁提高到二十一岁，每年

服役期限由一个月减为二十天，调绢由一匹改为二丈。590年又补充规定，男丁到五十岁免役收庸（庸即以缴纳一定数量的绢代替服役）。这样一来，成丁的年龄提高了，但原先十八岁受田的规定未变，这意味着农民受田后，可以有三年免服徭役或兵役，加上五十岁以上可以缴纳实物代替徭役，这些规定对当时的农业发展确实是有利的。

由于租调力役制是建立在人丁基础上的，户籍制度对于国家来说至关重要。隋朝为了掌握更多的劳动力，以保障和增加赋税收入，585年开始实行“大索貌阅”和“输籍之法”。所谓“大索貌阅”，就是按照户籍上的年龄和本人的体貌进行核对，检查是否有谎报年龄、诈老诈小，以逃避课役的情况。还规定堂兄弟以下必须分立户籍，即把大家族拆散，防止人口隐漏，称之为“析籍”。这些措施，把大量浮游民和世家豪门的荫附户搜括出来，载入户籍，成为国家编民。首次清查，就清出丁口四十四万三千，而新编入籍的户口则达一百六十四万余。以后历年“大索貌阅”都有新附人口。

“输籍之法”是政府划分户等的标准，颁发到各郡县，每年正月由地方官主持，在乡里挨户依官样确定户等，记入户籍，作为征发徭役、确定税额的依据。这样，百姓无法逃漏税，地方官吏难以营私舞弊。由于赋役减轻，逃亡和依附的农民多自愿脱离豪强而成为国家编户。

隋朝人口的增长速度在中国古代史上是罕见的。隋初户数为四百万左右，到开皇九年（589）全国统一时，长江以北的户口已达六百余万户，加上平陈后新进的五十余万户，总数达七百万户左右。至大业二年（606），更增加到八百九十余万户，人口达四千六百余万。除了自然增殖外，检括隐漏人

社仓纳粟砖

隋

传河南洛阳出土

长32.5厘米，宽16厘米，厚6.4厘米

社仓又名义仓，隋初在各地设置，百姓按规定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以备荒年赈恤之用。后政府借口社仓管理不善，将社仓收归官府掌管。这是当时社仓向官府缴纳粟粮的砖刻。





口的成效显然是不可低估的。

国家编户的增多，加上赋税徭役的减轻，为社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为了储藏各地征收的粮食，隋在许多地方建立了仓城。著名的有黎阳仓（在今河南浚县）、常平仓（在今河南陕县）、广通仓（在今陕西华阴），还有西京的太仓等，各仓储粮达数百万至千万石。大业六年（610），洛阳新城建成后，隋又在洛阳城内及洛阳北建含嘉仓和回洛仓，在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建洛口仓（又称兴洛仓）。其中洛口仓城周围二十余里，有粮窖三千，每窖可藏粮八千石。直到唐初，据唐太宗估计，隋末的储积仍可供五六十年之用。隋朝之富庶可见一斑。

## 五、府兵制

隋以前的军制都是专业性质的，实行“兵农分离”政策。隋初沿袭西魏、北周以来的府兵制度，又有所变化。首先是集军权于中央，其次是完成了从兵农分离到兵农合一的转变。开皇元年（581），隋在中央设十二卫，每卫置大将军一人，总领全国的军府，从而把征发、调动、指挥全国军队的大权集中到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手中；同时将各地军府改称骠骑府，设骠骑将军统领。隋炀帝时，又改骠骑府为鹰扬府，由鹰扬郎将统领。以后唐朝的军府就是在隋鹰扬府的基础上建立的。

开皇十年（590）全国统一后，隋又一次



灵山孕宝群兽铜镜

隋

高18.4厘米

镜背面饰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及“灵山孕宝神使观炉形圆晓月光清夜珠玉台稀世红妆应图千娇集影百福来扶”32字。在隋代，这种四神铜镜用于辟邪和祈求吉祥。



改革兵制，规定府兵及其家属一律落户籍于州县，与民户一样按均田令受田，从事农业生产；同时仍保留军籍，轮番宿卫，战时出征。作为军人，可以免除民户的租调，但出征时要资粮自备。这样一来，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制度，不但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而且对当时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都有积极作用。

## 第二节 兴文教、开科举

隋朝虽然国祚很短，但在文化教育方面颇有建树。隋代既继承了汉代推崇儒家学说的基本思想，又承续了南北朝以来佛老流行

的社会现实，“尊崇儒术，兼重佛老”成为这一时期的文教政策。这一政策直接被后来的唐朝所继承，不仅促进了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也丰富了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内容，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维方法。此外，隋朝首创进士科，开科取士，开风气之先。

### 一、礼遇儒生·兴办教育

隋文帝即位后，多次下诏“天下劝学行礼”，并广招天下名儒硕学之士。文帝曾亲召山东大儒马光等人进京，皆授予“太学博士”。他身边聚集了大批儒士，其中不少是当时的名儒。如身兼五职的宠臣苏威，精通儒学；重臣李德林十五岁就能诵五经，以儒学著称于时；内史侍郎薛道衡，时人谓之“关西孔子”；礼部尚书牛弘，世称“大雅君子”。

在选拔厚赏诸儒的同时，隋又大力兴办教育，加强传授和学习儒家经典。首先在中央正式设立国子寺，置国子祭酒，专门管理教育。这是中国历史上设立专门教育机构的开始，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炀帝时，改国子寺为国子监，增设司业一人，为国子祭酒副手。祭酒、司业既是官职，同时又兼为教授。此后，国子监一直延续到清代。隋朝国子寺下，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算五学，另有律学属于大理寺（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法院）。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同属高等学府，区别在于学生家庭出身品级高低不同。此外，地方州县也广设学校。当时学校已普及到岭南少数民族地区。如令狐熙任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时，在当地开设学校，建设城邑，令当地汉人和少数民族人十分感激，称为“大化”。总之，隋代儒学与教育事业在魏晋南北朝低潮的基础上有了很大转机，为唐朝出现中国教育史上的黄金时代奠

白瓷黑彩侍吏俑

隋

1959年河南安阳张盛墓出土  
河南省博物馆收藏

高 72 厘米

俑按剑立于莲座之上。俑身及莲座施白釉，发须、眉、袖口、剑鞘等部位饰以黑彩。人物形象十分写实。





定了基础。

## 二、古籍的搜集整理

隋初，负责收藏、管理经籍的秘书省藏书有一万五千余卷。秘书监牛弘以典籍散佚为由，上表请开献书之路。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下诏广泛征集儒家经典，献书一卷，赏绢一匹，因此搜集到不少好书。开皇九年（589）平陈后，又得到一批江南图书，其中有不少缺藏之书或原藏中篇章缺佚者。文帝命人将这些图书总集编次，并召天下工书之士，对残缺之书用不同本子补续抄全。经过整理，加上重复本，共有八万卷，其中精本三万七千余卷。炀帝即位后，扩大秘书省编制，校勘典籍。在三万七千余卷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抄写副本工作，并将图书分类为甲、乙、丙、丁四目，分统于经（儒家经典）、史（史书）、子（诸家著作）、集（文艺类书）四部，分别编写目录。这种分类法成为后来中国古代图书分类的正统方法。

隋代搜集、整理古籍的成就，为唐初大规模修史奠定了基础。

## 三、南风北渐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隋代的统一是由北朝统一了南朝，但是在文化上，却是南朝文化向北朝传播。魏晋南北朝继承了汉代以来高门世族以《诗》、《礼》传家的儒家思想文化传统，而北朝长期受少数民族思想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冲击，儒学传统削弱了。当时中原的士大夫都有这样一种共识：南朝才是华夏传统文化正宗之所在。即使在北朝文人比较集中、文坛相对活跃的东魏和北齐，也颇受南风影响。当时的北方作家多以南方作家为楷模，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以南方文学为主流的文风统一过程。



《大般涅槃经本》（局部）

隋

敦煌莫高窟发现

此为隋炀帝作太子时写经。经后落款为“仁寿三年五月皇太子广为众生敬造流通供养”。

隋的统一，为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隋平陈后，将陈朝君臣带回京城，供养起来，以示礼遇，同时把大批江南士人迁入京师。在后来的隋炀帝杨广周围逐渐聚集了不少南方的才学之士，炀帝喜好文学，他本人就是南方文学的倡导者和践行者。炀帝又新设进士科，以文才秀美取士，对以后的唐代影响极大。隋末唐初的著名学者如陆德明等都是南方人，可知南方士人在当时是很受青睐的。这对南方文化的传播，以及南方文化在南北文化融合中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 四、开科举之端

古人读书主要是为了做官，所以有“学而优则仕”的说法。古代统治者选拔官吏的途径，隋唐以前主要采取推荐的办法，称为选举制。而隋唐以后，科举制成为选拔人才





彩绘伎乐陶俑

隋  
1959年河南安阳张盛墓出土  
河南省博物馆收藏  
高17厘米至19厘米  
伎乐俑均为跏趺坐态，乐器有笙、篪、琵琶、笛、觱篥、排箫、钹等。这组伎乐俑反映了当时官宦人家蓄养歌舞伎的情况。

的主要方式。

史书记载，隋开皇年间正式废除九品中正制，炀帝大业年间始建进士科。正是基于这两点，现在中外学者大都主张科举制起源

于隋代。一般认为，隋朝实行科举制主要与当时收回地方用人权，以加强中央集权制相适应。《新唐书·房玄龄传》记载房玄龄十八岁于本州举进士，从他的年龄推算，应该是在隋开皇十五年（595）。在洛阳出土的隋北地太守陈思道墓志也有关于他不满二十岁及进士第的记载。这些记载是隋代已有进士科的例证。

科举制始于隋代，在史学界已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虽然对科举制始于哪一年还有不同意见，但是有一点共识，那就是将隋代实行进士科取士作为科举制的开端。在科举制后来的发展中，进士科一枝独秀，并逐渐代替、合并了其他诸科，成为考试取才的主导科目，乃至惟一科目。于是，把进士科的创置作为科举制的起始，就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标志。

科举制的形成确立有一个过程。它是在选举制的母胎内逐渐孕育出来的，直到1905年被废除，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有人统计，科举制选拔出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就整体而言，这是中国自隋代以后历代官员的基本队伍，其中产生了一大批出色的、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专家。大多数学者都认



陶文官俑

隋  
1956年湖北武汉出土  
高65厘米  
俑头戴方幘，上穿宽袖衣，下着曳地裳，腰系宽带，脚穿翘头鞋，笑容可掬，神态生动。



为,虽然科举制度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造成了“社会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封建政治;科举的一整套严密的考试程式和制度,更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杰出创造。

### 第三节 走向繁荣

#### 一、贯通南北的大运河

隋统一南北后,为了加强京城与洛阳的联系,适应南北物资文化交流的迫切需要,同时为了巩固统一,加强中央对河北、江南等地的控制,开通了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其里程至今仍在世界通航运河中居于首位。

隋代大运河的全部工程分为四段进行。

大业元年(605),隋炀帝营建东都,同时征发河南、淮北诸郡百余万人开通济渠,以沟通黄河与淮水。从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向西北入黄河,借一段黄河道下行,至板渚(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东北),又引黄河水入汴水,经大梁(河南开封)、睢县、商丘、永城、宿县、灵璧、泗县,至盱眙,交淮水。这段运河又称为御河,是运河中最为重要的一段,后来成为解决两京大批官员和军民食粮的生命线。

同年,又发河南民工十余万循文帝时所开山阳渎旧道,加以改造和疏通。自清江经山阳南到扬子(今江苏扬州西南)入长江。因这段河道的基础是春秋时期吴国开的沟通长江、淮河的运河故道,因此仍沿用旧名“邗沟”。

早在三国时期,从建安七年(202)始,曹操统治的魏国就陆续在华北平原上开凿了

六条运河,形成河北平原海河水系,这为以后隋朝开永济渠、通济渠奠定了部分河段的基础。大业四年(608),隋征发河北各郡百余万民工开永济渠。在河南武陟县引沁水入黄河,入口处与板渚夹岸相对。运河引淇水入卫河北上一段,便是曹操时期所修的白沟旧道。然后经今山东临清、天津直达涿郡(今北京)。这段运河的开凿与隋炀帝准备征伐高丽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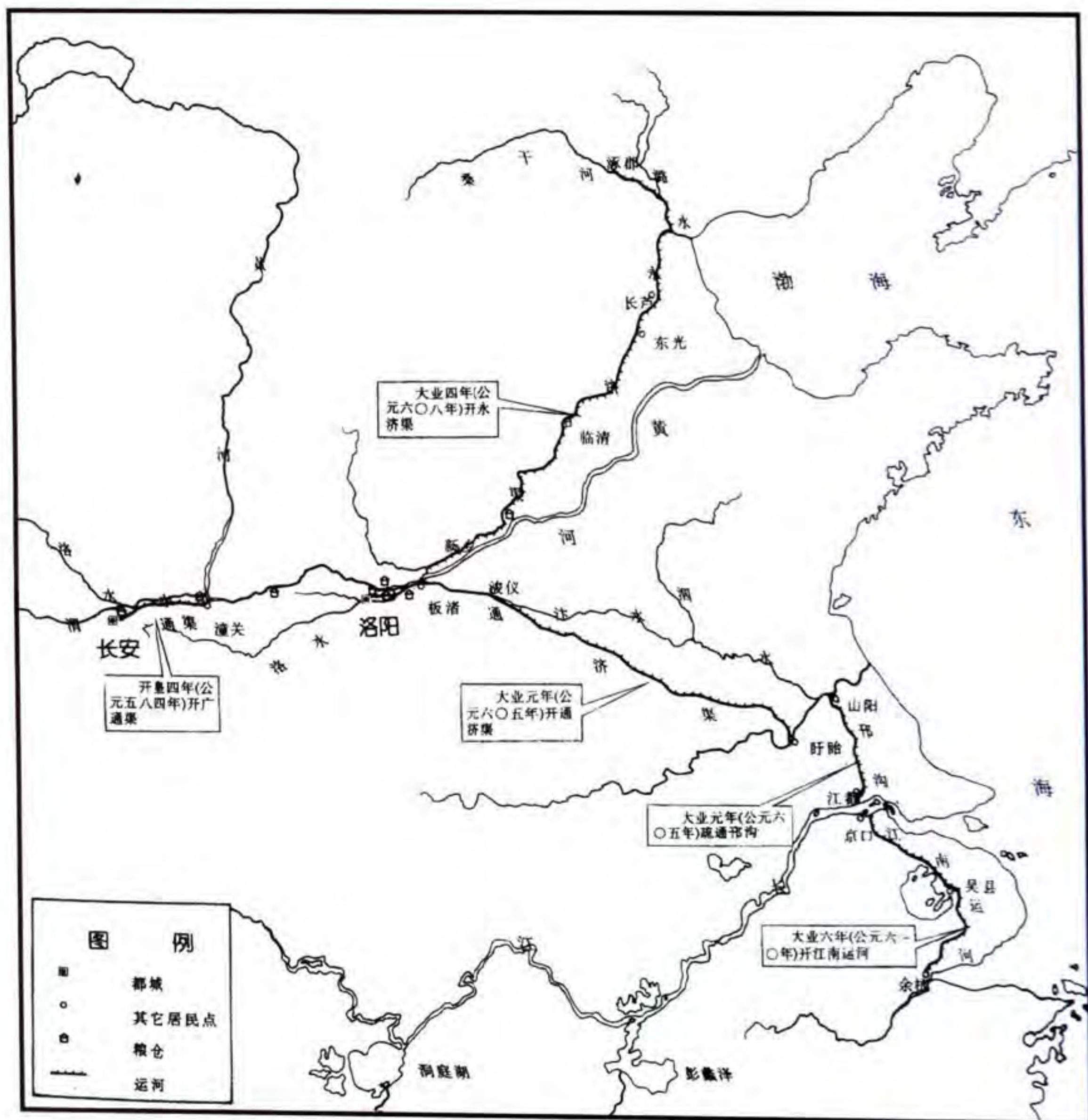
大业六年(610)隋又开江南河。江南河的前身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吴国阖闾、夫差在太湖地区开凿的古江南河和沟通古钱塘江的百尺渎,后经秦朝整治,自今镇江至丹阳间开通河道,东南接古江南河而至会稽郡(今江苏苏州),从而奠定了隋江南运河的基本走向。之后,六朝时期又不断修整,使丹徒水道的通航条件大为改善。隋朝正是大致利用了六朝以来的旧运渠,加以疏导,开通了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的河道,沟通了长江与钱塘江之间的航运。

至此,大运河全部竣工。前后用了六年时间,动用了数百万劳力。大运河南起余杭,北达涿郡,长达2400多公里,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运河开通后,在运河两岸又筑有宽阔的御道,沿途栽柳成行。从长安到江都修建离宫四十余所。为了转输储备粮食的需要,沿运河还建立了许多大型粮仓,其中著名的有黎阳仓(今河南浚县东南)、兴洛仓(今河南巩义东北,后改为洛口仓)、回洛仓(今河南洛阳城北)、含嘉仓(今河南洛阳北)、河阳仓(今河南孟县南黄河北岸)、陕县常平仓(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华阴广通仓(今渭河入黄河处,后改为永丰仓)、大兴城太仓和山阳仓(今江苏淮安西北)等。

从社会效益讲,运河的开通,将沿途所



隋运河图



经的洛阳、涿郡（今北京）、浚仪（今河南开封）、梁郡（今河南商丘）、山阳（今江苏淮安）、江都（今江苏扬州）、吴郡（今江苏苏州）、余杭（今浙江杭州）等通都大邑连缀起来，从而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和发展，当时运河上“商旅往返，船乘不绝”，对南北物资文化交流和维护全国统一都起到了促进作用。从科技角度讲，隋代运河工程规模巨大，地理环境复杂，全程高度落差达40多米，这对于主要用人力施工，生产工具又很简陋的隋朝来说，在勘探设计、节制水量、平衡水源等方面，确实是一次科学技术水平的大检阅。

唐代宰相李吉甫曾在他的《元和郡县

志》中写下这样一句话：“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明代于慎行的评价更耐人寻味，他认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导致隋王朝短命的原因，然而却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矣”。这条大运河作为历代的漕运要道，经后世改造疏导，直到19世纪南北海运兴起，津浦铁路开通，其作用才退居到次要地位。

## 二、规模宏大的都城

在中国历史上，隋唐共同建造了古代世界最宏大的都城——长安与洛阳，而总体规划和城市形制、布局是在隋朝完成的。长安与洛阳都是数朝古都，从城市发展看，隋朝



的大兴城（长安城）和洛阳城与秦汉以来的城市有所不同。秦汉以来的城市基本上是在旧有城址的基础上修建或改建，因而受到旧城布局的限制。而隋朝的这两座城市都是另选新地，并在统一规划设计的基础上建成。城市的布局力求合乎封建统治者所崇奉的帝王之居“建中立极”的理想模式，同时也借鉴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发展中出现的新特点，其中最为直接的借鉴来自北魏洛阳城，如将宫殿区由汉代的散布改为集中，郭城的修建，里坊（居民住宅区）的设置，以及纵横街道的布局，调整并对称安排工商业区等，体现了城市建设中中央集权思想、城市防卫功能的加强以及对人口集中布局的变化和工商业发展的注意。这两座城市不仅规模宏大，而且都是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建成，一方面显示了这一时期夯土墙壁、木构架房屋可以就地取材、预制安装、施工迅速的优点，同时也表现出组织施工上的卓越能力。

隋朝灭亡后，洛阳、长安作为唐朝的东、西二都和当时国际化的大都市，进入了它们的鼎盛期，又持续辉煌了近三百年。

#### （一）大兴城

开皇二年（582），隋文帝下诏修建新都。主要是由于长安旧城自汉代以后屡为战场，久经丧乱，凋残不堪；加之水质不好，不适宜饮用。汉长安城东南十余公里处的龙首原一带，川原秀丽，又可利用“八水绕长安”的地势引水入城，解决城市的用水问题。因此这里被选为新都的城址。新都由隋朝著名建筑家宇文恺负责规划和营造，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建成，583年迁入使用。因杨坚曾在北周时被封为大兴郡公，所以新都定名为大兴城。大兴城面积83.1平方公里，其规模是现存明清西安城的7倍，而且布局严整，并充分利用了地形地势的有利条件，形成了



高低错落的立体空间效果。在形制上，它属于中国中世纪封闭式城市的典型。

隋大兴城由宫城、皇城、外郭城组成。宫城是皇室居地，位于整个城市的北部正中，北部接皇家禁苑，南北长1492.1米，东西宽2820.3米，四周夯筑围墙，有五座城门。宫城正中宫殿区是皇帝居住和听政的场所，正殿为大兴殿。东侧是太子居住的东宫，西侧为宫嫔云集的掖庭宫。在宫城南面筑皇城是隋朝大兴城的首创。皇城南北长1843.6米，东西宽与宫城相同。有七座城门，南面三门，东、西两面各二门。皇城内东西向街七条、南北向街五条，朝廷衙属分布于其间。套在宫城、皇城东、西、南三面的是外郭城，东西宽9721米，南北长8651.7米，周长36.7公里，有夯筑的城墙环绕。墙外侧挖有宽9米、深4米的城壕。城门九座，东、西、南三面各有三门。以南部正中的明德门最大，已探出五个门道。门址东西长55.5米，南北进深17.5米，门道宽5米。郭城为居民区，分

镶金边白玉杯

隋

1957年陕西西安李静训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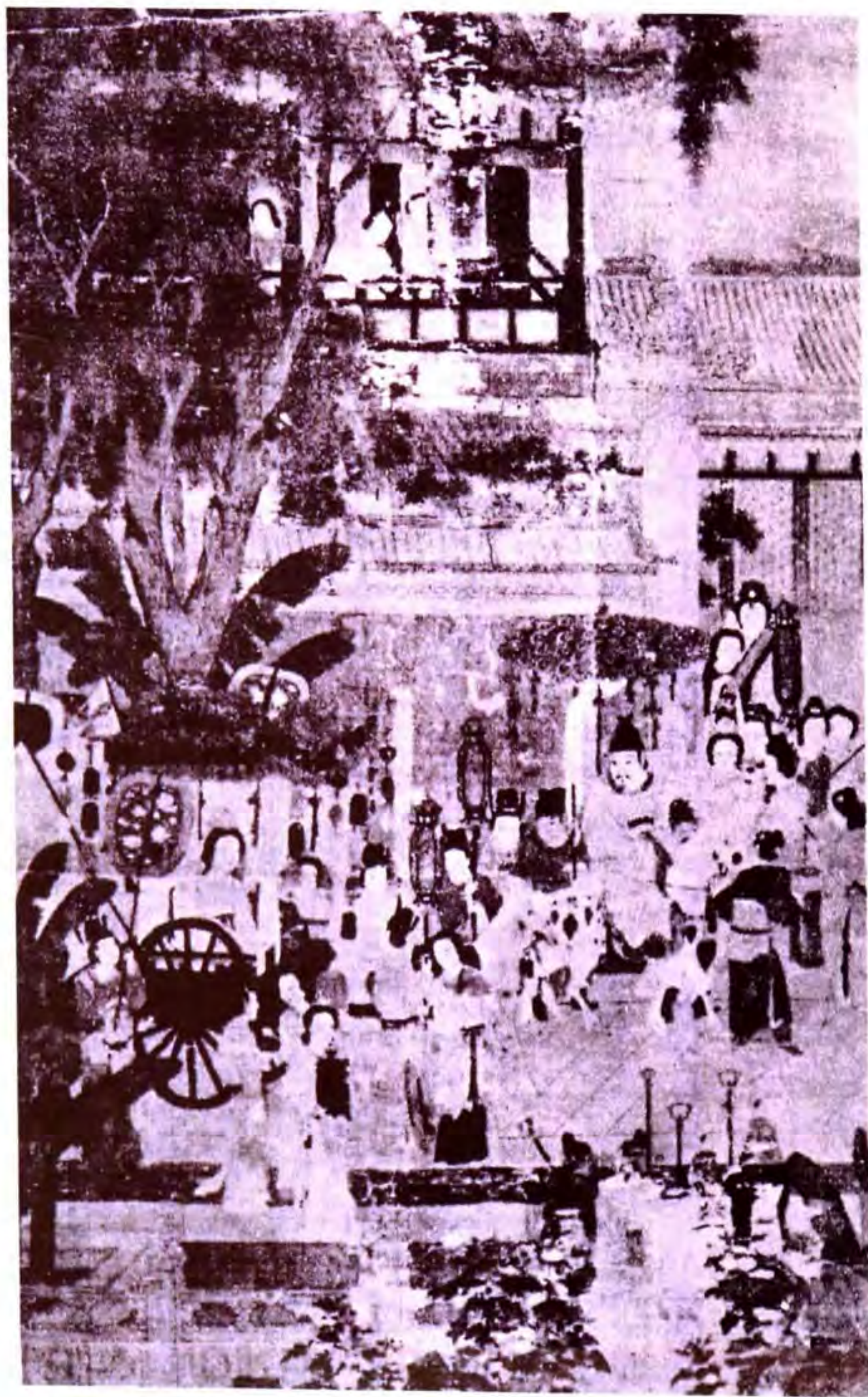
高4.1厘米，口径5.6厘米，底径2.9厘米

杯用白玉制成，口部内外镶金一周，造型、制作精美，是隋代玉器中的精品。



## 《隋炀帝夜游图》

选自明人绘《帝鉴图说》  
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时，又在洛阳城西建西苑。西苑周围100公里，苑内有人工湖，湖上造蓬莱、方丈、瀛洲三岛，台观殿阁分布其间。北面有龙鳞渠，迂回曲折流注湖内。沿渠建有十六院，每院设一妃子主管院事。炀帝喜欢于月夜携宫女骑马游园，往往弦歌达旦。此图描绘了炀帝夜游西苑的情景。



布着由纵横街道划分出来的坊、市。据记载，郭城内有南北向街十一条、东西向街十四条。实地考察发现，皇城以南有南北向街十一条、东西向街十条。通南面的三门和贯通东西六门的六条街道是主干大街，除一条东西向街宽55米外，其余皆宽100米以上。其中皇城南的正门朱雀门至明德门的南北中轴线——朱雀大街，宽达155米，是今天北京长安街宽度的两倍。各街道均路面起拱，两侧设有排水沟。纵横街道形成了棋盘式格

局，将郭城划分为二市一百零八坊（一说一百一十坊），在中轴线两侧对称排列。其中皇城两侧及其南面的坊最大，而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坊最小。坊内设有十字街道，坊周有夯筑的围墙，四面各开一门。二市位于皇城东南和西南。东南称都会市，西南称利人市，各占两坊之地。市内辟有井字形街道，临街开设店铺，市中心为管理机构。整个城市的管理十分严密，把一般居民区与皇室、官衙分开，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防卫。各坊入夜则实行禁闭，不得随意出入。两市严格遵守日中击鼓而开，日没而闭的制度。居民、市场都被局限在四周设置高墙的里坊之中，以便于控制和管理。这些都体现了封闭式城市布局的鲜明特点。

## （二）洛阳城

洛阳漕运交通方便，可解决粮食物资供应问题，加之地位适中，便于照顾全局，因此，隋炀帝初即位，就于大业元年（605）命尚书令杨素、将作大匠宇文恺等负责营建东都。新城建在洛阳西约20公里处，十个月建成。随后将旧城居民和各地的富商大贾迁往新城居住，隋炀帝本人也常住这里，洛阳成为全国政治、经济的又一中心。

从整体规模看，洛阳城不及大兴城，其规划布局虽然也是由宫城、皇城、外郭城组成，却与大兴城有所不同，它更多地体现了对南方城市特点的借鉴，充分注意了对河流和交通便利条件的利用，对工商业区的重视及合理安排等，构成了隋洛阳城的鲜明特色。

隋洛阳城的宫城位于全城的西北隅，近方形。宫城由若干座小城组成。洛城居中，平面呈方形。东西宽1030米。洛城东西两侧为东、西隔城，隔城东西各宽约330米。东西隔城外侧又分别设置东、西夹城。东西各宽



约180米。在东夹城以东另置东城。东城之北是隋唐时期赫赫有名的含嘉仓城。宫城南面为皇城。在宫城之北，还有玄武城、曜仪城和圆璧城。皇家禁苑建在洛阳城西，周围二百里。外郭城位于宫城、皇城的南面和东面，南宽北窄。城墙夯筑，东墙长7312米，西墙长6776米，南墙长7290米，北墙长6138米。城之南、北、东三面开有八个城门，已探出门址，皆三个门道。城内街道纵横相交，洛河从城中穿流而过。已探出洛河以南的南北向街十二条，东西向街六条，洛河以北南北向街四条，东西向街三条，通城门的街道一般都在41米至59米宽，其中从南城建国门（唐称定鼎门）通往皇城正门的大街，宽达121米。据记载，洛阳城共有一百零三坊，分列于纵横街道之间。坊呈方形，内有十字街道，四周有坊墙，四面开门。另辟有三市，即位于城东北的通远市、城东南的丰都市和城西南的大同市。三市皆依傍河渠，其中丰都市最大，市内有纵横街道各三条，四面各开三门。而东北部的通远市，因面临通济渠，实际上成为南北大运河的水运枢纽，“天下舟船，集于桥东，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贾贸易，车马填塞于市”。

一般认为，中国城市的布局在隋唐时期已经形成制度，并为以后的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以后虽然有局部的变化，但总的讲，这种布局的完备体系一直在延续，并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影响。遗憾的是，隋代城市的建筑物早已荡然无存。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看，此时已出现超大型建筑。傅熹年先生认为：通过在工官主持下的长安、洛阳的大规模建设，逐渐形成了唐代的官式建筑，创造了一代新风。据敦煌壁画和云冈石窟浮雕中的建筑形象可知，北朝建筑以土木混合结构为主，南朝木

构技术较先进，隋及唐前期建筑虽无实物存在，但把敦煌壁画此时期代表作中所绘的成熟的木构建筑形象和北朝壁画中土木混合结构的建筑形象相比，可看到巨大差异和进步。这是南北统一，互相融合，南朝先进木构建筑技术北传中原和关中的结果。把近年发掘的隋唐建筑遗址作一平面排比，就可以看到这些超大型殿宇逐步摆脱了夯土建筑物的扶持，发展为独立的木构架的进程。在两京建筑中，洛阳尤为明显地表现出南朝都城规划和木构建筑技术的迹象。此外，史料记载，隋代在建筑重要工程（如汾阳宫、明堂等）时，已经使用了设计图纸和模型。

### 三、天下奇巧——赵州桥

赵州桥，又名安济桥，位于河北赵县城南2.5公里处，横跨于洺河之上。据唐中书令张嘉贞撰写的《石桥铭序》，知此桥由隋朝工匠李春设计营造，建于开皇至大业年间（595—616）。史料记载，中国早在西周时期（前11世纪—前771）就已经在渭水上架设浮桥，东汉时期（公元25—220）出土的画像砖上，已有拱桥的图形。而至今尚存的最古老的石拱桥，就是隋朝的赵州桥。

赵州桥为敞肩式单孔石桥，全长50.82米，桥宽9米，主拱净跨37.02米，拱矢7.23米。结构上最直观的特点是跨度大，弧形平缓。这样既降低了桥面的坡度，扩大了通水面积，又便利交通。赵州桥采用了纵向并列砌筑法。桥体由28道并列的拱券砌筑，每道拱券自成一体，能独立站稳，倘若一道拱券损坏，不致影响全桥。这种方法，可以一道一道拱券施工，十分方便。为了加强横向联系，防止倾斜，又采取了勾石、收分、蜂腰、伏石“腰铁”连接加固，增强了整体稳固性。而在桥身设置敞肩拱，更是世界桥梁史上的





赵州桥石栏板

隋

1952年河北赵县赵州桥址出土

长212厘米，高84.5厘米  
栏板一侧浮雕双龙对穿岩穴  
的图像，质感、力度很强，极  
其灵动传神。

首创。敞肩拱，即在主拱的两端又各建两个小拱，小拱的净跨为2.85米和3.81米，使主拱的肩部敞开，既增大了泄洪能力，减轻了流水对桥身的平推力；又节省石料，减轻了由于桥体自身重量而产生的压力，从而增强桥梁的稳定性。敞肩拱的设置，还使整座桥梁显得轻灵秀丽，增加了观赏性。历代不少诗人将赵州桥赞誉为“新月”、“长虹”、“苍龙”、“玉环”等，更令这座古老的石桥成为一道艺术的景观。这种艺术性还直接体现在桥面栏板和望柱的精美雕刻上。桥面两侧共有42块栏板及望柱，如今的栏板、望柱都是1955年国家拨款加固修复后的仿制品。在对石桥勘察修复过程中，曾经在河床内挖出历代大小桥石1200余块，其中包括碑刻、栏板、望柱、狮子头、仰天石（安置栏板、望柱的脚石）等，大多残破。石质均为石灰石，色泽或青润或灰白，其中年代较早的石质青润，雕刻制作精美。各式青龙的雕刻图案与唐张嘉贞《石桥铭序》中的描写相吻合，应为隋代原物。雕龙栏板和望柱均为半圆雕刻，龙的形态各异，若飞若动，具有胜似透雕的艺术效果。另外，在雕龙望柱上，有安置柱头的榫眼。按《赵州志》所载，唐高宗龙朔年间（距隋建桥不过五六十年）有狮子柱头，隋朝望柱上装有狮子柱头的可能性极

大。这些出土的隋朝雕龙栏板和望柱，无疑是隋代雕塑艺术的精品。

赵州桥外形美观，设计精巧，结构合理。据1955年修缮时测量，这座古桥虽然历经近一千四百年的车来人往，以及洪水、地震的冲击，桥基仅沉降了5厘米左右。其坚固稳定，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

#### 四、制瓷与织锦的新变化

##### （一）织锦

锦是一种彩丝提花织物。中国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属于采用两种以上的彩色丝线提花的重经织物“经锦”。隋代是织锦技术发展的重要阶段。原来认为中国纬锦出现于盛唐时期，但是考古工作的新发现，将这一时间提前了。在位于新疆吐鲁番东南约40公里处的高昌阿斯塔那墓葬群中，出土了6世纪中晚期的纬锦，也就是说，至迟在隋代已经能够织造纬锦了。纬锦提花的技法原本是西亚、中亚一带游牧民族的毛织物织造方法。在罗马晚期和波斯萨珊王朝时期，那里的纺织工匠从中国输入了养蚕术和提花机后，便把他们传统的织毛技术应用到织锦上，于是出现了纬锦。隋朝时，这种波斯锦开始返传中国。据《隋书·何稠传》载，隋



文帝时，波斯人曾献锦袍，极为华丽，文帝命何稠仿制，何稠的新锦织成，竟超过了波斯所献的锦。

纬线显花工艺，从技术上讲比经线起花简单，而且克服了传统经线起花不能随意变化花纹、色彩的缺陷。纬线提花织出的图案、色彩更加多样化，组织也更加紧密，而且斜纹组织长浮线织法，能够更充分地显示出丝的光泽，从而使织物更加细致精美。纬锦工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织锦工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隋锦的图案，仍然流行北朝后期出现的连珠纹纹样，连珠纹内往往又套有对禽对兽的纹样，这种装饰纹样也是从中亚、西亚一带传来的。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隋墓中出土的牵驼纹“胡王”字锦、方格兽纹锦、连珠对孔雀“贵”字纹锦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隋代织造技术的水平。

## （二）制瓷

与前代相比，隋瓷的品种增多，器形多样，除日常生活用具外，还有各种雕塑品和明器等，而且产品比较精致，许多器物上附有花纹装饰。装饰方法有印花、刻划花、贴花等。

隋代青瓷的窑址，已发现与发掘的主要有河南的安阳窑、巩县窑，河北磁县窑，安徽淮南窑，湖南湘阴窑，江西丰城窑以及四川成都窑等。不同地区出土的青瓷，在造型、胎质、釉色和花纹装饰上都有不同的特色。一般讲，隋代青瓷的胎体较为厚重细密，胎色因产地不同而异，但以灰白色居多。釉为青色或青中泛黄，有的则呈黄褐色。从窑具的使用看，南方，特别是湘阴窑已经广泛使用筒形匣钵，对提高产量与烧成优质产品起到了促进作用。北方仍以支烧具最多，且形制复杂。化妆土的普遍运用是隋代制瓷工艺



上的一大进步。化妆土即在上釉前，在胎体上施一层白净细腻含铁少的瓷土作护胎釉，采用这种方法既可减轻胎体表面的粗糙，也能增加胎体的白度，从而使釉色更加莹润，具有玻璃质感。

在青瓷烧制的基础上，白瓷产生了。白瓷与青瓷的惟一区别，是胎釉原料中含铁量甚少。虽然白瓷在南北朝时期已露端倪，但是真正烧制成功却是在隋代。隋代白瓷主要出土于北方的陕西、河南地区，在河南安阳发掘的隋开皇十五年（595）张盛墓中，出土白瓷70多件。瓷器造型十分丰富，有日用器皿及日用器模型棋盘、几、凳、柜等，还出

方格兽纹锦

隋

1968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收藏

长18厘米，宽13.5厘米  
此锦用红、绿、白、黄、蓝五色丝线织成。格内为狮、牛、象写实纹样，其中狮和象是中亚、西亚文化中常见的图案。



土了器形较大的侍吏俑、武士俑、镇墓兽。特别是侍吏俑，在其头发、眉毛、胡子等部分，还成功烧制出了黑彩。在西安郊区隋大业四年（608）李静训墓中，也出土了一批白瓷，胎体洁白，釉面光滑，胎釉中已经完全看不到白中闪黄或白中泛青的痕迹。其中有一件龙柄连体瓶，造型奇特，制作精致，堪称隋代白瓷的佳作。1982年在河北内丘与临城交界的贾村发现了隋代烧制白瓷（亦烧青瓷）窑

址一处，后来在内丘城关又发现了隋唐时代的窑址。内丘窑与贾村窑相类似，同属一个瓷窑系统，有着共同的特征，说明在唐代最负盛名的邢窑白瓷以前，白瓷在这一地区已经发展起来，并达到了一定高度。窑址中出土的白瓷残片，胎厚仅0.3厘米至0.8厘米，测定结果表明，胎料中氧化铝含量高达26.8%，而氧化铁仅含0.34%，这反映出北方白瓷所具有的高铝低铁的特点。氧化铝含量大幅度增

白瓷龙柄连体瓶

隋

1959年陕西西安李静训墓出土

高18.6厘米，口径4.5厘米，腹径6.3厘米

此器造型独特，经1300℃高温烧制而成。由于控制并降低了瓷土中的含铁量，其胎、釉已不见白中泛青的现象，表明隋代白瓷烧制工艺已走向成熟。





加,说明它是在1300℃以上高温下烧成,这证明隋代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还原烧造技术。隋代白瓷的烧成,是隋代烧瓷取得的重大成就,在中国烧瓷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并为后世白瓷的进一步发展和彩瓷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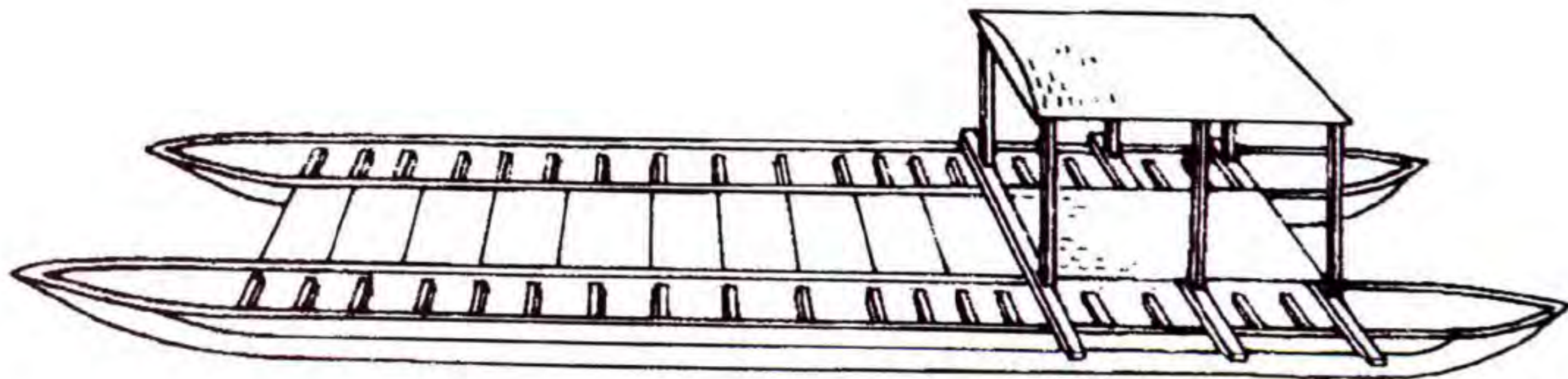
## 五、造船

隋代造船业具有相当的规模,这与当时军事需要、经济发展以及皇室奢华、游乐的需求有关。史料中有关记载颇多。隋初为了渡江平陈,杨素在永安(今重庆奉节)监造战船,其中有巨型战舰“五牙”,舱面舰楼五层,高达一百余尺。前后左右设置五十尺高的“拍杆”,前端缚有巨石,用于拍击敌船。五牙舰能容纳士兵八百人。此外,造有能容纳一百人的中型战船“黄龙”和小型战船“平乘”、“柂艚”等无数,可知规模之大。大业初年,炀帝已有攻打高丽的意图,将与高丽隔海相望的东莱(今山东莱州)海口作为打造舰船的基地,并遣元弘嗣前往监造,同时发数州工匠昼夜赶制舰船,总量达数百艘。第一次征高丽为横渡黄海,第二次则是沿海岸曲折航行。毫无疑问,隋代已经有能力打造规模宏大的海船了。大运河开通后,在这条南北物资交流的大动脉上,“商旅往返,船乘不绝”。经济的发展,水路的畅通,也促进

了造船业的兴盛。江南一带造船历史悠久,技术力量雄厚,民船数量众多。隋政府因为害怕老百姓利用船只出没江海,进行反抗,曾下令将百姓私造的三丈以上大船全部没收,这反映了当时民间造船业的发展。又如,炀帝下江南巡游江都,曾遣黄门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采木,造龙舟等数万艘。龙舟亦为楼船的一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起楼四层,上层有正殿、东西朝堂,中间的两层有一百二十间房,皆饰以金玉,下层为内侍用房。炀帝游江都一次出行,除龙舟外,还有皇后乘坐的“翔螭”凤舟和浮景、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等各类船舶,以及平乘、青龙、艨艟、艇舸等战船达数千艘,由后妃、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将士等乘之。光挽船的纤夫,就多达八万余人。船只首尾相接,长达100多公里。炀帝曾三次游江都。第三次巡游前,由于以前的船只在杨玄感起兵时被烧掉了,又下令再造船数千艘,形制大于旧者。可知当时的造船规模以及造船技术都是不可低估的。

尽管史料记载很多,但是隋代船只遗存的实物或实物模型却极少,亦未留下船只的图像资料,所以无法详知当时船舶的形制、结构。1975年,在山东平度泽河东岸发现了一只由两条U型独木舟联成的隋代双体木船。每只船体宽1米左右,由三段整枫香树

双体船图





## 青瓷鼠、牛、猴俑

隋

1955年湖北武汉出土

高15.3厘米至16.5厘米

这是十二生肖俑中的三件，均为兽首、人身、盘坐态。中国古代用天干、地支纪年、记时。在秦简中已有关于十二生肖的记载，至迟在汉代已把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相配，叫十二属相。十二生肖俑始于隋朝。

剡制、衔接而成。船体间用二十余根横梁连接，横梁两头穿过船身两侧，用铁钉固定。上面铺有甲板，甲板一端有建筑遗迹。船体两侧还附加翼形板。船残长20.24米，最宽处约2.8米，可载重23吨左右。双体船稳定性较好，运载量较大，中国古代称这种船为舫或方船。战国时期已有舫船的记载，在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出土铜鼓的纹饰上，发现有双体船的图像。隋代双体船则是中国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双体船实物。

该船出土地点在隋代打造海船地区，位于莱州湾南面的冲积平原上，距渤海湾仅1.5公里，潍河、胶莱河等多条河流流经其间，注入渤海。古船底部淤积土层中有红螺等多种

海生动物遗壳，表明该地在隋代尚是海滩。由此可知，这种双体船既用于内河，又可驶于近海，是种两用船。船体出土时，有明显的火烧痕迹，所以有人认为这是一条战船。

## 六、被埋没的皇极历

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相当突出，这与古代天子“受命于天”、“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有关。这种观念认为，王朝的统治若能与天象（自然）规律相吻合，则基业稳固。因此，历代王朝莫不设专官观测天象，修改历法。这种传统导致了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极为丰富、历法也备臻精确的状况。隋代天文学成就的代表作是刘焯的皇极历。





刘焯（544—610），字士元，信都昌亭（今河北冀州）人，是隋朝著名学者和天文学家。他在观察研究日、月视运动不均匀性的基础上，首次将南朝刘宋时何承天创立的定朔法引入了他的皇极历，并首创二次等间距内插法的计算公式，解决了采用定朔法的计算问题。定朔法即首先考虑月视运动的快慢，采用日月相合（同时出没）的真实时刻定朔日，从而定朔望月。而此前的历法都用平朔法，即用日月相合周期的平均值来定朔望月。以定朔法取代以往的平朔法，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而且，皇极历采用的天文数据也相当精确。如回归年长度为365.24454日，朔望月长度为29.530596日，采用破章法，在676年中设置249个闰月。又如岁差率，由于太阳运动存在不均匀性，所以古人观测到太阳在黄道上冬至点的位置有移动，这个冬至点在黄道上的移动距离，就是岁差率。东晋虞喜发现了岁差现象，并且计算出岁差率为59年相差1度，后来祖冲之认为应是45年11个月相差1度，刘焯则认为约75年相差1度，这 and 现代测定的结果71年8个月已经很接近了。当时西方还是用100年差1度的数值。

由于对隋朝当时颁行的开皇历提出批评，刘焯受到攻击，并曾被逐出京城。他的皇极历于开皇二十年（600）编成，却遭到冷落，不被采用。大业四年（608），刘焯抱憾而终。

刘焯的皇极历是当时最先进的历法，为唐朝制定出更进步的历法开辟了道路。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唐朝采用了李淳风依据皇极历制定的麟德历，定朔法付诸实行。李淳风在其撰写的《隋书·律历志》里，对皇极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将其详细录入《律历志》，使皇极历成为中国历法史上惟一

被正史记载而未颁行的历法。

## 七、转型期的书画

隋朝很短暂，但是如果把它放到魏晋南北朝至唐朝的历史进程中去，隋代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隋代的书画艺术在统一南北的基础上，继承了魏晋南北朝以来书画艺术的成果，同时又有新的开创，为唐代书画艺术的繁荣开辟了道路。

### （一）书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书法的审美功能继续强化，逐渐形成了南北两大风格体系。南方书法以王羲之为代表，形成了妍美流便的新书体风格；北方书法则以“魏碑”为代



《千字文》（局部）

隋 智永真书

智永曾在山阴（今浙江绍兴）永欣寺出家为僧，人称“永禅师”。相传他早年闭阁学书三十年，秃笔成冢。成名后，时人求书如市，以致门槛都被踏烂了，以铁皮包裹，名曰“铁门槛”。



表,仍以粗犷豪放、具有隶韵为主流。隋代书法更多地继承南方风格,追求华美成为一种趋势。隋朝楷法从粗犷浑朴向严谨闲雅转变,已开唐代楷法的先河。如《龙藏寺碑》,虽然仍未脱隶书笔意,但结体方正有致,笔画秀朗细挺,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清人评此碑已开唐初书家虞世南、褚遂良之先声。而《董美人墓志》在总体上已无隶书痕迹,已经是成熟的楷法了。其字布局整齐缜密,结构恭正严谨,笔法精劲,被誉为“隋志小楷第一”。隋朝书家的代表是释智永,他是王羲之的七世孙,能作各体书。传有《真草千字文》,系用楷、草二体对照写成。其楷体圆劲古雅,草体丰美匀适,承袭了王羲之的遗风,对初唐书家亦产生重要影响。一般来说,唐初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大书家,均以楷书著称,他们的楷书都属于王羲之系统。

## (二) 绘画

隋朝出现了一批著名画家,有郑法士、

董伯仁、展子虔、杨契丹、尉迟跋质那、阎毗等,其中郑法士、董伯仁、尉迟跋质那善画佛像,郑法士尤长于人物,董伯仁最善画台阁,展子虔亦善画山水、台阁、人马。可惜的是,只有展子虔有作品传世可考,即《游春图》,此图是现在所能看到的中国最早的山水画。山水画虽说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经开始萌芽,但至今尚未发现独立成幅的作品,山水多是作为人物画的配景而出现,在描画和构图上也存在非自然、不合理的缺陷,往往“人大于山,水不容泛”(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游春图》展现了山川辽阔、翠岫葱茏、碧波荡漾的春色,而以骑马、荡舟、游乐的人物作点缀,图中人、马、山、树比例适中,境界廓大,层次合理,描写自然,远近山川有咫尺千里之势。画面用细笔勾勒,以石青石绿敷色,在青绿重彩主调中,又间以红白诸色,色调明快强烈。从绘画技巧看,继魏晋山水画的稚拙而趋向成熟,首开唐代“青绿山水”之先河,对唐代以李思训、李昭

### 《游春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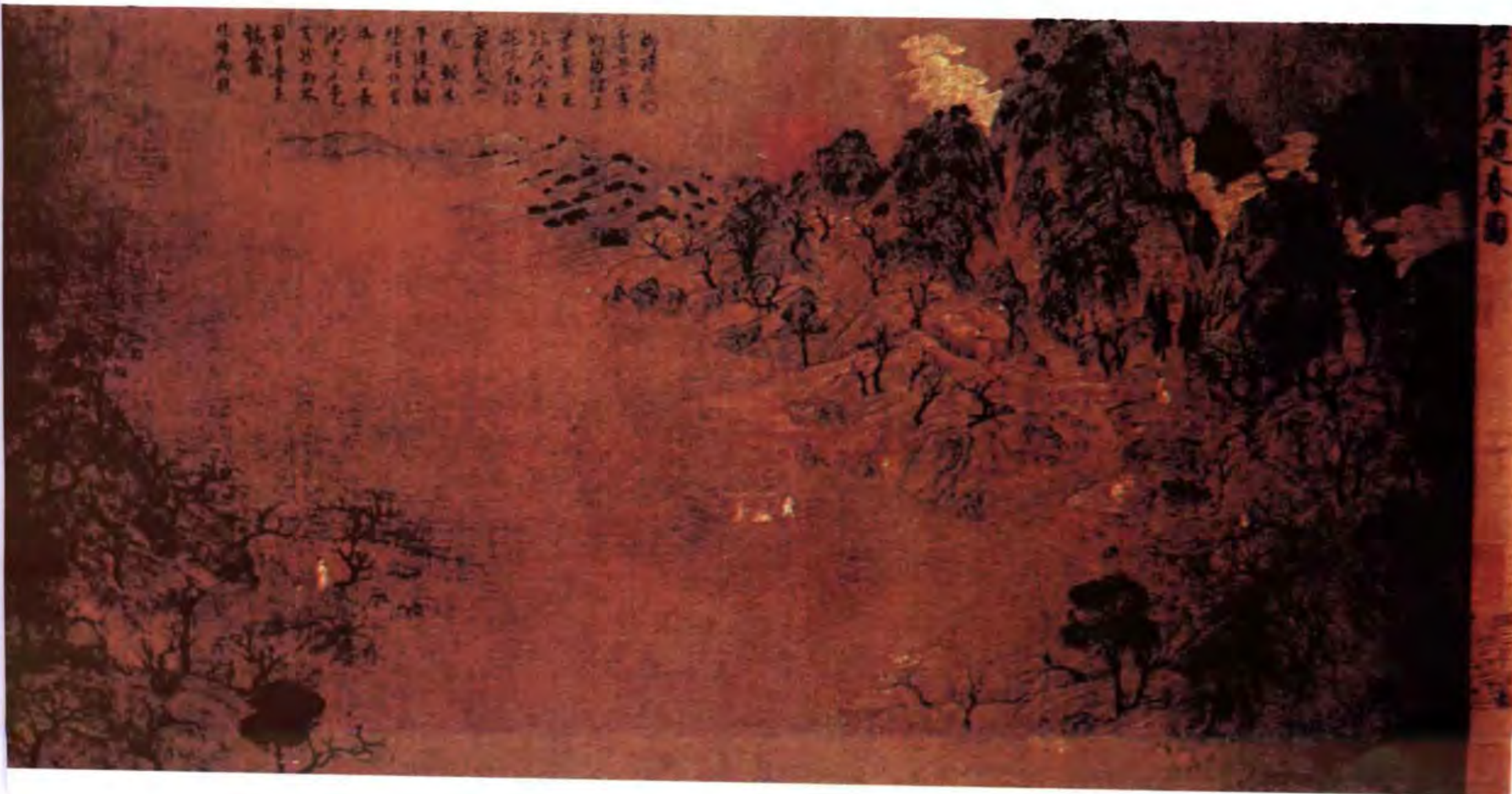
隋 展子虔绘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绢本

纵43厘米,横80.5厘米

此画卷首有宋徽宗赵佶题“展子虔游春图”六字,为中国存世最早的卷轴山水画。其绘画技法上的创新对后世山水画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道父子为代表的青绿山水画家影响极大。但其山石只空勾轮廓、不加皴斫的画法，仍保留了从六朝脱胎出来的古拙痕迹。在山东嘉祥英山1号隋墓，还发现了一幅画于墓室壁画中的屏风上的山水画。有人认为，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独立的山水画作品，说明隋代的山水画已经真正发展起来了。

此外，从敦煌壁画看，隋代中期开始，壁画的题材及艺术风格等方面都呈现出鲜明的过渡特色。在题材上，除了沿用一些原有的题材外，新出现了经变画。经变画后来发展为唐代壁画题材的大宗。隋代壁画人物的面相逐渐丰满起来，鼻梁降低，耳朵加大，已经表现出较强的民族风格。从壁画的色调上看，已经不像早期壁画那么阴森、狂热和冷酷，而是逐渐开朗，逐渐富于人世的欢乐色彩。这种发展趋势，到盛唐达到极致。这些都反映出隋代绘画转型期的特点。

## 八、走向世俗的佛教

隋唐时期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鼎盛时期。北周武帝灭佛（574）仅仅几年后，在隋朝杨坚、杨广两代皇帝的大力扶持下，佛教又重新兴盛起来。

隋文帝以振兴佛教为己任，力倡佛法。581年，他普诏天下，听任百姓出家，令计口出钱营造佛像。他召集高僧大德入京，在名刹宣讲佛法，并于京城造浮屠安放舍利。

仁寿年间，隋文帝又三次下诏，在全国一百一十六州修建佛塔一百一十三处。第一次在仁寿元年（601）于三十州建塔，第二次在仁寿二年于五十三州建塔，第三次在仁寿四年，又于三十州建塔。陕西曾发现一块流落民间的塔铭，现藏法门寺博物馆。据塔铭铭文看，是隋仁寿元年根据文帝诏书在岐州岐山县修建的凤泉寺塔塔铭，建塔时间完全

是按照诏书的圣命执行的，建塔费用主要来自民间。又，陕西耀县的隋神德寺塔为仁寿四年所造，也是文帝命百余州建的舍利塔之一。其塔基形制与北魏时期已有所不同。北魏将装有舍利的石函直接埋于塔基下的夯土层中，隋朝则在舍利石函的四周砌以护石和砖墙，这已经是地宫的前身了。石函内有装舍利的铜盒，一起埋入的还有铜净瓶及金银环、玉环、玛瑙、水晶、料珠、铜钱和波斯银币组成的所谓“七宝”等。这代表了隋朝瘞埋舍利的制度。

隋炀帝更自称为“菩萨戒弟子”，大肆崇佛。他以国家的力量支持僧徒续修旧经，翻译新经，立寺度僧，行道造像，并优礼僧徒，常带着他们一起巡游天下。由于皇室的积极扶持，佛教势力在隋代三十余年间迅速发展。全国共建佛寺3985所，僧尼达博二十三万余人，翻译佛经约九十部、五百余卷。史载，当时民间流传的佛经竟多于儒家六经数十百倍。隋朝以后，中国求法高僧从印度本土取得的梵文佛经原本日渐增多，这反映了中国译经事业的成熟。

隋唐佛教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出现了在佛教理论、寺院经济方面有着相对独立性的佛教宗派。从隋至唐先后出现了八个宗派，其中天台宗（创始人智顗）和三论宗（创始人吉藏）出现于隋朝。佛教宗派的出现，是在佛经大量输入和翻译的基础上吸收融化的结果，反映了佛教在中国的成熟程度，也标志着佛教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

佛教世俗化、中国化的进程也反映在佛教艺术中。我们知道，佛教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运用各种艺术手段来传播教化，如寺塔建筑、石窟艺术，还有渗透到民俗中去的文学、艺术等，不仅制造供人奉养的佛像，还将佛经中的内容用绘画、雕塑的形式表现出



敦煌莫高窟 419 窟造像  
隋



来，因而有很强的直观效果。隋朝以后，佛教在文学艺术各个领域的传播手段越来越成熟、多样化，这些突出表现在隋代的石窟艺术中。

隋朝佛教复兴后，在立塔建寺的同时，也开凿了大量石窟，其遗迹主要散见于北方各地。其中以莫高窟最多，有八十多座，数量上仅次于唐朝。成组大型彩塑的出现，是隋代石窟艺术的一个特征。即将佛、菩萨、弟子像组合在一起，有的还增加了天王、力士的护法像。造像题材由前代对释迦牟尼和弥勒的信仰为主，过渡到对阿弥陀佛和菩萨信仰的重视，具体表现为阿弥陀佛和菩萨像的

比例增加。这种变化反映了在佛教信仰普及的社会基础上，下层群众的信仰要求和佛教的世俗化。隋代造像的身体比例还不大协调，头大，肩宽，下身偏短，但是形象更加中国化。与早期的慈悲沉静而与世疏远的形象相比，这时期造像的面部线条变得柔和而显得平易亲近了。壁画的题材，除了沿用北朝时期的佛传、本生和因缘故事题材外，新出现了作为佛经图解的经变画，如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变、维摩诘经变、法华经变等，这意味着多佛信仰的形成。这时期壁画的色调也变得温暖、柔美而更接近人世了。这一切都反映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作为





北京房山云居寺雷音洞  
隋

一种文化模式，外来影响逐渐减少，形式、内容都越来越本土化。最初的石窟艺术是从西向东传播的，这在中国石窟的开凿时间、顺序以及内容形式上都留下了明显的轨迹。然而到6世纪中期，中原地区的石窟模式已经开始影响西部地区。总之，佛教这种民族化、世俗化的发展趋势，为唐代佛教的进一步繁盛开辟了道路。

在隋代佛教发展中，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隋幽州智泉寺僧静琬于北京房山云居寺镌刻石经。刻经缘起于静琬依据佛说“诸法无常”的教理，相信佛法分为三个时期：正法时期（佛教兴起时期）、像法时期（演变期）、末法时期（衰退期）。鉴于北魏和北周时曾两次灭佛，静琬担心书写的经文难以久存，所以发愿在房山刻石经，以备“未来佛法难时拟充经本”。从大业十二年（616）至唐贞观年间的三十余年中，静琬刻各种佛经146块。静琬死后，其弟子在皇室和地方官

吏的资助下，继续刻经事业。除五代战乱时期停顿外，历辽、金、元、明、清七个朝代，前后绵延一千余年，镌刻佛经1122部，3572卷，14061块。分别藏于北京房山云居寺的藏经洞和压经塔下。其中隋唐时期刻造的石经版有4196块。现在对外开放的雷音洞，就是当年静琬刊刻石经的起源处，面积最大，中间以四根八角形石柱支撑洞顶岩石，石柱各面雕刻佛像1056尊，故称千佛柱，为隋代遗物。洞体作不规则方形，每面约10米。静琬最初所刻石经就镌在四面洞壁上。有关专家指出，目前全世界仅存两套较完整的石经，一套是刊刻大乘佛教经典的云居寺石经；另一套是以巴利文刊刻的小乘佛教经典，现存缅甸，仅有700块石版。后者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不能与云居寺石经相比，云居寺石经成为世界上稀有而珍贵的文化遗产。



## 第三章

# 大唐帝国的兴衰



唐代，号称大唐盛世，这是一个令中国人骄傲的时代，是古代中华文明发展的巅峰，是中国历史长诗中的华彩篇章。

618年，在隋末战乱中起兵的太原留守李渊于长安称帝，建立唐朝；随后陆续消灭了南北各地的割据武装，统一了全国，大唐盛世之门由此开启。唐朝前期，天下从大乱走向大治，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安定、发展局面。历经武周时代的持续发展和财富积累，至开元、天宝时期，唐朝进入了全盛阶段，其时经济繁荣，文化灿烂，国力雄厚，声威远播，号称“盛唐”、“开元盛世”。就在唐朝盛极之时，“安史之乱”爆发，虽然最终被平息下去，但唐朝也从此由盛转衰。唐中期以后，内乱外患交困，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纷争，异族入侵，国势江河日下。唐朝末年各地的武装起义最终为唐王朝奏响了挽歌。907年，唐朝为节度使朱温所灭，从而结

束了近三百年的统治。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之一，也是疆域最为辽阔的王朝之一，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阶段。唐王朝先后征服了势力雄强的突厥以及高昌、于阗、龟兹、焉耆、疏勒等周边政权，使得疆土空前扩展，统治力量远达漠北、西域。唐朝最盛时，拥有东临大海、西达咸海、北越贝加尔湖、南到南海的广阔疆域，控制的户口最多时达九百余万户、五千二百余万人，是当时世界上疆土广大、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大帝国。

唐朝是古代经济、文化全面发展、高度繁荣的历史时期。农业兴旺，耕地面积与粮食产量空前增长，仓廩丰足，国家富庶；丝织品、唐三彩、瓷器、金银器、铜镜等手工业成果多姿多彩，至今仍是国之瑰宝；印刷、造纸、天文、历法、地理、史学、医药学等



都取得重大进展：书法、绘画、雕塑等艺术成果美不胜收，许多作品成为后世经典；传奇、散文等文学成果流芳百世，唐诗更是光耀千古，脍炙人口，在中国文学史上竖起了一座丰碑。

唐朝又是对外开放、与世界联系密切的时代。尤其是盛唐时期，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空前频繁，不仅使中华文明在亚洲各国广泛传播，并由此远达欧洲、非洲，同时吸取了外来文化因素，使中国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遍布中国及世界的数量惊人、璀璨瑰丽的各种唐代文物，无不向人们展示着这一中华古代盛世的风采。

## 第一节 晋阳起兵

晋阳是一座古城。据史籍记载，它始建于春秋时期，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隋唐时代，它曾地位显要，十分繁华。如今，古城只剩下几截断壁残垣矗立在山西太原西南的残墙周围。

一千多年以前，这里曾经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兵变。正是这场兵变，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王朝，开启了大唐盛世之门。

617年，隋炀帝大业十三年，春。此时的隋王朝已是危如累卵，大厦将倾。各地武装反抗行动风起云涌，统治集团内部也已众叛亲离，地方贵族官僚纷纷拥兵自立，割据一方，中原遍地烽烟。隋炀帝无力回天，只能南避江都，及时行乐，苟且偷安。

就在隋炀帝醉生梦死于江南美景之中时，三千里外的晋阳城里，太原留守李渊的府邸之中，一场兵变正在紧张地密谋策划。

这场兵变的主角李渊出身关陇军功贵

族，家世显赫。李渊祖父李虎是北周开国功臣，被追封为唐国公。父亲李昀也是北周高官柱国大将军。李昀与李渊父子两代先后袭封唐国公之位。隋代北周后，李氏家族是皇亲贵戚，李渊更加官高位显。隋朝末年，各地起兵造反之际，李渊被隋炀帝任命为太原留守，执掌兵权，受命镇压造反武装。李渊内藏二心已非一日。一来是看到隋王朝气数已尽，无可挽回；二来也是因为身家性命岌岌可危。大业兵乱后，他虽被委以重任，但生性猜忌的隋炀帝对这位表兄弟其实并不信任，不断派人监视他，并曾流露出恨其不死之意。李渊如同坐在火山口上，朝不保夕，所以早已萌生反意，只是等待时机而已。

这年四月，瓦岗军进攻东都洛阳，与官军决战，隋军主力被各地武装力量牵制；而隋炀帝滞留三千里外的江都，道路隔绝，对北方已失去控制。看到时机成熟，据守晋阳的李渊终于下了造反的决心。随从他在晋阳的次子李世民也有造反之志，并且早与晋阳令刘文静、亲信裴寂等私下密谋，结交豪杰壮士，联络四方人马，准备起兵。父子二人与亲信们密商大计，决定诈称接到隋炀帝的密诏，以防突厥、高丽为名，在太原、西河

晋阳古城遗址

位于山西太原晋源区





等地广招兵马。受隋炀帝委派监视李渊的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察觉情况有异，准备对李渊采取行动。五月十五日，得到密报的李渊先行一步，将二人抓捕入狱。

随后，李渊集团拟定了攻取长安、占领关中的战略计划。六月，李渊秘密召回在河东（今山西永济一带）看家，同时暗中活动、纠集兵马的长子李建成以及女婿等，在晋阳聚合了三万大军。七月，李渊正式发兵。出征前誓师，并发布檄文声讨隋炀帝的罪孽，表示要“废昏立明”。此后大军挥师西征，进取关中，直指长安。由于隋军不堪一击，百姓、官吏归附者甚众，一路进军顺利，十月已兵临长安城下。出兵时人马仅有三万，攻至长安时已聚合成二十万大军。

十一月，唐军攻占长安。李渊迎立隋炀帝孙子代王杨侑为恭帝，改元义宁，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并自命为大丞相，晋升唐王。入城后，唐军约法十二条，废除隋朝苛政，获得了百姓的好感与支持。

大业十四年（618）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杀。五月，李渊废掉傀儡隋恭帝，正式登上皇帝之位，建国号为唐，改元武德，仍以长安为都城，成为唐朝第一代皇帝——唐高祖。

## 第二节 扫灭群雄

在陕西礼泉的唐太宗陵墓——昭陵北麓，曾经排列着一组大型高浮雕骏马石像，这就是驰名中外的“昭陵六骏”。

六骏石刻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可惜在19世纪20年代遭到破坏。其中的两件被盗运到国外，其余四件也被打成碎块，修复后存于陕西省博物馆。现存的这四件石刻，虽然

破损，还是能够看出它们的气势与生动形象。骏马姿态各异，有的昂然站立，有的奋蹄飞驰，一匹匹矫健雄强，生气勃勃。

这六匹马的名字很特别，分别是：白蹄乌、青骢、特勒骠、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騧。据专家考证，其中有几匹马的名称是从少数民族语言音译过来的，这有一定的道理，当时的好马确实都出自西域等少数民族地区。根据记载，白蹄乌为四蹄皆白的纯黑色马，青骢是苍白色杂毛马，特勒骠毛色黄里透白，什伐赤是纯赤色马，飒露紫是纯红色马，拳毛騧是黑嘴头黄马。其中的拳毛騧与飒露紫流落国外，其余四匹我们还能在博物馆观赏到它们的英姿。

六匹骏马不同凡响，它们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坐骑，是唐朝的开国功臣。诗人的《昭陵六骏歌》赞道：“唐家创业扫群雄，马上得之为太宗。真人出世姿神武，驰骋纵横驾六龙。”

出身军功贵族的李氏集团在建立唐朝后，以“武德”作为王朝第一个年号。他们正是依靠武力征伐在马上获得天下的——先以武力横扫隋军，建立了王朝，其后又依靠武力统一了天下。

李渊登基建唐之后，并没有真正成为天下之主，唐政权的势力范围不过关中一带。隋朝末年崛起的群雄仍然各自割据一方，唐朝面临着四面受敌的艰难局面。与其他割据势力相比，李渊集团并不是一开始就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但是他们明显地比其他势力更富有政治经验与军事谋略。对于各地的割据势力，唐政权采取了以武力征伐为主，辅以拉拢瓦解的战略措施。

当时唐政权周围存在着几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东面有隋朝官僚王世充建立的郑政权、魏公李密领导的瓦岗军，他们占据中原



洛阳一带，不断交战；窦建德领导的人马占据河北，并建立了夏政权。北面有依附突厥自称皇帝的刘武周武装势力，不断南下，并进占唐根据地太原；梁师都建立的梁政权，占据北面朔方、延安等郡。西北有“西秦霸王”薛举、薛仁果父子，占有陇西之地，号称军士三十万，并向东推进，欲取关中；“河西大凉王”李轨，占据河西五郡。南方则有杜伏威军占据江淮一带。李密在唐政权的政治攻势下，于武德元年（618）带兵投奔长安，瓦岗军的威胁已经基本消除。面对余下的四方强敌，李氏父子采取了先西后东的战略部

署。武德元年，李世民率军西征薛仁果，薛兵败举城投降；继而俘获李轨，平定河西。武德二年，杜伏威请降，江淮归入唐统治之下。武德三年，李世民率军经过激战，打败刘武周，收复太原，占领河东。武德四年，以李世民为首的唐军打败王世充与河北的窦建德十余万大军，占领东都洛阳，控制了中原、河北。至此，北方基本平定。此后，唐军顺江东下，直取南方割据江陵的梁王萧铣，萧开城投降。武德六年，唐军又兵发江淮，打败杜伏威余部辅公祐，长江下游、东南一带也为唐占领。原窦建德军的刘黑闥于武德四年

#### 昭陵六骏

飒露紫（左上）

拳毛騧（右上）

白蹄乌（左中）

特勤骠（右中）

青骊（左下）

什伐赤（右下）

唐

飒露紫和拳毛騧现存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余藏陕西省博物馆。





重新聚众造反并自立为汉东王，也于武德六年最终被唐军扫平。至此，李唐政权经过六七年东征西战，基本统一了中原与南方。这场中原逐鹿之战最终以唐王朝的胜利而告终。

在这场持续数年的统一天下的战争中，李渊次子，后来成为唐朝第二代皇帝的李世民，驰骋疆场，西平薛举父子，北灭刘武周，东败王世充、窦建德，骁勇善战，功绩卓著。“昭陵六骏”正是陪伴李世民南征北战的六匹战马，它们为主人立下了赫赫战功：

白蹄乌，武德元年李世民与薛仁果作战时所骑。

特勒骠，武德二年李世民与宋金刚作战时所骑。

飒露紫，武德四年唐军攻打东都洛阳，李世民与王世充作战时所骑，马前胸中箭，被丘行恭救援脱险，所以石像雕刻了丘行恭为马拔箭的形象。

青骊，李世民与窦建德在虎牢作战时所骑，当时马身中五箭。

什伐赤，也是与窦建德在虎牢作战时所骑，马臀部曾连中五箭。

拳毛騧，武德五年李世民与刘黑闥在洛水激战时所骑，马中九箭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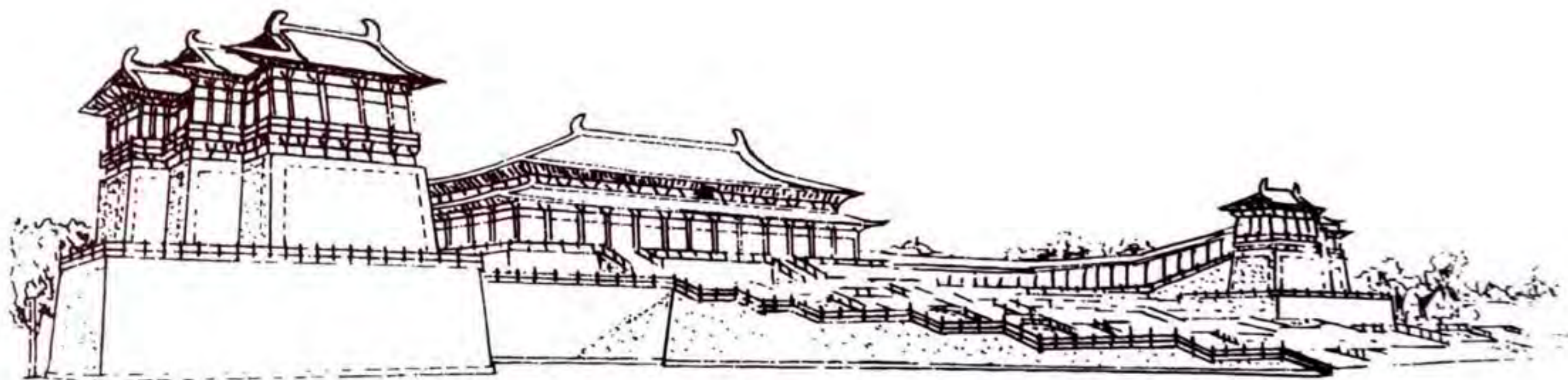
有感于六骏的功绩，唐太宗命令工匠雕刻了它们的形象，将它们置于自己的陵园之中，以便永远纪念它们，让它们永远陪伴自己。

### 第三节 宫门喋血

太极宫是唐朝初年的皇宫和朝廷所在地，位于长安城中轴线北端（今西安西北），是唐朝三大皇宫中最早兴建的一座。现在遗址处尚残存有两处宫墙的遗迹。皇宫北门即后门，名为玄武门。在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刀光剑影、骨肉相残的血战，那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这是一场胜利者内部的权力之争。李渊有三个儿子，他们都参与了起兵反隋、平定天下的战争，协助父亲夺得了天下。长子李建成与次子李世民都立下汗马功劳，但是，无论是起兵之日，还是战争之中，李世民的功劳、名声显然远远超过其兄长。他率领的十三万兵马是唐朝取得天下的主力。李渊当皇帝后，按照古代立嫡以长的传统，立长子建成为太子，立李世民为秦王。但是李世民功高过人，又胸怀大志，同时在战争中形成

大明宫含元殿复原图





了自己的势力，他并不甘心让兄长继承皇位，他的秦王府属下也极力怂恿鼓动。一场皇位继承权的争夺战势不可免。在斗争中，李渊的四子、齐王李元吉站在了太子一方；而李渊对于名声过盛、势力雄厚的秦王李世民也有猜疑，常常倾向太子一方。兄弟之间勾心斗角，矛盾重重，相互打击，甚至投毒谋害，已成你死我活之势。他们各自培植党羽，发展势力，准备进行最后的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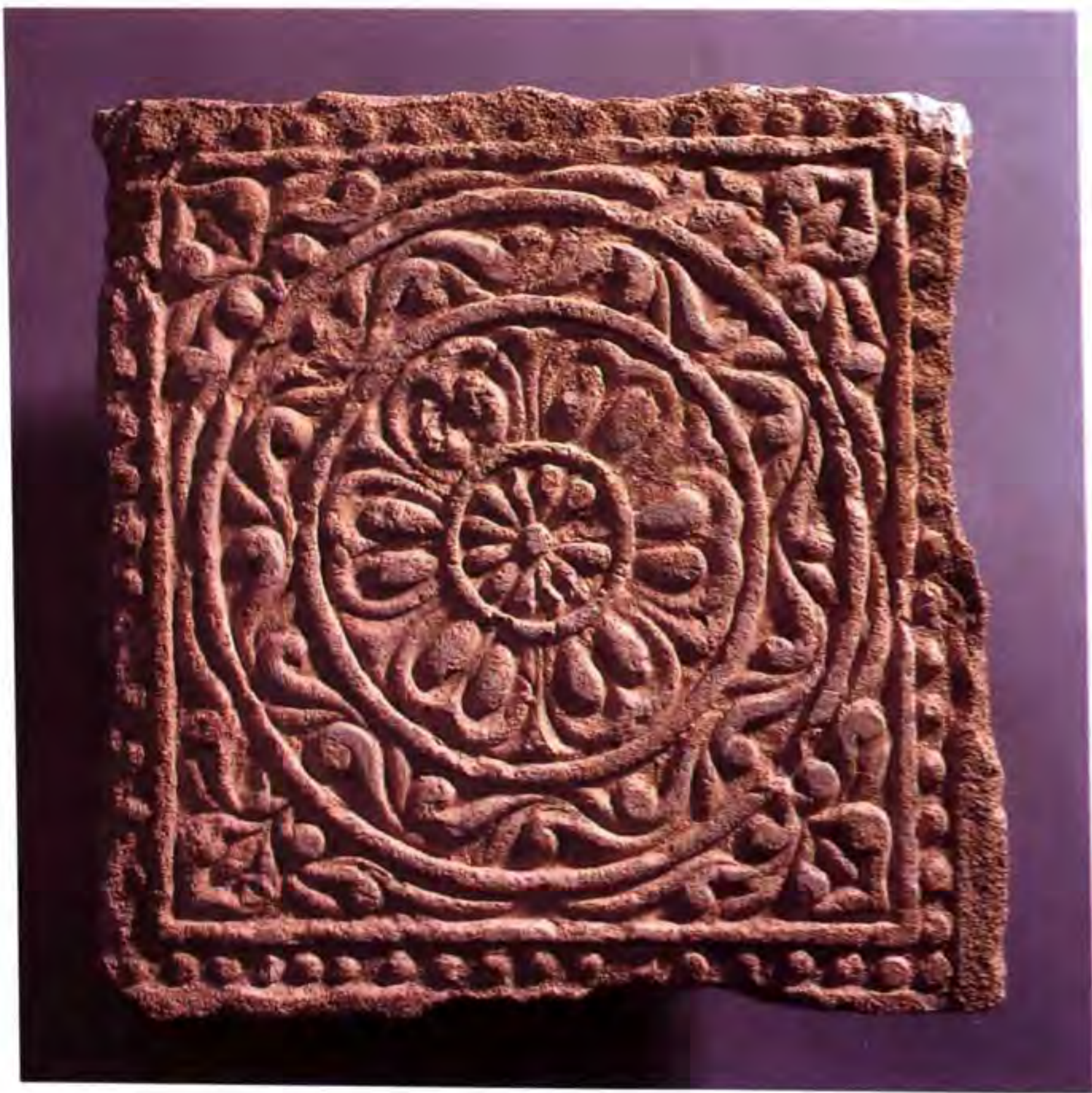
武德九年（626），由于形势急迫，李世民与秦王府臣僚决定先发制人，发动政变。六月四日，李世民派兵埋伏于玄武门内，袭击上朝的太子建成与齐王元吉，与两府卫兵进行激战，最终将二人杀死；其后又进宫胁迫李渊宣布诏令，命令诸军听从秦王命令，兵戈随即平息。事后，李世民杀死建成、元吉的诸子，彻底清除了两兄弟的势力。一场同室操戈、骨肉相残的宫廷政变以李世民一方获胜而告终。

玄武门事变后，二十九岁的李世民登上了太子之位。两个月后，他即位为皇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唐高祖李渊被迫退位，做了太上皇，从此结束了政治生涯。

唐太宗上台后，为了显示孝心，于贞观八年（634）在长安城东北角的龙首原上兴建大明宫，以供父亲避暑。

唐代长安有三大皇宫，太极宫是在隋朝大兴宫基础上建立的，唐朝初建便以此为皇宫；大明宫是唐太宗时开始修建，第三代皇帝唐高宗时进行扩建后，迁往此处听政，此后朝廷主要设在这里；兴庆宫在长安城东面偏北，为唐玄宗所建，是他的主要居住地。依照方位，太极殿称“西内”，大明宫称“东内”，兴庆宫称“南内”，统称“三大内”。三大皇宫中以大明宫占地最广，规模最为宏大。

大明宫遗址在今西安东北城郊，东西宽



1.5 公里，南北长2.5 公里，是三大皇宫中保存遗迹最多的一处。逶迤起伏的城墙、高耸的宫殿台基和园林池沼的遗迹，今日仍依稀可辨。现已探查出殿台亭阁三十余处，经过发掘修整，大明宫的面貌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今人面前。

大明宫因为建在龙首原上，依地势起伏建造楼阁宫殿，因而显得气势磅礴。据记载，天晴日朗之时，伫立在大明宫高处，放眼可望终南山，俯视可见长安城内坊市街巷。今日登临遗址，仍可想见当年楼阁凌霄的壮丽景象。可惜的是，太上皇李渊没有等到享受宫殿的清凉与美景便去世了。后来，唐高宗因患病嫌太极宫潮湿，遂改建大明宫，迁往大明宫居住听政。此后直至唐末，朝廷基本都设在这里，大明宫成为唐帝国的主要政治中枢。二百多年间，在这里曾上演了一幕幕治乱盛衰、悲喜交替的历史剧。

大明宫有三十多座宫殿，是唐代宫殿建

方花砖

唐

1958年陕西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

长32.9厘米，宽32.5厘米，厚6厘米





莲花纹方砖

唐

1958年陕西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

边长33.5厘米，厚7.3厘米

筑的代表作。正殿含元殿高耸于龙首原南沿，如今留下的宫殿遗迹仍高出地面15米。根据发掘，得知殿基东西宽76米，南北长41米；殿面阔近60米、11间，进深4间，可知这是一座非常高大而宽敞的宫殿。据说当年

在丹凤门仰望含元殿，犹如天上琼阁，庄严巍峨。这里是举行重大朝会和颁布诏令的地方。北面的麟德殿规模最大，由三座宫殿前后连接组成，是皇帝举行宴会或接见外国使节、宾客的地方。盛唐诗人王维有“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名句描绘这里的朝会景况，可以想见当年宫殿大开、万国来朝的盛景。诗人王建《宫词》道，“直到银台排仗合，圣人三殿对西蕃”，也描绘了皇帝在麟德殿宴请外国宾客的情景。据记载，这里曾经宴请过来自七十多个国家的外宾，也曾宴请过三千五百名神策军将士，可知宫殿之大。

龙首原北坡下有一片洼地，这里是宫中湖泊太液池遗址，《长恨歌》中有“太液芙蓉未央柳”的诗句，可知这里长满荷花；中间有一土山，是当年池中的假山——蓬莱山的遗迹。当年皇帝曾在这里休闲、听讲、与大臣议事。

唐朝由盛转衰后，大明宫内也曾发生过宦官杀戮朝官、血流成河的“甘露之变”。唐朝末年，黄巢攻入长安后，也是在大明宫宣告大齐政权建立。大明宫历经二百余年沧桑，成为唐朝治乱盛衰的历史见证。

#### 第四节 贞观善政

陕西关中渭河以北的山岭上，迤逦散布着唐朝的十八座皇帝陵墓，唐朝的二十一个皇帝除了末期的昭宗、哀帝葬身他乡外，十九个都埋葬在这里（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一处），被称为“关中唐十八陵”。唐陵多是依山而建，与后世帝王陵寝相比，显得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极为壮观。唐陵地面上保留了许多大型石刻，已开掘的墓中出土了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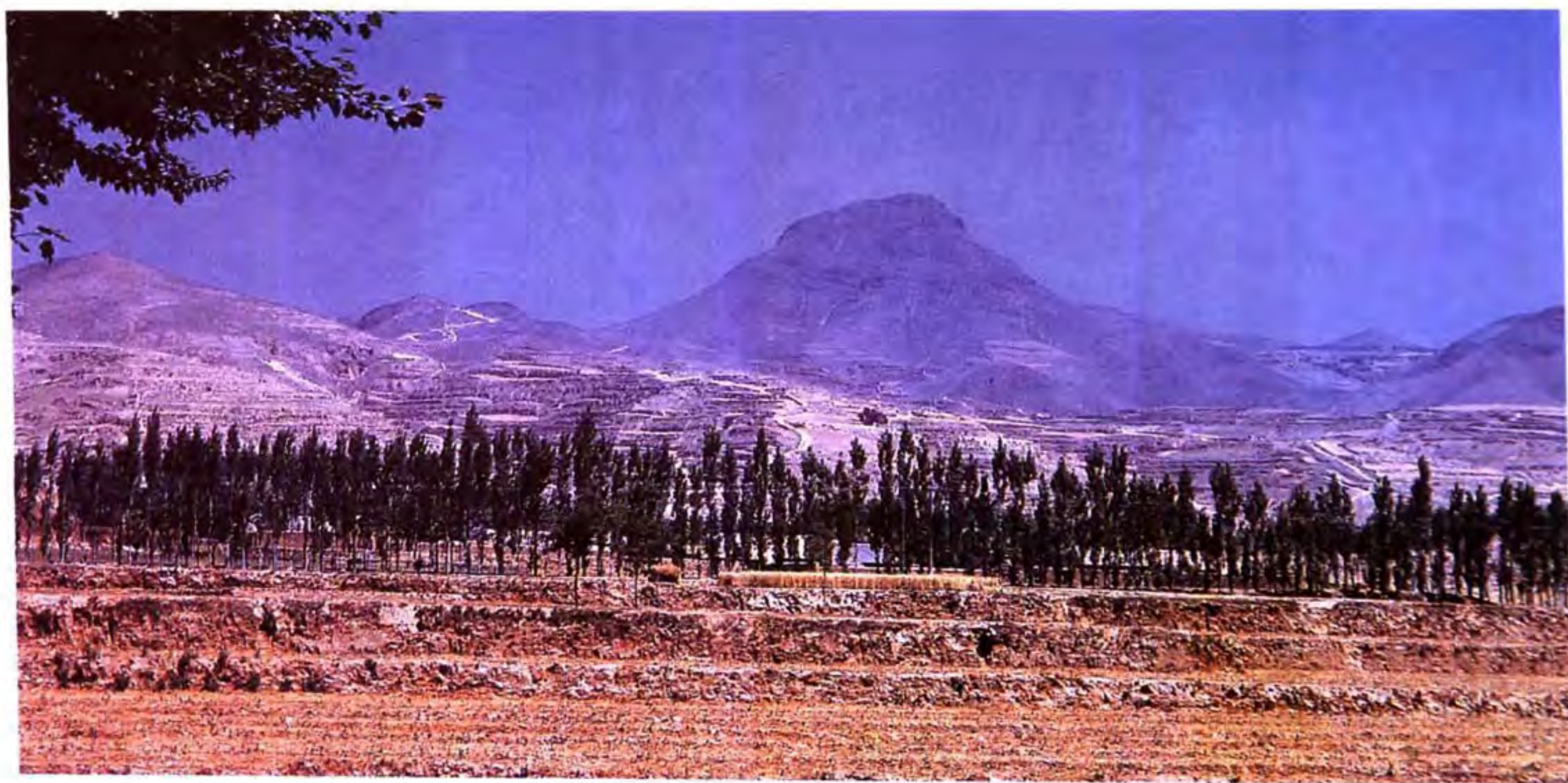


兽面花纹残砖

唐

1958年陕西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





塑、绘画等诸多盖世艺术珍品，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群。在这些陵墓中，陕西醴泉东北九嵎山主峰上的昭陵最为引人注目，号称“天下名陵”，不仅是因为此处山峰高耸、陵墓宏大，更因为它是唐代最著名的皇帝唐太宗的陵墓。

昭陵是十八帝陵中陪葬墓最多的一座，也是最大的帝王陵园，正与唐太宗的历史地位相匹配。据记载，当时地上建筑富丽堂皇，规模与长安皇宫相近。如今地上建筑早已毁坏，仅存几处废墟。

陵园中除唐太宗与皇后的陵寝居高临下外，还有 167 座陪葬墓列侍两旁，墓中埋葬的都是唐太宗的辅佐功臣与皇亲贵戚。其中魏徵、李靖、李勣(徐懋功)的墓尤显得与众不同。魏徵墓在太宗陵寝近处的凤凰山上，墓碑是唐太宗亲自撰写。李靖墓的建造象征阴山(今内蒙古大青山)与积石山(今青海境内)，李勣墓象征阴山、铁山(今辽宁铁岭山)、乌德鞑山(今蒙古杭爱山)，标志着他们对突厥、吐谷浑、薛延陀等作战的辉煌战绩。另外，引人注目的是，陪葬墓还有一些

少数民族将领的墓，如阿史那社尔、阿史那忠、史大奈、李思摩等，他们都在唐政权中担任高官，并为唐王朝立下功勋。

陵墓祭坛内除了唐太宗的战马“昭陵六骏”的石刻，还有十四国君主的石刻像，包括：突厥颉利可汗(唐封右卫大将军)、突厥突利可汗(唐封右卫大将军)、突厥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赐姓李，唐封右武侯大将军、化州都督、怀化郡王)、突厥答布可汗(唐封右

昭陵外景  
唐  
位于陕西礼泉



唐太宗像



武卫大将军，娶衡阳公主，为驸马都尉）、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吐蕃赞普（即松赞干布，唐封西海郡王，娶文成公主）、新罗乐浪郡主金真德、吐谷浑乌地也拔勤豆可汗（唐封河源郡王）、龟兹王诃黎布失毕（唐封右骁卫大将军）、于阗王伏闼信（唐封右骁卫大将军）、焉耆王龙突骑支、高昌王麴智盛（唐封左卫将军、金城郡公）、林邑王范头利、婆罗门帝那伏帝王阿罗那顺。这些宝贵的石像也早已被毁，只存几座像的题名像座和几件残头、残体石块。根据清朝人的记载，石人像都是深眼高鼻，身佩弓刀，非常雄壮。

这些陪葬墓与石刻像不仅真实地反映了

当时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密切关系、唐王朝万国来朝的盛况，也显示了唐太宗作为“天可汗”，对于“夷夏”“视之如一”的恢弘气魄与统治谋略。

如同这座雄伟的帝陵一样，唐太宗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在中国历史上也立起了一座丰碑。他统治下的唐朝开始进入兴盛发展阶段，出现了大治局面，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诗人白居易曾写诗歌颂唐太宗的功业，诗中赞道：“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旆黄钺定两京，擒充戮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

彩绘釉陶文吏，武官俑

唐

1972年陕西礼泉郑仁泰墓出土

高69厘米，71.5厘米

墓主郑仁泰是唐初的一位重要人物，参加过晋阳起兵和玄武门之变，死后陪葬昭陵。





唐太宗在打天下中已显示了超群的武功，他登上帝位之后，大兴文治，又显示出卓越的政治见识与才能。贞观善政流传青史，历代传颂。他知人善任，求贤若渴，任用了一大批有才干的贤能大臣，贞观中朝廷人才济济，其中最著名的有：名相房玄龄、杜如晦，以直言谏诤著称于史的魏徵、王珪，忠直博学的虞世南，出将入相的李靖、李勣。正是在这一群文臣武将的忠心辅佐下，才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治世。尤其是鉴于隋炀帝不听逆耳忠言导致亡国，唐太宗特别注意虚心听取大臣谏诤，接受反对意见，并能改正错误，以能容纳逆耳之言著称。这一点超越历代皇帝，成为唐太宗最为人称颂之处。魏徵正是因为一生进谏二百余事以匡正过失，并多次冒着获罪的危险犯颜直谏而成为历史上的名臣。在唐太宗的鼓励倡导下，贞观时期大臣直言进谏形成风气，成为政治清明的重要原因。唐太宗纳谏的故事也成为千古佳话。为了长治久安，唐太宗经常与大臣们一起探讨治理天下之道，这些言论后来被编为《贞观政要》一书，成为后世统治者的政治课本。唐太宗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等政治言论也成为千古名言。唐太宗的善于用人与纳谏被认为是古代帝王中独一无二的。

在唐太宗统治下，贞观时期进行了政治改革，修订了各项典章制度：改定官制，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这一制度影响深远，一直沿袭到清代；精简各级行政机构，省减官员，节约财政开支；修订唐律，完善兵制，发展改革科举制，兴办学校，整顿吏治，严格赏罚，等等。同时，唐太宗大力倡导节俭，节省开支，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减免百姓负担，以发展生产。这些措施使得经



乾陵石狮  
唐  
位于陕西乾县

过隋末丧乱满目疮痍的社会迅速得到恢复发展，仅十几年时间便出现了“马牛布野，外户不闭”、“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的太平景象。

在经过数年休养生息，国力增强之后，唐太宗兴兵北灭东突厥、薛延陀，西平吐谷浑，征服西域诸国，又以和亲联络吐蕃，唐朝的边患基本解除。由于唐朝声威远播，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和国家纷纷遣使进贡，归附于唐，并且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唐朝疆域大大扩展，“东西九千五百十里，南北万六千九百十八里”。唐太宗实行了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在武力征服后，注意改善民族关系，尊重、优待少数民族首领，任用他们为高官、将领，许多蕃将在战争中屡建奇功，从而开创了“胡越一家，自古未有”的局面，实现了对于多民族国家的有效治理。唐太宗去世后，一些少数民族将领、首领纷纷要杀身殉葬，唐高宗派人告谕说太宗遗嘱不允许，后来便将各部落酋长十四人刻石为像，列于昭陵。这十四国君主像正是当时多民族国家



和唐太宗开明民族政策的真实记录。

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因病去世，年仅五十一岁，死后葬于昭陵。由于唐太宗的文治武功，他被后世奉为明君，成为皇帝的楷模。今天，他仍然是人所公认的中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中华民族历史上有贡献、有作为的伟大人物。

## 第五节 武周革命

在唐朝十八帝陵中，与唐太宗昭陵齐名的是他的儿子唐高宗的乾陵。但是，这座帝陵的名声与人们对它的兴趣却主要不是因为唐高宗，而是因为他的妻子、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乾陵俗称“姑婆陵”，这是独一无二的两个皇帝，而且是两个

朝代的皇帝的合葬墓。“突兀乾陵接碧霄，秋风落日草萧萧。百年帝后无双冢，万古周唐说两朝。”清人的《乾陵》诗便说到了两朝皇帝合葬一处这一亘古未有之事。

唐朝开国六七十年后，发生了一段改朝换代的插曲——女皇帝武则天建立了周朝。实际上，唐朝的历史中包括了这个维持了十五年的短命朝代，只是由于人们的正统观念，往往不把它列入朝代中。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则天的合葬陵，位于今陕西乾县城北的梁山上。它气势雄伟，建筑规模宏大，被认为是唐陵之冠。目前地上的建筑虽已无存，但是可贵的是留下了一百二十多座大型石刻，在唐陵中为数最多，包括华表、石人、石马、石狮、翼马、鸵鸟等，造型生动、雄浑，是唐代石刻艺术的代表作。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朱雀门两侧的六

乾陵六十一宾王像  
唐  
位于陕西乾县





十一座宾王石像，它们整齐排列，身穿紧袖长袍，腰束带，足登靴，拱手而立。这是参加唐高宗葬礼的六十一位使节，从衣着可以看出是西北少数民族和西亚一带人物。可惜的是，不知何年何月，石人头全部被毁掉，只剩下无头身体矗立于陵前。据考证，乾陵地宫尚未被盗，幽宫重启之日，必将展现给世人一座举世罕见的宝库。

除了帝陵外，还有十七座陪葬墓，埋葬的是高宗的子女与大臣。已经发掘了五座，包括武则天第二子章怀太子墓、孙女永泰公主墓、孙子懿德太子墓、大臣薛元超墓、靺鞨族将军李谨行墓，出土文物4300多件。墓中保留了大面积内容丰富的精美壁画、唐三彩等珍贵文物，其中的《侍女图》、《狩猎出行图》、《礼宾图》、《观鸟扑蝉图》、《打马球图》等壁画真实地再现了唐代宫廷生活与政治活动场景，不仅是艺术奇珍，而且是研究唐代历史的形象资料。

除此而外，乾陵还矗立着两座石碑。一座是“述圣纪碑”，碑高7.5米，原刻5500多字碑文，现在尚存1600多字。碑文大意是记述唐高宗的生平、业绩，传说是武则天撰文、其子唐中宗李显书写。东面的另一座碑十分蹊跷，碑身极为高大，是一块完整的巨石，高7米多，碑额有螭龙盘绕，碑侧各刻升龙一条，碑座刻有一匹骏马和一只雄狮。由于雕刻精细、高大雄浑，此碑被誉为历代碑石之冠。只是这样一座巨型碑刻却未刻一字碑文，所以被称为“无字碑”。

“无字碑”留下了一个谜，任由后人猜测，从而引起了历史学家的兴趣。对于此碑的来源、无字的原因，人们有各种猜想推论，至今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武则天将自己的功过留与后人评说；有人说是因为武则天自以为功高盖世，无法言表，故不题字；也有人



认为是因为其子唐中宗李显难定母亲的称谓，不知是称皇帝还是母后，故不书写碑文；还有研究者认为那原本就不是一通碑，而是代表宗庙的“石祖”。从北宋起，不断有名人文士在碑上题词记游或抒怀，今日我们看到

《武后行从图》(摹本)  
唐 张萱绘



武则天像



的其实已是一座有字碑。

对于无字碑之谜，人们今后还会猜测、争论下去，尽管有着各种说法，但是这通碑与武则天有关是为多数人公认的。正因为数千年来对于女皇的功过众说纷纭，难以定论，所以人们才将无字碑与之联系起来。我们且看一下有字的史载，了解一下这位女皇帝的生平与功过。

武则天是山西文水人，其父原本是木材

商人，因在晋阳起兵中立了功，唐朝建立后便做了高官。武则天自幼便性格刚强，见识过人。她十四岁时被选入宫中，做了唐太宗的妃妾，被立为才人（妃嫔名号，正五品），并赐号武媚。但是此后的十几年中，她似乎并没有得到太宗的眷顾与宠爱。太宗死后，她与众多妃嫔一起被送入感业寺做了尼姑，其时只有二十六岁。但是，武则天并不甘心陪伴青灯古佛了却一生。在做唐太宗才人时，她便与当时做太子的李治有了恋情。李治即位后，到感业寺进香，两人相见，武氏对之黯然泣下，李治念及旧情也很伤感。正是这次见面给武则天的命运带来了转机。当时唐高宗王皇后正与萧淑妃争宠，得知此事，便让武氏蓄发入宫，企图以其夺萧妃之宠。不料，唐代的历史却因这一后宫争宠的计谋而骤然改观。

武则天二次进宫后，被立为昭仪（妃嫔名号，正二品）。不过数年之间，她依靠心机权术，在后宫连连击败了萧淑妃与王皇后。最终排除朝廷内外重重阻力，于永徽六年（655）登上了皇后宝座。

随着后宫角逐的胜利，又兼高宗性情懦弱，武则天的政治权力欲逐渐膨胀起来。而自显庆五年（660）起，唐高宗的患病更给这位不同凡响的皇后创造了驰骋政治舞台、施展政治才能的机会。她明敏果断，“素多智计，兼涉文史”，先是受高宗委托批阅奏章，处理政事；后来便与高宗一起上朝，垂帘听政，政无大小，皆与闻之；最终天下大权悉归中宫，生杀予夺，决于其口，皇帝只落得拱手而已。当时朝野称为“二圣”。后来高宗病重，头昏目眩，近乎失明，她便一人独揽大权，实际上做了天下之主。高宗也曾经想让位于皇后，只是由于大臣反对而未能实行。高宗死后，她先后立了两个儿子为皇帝，

《升仙太子碑局部》（拓片）

唐

立于河南偃师升仙观旧址  
原碑高6.7米，宽1.55米  
武则天从东都洛阳去登封封禅，途中游览刚竣工的升仙太子庙时撰写此碑文。





即中宗李显与睿宗李旦，但不到一年便将他们废掉，自己仍以太后的身份执掌政权，并自称“圣母神皇”。690年，六十七岁的武则天终于正式登上皇帝之位，废唐朝，建立大周，自称“圣神皇帝”，改元天授，并改名为武曌。历史上称这次事件为“武周革命”。

十几年后，武则天八十二岁病危时，被儿子和大臣挟制，还政于唐中宗，武周王朝结束。她临终遗嘱去皇帝尊号，中宗追谥她为“则天大圣皇后”。

武则天从开始参政，到大权独揽，到建立周朝，直到去世，实际当政近五十年，做皇帝整整十五年。她执政期间，“政由己出，明察善断”，任用贤才，朝政基本清明。她重视农桑，鼓励生产，首创殿试和武举，发展了科举制，繁荣了文化，并重新夺回了安西四镇，巩固了唐朝的边防。这一历史时期，社会基本安定，经济生产得到持续发展，国力有所增长。她继承了唐太宗贞观时期的大治局面，并为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所以被誉为“政启开元，治宏贞观”。当然，她多疑好杀，任用酷吏，糜费资财，大兴佛教，受到后世的批评。不过，综观她的一生政绩和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我们还是可以断言，她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是对中华民族有贡献的历史人物——这正是后人对于无字碑的回答。

女皇帝虽然已经离去千余载，但是她身后留下了许多传说与遗迹。四川广元嘉陵江畔的皇泽寺就是重要遗迹之一。因武则天童年时曾随任利州都督的父亲在广元居住，这里留下许多关于武则天的传说、地名和给武则天过生日的女儿节习俗，皇泽寺也成为武则天的纪念胜地。据说皇泽寺曾是武氏家庙，寺中有则天殿，供奉着被认为是武则天真容的石像。寺中还有宋庆龄的题词和郭沫



乾陵无字碑

唐  
位于陕西乾县

若为则天殿题写的楹联，“政启开元，治宏贞观，芳流剑阁，光被利州”，赞颂武则天承前启后的历史功绩和光耀一方的美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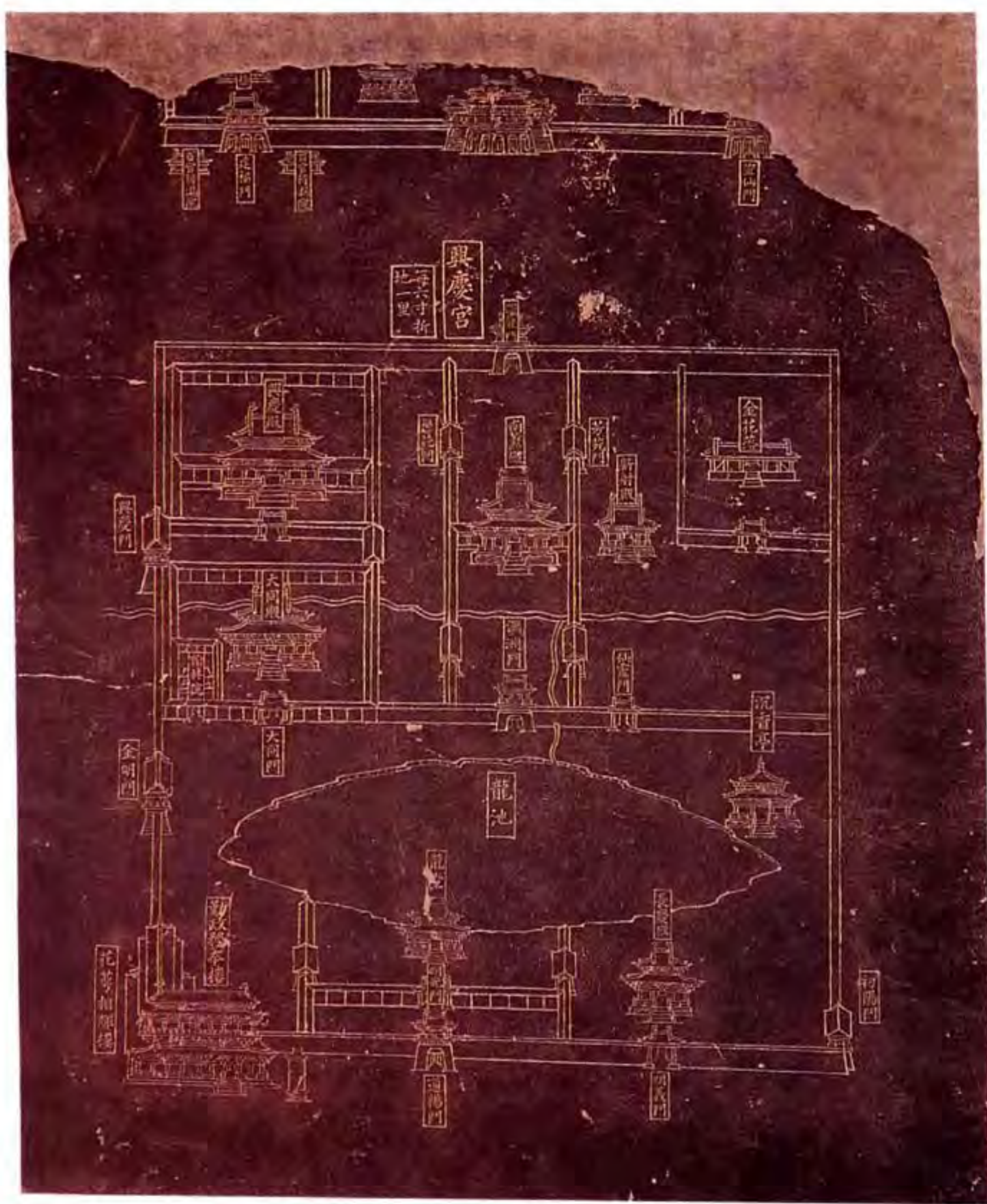
对于武则天的千秋功过，人们见仁见智，还会不断评论下去。但是，她作为中国数千年惟一的女皇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乾陵与无字碑也会永远受到人们的瞩目与研究。

## 第六节 开元全盛

西安市东南的兴庆公园是一座风景秀丽的遗址公园。一千二百多年前，这里曾经是大唐盛世的政治中心、著名皇帝唐玄宗豪华的皇宫——兴庆宫。兴庆宫起初是唐玄宗李隆基做亲王时的府邸，他登基后兴建为皇宫，并在这里处理朝政，度过了一生的主要时光。

在唐代长安的三大皇宫中，兴庆宫规模





《兴庆宫图》(拓片)

原刻石北宋元丰三年(1080)制，现藏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

最小，但风景最为优美。当年这里楼台殿阁豪华富丽，远在太极宫、大明宫之上，更兼园林茂盛，花木葱茏，湖光石色，交相辉映，美景如画。现今在遗址发掘中发现了当年勤政务本楼地基，宫殿柱础与石门槛基本保存完好，并且出土了带有“天宝”年号的瓦当。遗址上如今仿照当年情景挖掘了龙池，修建了一些楼台亭阁，包括著名的花萼相辉楼和李白名句“沉香亭北倚栏杆”中的沉香亭等。来到这里，人们自然会想起当年“开元全盛”的辉煌气象和盛唐皇帝唐玄宗一生的传奇事迹。

唐玄宗李隆基之所以著名，并成为后世许多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多半是因为他与杨贵妃的一段哀艳情史，他被描绘成一位风流天子。其实，这是一位文韬武略兼备、很有

作为的杰出皇帝。正是在他的统治时期，中国历史进入了辉煌的鼎盛之巅——盛唐，或称开元、天宝盛世。

杜甫的名诗《忆昔》深情赞颂了那个令人怀念的时代：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

这个统治着盛世的皇帝有着一番极不寻常的经历，他登上政治舞台的道路艰难曲折。

李隆基是武则天的孙子、唐睿宗的第三个儿子。他自幼性格勇敢强悍，得到祖母的喜爱。武则天去世后，继位的唐中宗昏庸无能，皇后韦氏参与政事。韦氏有效法武则天当女皇之意，她的女儿安乐公主也想成为“皇太女”以继承皇位，只是她们虽有政治野心却缺乏武则天的政治才干。韦后在朝廷结党弄权，发展个人势力，同时排挤潜在的政敌——中宗的弟弟相王李旦与他的几个儿子。

李旦的儿子临淄王李隆基早有不满意，他暗中聚集力量，准备行动。景龙四年(710)，韦后与女儿安乐公主合谋毒死唐中宗，立十六岁的皇子李重茂为皇帝。韦后临朝摄政，总揽大权，韦氏集团势力控制了朝廷。李旦父子等皇室贵族受到威胁，形势险恶，李隆基决定立即发动政变。经过密谋，他发动羽林军趁夜晚攻进皇宫，一举诛杀了韦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铲除了韦氏集团势力，随即奉父亲相王李旦即皇帝位，即唐睿宗。李隆基因功被立为太子。睿宗在位只有两年，便传位给太子。此后，唐玄宗李隆基又与权倾天下、势压朝廷的姑母太平公主政治集团进行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最终彻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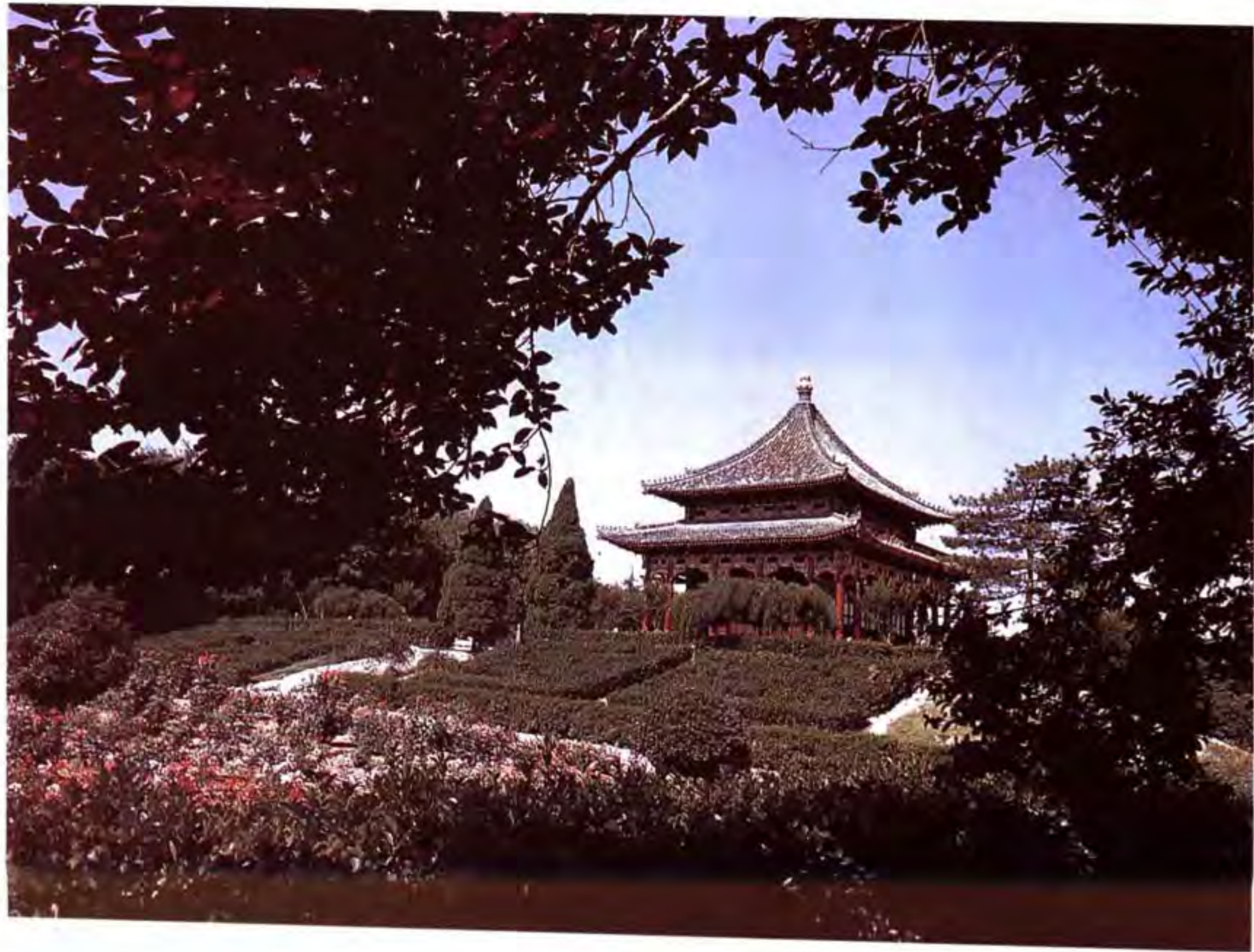
消灭了太平公主势力，把握了政权，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

唐玄宗继位之前，唐朝经历了多年动乱，政变迭起，纷争不断，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唐玄宗登基后，怀着振兴唐朝的志向，勤勉奋发，励精图治。他在兴建兴庆宫时，特意将新建的两座楼命名为“勤政务本楼”和“花萼相辉楼”。“勤政务本”表达了他勤于政事和重视民本的志向。这座楼是颁布诏令、召见大臣和举行重大庆典、宴会的地方，唐玄宗常与大臣在此讲经议政。后者更有深意，鉴于唐朝前期皇室亲属间纷争不断，唐玄宗自己也是靠政变起家，而且不是以长子身份名正言顺继位的，他的兄弟又非常之多，所以他特意根据《诗经》中“常（棠）棣之华（花），鄂不（萼）柎（附）”之意，取名“花萼相辉楼”，希望他们弟兄之间如同花与萼一样相互辉映、相互扶持，避免往昔皇家骨肉相残的悲剧，巩固皇权。唐玄宗在统治期间大力倡导孝道和特别重视手足之情都与此有

关。这座楼面临大街，每逢节日，常在楼前举行庆祝活动，表演歌舞百戏。当时大臣张说的《踏歌词》“花萼楼前雨露新，长安城里太平人。龙衔火树千灯艳，鸡踏莲花万岁春”，描写了元宵节唐玄宗君臣与百姓在花萼楼前观灯的盛况。

通过一系列措施，唐玄宗巩固了皇权，稳定了政局。他任用姚崇、宋璟等名相，整顿吏治，革除弊政，拨乱反正，使得唐朝出现了近半个世纪的安定与大治局面。与此同时，他采取宽平赋役、清省刑罚的政策，并且禁止奢靡，节省支出，改善财政，很快出现了“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的景象。

在唐朝前期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经过数年稳定发展与财富积累，唐朝进入了开元全盛时期，历史上号称“盛唐”。当时唐朝一年可收入粮食一千九百八十万斛，绢七百四十万匹，布一千零三十五万端（每端五丈），钱二百多万缗（每缗一千文）。史书记载，其时“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左



沉香亭

位于陕西西安兴庆宫遗址



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这些描写虽然是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但也反映了当时国家的繁荣富庶。盛唐不仅经济富庶，文化园地也繁花似锦，诗歌、音乐、舞蹈、书法、美术等都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局面。大唐帝国雄踞东方，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盛唐也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值得称颂的巅峰时代永载史册。

## 第七节 山雨欲来

骊山，位于陕西临潼，这里青峰翠峦，温泉激湍，自古就是风景胜地，周、秦、汉、唐历代帝王都曾在此修筑离宫别馆。骊山千百年来吸引游人的不仅是它的如画美景，更重

要的是许多史迹与掌故。其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骊山北麓的华清池——它记载着盛唐的一段动人心魄的历史和一段千古传颂的风流韵事。

唐玄宗开元时期，开始扩建原先的骊山温泉宫。遍山栽植松柏花木，环绕山麓筑起重重金碧辉煌、雕梁画栋的楼台亭阁，有朝元阁、长生殿、飞霞殿、羯鼓楼、集灵台等等，还陆续建造了十余处汤池，除了皇帝御用的九龙池、贵妃的海棠汤（又名芙蓉汤）外，后妃百官都各有不同的汤池。汤池边建有庭院、殿堂等建筑。唐玄宗的汤池用美玉宝石镶砌，中央雕玉莲花，温泉水从莲花中喷出，池中还放置着宝船，堆垒了山岛，以象征仙境。此外还建造了供表演、游戏的按歌台、舞马台、斗鸡楼和球场等。至天宝六年（747）温泉宫改建完毕，更名为“华清宫”。华清宫总体布局严整，建筑华丽，工程浩大，

莲花纹瓦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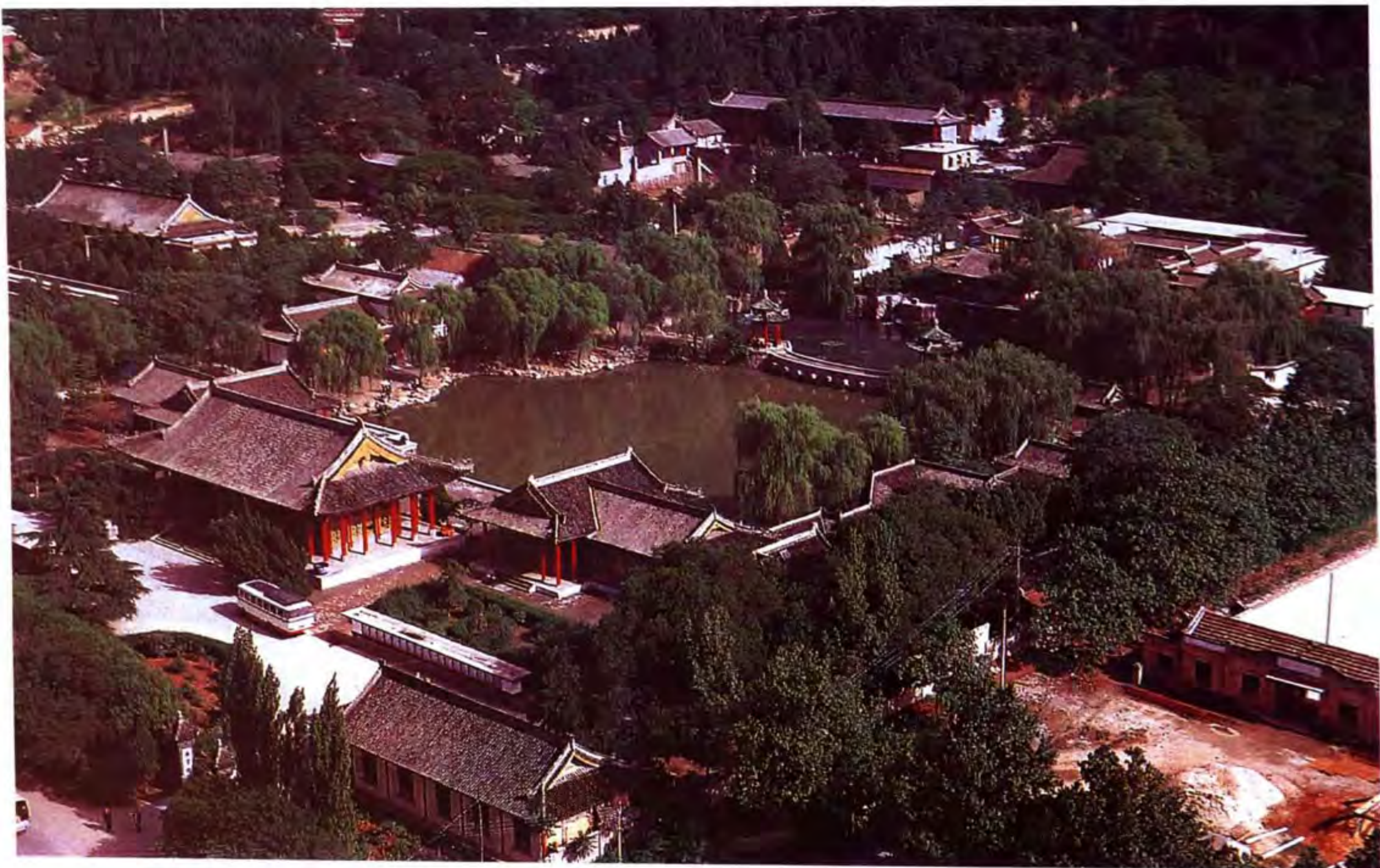
唐

1958年陕西西安兴庆宫遗址出土

直径13厘米、15.2厘米、15.5厘米







极尽豪奢。唐诗中有许多诗句描写这座山上海清宫的气势：“高高骊山上有宫，朱楼紫殿三四重”，“楼阁层层佳气多”，“山顶千门次第开”。华清宫建成后，唐玄宗与“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便每年到这里长住避寒，度过了许多夜舞朝歌的享乐时光。

历经千年，当年的建筑虽已湮废，但骊山与华清宫遗址依然秀色迷人，令人流连忘返。经过考古发掘，这里发现了当年规模最大的御用温泉池——九龙殿汤池和杨贵妃专用的“海棠汤”以及“太子汤”等遗址。“海棠汤”的墙基石上还刻有“杨”字，汤池砖石结构清晰可见，同时发现了排水道、水井等，并且出土了唐代钱币“开元通宝”、带有花纹的砖瓦等遗物。目前已对华清宫进行了修复，依照记载对地上建筑进行了复原，建造了《长恨歌》中描写的玄宗与贵妃七夕夜半密誓的长生殿、贵妃晾发的飞霞阁等建筑。来到这里，人们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吟诵

起《长恨歌》中的名句“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怀想遥远的盛唐时代和唐玄宗、杨贵妃的爱情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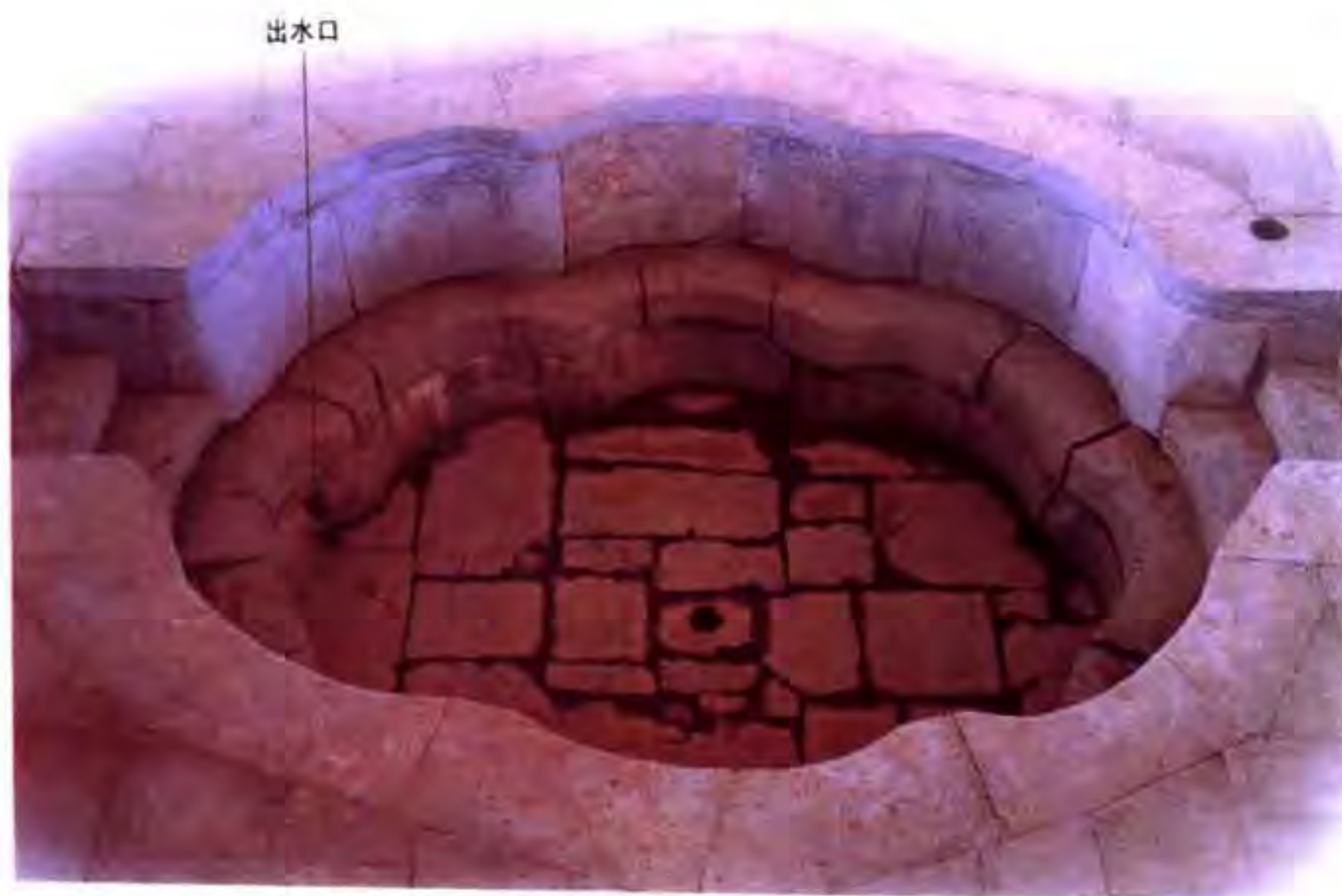
“开元天子太平时，夜舞朝歌意转迷。”随着太平盛世的来临，唐玄宗逐渐志得意满，陶醉于自己的文治武功之中；在位岁久，华年老去，也使他日益怠惰，贪图安逸。晚年时他自恃天下太平无事，将朝事一概委托给宰相李林甫，一味纵情声色，寻欢作乐。尤其是五十多岁时，他看中儿子寿王的妃子——美貌聪慧、能歌善舞的杨玉环，千方百计纳为贵妃，宠爱无比。

兴庆宫沉香亭曾留下唐玄宗与杨贵妃享乐的轶事，更使李白的名篇《清平调》名扬天下。那一日，唐玄宗携贵妃赏牡丹，命乐工奏乐助兴，他觉得陈歌旧调不能尽兴，于是急召翰林学士李白进宫，命他创作新歌词。李白挥毫成篇，写成《清平调》三首，其中一首道：“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

华清池全景

位于陕西临潼骊山





贵妃汤  
位于陕西临潼骊山

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此后，《清平调》成为千古名篇，沉香亭也随之成了众口传颂的名胜。

华清宫更是唐玄宗奢侈享乐生活的历史见证。每年十月，唐玄宗带领贵妃与杨氏五家以及宫中的侍臣护卫、歌儿舞女，浩浩荡荡前往华清宫避寒。一路香车宝马，冠盖豪华，珠宝首饰遍地撒落。在华清宫，他们终日游宴歌舞，斗鸡舞马，恣意享乐，挥金如土。“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杜甫路过骊山，听到宫中传出的音乐感慨万端，写下了著名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千百年来，游人到此无不感慨万千，历代文人墨客留下了无数咏叹华清宫美景和批评唐玄宗纵欲享乐招致祸患的诗文。

就在唐玄宗日夜沉醉于温柔乡里、歌舞场中之时，一场导致唐朝由盛转衰的弥天大祸已经是“山雨欲来”。

## 第八节 “安史之乱”

西安以西约百余里的兴平境内有座马嵬镇，这里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马嵬坡，或称马

嵬驿。出镇西行不远，一座小小的陵园建在土坡上。园内有座不大的古墓，墓碑书“唐杨氏贵妃之墓”，传说这就是唐玄宗爱妃杨玉环的坟墓。这座古墓究竟是真是假，难以断定，但是一千二百多年前，这里确实是马嵬兵变的发生地，是唐玄宗一生英雄悲剧的高潮，也是千百年来人们咏叹不已的李杨爱情悲剧的见证。陵园中保留着许多后人题咏的碑刻，对这场惊心动魄的悲剧抒发着各种感慨、议论。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唐天宝十四年（755），正当唐玄宗沉湎于夜舞朝歌之中时，安史之乱爆发了。

唐初以来，为抵御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侵犯，唐朝边境一直有重兵驻扎。唐玄宗时期，为了加强防御，又在边境重要地区增设军镇，军镇统辖几个州，主将称“节度使”。节度使起初只是统领军队、掌管军事的将领，后来逐渐兼管行政、财政，演变成了统管全局的地方行政长官，权力很大。天宝初年，边境的十个节度使共拥兵四十九万，而中央禁军不过十二万。“安史之乱”正是在这种外重内轻的情势下爆发的。

安禄山的父亲是西域胡人，母亲是突厥人，他骁勇剽悍，能征善战，受到唐玄宗的宠信和重用，还被杨贵妃收为养子，经常出入朝廷。他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个军事重镇的节度使，拥兵十五万，兵精粮足，势力雄厚。安禄山看到朝廷政治腐败、内地兵力空虚，唐玄宗终日作乐，懈怠国事，感到有机可乘，产生了起兵夺取天下的念头。他表面上表现得忠心耿耿，取得了唐玄宗的信任，暗中却招兵买马，扩充军队，屯积粮草兵器，蓄养战马几万匹，准备举兵叛唐。经过十年蓄积准备，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他以诛讨杨贵妃的堂兄宰相杨国忠为名，率





杨贵妃墓

位于陕西兴平

十五万大军在范阳起兵，南下直趋长安。唐朝太平日久，军备废弛，不仅士兵不会作战，连库中的武器都朽烂了。官军一路败绩，连连失守。地方官有的弃城而逃，有的开门投降。叛军几乎没有遇到激烈的抵抗，很快就渡过黄河，不到三个月便攻占东都洛阳。第二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登基，自称“大燕皇帝”。继而西进，六月，攻破京城门户潼关，兵临长安城下。

此时的唐玄宗已是英雄气短，他无心抵抗，带领贵妃、太子、皇亲国戚等仓皇出宫向西南逃跑，准备到川蜀避难。随行的禁军将士怨声载道，刚刚逃至长安以西百余里的马嵬驿，便在将领陈玄礼带领下哗变。乱兵杀死被认为是召祸根源的杨国忠，并胁迫玄宗赐死杨贵妃。玄宗无奈，为了继续前行避难，只得忍痛让人缢死杨贵妃，平息兵乱。唐玄宗继续逃亡入蜀，而太子李亨则北上朔方，领导平叛。不久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即位，为唐肃宗，改元至德。唐玄宗成了太上皇，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白居易的《长恨歌》生动地描述了这场

悲剧和唐玄宗的千古遗恨：“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纆登剑阁。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对于在这场悲剧中做了牺牲品和替罪羊的杨贵妃，自古便有人表示不平与同情：“祸端自是君王启，倾国何须怨玉环？”出于对杨贵妃的同情，民间还传言杨贵妃没有死，而是随遣唐使东渡到了日本。至今，日本还保留着关于杨贵妃的美丽传说和一些遗迹，许多文学作品也对这一传说作了尽情的发挥与想象。

经过郭子仪、李光弼、颜杲卿、颜真卿等各地节度使、地方官员率兵奋战，唐朝收复了一些失地；由于叛军烧杀抢掠，各地人民也纷纷反抗，安禄山的兵势受到扼制。叛军内部则是争权夺势不断。757年初安禄山



被儿子安庆绪杀死。759年春安庆绪又被大将史思明所杀，史思明也自立为帝。761年春史思明又被儿子史朝义杀死。不断的内讧和自相残杀，大大削弱了叛军的力量。经过数年浴血奋战，至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叛军主要将领先后投降唐朝，史朝义自杀，唐朝最终平定了这场叛乱。安史之乱历时八年，席卷大半个中国，黎民百姓流离失所，大片州县沦为废墟，黄河中下游一带“人烟断绝，千里萧条”，人民遭受了巨大苦难，唐王朝也从此走向下坡路，开元、天宝时代的兴盛一去不复返了。

这场动乱的起因与内情复杂多端、扑朔迷离，自古便有着各种猜测与说法；对于李、杨的爱情悲剧与杨贵妃的“女色倾国”，千百年来人们也抒发了各种感想与议论。无论如何，唐玄宗贪图享乐，贻误国事，恐怕是难辞其咎的。

唐玄宗回到长安后，虽然表面上处于太上皇的尊贵地位，事实上不久就被专权的宦官逼迫迁出兴庆宫，幽禁在与世隔绝的太极宫中。762年四月初五日，七十八岁的唐玄宗在孤独、寂寞中郁郁而终。由他主演的这场大喜大悲、盛极而衰的历史剧至此也落下了帷幕。同月十八日，肃宗亦死，年五十二岁，代宗李豫即位。

泰陵是唐玄宗的身后归宿，位于陕西蒲城的金粟山。这里山势雄险峻奇，碎石犹如金粟闪烁。泰陵是唐玄宗生前亲自选址并开始建筑的，虽然当年建筑宏伟，气势浩大，但到唐玄宗死时，繁华盛世已然衰落，他的地位也一落千丈，死后哀荣已与他四十六年盛世皇帝的威名不相匹配。最令人感慨的是，唐玄宗在位时身边文臣武将如林，六宫粉黛如云，身后的泰陵却只有两座陪葬墓，陪伴他的只有数十年忠心耿耿服侍左右的宦官高

力士和唐肃宗的生母杨皇后。生时相依相伴的杨贵妃，葬于百里之外的马嵬坡。与陪葬墓如同众星捧月一般的昭陵、乾陵相比，夕阳残照下的泰陵显得尤为冷清，恰是唐玄宗身后寂寞的真实写照。

## 第九节 内忧外患

“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于艰难中踉跄前行，又维持了百余年的寿命，其间也有过几次貌似峰回路转的“中兴”气象，但是总体上已经是江河日下，痼疾在身，颓势无可挽回。

### 一、致命痼疾——藩镇割据

唐朝后期政局最大的疾患是“安史之乱”后形成的藩镇割据局面。叛乱虽然被平息，割据局面却由此形成，实际上直至唐末，唐王朝再也没有真正实现过对全国有效的中央集权统治。

持续七八年的平叛战争使得唐朝生产荒废，财政空虚，军队疲惫，同时西北边疆又面临着吐蕃、党项的威胁，需要重兵防守。朝廷希望尽快结束战争，也无力再追击穷寇，而叛军余部仍有很大势力，于是便对投降将领采取了妥协政策——就地封他们做节度使，让他们依旧统领军队。战乱刚刚结束，唐代宗便任命安史降将张忠志为成德节度使并赐名李宝臣，任命薛嵩为相卫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使得安史余部仍然占据着叛乱的根据地河朔一带。不仅如此，由于平叛战争的需要，其他内地的军将也都被授予节度使之衔，在内地设立军区，掌握军事大权。

由于节度使把握军权，进而掌握地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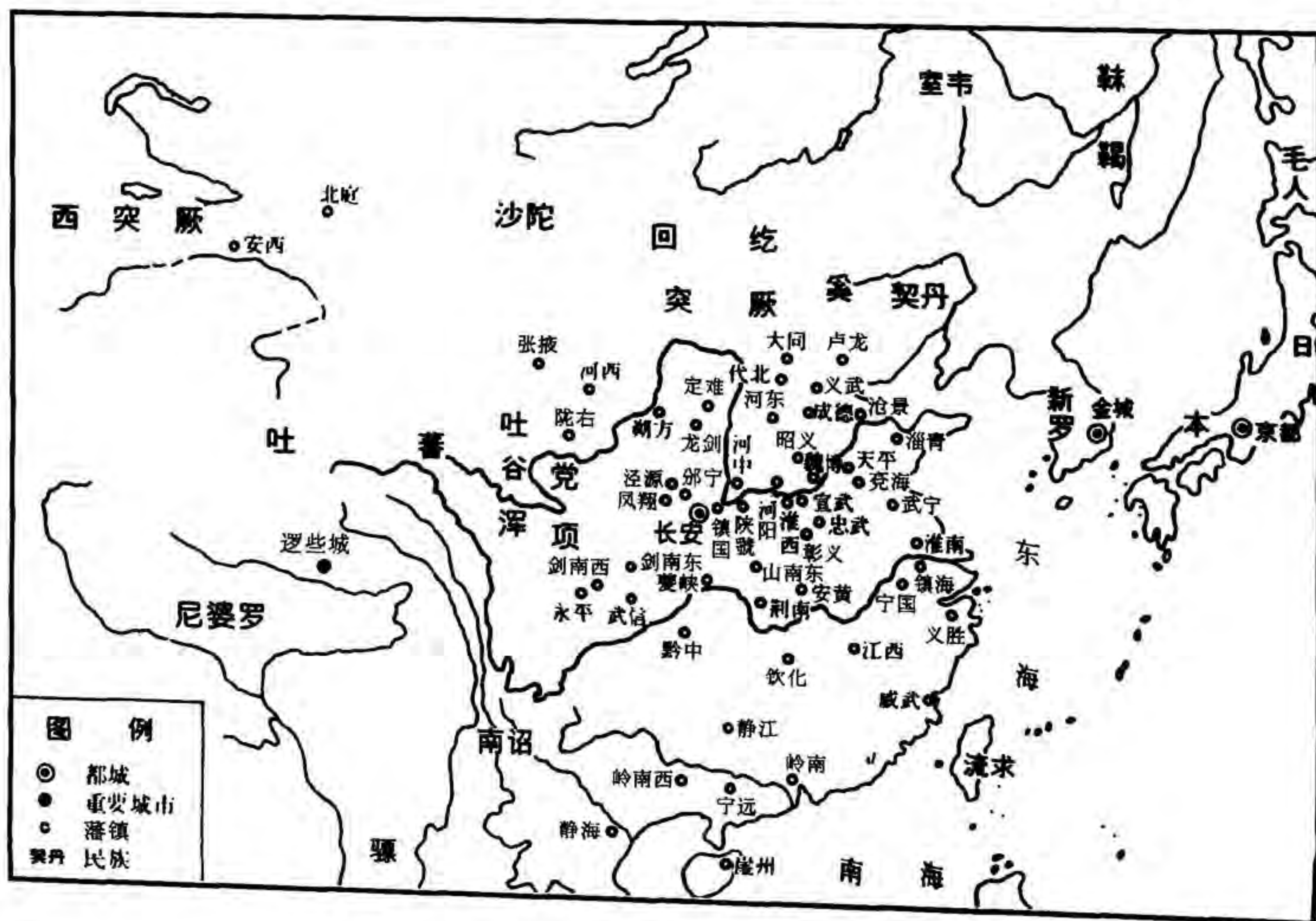


政权、财权，他们很容易发展自己的实力与朝廷抗衡，而朝廷又无力制约，于是藩镇割据局面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不仅河朔地区，中原内地以至江南、岭南地区也是藩镇林立，节度使位威权重，号令一方。各地的节度使有的尊奉皇权，服从中央，有的则成为与中央对抗的独立王国。其中最严重的是安史旧部统辖的河北地区的成德、卢龙、魏博三镇，史称“河北三镇”。三镇虽然名义上是唐朝的属地，实际上等同于独立王国。这些藩镇的节度使父死子继、兄终弟立，中央的任命不过是形式而已。如，田氏盘踞魏博长达五十多年，张氏盘踞成德长达八十多年，实际上已经是土皇帝。他们在藩镇内修建城池，扩充军队，任命官吏，收纳赋税，大量占有向中央上缴的财赋，有的更干脆根本不供赋税。唐王朝无力制服，往往只能姑息。唐宪宗时期是对藩镇控制最强的时候，但其时

天下藩镇有四十八个，其中十五道、七十一州都不向中央申报户口，致使朝廷控制的纳税人口只有全国的半数，其他时候就更少了。而且藩镇之间有时联合起来一起对抗朝廷，有时又相互火并，争夺地盘、财货；各藩镇内部也不断发生部将杀死节度使等内讧、兵变。唐朝中央与藩镇之间、各藩镇之间战火连绵，国无宁日。

唐朝后期，中央与藩镇间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战争。第一次是唐德宗采取强硬态度，发动平藩战争，结果是藩镇联兵反唐，四人称王、二人称帝，致使德宗一度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战争持续了五年之久，最终以朝廷姑息妥协告终。第二次是唐宪宗大举用兵对付强藩巨镇，此次取得胜利，平定了部分与朝廷对抗的藩镇。但是，藩镇形成的根源未除，所以在他死后不久，各处藩镇又重新崛起，再度与中央对抗。第三次是唐武

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图  
位于陕西兴平





宗发兵平定泽潞这一强大藩镇。此后，唐朝中央再也无力与藩镇较量，而各藩镇间与藩镇内部则火并不断。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唐朝寿终正寝。藩镇割据局面前后持续长达一百五十多年。

在唐朝后期的百余年中，朝廷平藩与藩镇间的战争连绵不断，给社会与民生造成极大灾难，战争频发的黄河流域更是田地荒芜、人烟断绝。因为战争，朝廷和藩镇加重兵役征发与财赋征敛，使得百姓负担沉重，民怨沸腾，给唐朝末年的各地民变、暴动埋下了伏笔。

## 二、腹心之患——宦官与朋党

在外有藩镇之祸的同时，唐朝中央政权集团内部也有着腹心之患，那就是宦官的专权与朝廷的朋党之争。

宦官的本职原本是侍奉皇帝起居、管理后宫事务，但是由于他们亲近皇帝的特殊身份与地位，在古代宫廷中始终是一支特殊的政治力量。在皇权控制不力时，宦官就有可能形成政治势力，越过职权干预朝政，甚至侵夺皇权。唐朝以前，中国历史上就曾不止一次出现宦官参政专权的现象。唐朝后期，这一幕又一次重演。

由于皇室生活的豪奢，唐朝宫廷中的宦官人数常常有数千名之多。而宦官势力的兴起最早可以追溯到唐玄宗时期。当时，宦官办事得力者，唐玄宗便授予三品官位，宦官地位得到提升；玄宗尤其重用宦官高力士，四方进奏，先由他处理，然后转呈皇帝，使得宦官开始参与政治。但是高力士一生谨慎，当时宦官也尚未聚结成一股政治势力。宦官势力的真正崛起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安史之乱中，宦官李辅国跟随肃宗平叛，立下功劳。战乱过后，他因功被封成国公，并担

任重要职位，掌握了禁军，权势显赫。朝廷百官奏事、颁布诏书、监察官吏、审判案件，都由他掌握裁决，连宰相都尊他为“五父”。肃宗病危时，他与另一宦官程元振合谋，拥立代宗李豫，并杀死了张皇后与越王，开了宦官废立皇帝之端。唐代宗即位后，李辅国因有拥立之功，更加骄横，甚至告诉皇帝：“大家（皇帝）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代宗畏于他掌握禁军，不得不屈尊忍让，尊之为“尚父”，朝廷机要大事都请他参与决策。后来代宗虽借机除掉了李辅国，但是宦官程元振、鱼朝恩又先后掌握禁军，重权在握。鱼朝恩甚至骄横地声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到唐德宗时，宦官掌握中央禁军成为定制，实际上是掌握了京师的主要兵力，至此，宦官势力已无法扼制。唐宪宗时，正式设立枢密使职位，由宦官担任，执掌上传下达职责，宦官势力得以更加名正言顺地参与朝政。唐文宗时，宦官仇士良甚至公然告诫同僚，必须要以声色犬马迷惑皇帝，使之不了解国事，才能稳操权力。

另外，唐朝有监军使之职，执掌监察各地的军队将领。唐中期以后，为了加强对掌握重兵的地方将领和藩镇统帅的控制，常以宦官为监军使，分赴各地巡察监督。这使得宦官权力更大，并得以结交封疆大吏。他们代皇帝与朝廷监察军队，自然威势赫赫，飞扬跋扈，因此也常与藩镇发生矛盾，甚至激发军变。

总之，唐后期，宦官已经成为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他们不仅参与朝廷军国大事，而且常常将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中，废立甚至杀死皇帝如同儿戏。自唐宪宗起，皇帝的废立都由宦官一手操纵，后期的十个皇帝，竟有七个是宦官拥立的。有时宦官们内部发生矛盾，各派拥立不同人选，为此发生



争斗。唐肃宗因为宦官屠戮宫廷，惊惧而死；而号称“神武”的唐宪宗和唐敬宗都不明不白地死于宦官之手。唐文宗曾经流泪哀叹“朕受制于家奴”，还不如亡国之君。

宦官权力的恶性膨胀，自然引起皇帝与朝廷大臣的不满。外廷大臣与内廷宦官的敌对、冲突十分激烈，由于朝官衙门多在皇城，即南面，宦官机构在宫城，即北面，所以他们之间的斗争被称为“南衙北司之争”。唐朝后期曾经多次发生南衙北司之间的残酷斗争。其中斗争最激烈的流血事件是发生在太和九年（835）的“甘露之变”。唐文宗对于骄横的宦官忍无可忍，与宰相李训、郑注等密谋翦除宦官。这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朝会时，大臣谎称夜间天降甘露于石榴树上，文宗假意派遣宦官去查看，想让预先埋伏的兵士杀死宦官，不料被宦官察觉，他们强拥皇帝进入后宫，与朝官展开血战。这场预谋铲除宦官的斗争最终以宦官获胜、朝官惨败而告终，当时被杀的随从官吏就有六七百人。李训、郑注等宰相、高官十余家都被全族处死，株连朝廷大臣无数，杀死千余人，朝中几乎为之一空。宦官自此更加傲视群臣，无人敢惹。

不仅宦官与朝官之间存在激烈争斗，自唐宪宗时起，朝官内部又发生势不两立的朋党之争。两党首领分别为牛僧孺与李德裕，因而这场党争被称为“牛李党争”。两党在对待藩镇、科举、佛教等方面存在巨大政见分歧，不择手段争夺地位与权力。双方各结党羽，排除异己，争权夺势，互相攻击，一方得势必置对方于死地，朝政大事上也互相拆台、掣肘，使得朝政无法正常进行。其间起伏曲折，前后竟持续了四五十年。这场难解难分、剑拔弩张的党争使皇帝无可奈何，甚至觉得比平息藩镇割据还难。唐文宗因此愤



宦官俑

唐

1973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  
墓地出土

高34.5厘米

而慨叹：“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

此后，朋党之争虽然稍稍平息，宦官与朝官的敌对斗争却更趋激烈，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

内忧之时，外患也威胁着唐朝。安史之乱大大消耗了唐朝的国力，军费支出浩大，国库损耗严重，且因为要集中兵力与叛军作战，戍守西北边疆的军队被调往东面平叛，造成了唐朝的西北边防空虚。唐朝的虚弱与内乱给了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以可乘之机。

当时周边最强悍、对唐朝威胁最大的是吐蕃与回纥。吐蕃趁唐朝边疆空虚，不断进



攻唐朝疆土，攻占了数十州，广德元年（763）还曾攻陷了首都长安。因为吐蕃几乎年年入侵，唐朝每年都不得不征调兵力防备，最多时征兵达到二十八万以上。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中，唐朝曾经借助回纥军队收复东、西两京，回纥因此十分骄蛮，借机在两京抢掠，此后又以不平等价格用马匹换取唐朝绢帛，勒索唐朝钱财，并且多次与唐朝发生武装冲突。

边疆有强敌进逼侵扰，地方上有藩镇对抗，中央政权内部又是宦官、朋党为患，唐王朝就在如此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艰难前行。这些内忧外患的造成，其中有些是由于唐朝统治集团的过失，但是更多的还是由于内外情势所致，非一日之寒，当然也不是哪一个英明皇帝所能挽救的。所以，尽管唐朝后期的唐德宗、顺宗、宪宗、文宗、宣宗等皇帝各有作为，尤其是唐宪宗努力削藩，力图重振唐朝，一度出现了“元和中兴”的气象，唐宣宗则有“小太宗”的美名；一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大臣也曾力图革新求治，发生了以

唐人所书黄巢起义记事墨迹

“二王八司马”为首的“永贞革新”等政治改

革运动，但是终究难以挽回唐王朝的颓势。

走向衰落的唐朝虽然政治斗争险恶，战乱不断，社会发展受到了很大影响，但是透过弥漫于唐朝中后期的政治斗争硝烟，我们应该看到唐朝中后期的百年间社会经济、文化仍然持续发展，成果也丰硕可观，尤其是战乱相对较少的南方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 第十节 末世烽烟

唐朝末年，士人韦庄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僖宗广明元年（881）十二月，黄巢起义军打进了长安。韦庄亲身经历这场历史巨变，写下了一首长诗《秦妇吟》。这首诗后人曾有记载，但是原文却久已失传。不料，一千多年后，在敦煌遗书中却发现了这首诗的抄本，而且有十个卷子之多。在敦煌这一边陲之地发现了如此多的抄本，可见这首诗在当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

韦庄的诗长达一千六百余字，详细描写了当时兵荒马乱、战火纷飞，人们颠沛流离、生活悲惨的情景。因为他是站在士人阶层的角度，所以将这场灾难全都归咎于黄巢领导的“狂寇”、“妖徒”作乱。尽管如此，他所描写的战乱造成的昔日繁华的消失、田园的残破、皇宫的荒废、豪门的败落等等还是真实可信的。诗中写道：“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荒凉无故物。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明朝晓至三峰路，百万人家无一户。破落田园但有蒿，摧残竹树皆无主。”

安史之乱后在下坡路上艰难行进了百余





年的唐朝，最终无可挽回地进入了末世。唐末，各地武装暴动此起彼伏，前后持续数十年，奏响了唐王朝的挽歌。

如同历代王朝末年的民变一样，唐朝末年社会变乱的起因也是天灾人祸交加。中国的农民安土重迁，惯于忍受，他们一旦铤而走险，必定是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唐朝末年，激起民变的主要原因是人祸纷繁：统治集团的内部争斗尤其是藩镇战争造成的社会动荡，使农民饱受离乱之苦；而朝廷、官僚、贵族、豪绅等的层层盘剥，更使农民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生活。

唐朝后期，统治集团的奢侈挥霍与坐食阶层的膨胀，使得朝廷财政支出惊人。皇室贵族纵欲享受，挥金如土。唐懿宗最为奢侈放纵，他经常带十余万随从到处游玩，又四处修庙造佛，并花费巨资迎接佛骨，用金玉、锦绣、珠翠制作宝帐、香辇、幡花、幢盖等，从京城到法门寺之间的三百余里道路上，车马昼夜不绝。他的爱女同昌公主出嫁时，赐钱五百万贯，房屋门窗都用珍宝装饰，连橱柜、锅盆都是金银珠宝制作的。公主死后，送葬队伍长达二十余里，殉葬珍宝多达一百二十车。朝廷官僚机构膨胀，官员多至数十万，他们不仅享有俸禄，还有免除赋役等特权，同时贪赃受贿成风。为平抑藩镇和抵御外侮，朝廷素常养兵八十余万，多时达到九十九万，平均两三户养一兵，军费支出浩大。庞大的官僚机构与军队，都要靠农民勤苦耕织缴纳赋税养活。朝廷为了维持巨大的开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百姓连吃盐、喝茶、住房都要缴税，庄稼尚未成熟就要缴纳“青苗钱”。同时，官僚、贵族、豪门也竞相聚敛财富，如大官僚韦宙庄园积谷七千堆，号称“足谷翁”；宰相路岩的亲信边威聚敛的家产竟然可供唐朝军队两年的给养。社会财富大量

集中到少数人手中，造成了贫富悬殊。

明智的大臣早在唐朝后期就已经警告朝廷“天下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辈”，如此的状态岂能持久！唐僖宗时有位翰林学士刘允章上了一封《直谏书》，直言不讳地指出国家的“九破”与百姓的“八苦”：“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征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国家到了这种地步，不亡何待？民众到了这种地步，不反何待？

## 一、浙东暴动·桂林兵变

唐朝后期开始，社会矛盾突出，朝廷控制较弱的南方，尤其是江淮地区已经不断出现小股的民变，就连戒备森严的皇宫也发生了工匠的暴动。这些零星的造反活动最终汇成了唐末农民起义的大潮。

大中十三年（859）十二月，浙东裘甫领导的暴动首先奏响了轰轰烈烈的唐末大起义的序曲。唐懿宗刚刚上台数月，就传来了浙东发生武装暴动的消息。浙东农民裘甫率领百人起义，他们屡败官军，攻占数县，开仓放粮，赈济贫民。各地农民纷纷投奔，队伍很快发展到三万人。裘甫建立政权，废弃唐朝年号，改元“罗平”，铸印称“天平”，并继续扩大地盘，攻占州县，声威震动中原。唐朝调发大军镇压，双方展开激烈交战，曾经在三天内打了八十三仗，裘军寡不敌众，最终失败，裘甫被押解到长安处死。这次起义



前后历时七个月。

数年之后，咸通九年（868）七月，以庞勋为首的桂林戍卒爆发兵变。戍守桂林的八百名兵士是从徐州招募来的，已经服役六年，早已超过原定的三年期限，兵士们要求返回，但是掌兵的徐泗观察使强迫他们继续服役一年。兵士们愤怒之极，杀死将领，推粮料判官庞勋为首领，一路打回家乡。当时淮北发大水，农民被深重的赋税所迫，争相投奔起义军。庞勋开仓放粮，招募兵士，队伍迅速发展至六七千人。他们打败前来镇压的官军，攻占徐州，并进占江淮一带。原先占据河南、山东、淮浙一带的小股造反队伍也相继归入庞勋麾下，队伍迅速发展到二十万人。唐朝赶紧调集军队，并求借沙陀与吐谷浑等少数民族部落骑兵二十万，大举镇压。由于庞勋幻想受唐朝册封，成为割据一地的节度使，致使军心涣散，战斗不利。起义军四面受敌，加上内部分裂，最终被镇压下去，庞勋战死。

这场武装暴动规模更大，转战广西、湖南、安徽、浙江、江苏、河南、山东等广大地区，前后历时一年零两个月，对唐朝的打击极大，一度断绝了江淮的运粮水道，严重威胁长安。起义失败后，余部仍然长期活动在山东地区，州县难以制服。所以有人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

这两次暴动虽然没有最终取得胜利，但是沉重打击了本来就虚弱不堪的唐王朝，更重要的是为其后更大规模的起义开辟了道路，铺垫了基础。

## 二、翻却曹州天下反

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潼关以东地区遭受大旱，粮食收成只有往年的一半，有的地方甚至颗粒无收，农民被迫吃草根、树

叶，路有饿殍。但是官府照旧征收赋税，农民被迫拆房砍树、卖妻鬻子以缴纳官税，民间怨声载道。黄河下游地区流传着“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民谣，预示着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

乾符元年（875），山东濮州人王仙芝领导数千人于河南长垣举起造反旗帜，声讨唐朝官吏贪赃、赋税沉重、赏罚不平，并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号召天下造反。曹州冤句（山东曹县西北）人黄巢带领数千人起兵响应。山东一带农民因为赋税沉重，生活困难，纷纷投于造反旗帜下，数月间，队伍发展至数万人。队伍迅速攻占十余州，一直打到淮南。与唐王朝军队转战于山东、河南十二郡之地，并威胁东都洛阳，致使达官显贵与富人纷纷出逃。队伍一度发展到三十万人，声势震动天下。在他们的影响下，各地小股造反军也相继而起。

唐王朝难以强行镇压，于是采取招降策略，王仙芝得到朝廷授予的官职，发生动摇，准备投降，遭到黄巢与其他将领的激烈反对，终究未能降成。但是起义军发生了分裂，黄巢带领一部分人马与之分道扬镳，另举义旗。王仙芝后来在与唐军的战斗中战死，起义陷入低潮。

王仙芝死后，尚让率余部与黄巢会合，队伍有十余万人。大家公推黄巢为“冲天大将军”，称“黄王”，年号“王霸”。从此黄巢成为起义军领袖，率领队伍转战南北。

## 三、天街踏尽公卿骨

在黄巢统帅下，起义军的势力有了更大发展。黄巢以攻占东西两京、推翻唐政权为目标，挥师南下进军江南，转战江西、浙江、福建等地，而后进入岭南占领广州，一路惩处贪官污吏，没收地主豪绅财产，队伍发展



到数十万人。在岭南休整后，大军挥师北上。起义军发布公告，指斥唐朝弊政，并宣告了禁止官员增殖财产、惩办贪赃等政策。此后，数十万大军北进，经湖南、湖北、江西，从采石（今安徽当涂北）浩浩荡荡渡过长江，进军淮北、河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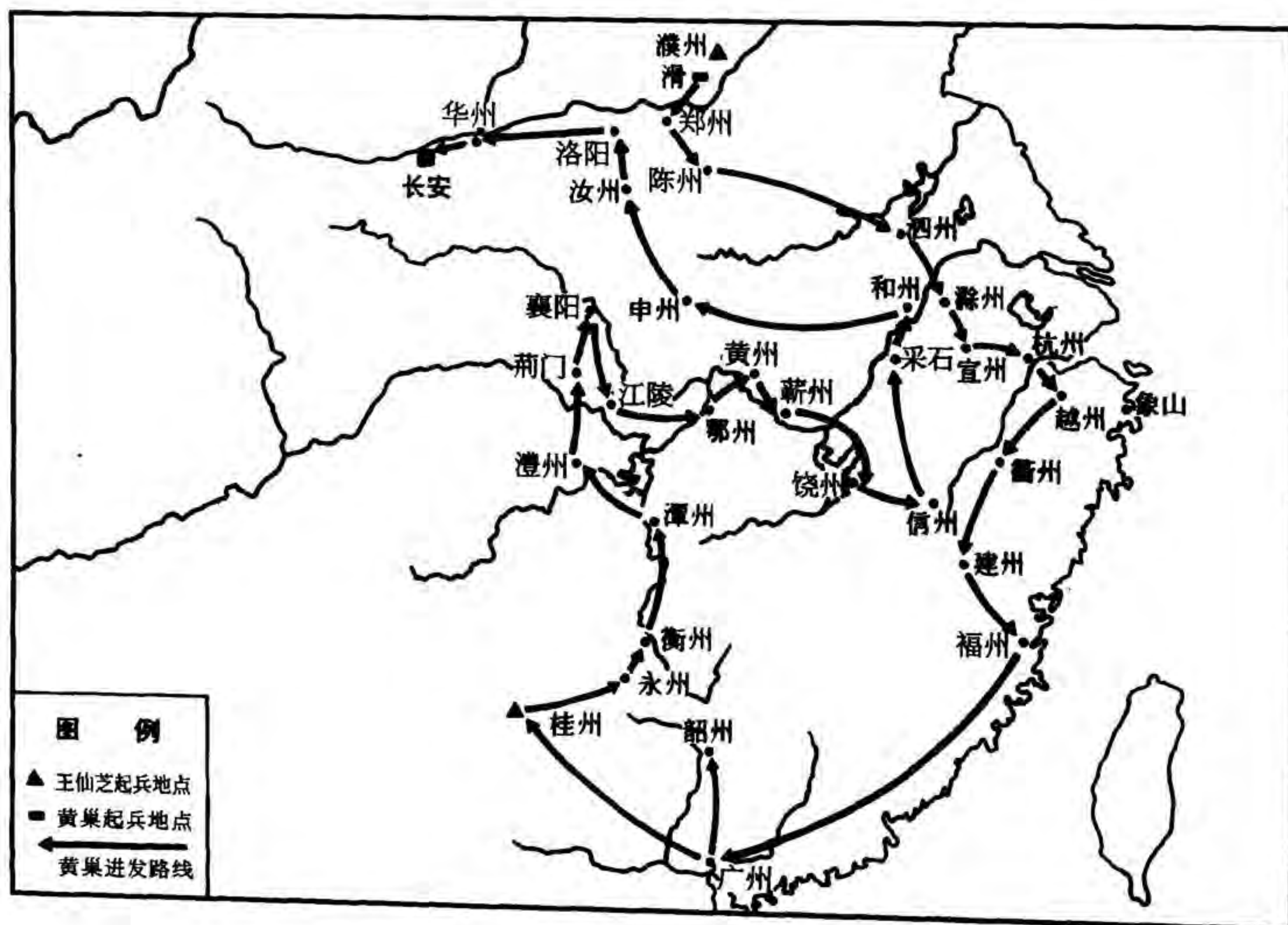
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八月，黄巢攻克东都洛阳，唐朝留守官员投降。起义军纪律严明，攻占洛阳后，街市安然无恙。接着起义军向西突破潼关天险，于十二月（881年初）攻占长安。义军进城后安抚百姓说：“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小皇帝唐僖宗出逃到成都，起义取得重大胜利。

同年十二月十三日，黄巢在大明宫含元殿即皇帝位，国号“大齐”，改元“金统”，任命了宰相等文武百官，并处决唐朝皇室贵族

与高官，罢免三品以上官员，没收豪门富户的财产。长安城里一片鼎故革新景象，改朝换代似乎指日可待。然而，大齐政权面临的形势却并不乐观。唐朝各地的节度使虽曾不断与中央政权抗衡，但是却不会坐视大齐夺取天下。宰相兼凤翔节度使郑畋率先收编残兵，并号召各道节度使出兵围攻长安。唐僖宗在蜀中站稳脚跟后，也开始组织大反攻，又求得了北方沙陀族和党项族的援助。藩镇强兵与沙陀铁骑来势汹汹，对大齐政权造成极大威胁。而起义军内部同州守将朱温等人的叛变投降更使大齐雪上加霜。大齐政权被困于长安城中，粮食补给极为困难，所能控制的地区不过长安周围数百里。

中和三年（883）四月，由于长安难以困守，黄巢只得率众退出长安，向东进入河南。在沙陀军的追击下，又败退山东，几乎全军

黄巢起义战略图





覆没。884年六月，黄巢退至泰山狼虎谷（今山东莱芜西南）自刎而死，余部投降唐朝，起义最终失败。

这次历史上著名的大起义持续了近十年之久，起义军转战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流域，势力波及今十二个省的广大地区，虽然最终失败，但是对于唐朝的打击是致命的。

唐末大起义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发明，那就是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平均”的口号。针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贵贱地位不平等，裘甫年号称“罗平”、铸印“天平”，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都把“平均”当作奋斗目标与号召民众的旗帜。这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与觉醒。而且几支起义队伍确实都实施了掠取富户财产、救济穷人的行动。大齐政权建立后，有人目睹贫富、贵贱的颠倒，曾偷偷在官府门上贴了一首诗发泄不满：“自从大驾去奔西，贵落深坑贱出泥。……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却吃齑。惟有一般平不得，南山依旧与天齐。”这说明当时大齐政权不仅将平均、平等作为口号与旗帜，而且确实付诸了行动。此后，平均、平等成了各朝起义的常见纲领与口号，唐朝末年的大起义功不可没，它在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价值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 第十一节 帝国末日

对皇帝来说，哀莫大于亡国。唐朝最后一个皇帝被谥为“哀帝”，实在是再准确不过了。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唐哀帝即位的玉册意外地重见天日，使我们得以更真切地感受到这位末世皇帝的悲哀。

在唐朝东都洛阳宫城遗址中，考古工作

者发现了玉册10枚，质料为汉白玉，每枚长28.5厘米，宽2.7厘米至3.1厘米，厚1.2厘米至1.4厘米。两端各有一小孔，系穿绳连缀用。每枚上刻有三至八个字，为楷书，字内填金。专家通过对照文献记载，辨认出其中六枚是唐哀帝即位的册文。玉册上的文字为“十五日丙午”、“百年重熙”、“祖业克绍”、“宝图光践”等，与《唐大诏令集》所载文字完全相同，证明正是哀帝即位册文。

唐末天复四年（904）八月十五日，唐昭宗的九子、十三岁的李祝被节度使朱全忠挟持着做了末世皇帝，三年之后，又被废黜，次年遭杀害，被谥为“哀皇帝”。一个无辜少年身不由己地成了改朝换代的牺牲品。玉册正是这位傀儡皇帝被胁迫上台的文告。

经过黄巢起义的打击，唐朝政权虽然得以延续，但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名存实亡。唐王朝从黄巢手中收复了长安，能够控制的地盘却只剩下数十州，其余都被各地藩镇瓜分占据。藩镇对于唐王朝，犹如一把双刃宝剑，唐朝依靠它镇压了黄巢起义，延缓了寿命；但是同时也使得藩镇势力越发不可控制，最终被它斩断了近三百年的命脉。

唐朝政权在百余年的藩镇割据状态下，虽然虚弱，却始终维持着表面上的统治，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藩镇之间互相制约，形成了一种平衡。而镇压黄巢起义打破了这种平衡。一批势力雄强的新藩镇趁镇压起义之机迅速发展崛起，其中势力最为强大的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宣武节度使朱温（他原本是黄巢起义军首领，投降唐朝后被赐名为全忠）、凤翔节度使李茂贞。

唐僖宗去世后，宦官推出了昭宗做皇帝。到这一时期，各地的藩镇已经不甘心割据一方，趁朝廷混乱、虚弱，他们开始插手中央政权；而朝中官僚和宦官集团在政权风



雨飘摇之际依然争斗不已，他们也需要藩镇做靠山。

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刘季述等宦官合谋废黜昭宗，另立其子为帝。朱全忠趁机派人进入长安，与宰相崔胤秘密策划，发动禁军，杀死刘季述等，迎接昭宗复位。宦官见事不济，劫持昭宗投奔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于是形成了朝官联合朱全忠、宦官依附李茂贞两个阵营的对立阵势。李茂贞和朱全忠都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皇帝争夺战。唐昭宗被劫持到凤翔后，朱全忠立即以大兵围困凤翔，李茂贞被困粮绝，被迫让步，杀死投靠他的宦官，将昭宗送出。天复三年（903），朱全忠将昭宗带回长安。此时的皇帝早已成了各方势力争夺的囊中之物，只能在夹缝中苟且偷生。

回到长安后，朱全忠实际上已控制了中

央政权。他依靠军事实力，将与他作对的宦官一网打尽，总共处死七百余人，派到各地监军的宦官也都被杀死。唐朝后期参政专权一百多年的宦官势力至此彻底灭绝。

天复四年（904），为了更好地控制皇帝，朱全忠胁迫昭宗迁都，将朝廷百官迁到了自己的根据地洛阳。到洛阳后不久，九月，朱全忠杀死昭宗，立昭宗之子十三岁的李祝为皇帝。接着，朱全忠又对唐朝皇室、朝廷百官下手，贬逐了大批官员，并在白马驿诛杀宰相崔枢等重要朝官三十人，投尸于河。史称“白马驿之祸”。

一切铺垫都已经完成。907年四月，朱全忠取消了傀儡唐哀帝的名位，自己正式上台当了皇帝，改国号为“梁”。

持续近三百年的大唐帝国最终灭亡，一个新的分裂时代又开始了。



## 第四章

# 臻于成熟的唐代典制



盛世必是治世，大治才有大盛。大唐盛世的出现是古代社会财富积累、文化发展的必然，而统治者采取的治理国家的各项政策、制度、法规同样起了重要的作用。

唐朝之盛不仅在于国力的强盛、经济的繁荣，它的典章制度也臻于成熟、完备，有着明显的承前启后特征。唐朝建基于北朝，其典制、法规主要继承的是北朝与隋，对于南朝制度也有所借鉴。唐朝对于这些典制进行了整理、改进，同时有许多新的开创发明。这些典章制度的实施在当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很多为后世所继承、沿袭，一直持续到明清时代。唐律更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成熟完整的法典，成为后世制定法规律条的楷模。记载唐朝典制的《唐六典》、《唐律疏议》等都成为后世统治者制定典制的必备参考书和历史学家重要的研究资料。

### 第一节 严密的官制

唐朝帝王和官贵墓葬中有不少文臣、武官形象的陪葬陶俑，文官多面容温文清秀，细眉凤目，头戴峨冠，长袍大袖，深衣垂地；武官则多面容粗犷，双目圆睁，英气逼人，头戴兽头冠，身着袍裤。两者面容、装束不同，但都拱手或持笏而立，犹如肃立于朝堂。独孤思贞、独孤思敬墓出土的陪葬俑更为引人注目，大概因为墓主人是少数民族官员，有些文武官员俑高鼻深目，一望便知是胡人。这些珍贵的艺术品塑造了唐朝各民族文武官员的真实形象，使人不禁怀想当年大唐帝国皇帝端坐龙位、文武百官肃立朝堂的庄严、肃穆场景。

唐朝统治集团虽然出身军事贵族，又是以武力夺得天下，但他们深深懂得可以“马





三彩文官俑(左)

唐

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庭海墓出土

高72厘米



三彩武官俑(右)

唐

1957年陕西西安独孤思贞墓出土

高97厘米

上得之”但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所以在夺取天下、巩固政权后，便立即开始制定治理天下的各项典章制度。唐高祖武德七年(624)，正式颁行各项制度、法令，首先颁行的便是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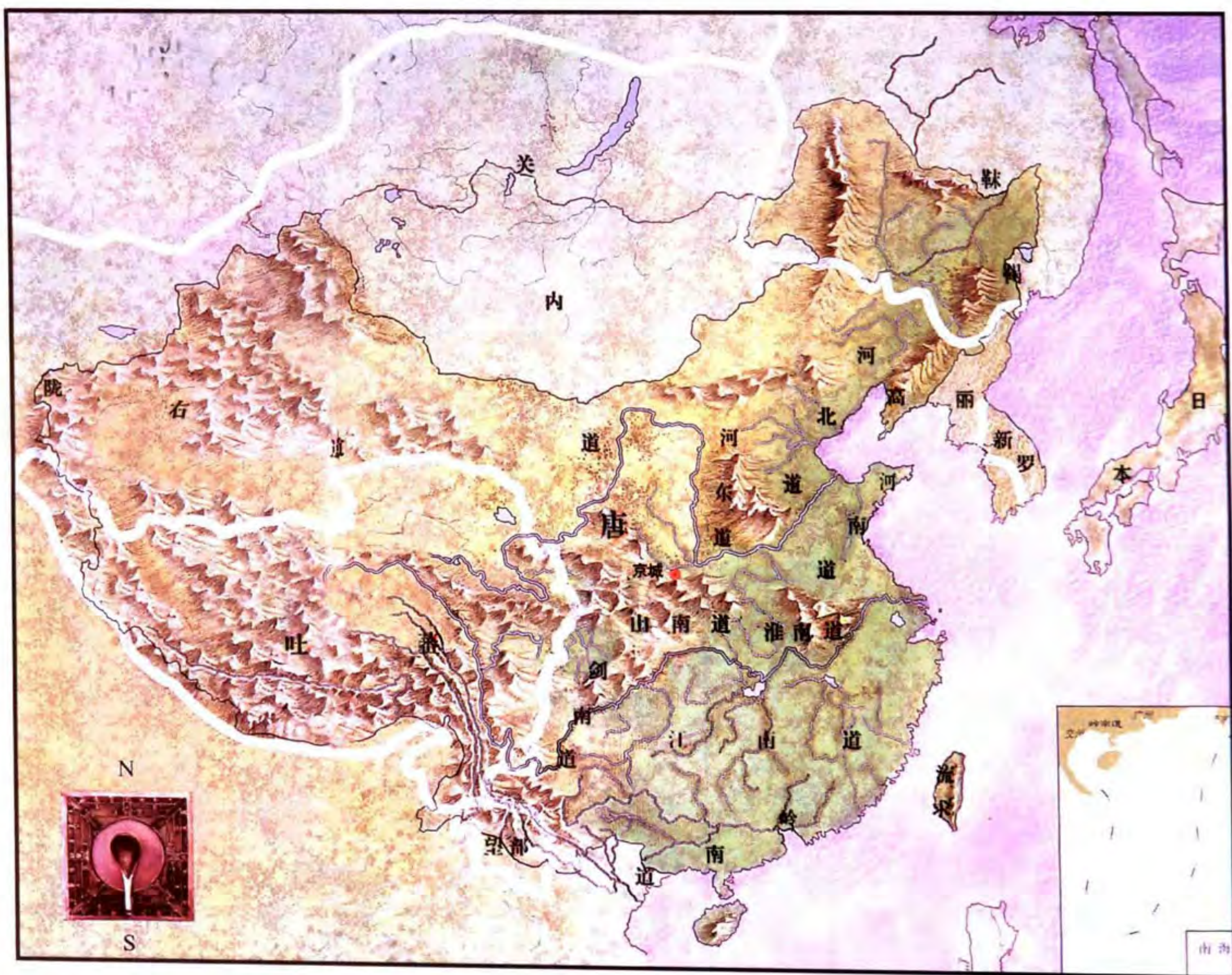
隋朝虽然短暂，但是在官制上有重要建树，最主要的是中央政权确立了三省六部的决策行政体制。唐承隋制，仍然实行三省六部制，但对名称与职能都进行了改革。

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是拟定政令的机构，正副长官是中书令、中书侍郎，负责起草皇帝诏制。门下省是审

议机构，正副长官是侍中、门下侍郎，负责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令旨意，驳正违失，并审批尚书省的奏书。尚书省是执行机构，正副长官是尚书令和左、右仆射（因为开国初期李世民曾任尚书令一职，其后这一职位成为虚设，左右仆射实际上成为尚书省最高长官），尚书省下面统辖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负责贯彻执行中央的旨意政令。

六部分别掌管各项行政事务：吏部掌管官吏的选用、考绩；户部掌管户口、土地、赋税；礼部掌管礼仪、祭祀、科举考试等；兵





唐时期 (669) 全图

部掌管军事；刑部掌管刑法；工部掌管土木建设等工程事务。各部下面又分设多个部门，分工负责各项具体事务。

隋时建立、唐代完善的三省六部制度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六部建制，一直延续到清朝。

唐朝的宰相采用的是多宰相制和宰相兼职制度。唐朝初建，以三省最高长官为宰相，并在门下省设立了政事堂，供三省宰相共同商议国家大事。后来有所变革，参加政事堂会议的不限于三省长官，其他职位的朝官也可以受命参加。凡是参加政事堂议政的都成为宰相，在职位前加上“参知政事”等各种名衔，到后期名衔逐渐确定为“同中书门下

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平章事”就是评议天下大事）。因此，凡是在官职前面加有这种名衔的官员就是宰相，有参与朝政决策的权力。同时，宰相不是专职，都各自兼有其他职务，只是议政时才集中在政事堂。

从唐朝实行的多宰相制度可以明显地看出，目的是为了防止宰相权力集中于一人，导致宰相权力过大无法制约，最终威胁皇权。可见，这种宰相制度正是为了巩固皇权而制定的。不过，这种制度也并没有彻底避免宰相专权弊端的出现，因为在众多宰相中，还有首末之分，其中有一位秉笔宰相，称为“执政事笔”，实际上就是首席宰相。唐玄宗时李林甫、杨国忠曾经专权擅政，就是因





为长期把握了“执政事笔”的权力。不过总的来看，唐朝宰相专权的状况的确较少，这与它实行的宰相制度有直接关系。

此外，朝廷还设立有监察机构——御史台，负责纠察中央、地方官员和府库出纳等，被称为“天子耳目”。大理寺是最高审判机构。它与分掌其他事务的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合为“九寺”。另有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三监”，以及掌管文化典籍的秘书省等等分工明细的各种事务机关。

在地方，唐朝将隋朝的郡、县两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州长官为刺史，县长官为县令。唐太宗贞观年间将天下分为关内、河

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十道，唐玄宗时又将十道重划为十五道。朝廷不时派遣黜陟使、观风俗使、巡察使、按察使、采访处置使等官员巡察各道。后来，道逐渐成为州以上的一级行政单位，原先临时派遣巡察的官员也成了常驻的地方长官。地方两级行政体制于是变成了三级制。安史之乱后全国大约划分为四五十个道。增设一级地方行政机构，是唐朝鉴于疆域辽阔，为了加强中央政权对地方尤其是边远地区的控制而采取的措施。道、州、县这种地方三级行政体制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直至当代，中国的地方行政体制仍然可以看出唐朝以来的三级制框架。

封泥

唐

1957年陕西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

这些封泥是地方官员向皇帝供奉本地土特产时用来封缄之物。上有墨书题记和红色印文。题记内容有进奉人的姓名和官衔。





《制授张无价游击将军告身》  
文书

唐

1973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  
出土

纵76.5厘米，横29厘米  
告身是授官授勋的文书。

唐朝还建立了严格的官员考课制度，订立标准，将官员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每年定期考察，以决定奖惩、升降。另外，还规定了年满七十岁退休的“致仕”制度和十天一休假的“休沐”制度等等。

总之，唐朝整理、改革了前代的政治制度，制定了严格完整的官制和行政体制，构建了分工细致周密的庞大官员机构，而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了加强皇权统治。严密的制度保证了行政效率，为治世提供了条件，对于盛世的出现起到了有益的促进作用；但是，到唐朝后期，官员队伍日益膨胀，坐食俸禄的人越来越多，也给人民造成了沉重负担，吏治腐败更成为痼疾，这又成为唐朝后期的弊政和导致唐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 第二节 科举之盛

西安南郊的大雁塔是驰名中外的名胜古迹，它始建于唐朝，当时称作慈恩寺塔。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子李治为了追

念长孙皇后的慈母之恩，在长安晋昌坊修建了大慈恩寺。寺院很大，香火非常兴盛。唐玄奘取经回来后，唐太宗便让他在这里居住翻译佛经。后来，根据玄奘的建议，由他亲自参与设计，建造了这座佛塔，用来贮藏取回的佛经。慈恩寺塔磅礴、雄浑，一派大唐气势。唐诗描写道：“十层突兀在虚空，四十门开面面风。却怪鸟飞平地上，自惊人语半天中。”

这座名塔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高大雄伟，也不仅在于它曾经是唐僧的译经之地，还因为它记载了唐朝新科进士放榜时的盛况，见证了唐朝科举制度的兴盛。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选拔人才、任用官员的重要制度。隋唐以前，中央政权选拔人才依靠的主要是“选举”，即通过地方、乡里推举选送，然后录用为官员。隋代开始设立科举考试制度，即由中央设立科目考试，允许各地士人应考，以优劣定取舍，直接选拔人才。从此以后，科举代替选举成为中国古代主要的人才选拔制度。这一制度延续了一千余年，直至清末才完结，从而引起了世界瞩目。唐朝正是科举制度的完善与成熟时期。



唐朝的科举分为制举与常举。制举是由皇帝特别下诏令举行，随时设科，名目繁多，常见的有贤良方正科、直言极谏科等。制举主要是选拔“非常之才”，在科举中不占主要地位。科举主要是常举，分为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字、明算等科目。武则天时还增加了武举和殿试，殿试即由皇帝在殿上亲自考选士人。在众多科目中，士人主要趋向的是明经与进士两科。

进士科重诗赋文才与对策，更便于发挥聪明才智和志向、识见，在唐朝这个文学兴盛、士人思想活跃的时代，进士科受到特别崇尚，最为人推重；而且，进士及第者往往得以平步青云，晋升朝廷显贵，被称为“白衣公卿”，自然更使士人趋之若鹜。到后来，进士科一枝独秀，压倒其他科目，几乎成了科举的代名词。中进士成为唐朝士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人称“登龙门”、“蟾宫折桂”。即使是朝廷显贵、位居宰辅，如果不是进士出身，也觉得终身遗憾；甚至皇帝唐宣宗也署名“乡贡进士李道龙”，表达了对进士的艳羡。进士科极为难考，每年各地来长安参加考试者常有千人之多，得中者却不过二三十人，这就更增加了进士的荣誉感，刺激天下士人为之奋斗终生。当时就有人写诗嘲讽说：“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唐朝依靠科举制度搜罗了无数英才，正是他们帮助李氏家族支撑了近三百年不堕的唐朝基业大厦。所以唐太宗在看到新科进士鱼贯而出时，欣慰地叹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唐代朝野上下对于进士科与中进士者近乎狂热地追捧，每年新科进士放榜是轰动一时的一大盛事。长安万人空巷，人们争相上街观看新科进士：“十二街前楼阁上，卷帘谁不看神仙！”进士们更是扬眉吐气，志得意

满。诗人孟郊的一首吟诵进士及第的诗生动地表现了他们得意、狂喜的心情：“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日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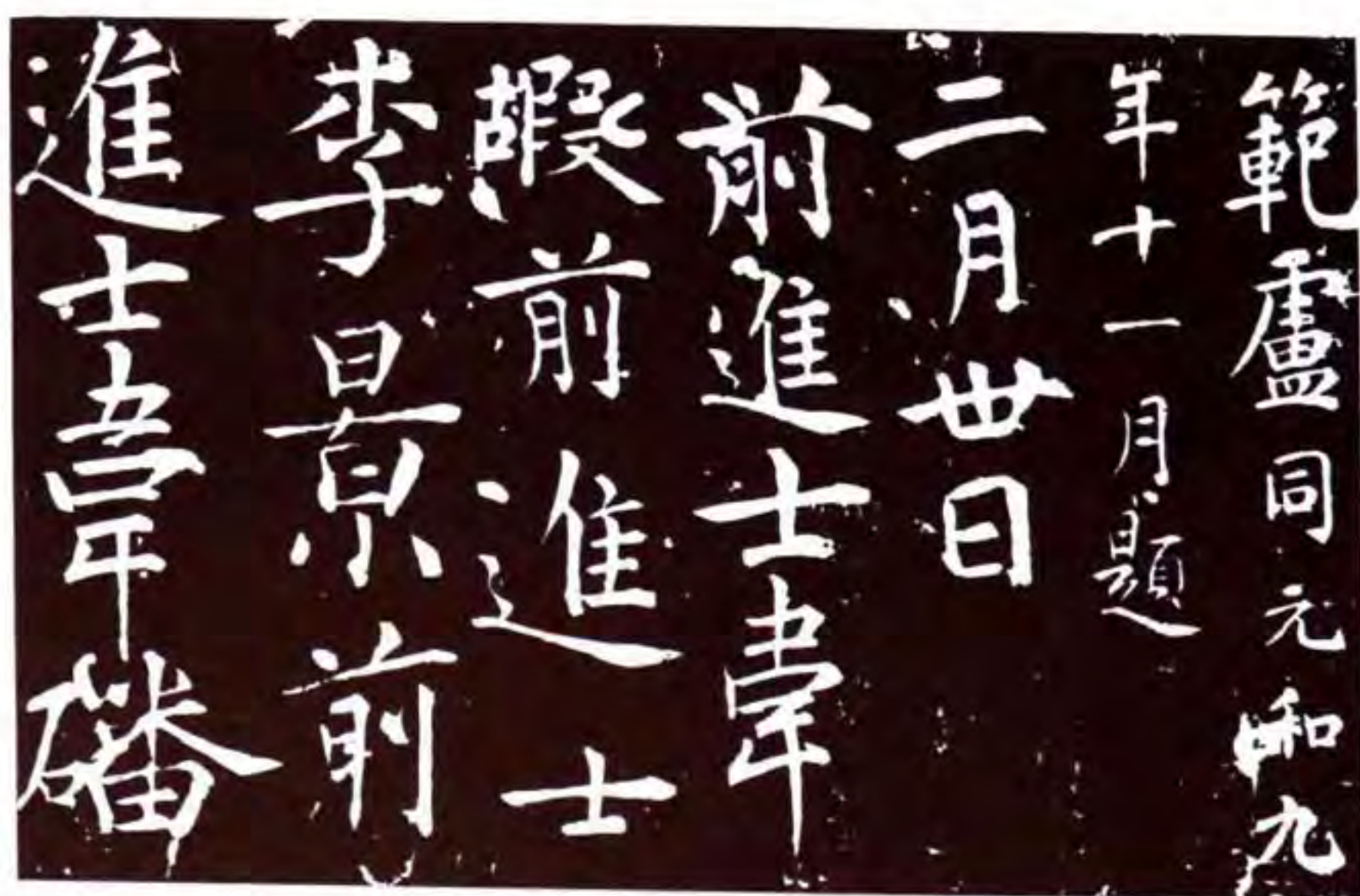
新科进士有一大套庆贺仪式，互相拜谒、宴请、观看佛牙、到月登阁打球等等，其中最隆重的活动要数皇帝亲自在长安东南隅的风景胜地曲江池赐宴和新科进士到慈恩寺塔题名留念，当时称作“曲江大会”、“雁塔题名”。曲江池畔，新科进士和朝廷百官聚集一处，泛舟击球，歌舞吟咏，尽情游乐。长安市民也倾城出动，争睹新贵人风采。宴会后，全体进士到慈恩寺塔下，由其中擅长书法者将全体进士姓名题写在塔壁上留作纪念。白居易二十九岁时及第，题名后得意地吟道：“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大雁塔

位于陕西西安







雁塔进士题名帖墨迹

唐

今天，人们在大雁塔仍能看到一千多年前那些天之骄子们题名的墨迹，使人如同亲历当时盛景，对于唐代科举制度的兴盛有了一番更为真切的感受。

### 第三节 修订唐律

中国古代的法律条文出现得很早，但是唐以前各代法典多已失传，有的不完整，有的只留下一些断简残篇，很难窥其全貌。而唐律却完整保留至今，成为传世的最早、最完整的古代法典。它总结发展了唐以前从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到隋代的各朝法制成果，使得古代法制臻于成熟完备。其后的宋元明清的法规制度无不以之为本，唐律对中

华法系的形成起了奠基作用。

唐朝制定的国家各项法规、制度，分为律、令、格、式四部分，内容非常详尽完备。律，是正刑定罪的刑律；令，是关于各种典章制度的规定，如《官品令》、《田令》、《赋役令》等；格，是以皇帝诏敕形式颁布的各种禁令，如《贞观格》、《开元格》等；式，是官府办事的各种具体章程，如《水部式》、《职方式》等。唐朝的令、格、式没有完整流传下来，只有唐律保存完整，成为极为珍贵的法律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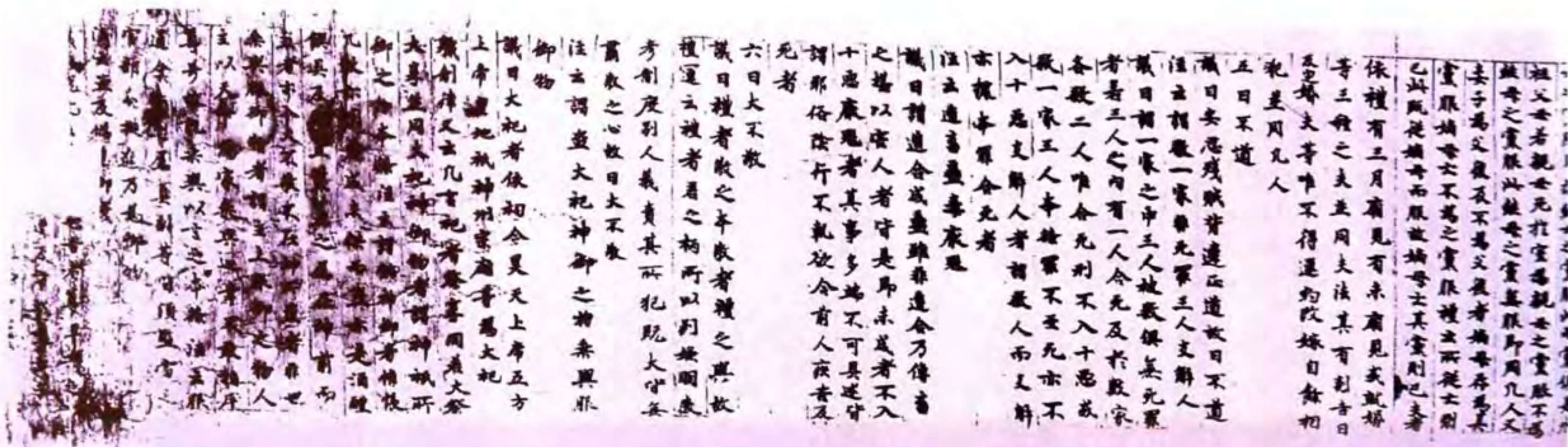
唐律是唐初开始制定，后又经过几次修订而成的。唐朝刚刚建立，唐高祖便组织人员参照隋律制定了新法律。唐太宗时又命大臣对其进行增删修改，前后费时十余年，最后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唐高宗时再次进行修订，并命长孙无忌等人撰写了《律疏》三十卷，逐条解释律文，以便各级官吏执行。律文与释文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唐律疏议》。

唐律十二篇包括：名例律、卫禁律、职制律、户婚律、厩库律、擅兴律、贼盗律、斗讼律、诈伪律、杂律、捕亡律、断狱律。诸篇具体规定了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罪名与处罚方式，疏议又逐字逐句进行了详细诠释。

这部法典不仅对于后世影响至深，成为后代各朝制定法律的蓝本，而且对亚洲很多

敦煌《唐律疏议》残卷

唐





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日本的《大宝律令》、朝鲜的《高丽律》、越南的《国朝刑律》等法典都对唐律多有借鉴或是仿照唐律制定，比如《大宝律令》不仅十二篇篇目、次序与唐律相同，许多文句都与唐律一模一样。

#### 第四节 均田制与租庸调制

敦煌与吐鲁番，唐时属沙州与西州，是远离中原的西北边僻之地。然而就在这边僻之地，保存了令世界震惊的数万卷古代文书。在这些文书中，一些唐代户籍残卷与土地文书以及租田、买地契约等成了历史学家研究唐代田地与租税制度的至宝。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许多问题，因为它们的出土与佐证而揭开了谜底，获得了答案。敦煌所出赵怀满租田契是文书中具有重要价值的一件。这件租田契已被剪成了鞋帮、鞋底状，显然是当时妇女用废弃的文书做了鞋样。虽然它的内容已经残缺，但是还能看出其大意：赵怀满从张弟仁、张茵富处租田耕种，每年要向田主缴纳田租（小麦），限定六个月缴齐。

吐鲁番唐墓中还出土了一些纺织品，有衣服、被褥、袜子、粮袋等。在部分麻、绫、绢织物上可以看到墨书题款，上面写有年月、地区、布帛性质、纳布人姓名、数量等内容，并钤有州、县以及库司的印鉴，有几件还标明“庸调布”、“庸布”等字样。布帛上标明的地点涉及唐代河南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江南东道、剑南道等，包括了今河南、陕西、湖北、湖南、四川、江苏、浙江等地区。这些中原的纺织品正是唐政府实

行租庸调制度的物证，它们又通过军资、赏赐或货币流通等途径，到达了新疆地区。

中国是农业国家，盛世的基础正是农业的发展。唐朝的土地与赋役制度——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对于农业的发展、盛世的到来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唐朝初年，经过隋末以来一二十年的战乱，人民流亡，土地荒废。直到唐太宗时，河南、山东一带还是“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唐朝建立后，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成为统治者的当务之急。唐朝统治者亲眼目睹隋由于赋役繁重、民不聊生导致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深切认识到让农民有田可耕，并减轻他们的负担，让他们休养生息、安居乐业是政权稳定、长治久安的基础，而当时天下又有大量土地荒废闲置，于是，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度出台了。

这两项制度并非唐朝的发明，而是创建

赵怀满租田契

唐

1959年新疆吐鲁番出土

宽21.7厘米，高27.2厘米





于北朝，在唐朝得到了重大发展。

唐朝均田制的基本原则是按人丁授田。均田令规定：按照户籍授田，十八岁以上至六十岁以下的丁男，每人授田一顷。老男和残疾人授田四十亩，寡妻妾授田三十亩。这些人如果是户主，再加授二十亩。所授田地十分之二是永业田，可以传给后代；十分之八是口分田，人死之后归还官府。另外，和尚、道士每人授口分田三十亩，尼姑、女冠每人二十亩。工商业者授永业田、口分田为农户丁男的一半。贵族与官吏依照官品与爵位，另有优厚的授田制度。所授土地不能随便买卖，但有例外：永业田在人死家贫、无力埋葬时可以出卖；口分田在特殊情况下，比如从人口密集的狭乡迁往人口稀少的宽乡时可以出卖；另外，官僚贵族的永业田、赐田可以出卖。而买地者不准超过本人应占有的土地的限额。限制土地买卖是为了防止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造成耕者无地，影响农业生产和国家赋税收入，但是与前朝相比，唐朝对于土地买卖的限制还是有所放

松。

在均田制即按丁授田的基础上，实行租庸调制度。如史书所说：“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租庸调制度将百姓的赋役分为三部分：租，受田户每丁每年缴纳粟二石；调，每丁每年缴纳绢二丈、绵三两，或麻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庸，每丁每年服役二十天，不服役者每日可以折合成绢三尺，或麻布三尺七寸五分，称作“以庸代役”。

除以上赋役以外，还有户税制度。唐朝按照财产和丁口即劳动力多少，把民户划为上上至下下九等，根据户等征收税钱，每户大约数百文，以供国家军事传驿、官员俸禄以及其他官府支出等用。

唐初实行的租庸调制度相比于隋朝的赋役，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尤其是以庸代役的办法，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对保证农耕、发展生产有一定益处。

唐朝的均田制度是否真正实行了？是如何具体实行的？是将所有田地全部由官府重新分配，还是只分朝廷掌握的无主荒地？授田是重新授给田地，还是对于民户已有土地的承认？授田数字是国家实际授给的田地数，还是法定的占田最高限额？农民是否如数得到了田令上规定的土地？对于这些，历史学家争论多年，至今看法仍不完全一致。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大量唐朝的户籍卷子以及给田、欠田、退田文书等，提供了最为真实的记录，详细地记载了当时民间田制的施行情况。通过对这些文书的研究，人们已大体肯定唐代确实实行了均田制。而这些文书又反映出，许多民户并没有得到法定授给的田数，“已受田”和“应受田”数额之间有很大差距。研究者曾对敦煌户籍残卷中记载清楚的五十五户授田数字作了统计，平均每丁授田三十五亩多一点，仅为法定授田数字的

庸调麻布

唐

1967年新疆吐鲁番出土  
幅宽58.9厘米





三分之一。这说明至少在这些边远地区，均田制度并没有完全得到实施。此外，上面所举的租田契约等，也证明唐朝的均田制只是国家规定主要的但不是惟一的土地制度，各地还存在着许多复杂的情况。

唐朝的均田制及租庸调制从唐初武德七年（624）开始实行，至中期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废弛，共推行了一百五十多年。它保证了农民有一定的土地可以耕种，从而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对于盛唐时期出现的农业兴旺、经济繁荣、府库丰盈、国力雄厚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 第五节 赋役改革： 两税法

唐朝中期的德宗皇帝并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但是他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作出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施行两税法，废止租庸调制。这是唐朝也是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重大改革，对于此后的经济制度与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改革源于安史之乱后唐朝社会的剧烈变化。唐朝田制号称“均田”，但是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地实现“均”，这从前面所举文书可以略知一二；而对于土地的买卖与掠夺，政府也日渐失去控制。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极大的问题：不管田是否“均”，租庸调却是按人丁照样收取。农民本来受田不足或者完全丧失土地，却仍要承担按照人丁征收的租庸调与其他徭役；而豪族富户无论怎样广占田地，甚至成为“积谷翁”，也只承担微不足道的赋役负担。

没有了田地的破产农民无力承担赋役，

于是脱离原地户籍，远走他乡或者做富户的佃客以逃避赋役，成为逃户和浮客。这种现象其实在唐朝前期就出现了，武则天时期逃户就已经成为让官府头疼的严重社会问题。安史之乱后的政治动乱，使得这一切变得更为严重，以至于“王赋所入无几”。而中唐以后本来战争支出浩大，控制的地盘和户口又大大减缩，按照原先的制度无法征收到更多的赋税，造成了朝廷财政枯竭、入不敷出，于是只好增收各种苛捐杂税。这就造成更多的农民逃亡，矛盾更加激化，进入了恶性循环。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改善财政，增加赋税收入，唐代宗时开始进行变革，办法是增加原先的按户等收取的户税和地税。唐德宗时期，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决定彻底改革税制，于建中元年（780）正式宣布实行两税法。

新税制规定：废除以前的租庸调和一切杂项赋税，全部并入两税。不论原住的土户还是外来的客户，包括没有固定居住地的行商，一律在现住地登入户籍，按照财产多少缴纳两税。两税包括户税与地税两项：户税是官府按贫富将居民分为上上至下下九等户，根据户等高低规定具体税额，收缴税钱，可以折收绌、绢、布；地税是按照田亩征收粮食即米、麦，开始时大约为每亩纳米或麦五升至九升五合。由于是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因此称作两税法。

两税法的立法原则明显不同于原先的租庸调制，它不是以人丁即男丁多少为本，而是以资产即土地多少为纳税标准，资产多则纳税多，资产少则纳税少。两税法实行后，唐朝的税收短期内有了明显改善，朝廷检查出了三百多万户新户口，包括一百三十多万各地豪强隐占的户口，国家的纳税户增加了一倍多，赋税自然大增，朝廷财力增强了，但



是，新的弊病也随之而来。官僚豪门或利用特权免税，或采取各种手段逃税，加上吏治腐败，行政效率低下，所定户等不合理或长久不变，故而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唐朝的财政困境。而且，为了对付藩镇战争，朝廷又增收各种名目的杂税，甚至比正税还多，使得农民负担愈加沉重。

尽管如此，两税法出现的历史意义却不可低估。它是中国古代税制的重要变革。它的出现，意味着官府对于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反映了社会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有了新发展。它基本结束了中唐以前以人丁为本收取赋税的历史，开辟了以财产为本收取赋税的新阶段。此后，在各朝订立的税制中都不难看到两税法的影子。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 第六节 府兵制的兴衰

唐朝墓葬中出土了大量戎装武士俑，一个个身着铠甲，腰横弓刀，威风凛凛。唐朝数百年间控制辽阔的疆域、抵御外来的侵扰、维持国内的安定，依靠的正是这些戎装的将士。但是人们并不十分了解，唐朝的兵士是些什么人，他们是从哪里征召而来，他们有什么样的责任与义务，又享受什么样的

待遇。

杜甫的名诗《兵车行》勾画了一幅凄惨的征兵图：“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诗中描写了唐玄宗时期因为边境开战而强行征兵，造成田地荒废、无人耕种，官府又催逼租赋，百姓怨声载道、生离死别的情景，表达了诗人反对穷兵黩武、同情贫苦农民的心情。“点行”就是征召兵士。从诗中可以看到，被征召的是关中的农民，他们带着弓箭，出发到边境戍守、屯田，有的从少年到老年，几十年不能还乡。

敦煌遗书中，有一首王梵志诗则描绘了唐朝兵士征战生不如死的境遇：“你道生胜死，我道死胜生。生即苦战死，死即无人征。十六作夫役，二十充府兵。碛里向西走，衣甲困须擎。白日趁食地，每夜悉知更。铁钵淹干饭，同火共分争。长头饥欲死，肚似破穷坑。”新疆阿斯塔那唐墓中还曾经出土一件《西州营名簿》，是开元三年（715）西州（今吐鲁番）的府兵花名册，一式三份，上面记载着四十名火长和四十名士兵的名字，还记着他们共牵挽二百四十匹驮马。可知这是

西州营牒

唐

1968年新疆吐鲁番出土

纵29厘米，横115厘米

这是唐开元三年（715）西州府兵的一支临时部队的营牒，记录有西州营的编制、配给等。





一支运输部队，由西州几个折冲府征调兵马组成，调发的目的地是甘肃陇西。

这些文字不仅勾勒了兵士们的艰苦生活，也记载了唐朝实施的府兵制度。王梵志诗明确道出了“府兵”之称，《兵车行》和《西州营名簿》所记也应是府兵。

唐朝前期实施的兵制主要是府兵制。府兵制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军事制度，其特

点是寓兵于农、兵农合一。它源于北朝，经隋至唐前期而趋于完备，唐朝中期后被停废，共实行了约二百年。

唐朝府兵的建制是：中央设置十二卫，各卫设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大将军是府兵最高长官，直接归皇帝节制。全国各地设置军府，称为“折冲府”，作为府兵的基层单位。所有军府分别划归十二卫统率。折冲府



描金石刻武士俑

唐

1958年陕西西安南郊杨思勖墓出土

高40.3厘米





彩绘贴金骑马陶俑

唐

1971年陕西乾县懿德太子墓出土

高33厘米至35厘米，长30厘米至32厘米

最多时有634个，其中首都所在的关内道最多，用以保证中央政权有足够的兵力统驭四方。

各军府的府兵由均田农民轮流充当，所有二十岁到六十岁的受田农民都有服兵役的

义务。征兵原则是根据财产先取富后取贫，财产相当，先取强后取弱，财产与身体相当，先取家中多丁的后取少丁的。服役期限为三年，官府三年一检点，以轮换兵士，补充缺额。府兵自身免除赋役，但是军资、衣装、轻





武器和前去服役途中的粮食都要自备。府兵一般春夏秋三季从事生产，冬季训练。平时主要任务是宿卫京师和戍守边境。遇到战争，由朝廷派将领统兵出征；战争结束，兵归军府，将归于朝，使将帅不能专掌兵权。

由此可以看出，府兵制度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农民有田才有可能自备资粮。唐朝前期，由于均田制得以实施，府兵制也能有效地实行，府兵因此成为唐朝主要的军事力量。而均田制度的逐渐废弛自然也导致了府兵制的崩溃。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失去土地的贫苦农民无力自备武器、资粮，府兵的征点也就无法进行；农民大批逃亡，更使得兵源短缺。而且州县点兵时，家富身强者往往雇人代替或贿赂官吏逃避兵役。加上边疆战争频繁，府兵多年不能更替轮换，更使农民逃避兵役惟恐不及，府兵也大批逃亡。《兵车行》正写到了这种情形。军府因此缺额严重，已经不能提供足够的宿卫、边防兵力。

为了解决兵源缺乏问题，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开始实行募兵法。即招募职业兵从事宿卫，称“长从宿卫”，后改称“彍骑”。这种雇佣兵由官府供给武器、资粮，并且免除赋役。开元二十五年，又改革边境征防军，招募自愿长住边镇当兵者，家口可以随军，官府提供田地、住房，称作“长征健儿”。此外，地方上还出现了“团结兵”，由各地富裕、强壮的本地人充当，他们不离乡土，也从事生产，但是不用自备武器、资粮，改由官府供给，类似于雇佣兵。事实上，募兵制已经逐渐取代府兵制。天宝八年（749），鉴于各府已无兵可调，府兵制名存实亡，朝廷正式废止了府兵制。

兵制的变化对唐朝后期的战争与政治形势产生了很大影响，唐朝后期对藩镇的战争就都是由这种招募的兵士进行的。



## 第五章

# 百业俱兴的唐代经济



### 第一节 农业兴旺· 仓廩丰实

#### 一、高山绝壑，耒耜亦满

唐朝前期，社会的长期安定、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朝廷劝农兴农政策的鼓励，使得农业获得了显著发展，到盛唐时期，农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史书描述当时的状况说：“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杜甫对开元时期男耕女织、仓储富足的盛世景象更是赞叹不已：“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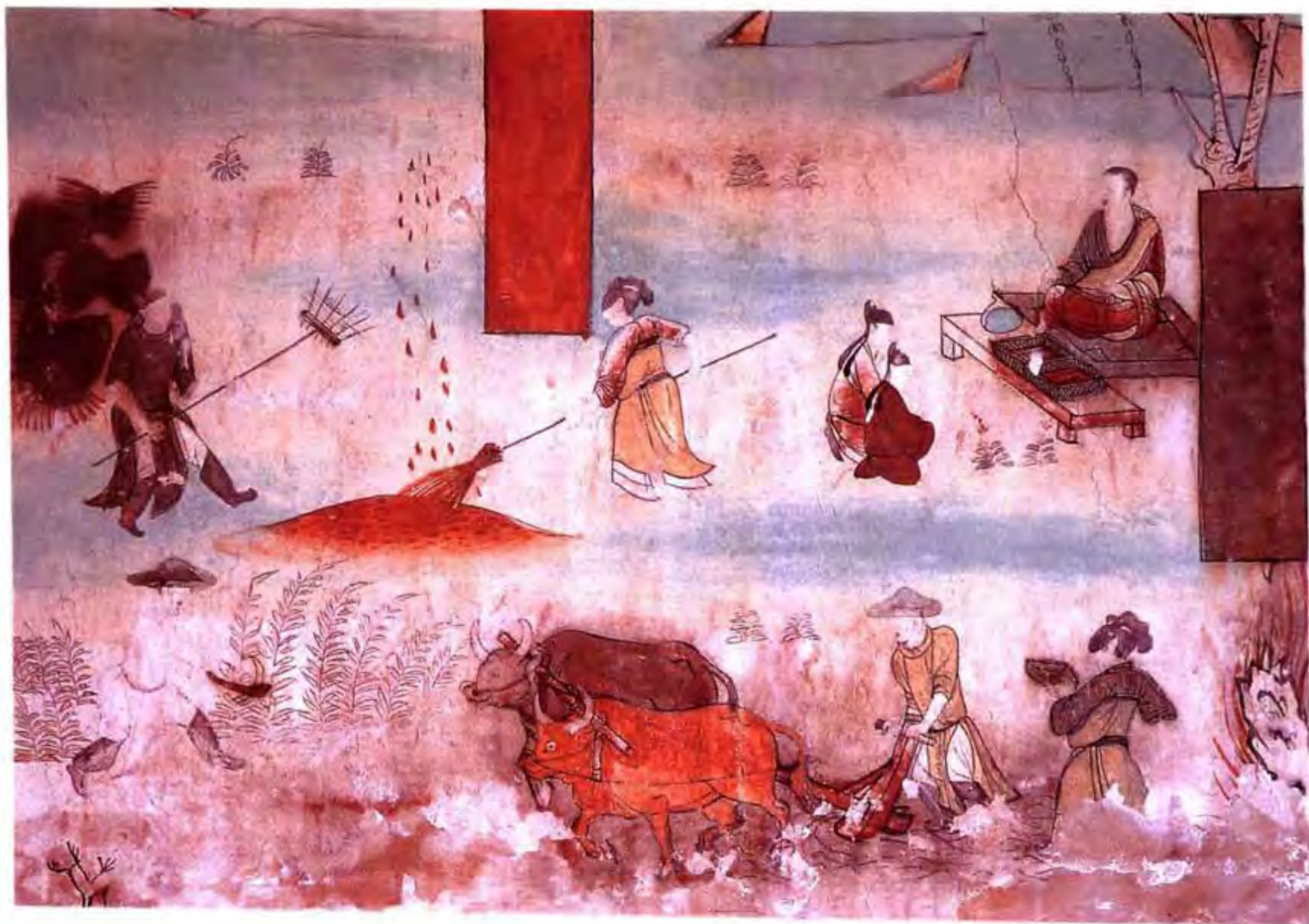
从“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的

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农耕面积的扩大，耕地已经从平原发展到荒僻的山地。唐政府鼓励开发垦殖荒地，有一定减免赋税的政策。水乡主要通过筑坝围水造田，把低洼的涝地改造成良田；山区则通过火耕等方法开垦山地，使得许多荒山僻岭得到开发，形成新的人口聚集地。通过开山、围水造田和垦殖荒地，耕地面积明显扩大。到盛唐天宝年间，垦田数字达到一千四百三十多万顷，按照当时八百九十余万户的数字计算，每户合田地一顷六十余亩。耕地的增加，使得粮食产量大大增长。

唐政府很重视兴修农田水利。根据记载，唐朝通过修筑堤坝、疏浚河道、开凿沟渠等，仅前期就兴修了一百六十多处水利工程，有的工程能灌溉数百顷至数千顷田地，保证了农业生产与增收。

耕作技术的提高也是粮食增产的重要原





《耕稼图》(壁画,摹绘)

唐

敦煌榆林窟第25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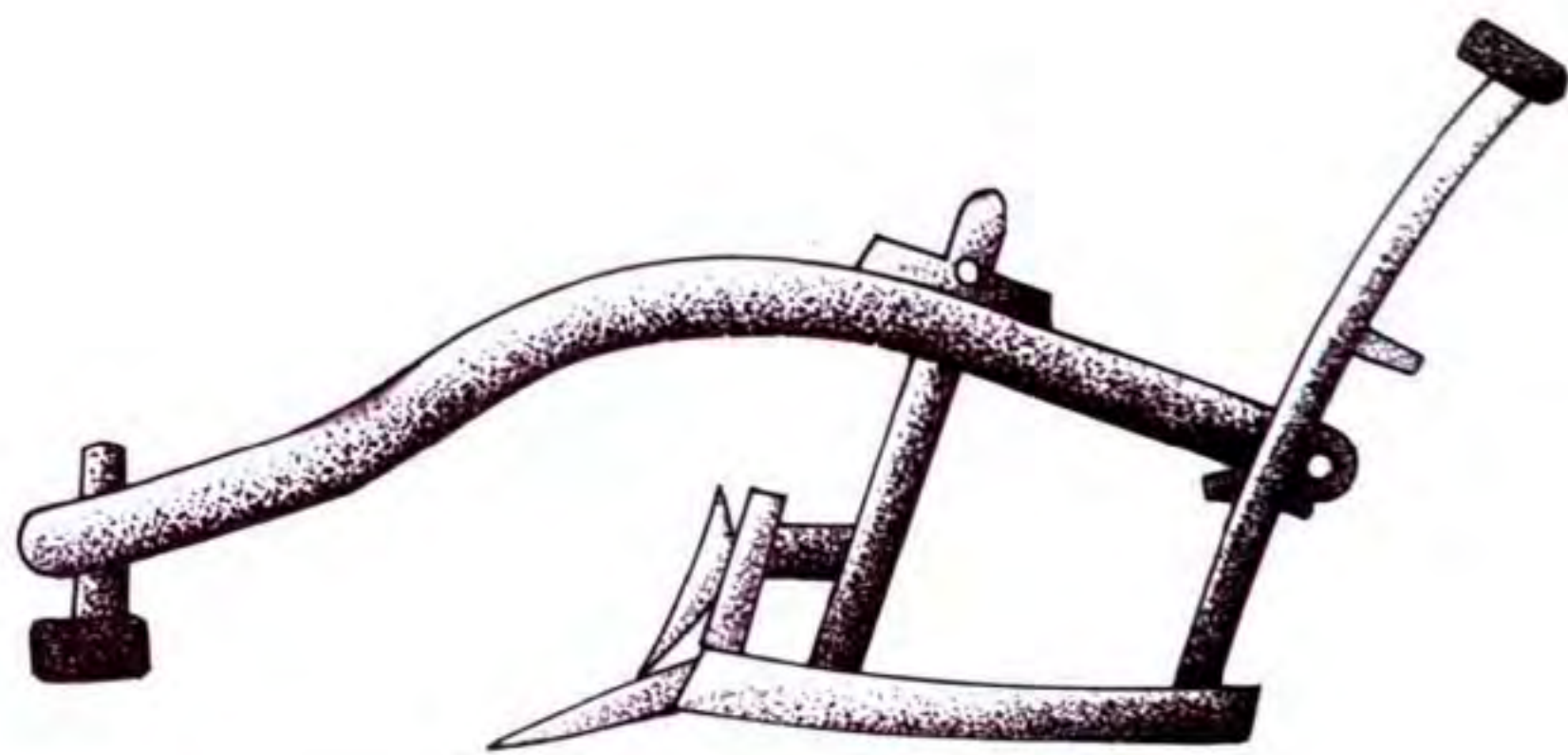
因。南方双季稻种植已相当普遍,还出现了稻、麦轮作复种的一年二熟制。粮食作物中,江南的水稻种植面积发展迅速,产量增长,大量稻谷北运,稻米已在北方饮食中占据了一定地位。至唐后期,江南水稻种植一直持续发展,使得这一地区逐渐成为富庶的鱼米之乡。而后期藩镇割据局面下的朝廷,也主要是仰赖江淮等东南地区的粮食才维持了国家财政和王朝命脉。经济作物方面,除了桑、麻、水果、药材等传统作物产量增加外,由于饮茶风气的普及,茶的种植逐渐广泛,产量大幅度增加。到唐后期,茶叶生产已经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所以唐朝实行了榷茶即茶叶专卖制度。

## 二、农具改革:曲辕犁与筒车

唐朝人陆龟蒙著有《耒耜经》,记录了当时使用的种类繁多的农具,不仅包括了前代所有的农具,宋以后使用的农具也基本齐备。其中,唐代农具改革的最主要成就是犁

的重大改进,出现了曲辕犁,当时称“江东犁”。这是唐代农业技术改进的重要成果。据《耒耜经》记载,江东犁由十一个部件组成,与前代相比有较大改进,最主要的改进是将原先的长直的犁辕改造为短曲的犁辕,使犁的重量减轻,操纵灵活省力,而且能够深耕,还有犁铧控制耕地的深浅。自此以后,中国的步犁基本定型,宋代南北方已经通用,一直沿用到近现代。此外,平整地的工具也有改进,有爬(耙)、碌碡、砺碡、铁搭等,用于翻耕土地、耙碎土块,使得土壤更为细熟,这些工具说明了当时农业生产精耕细作程度

曲辕犁示意图







铁犁铧（左）

唐  
河南三门峡出土  
长17.5厘米，宽28.5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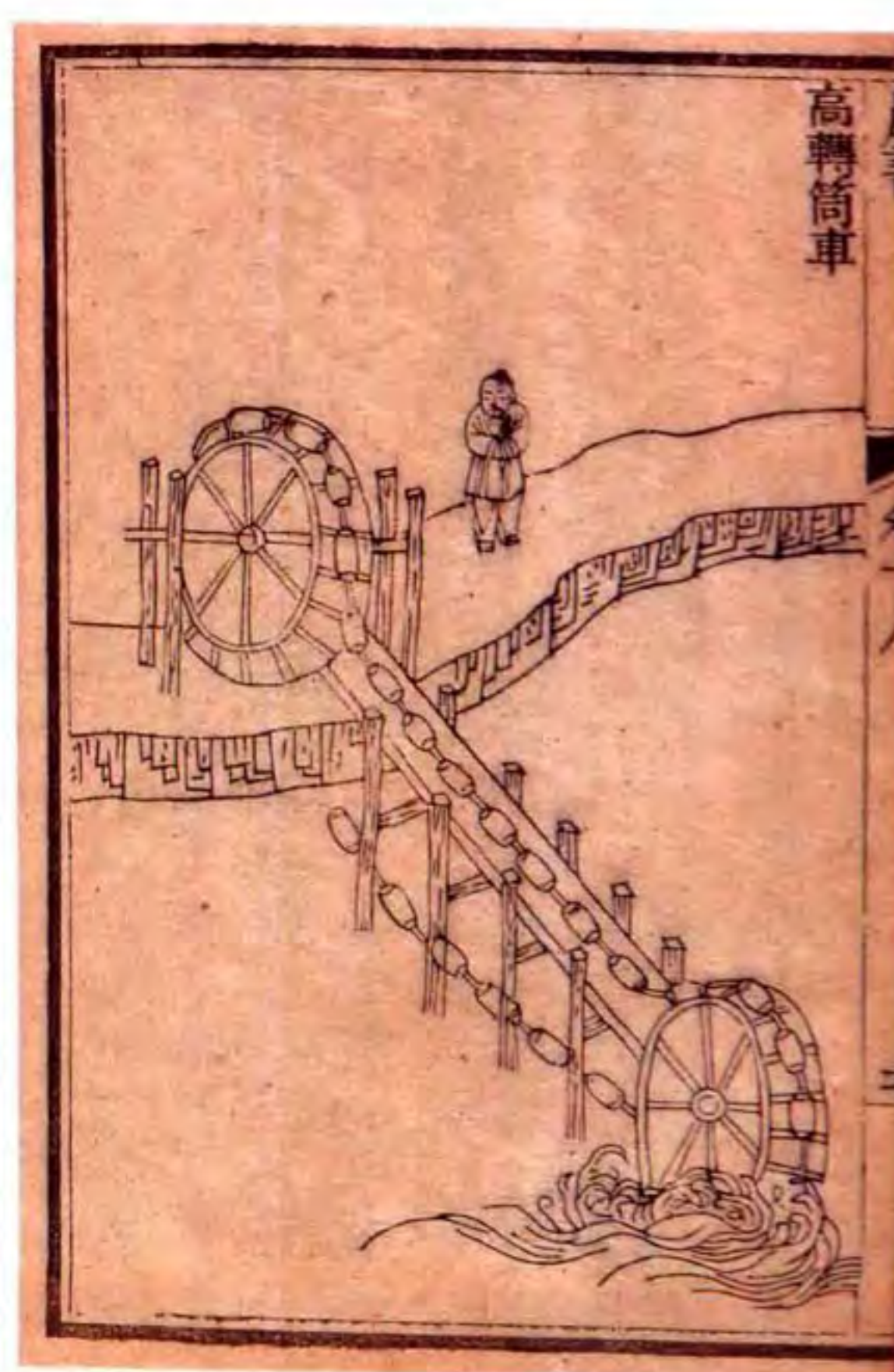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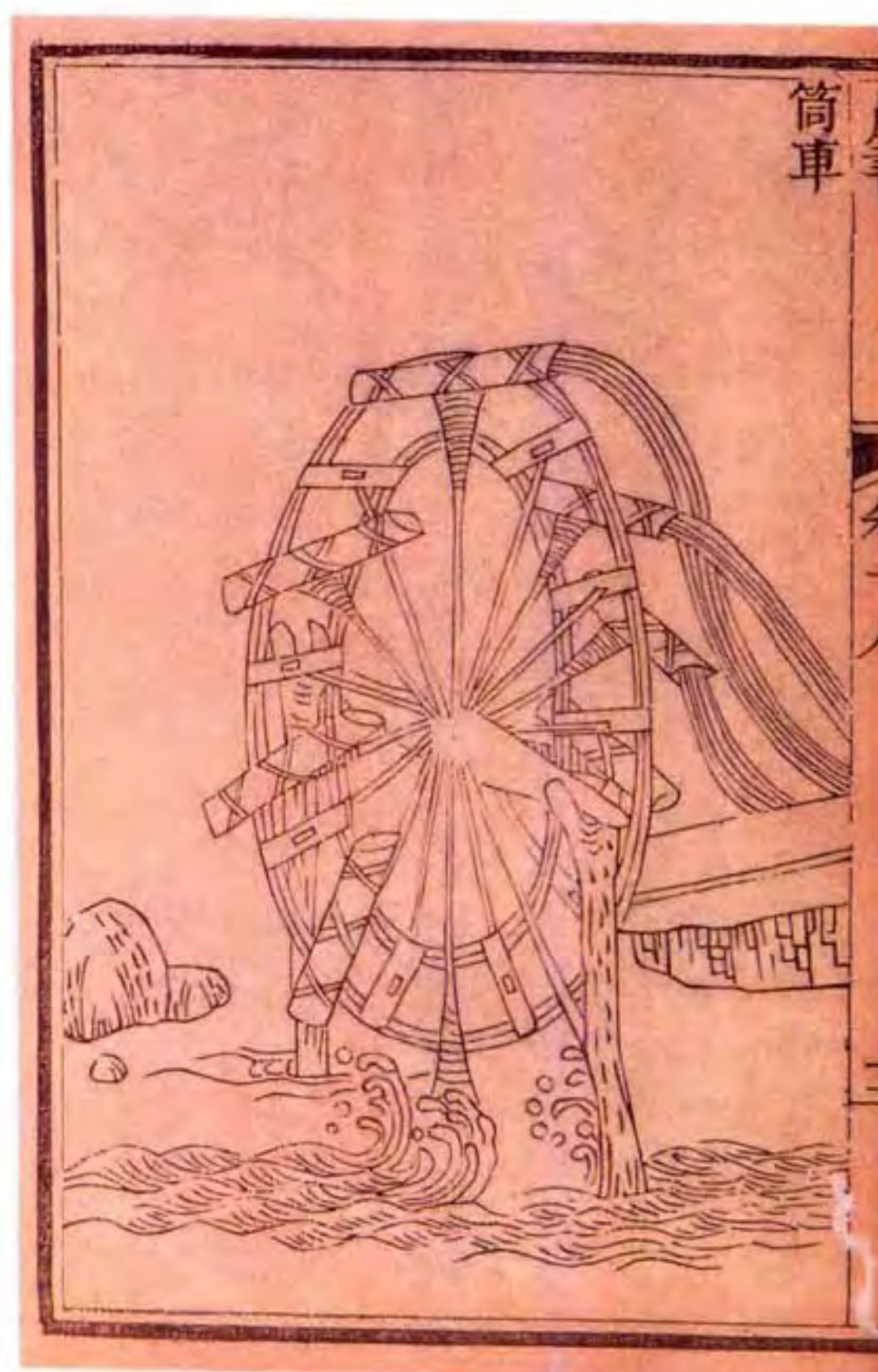
铁镰（右）

唐  
河南三门峡出土  
长30厘米，宽3.4厘米

的加强。

农田灌溉技术有很大进步，灌溉工具种类增多，除了普遍使用辘轳、桔槔、翻车等传统工具外，水车这一先进的灌溉工具已经比较广泛地使用。唐后期文宗时，朝廷曾经出示水车样，命京兆府按照样品制造水车，散发给百姓，以便灌溉水田。唐代还发明了新型的水车与筒车。北方发明使用了一种木桶水车，水车上有许多木桶相连接，以人力

或畜力使水车转动，木桶连续将井水取至地面，灌溉农田。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利用架空索道的辘轳汲水机械。长江流域则发明了水转筒车，筒车形状类似纺车，由水轮、竹筒、水槽组成，水轮上绑有小竹筒，旋转时，竹筒在低处舀水，到高处泻水。将筒车置于河边水中，河水带动筒车运转，车上的小筒汲取河水，倒入水槽，再进入水渠，昼夜不息，灌溉农田。这种筒车利用河水冲击的力量，



王祯《农书》中的筒车、高转筒车图



使水轮自行运转，已经是一种半机械化的工具。唐朝人陈延章的《水轮赋》便讲到了这种水转筒车。

这些农具的改革、创造对于唐代粮食增产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也表明古代农业日益走向精耕细作化的趋势。

### 三、国家粮库——含嘉仓

东都洛阳的含嘉仓是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著名的大型国家粮仓。

含嘉仓始建于隋，是隋炀帝营建东都时一起建造的。它位于洛阳城的北端、宫城的东北面，与宫城相连。这座大型粮仓实际上是一座小城，有城墙、城门，所以又称为含嘉城。

20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对含嘉仓遗址进行了勘查、发掘。含嘉仓位于今洛阳老城区北侧，东西长约600米，南北长约700米。仓城有四座城门，东门可能是漕运粮食进入含嘉仓的门户，北门可能是从仓内输出粮食漕运到长安的门户。仓城内已发现有大小不等的280余座圆形或椭圆形的粮食窖，还有记录着储粮时间、品种、数量、经手官员姓名等情况的刻铭砖。考古工作者推断，如果将被现代地上建筑与铁路压着的部分估计在内，全仓城应该有400余座粮窖。仓窖十分密集，排列有序，东西成排，南北成行。另据发掘勘测，仓城内还有管理机关的所在地和东西向、南北向的大道各一条以及遍布仓城的窖间小道。

仓窖口大底小，如同缸形。口径最大的为18米，一般是10米至16米；最深达12米，一般为7米至9米。大窖可藏粮一万数千余石（一石约合60公斤），小窖可藏粮数千石。在发掘的粮窖中，有的粮窖还保存着满满的一窖粮食——粟，即谷子，约有25万公斤。

从发掘还可以看出粮窖的构造与建造过程：

先挖成土窖，将窖底与窖壁夯实，用火烤硬，上面涂抹由烧土碎块、炭渣及油类混合成的防潮层。窖底铺设木板和草，然后铺垫谷糠，最后铺草席。窖壁也镶砌木板。然后分层放粮食，每层用席隔开。粮窖装满后，窖口覆盖谷糠，盖上席子，最后用竹篾、木板、草拌泥等做成的窖顶密封。这种地窖藏粮，既可以避火防虫，又可以抗腐防盗。据唐代文献记载，谷子可藏九年，稻米可藏五年。

唐朝前期，朝廷所需的粮食、物资，主要依靠农业比较发达的黄河下游、河北平原和江淮流域供给。这些地区距离长安较远，向西运送粮食主要依靠漕运。当时漕运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运输体系，洛阳以东地区的租米，经长江、淮河、运河、黄河，可以直达洛阳，先运到含嘉仓集中，然后再通过水运与陆运输送到长安。尤其是武周时，武则天长期居住洛阳，洛阳成为统治中心，各地的

含嘉仓铭砖（拓片）





租赋便更多地储存到含嘉仓，含嘉仓遂成为全国最大的粮仓。从刻铭砖所记年号可以看出，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储入的粮食最多；含嘉仓的粮食来自苏州、徐州、楚州（今江苏淮安）、润州（今江苏镇江）、滁州（今安徽滁州）、随州（今湖北随州）、越州（今浙江绍兴）、邢州（今河北邢台）、冀州（今河北

冀州）、德州（今山东陵县）、濮州（今山东鄄城北）、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南）等南北各地。到盛唐时期，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租赋的大量输入，粮食储备也达到了顶点。唐玄宗天宝八年（749），粮食储藏量达到一千二百六十余万石，仅含嘉仓的储粮就有五百八十余万石。正如杜甫诗中所说：“稻米流脂

含嘉仓第160窖存谷物与底层结构





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

储藏量巨大的含嘉仓正是唐代农业生产发达和粮食储备丰厚的实证。

## 第二节 百工千行· 争奇斗艳

### 一、织为秋雁行，染作春水色

在唐朝实行的租庸调制度下，每年全国各地都要上缴成千上万匹绢、布等各种纺织品以供朝廷、官府支用，同时丝织品又是对外贸易的主要输出品。以唐玄宗天宝八年为例，政府一年收纳的纺织品达到绢七百四十余万匹、绵一百八十五万余屯、布一千六百万零五万端。全国十道进贡朝廷的贡品中包括了诸多品种的丝、麻纺织品。唐代纺织业的繁荣兴旺由此可见。白居易曾以优美的诗句描绘了江南缭绫的巧夺天工和织女们的高超技艺：“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纺织品的精美、织染技术的精湛从诗中可见一斑。

保存至今的实物比文字记载更直观地反映了唐代纺织业的发达和织染技术的高超。20世纪以来，在新疆吐鲁番、甘肃敦煌、陕西法门寺地宫等处发现了不少唐代纺织品。它们的花色品种之繁多、花纹之精巧、图案之华美、色泽之鲜艳，都令人惊叹不已。

唐朝的纺织业有官营也有民营，朝廷设有织染署，专门管理织染生产，并设有织染作坊，役使的能工巧匠常有数百人之多，产品主要供皇室贵族享用。民间纺织手工业更

为兴旺，遍布全国各地。专业工匠以及农妇织女们机不停杼，终年纺织，以进贡朝廷、缴纳调庸，并作为商品出卖以维持生计。纺织业主要是丝织与麻织两大类。丝织品贵重精美，主要供上层富贵人家享用；麻织品较为粗糙价廉，多是下层百姓穿用。我们今日看到的精美织物基本都是丝织品，唐代纺织技艺的高超也主要体现于丝织业。

唐朝前期，纺织业以北方更为发达，今河南、河北是主要产地。河北定州一带是纺织业的中心，当地家家从事纺织，机杼之声百里相闻。各地出产的纺织品品种繁多，包括布、绢、绡、纱、绫、罗、锦、绮、褐等诸多品种。上等丝织品称绫、罗，绢和绡是一般品种，最常用、产量最大的是绢与锦。著名的品种有：剑南、河北的绫罗，江南的纱，彭、越二州的缎，宋、亳二州的绢，常州的紬，润州的绫，益州的锦等。唐朝后期，江南纺织业有了更大发展，江浙一带成为进贡朝廷丝织品的主要产地，品种多达数十种，

棕色地印花绢

唐

1967年新疆吐鲁番出土  
残长37厘米，宽23厘米







小团花锦

唐

1960年新疆吐鲁番出土  
残长26.3厘米,宽14.2厘米

大多纤美、华丽,满足了皇室贵族奢华生活的需要,白居易诗赞美的缭绡就是其中最精绝者。此外,宣州(今安徽宣城)出产的丝织红线毯也极为名贵,当地大量织造,进贡朝廷作为地毯。

丝织品花纹华美多彩,常见的花纹有联珠纹、团花连环纹、散点、几何形纹等,图案常见的有雁衔绶带、鹊衔瑞草、鹤衔方胜、盘龙、对凤、麒麟、狮子、天马、孔雀、仙鹤、葡萄、芝草、辟邪、折枝散花等,色彩富丽、明快。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蓝地瑞花锦,以绛黄色花纹配红白边、绿花心,与宝蓝色地相衬,和谐而明丽。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花鸟文锦,主题花纹是五彩大团花,周围环以飞鸟、散花,锦边为蓝地五彩花卉带。从唐代仕女画的妇女服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唐代丝织品花纹与颜色的多姿多彩。

唐代丝织技术有很多创新,出现了一些新品种。锦是丝织品中最为华美的传统织物。唐代使用新技法,利用多重多色的纬线,织出花纹更繁复的织品。最有代表性的是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锦鞋,面料是用八种各色丝线织成,构图复杂、配色华丽、组织细密;还有同地出土的花鸟纹锦,花纹复杂,色彩鲜艳,花鸟形态逼真,即使放在今天的纺织品中也不逊色。其余如联珠对马纹锦、联珠戴胜鸾鸟纹锦和克孜尔石窟所出双鱼纹锦,以及日本探险队从新疆劫去的花树对鹿锦等,都是唐锦中的珍品。还有一种特殊的“织成锦”,能织出非常精细、华丽的图案。据记载,唐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有一条用鸟的羽毛和丝织成的百鸟裙,应该就是一种织成锦。锦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形状尽显于裙上,可见制造技术的高超。蜀锦是传统名产,唐代的蜀锦花色更为繁多,驰名天下。罗、纱都是半透明的轻薄织物,有很强的装饰性,非常受贵妇仕女欢迎,她们常用轻纱作披帛。唐代生产的罗、纱比前代更为精细,诗人把它们比作天上的云彩。新疆阿斯塔那墓葬中的白地绿花罗,轻薄如云雾,丝细如毫发,真实地反映了唐代织罗的精湛技艺。吐鲁番出土的绛色轻容纱,也比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织造更为精巧。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唐代的幡,用轻绢制成,几乎是透明的,幡的两面还有彩线绣的图画。

与丝织品相比,下层百姓穿用的主要是麻布。麻织品生产量巨大,全国每年麻布总量最高时多达一百多万匹。麻织品包括苧布、葛布、蕉布等类,南方出产较多。新疆克孜尔、阿斯塔那都发现有唐代麻布,从中可以了解唐代麻织品的织造技术。此外,西北地区的毛织业、西北与岭南的棉织业也开



始发展起来，有不少产品输入中原。日本收藏以及新疆塔里木出土的毛毯都是唐代毛织业的见证。棉织品当时称为白叠布，多产于两广、福建等地，棉布后来流入北方，长安、洛阳等城市都有棉布贸易。广西的“桂布”因为质厚可以御寒，受到了长安朝廷人士的喜爱。

由于纺织品生产的迅猛发展，唐代染色

工艺技术也随之有了很大提高。研究者对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丝织品做过色谱分析，共发现了二十四种颜色。唐代流行的印染技术有夹纈、绞纈、拓印、碱印以及蜡染。最常用的是夹纈和绞纈。夹纈是用两块雕镂相同图案的花板，将织物夹在中间，在镂空处涂上防染浆料，然后去板浸染，成为色地白花的印染品；或在花板镂空处涂上颜色，成为花



墨绿地狩猎纹印花纱

唐

1968年新疆吐鲁番出土  
长35厘米，18厘米





红绢

唐

1967年新疆吐鲁番出土  
长45厘米，宽16厘米

方格棉布

唐

1959年新疆巴楚出土  
长33厘米，宽10厘米

纹。夹纈印染的花纹对称，精致美观。绞纈法较为简易，相当于今日的扎染，是民间常用的印染方法。有的用线将布扎成、缝成各种花纹，然后浸染，形成色地白花的图案；也有的将谷粒包扎在织物上，然后浸染，形成各种图案花纹。印染品风格朴素大方。新疆阿斯塔那墓出土的茶褐地绿白印花绢是唐代印染纺织品的代表。唐代诗人曾经用“红裙妒杀石榴花”等诗句赞美衣裙色彩的艳丽。



许多出土的唐代纺织品历经千年，仍然颜色鲜艳，更证实了染色颜料与印染技术的成熟。

唐代刺绣工艺也有了明显进步。由于皇室贵族生活的需要，宫廷中、地方上都有专以刺绣为业的绣工绣女，绣品进贡朝廷或作为商品。武则天、杨贵妃时期，后宫专门从事刺绣的女工就有数百人之多。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刺绣除了进行丝绸服饰加工外，还广泛应用于刺绣佛经、佛像，使得刺绣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品，这在古代刺绣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变。由于刺绣表现对象的扩大，技法也随之得到创新、提高。唐懿宗的女儿同昌公主的嫁妆中有神绣被，绣了三千鸳鸯，间以奇花异草，巧夺天工。唐中期永贞年间，南海进贡的巧女卢眉娘，能在尺幅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体如同小米粒，而点画分明，细如毫发。刺绣佛像更为普遍，今天人们还可以见到唐人绣的交脚菩萨等佛像绣品实物。

唐代的丝绸畅销海外，泉州、扬州、广州等外贸港口船舶云集，外来船舶大都运来海外珍宝、特产，以换取中国光彩夺目的锦、绮、罗、绢等丝织品。日本的留学生、遣唐使返回日本时也带回大量丝织品。至今日本正仓院内还珍藏着唐代传输过去的各种绚丽的锦、绫等名贵织物以及夹纈、蜡染等印染品。同时，唐代的织染技术也促进了一些国家织染技术的发展，镂空印花等技术就在这一时期传播到了日本，后来又传播到欧洲。由于丝绸大量输出，中国被许多国家称为“丝国”，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中外交通道路也因此被世人誉为“丝绸之路”。

## 二、千姿百态唐三彩

唐三彩是最富时代特色的陶瓷工艺的一



枝奇葩，也是唐代手工业的一项杰出成就。

仰赖随葬品丰富的唐代墓葬，唐三彩在20世纪被大量出土。陕西的几十座唐墓中先后出土了大量三彩器物，有的墓葬竟有数百件之多，此外，河南、江苏、辽宁、山西、甘肃、江西、湖北、广东等地的墓葬也都有唐三彩出土。一时间，这种陶瓷工艺品几乎举目皆是，构成了一个璀璨的艺术世界。

出土的器物中有许多各种姿态、形象的三彩人物俑，包括天王、文官、武士、贵妇、少女、胡人、乐舞伎、说唱人、侍女、僮仆以及牵马、牵驼、骑马击鼓、骑驼舞乐、骑马射猎等形象的人物，有马、骆驼、狮子、牛、羊、猪、驴、骡、狗、鸡、鸭、兔等动物俑，有人面兽身或兽面兽身的镇墓兽，还有罐、壶、碗、盘、盆、洗、盂、炉、枕等生活用具，以及房屋、庭院、园林山水、牛车、橱柜等模型。它们不仅使今人得以探究当时陶瓷工艺的成就与特点，也成为人们了解当时社会文化、服饰、娱乐、乐舞、生活状况的极好形象资料。

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釉陶器，釉色有黄、绿、蓝、黑、白等，因为其中黄、绿、褐三色为基本釉色，所以习称为“三彩”。唐三彩是统称，并不一定每件器物都有三色，有的只有一种或两种釉色。唐三彩的胎料是白色粘土，在烧制过程中，釉料向四周扩散流淌，使得各种颜色互相浸润交融，形成了自然而斑驳瑰丽的三彩釉面。这成为唐三彩的鲜明特色。唐代，瓷器大量烧制，并广泛使用于日常生活。三彩陶器虽然斑斓明丽，光彩夺目，但质地较为粗松，所以一般不作为日常生活用具，而是用作明器。

唐代手工业尤其是陶瓷业的兴旺发达，为唐三彩取得突出成就铺垫了基础；而上层社会的厚葬之风导致的对于随葬明器的需



三彩花瓣纹枕

唐

1987年河南洛阳出土

长10.7厘米，宽6.7厘米，高5.1厘米



三彩武士俑

唐

1958年陕西西安独孤思贞墓出土

高89厘米



## 三彩女俑

唐

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庭海墓出土

高45.2厘米



求，更刺激了三彩的生产与质量的提高；唐代雕塑艺术和陶瓷烧造工艺、技术的成熟，则使得这些原本是用来陪伴死人的随葬品，成了古代艺术宝库中独特的瑰宝。

唐三彩作品虽然主要是用于陪葬，但是却绝不刻板、乏味，而是色泽绚丽，造型美观，题材广泛，富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体现了大唐盛世的气魄。工匠们在制作中不是全部照搬现实生活，而是有所创造、发挥与想象。人物、神怪、动物形态或逼真、或夸张，极富表现力。器物风格、造型各异，富有情趣。如三彩龙首杯，龙头反转吐水，做成杯把；象首杯则是象鼻上翘，做成环形杯把，构思均十分奇巧。其中胡瓶、龙首杯等，是工匠吸收西域和国外生活用具的造型特色制成的，因而带有明显的异国情调。

考古工作者还先后在河南巩义和陕西铜

## 黑釉三彩马

唐

1971年河南洛阳关林出土  
高66.5厘米



川黄堡发现了两处烧制唐三彩的窑址。在窑址不仅出土了许多三彩器物及坯胎和范模、支垫等烧造工具，而且在黄堡窑址发现了由一排窑洞组成的作坊，有工匠的居室、制坯的工作间和产品库房；另外还有三座窑炉，由耐火砖砌筑，有窑门、燃烧室、窑床和烟囱。这些遗物完整地再现了当时工匠烧造三彩陶器的情景与工作程序。

唐三彩不仅受到唐人的欣赏，而且曾作为中国的独特宝物远销到国外。在韩国庆州附近曾经出土了一件唐三彩三足罐，蓝彩非常美丽，与中国辽宁、陕西等地出土的此类

器物风格一致。日本的奈良、福冈、京都等地的古墓、宫殿、寺院遗址中都发现过三彩器物的残片，有罐、瓶、枕、壶等。伊拉克巴格达附近的遗址中也发现了唐三彩的碗和盘。此外，意大利、埃及也有三彩陶器和碎片出土。朝鲜、日本、西亚古国波斯受其影响，还烧制成了与之类似的“新罗三彩”、“奈良三彩”、“波斯三彩”等。

### 三、类玉类雪青白瓷

与主要作为随葬明器的三彩陶器相比，瓷器是唐朝人的日常生活用品，尤其饮茶风



三彩天王俑

唐

1955年陕西西安韩森寨出土  
高52厘米，53.5厘米





青瓷葫芦尊

唐

1956年河南陕县出土  
高17.6厘米，口径2厘米，底  
径7.4厘米

气的盛行，使得瓷器需求量更大，因而产量空前增多。出土与存世的唐代瓷器为数不少，唐代陶瓷工业的兴旺和烧制工艺的精湛，

从中得到了最为直接的说明。

唐朝瓷器生产有“南青北白”之说，即南方主要生产青釉瓷器，北方主要生产白釉瓷器。陆羽在《茶经》中评点瓷茶具时说南方的青瓷“类玉”、“类冰”，北方的白瓷“类银”、“类雪”，可见瓷器的纯净晶莹。

青瓷是唐代陶瓷的主流，窑址遍布南北，浙江、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四川都有青瓷生产，其中浙江越窑的青瓷最享盛名，此外，湖南岳州窑青瓷产量也很大。越窑主要分布在当时的对外贸易港口明州（今浙江宁波）附近，当地窑场林立，产品不仅畅行国内各地，而且大量出口。越窑青瓷胎骨较薄，釉色为青黄或青绿。诗人赞誉青瓷“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可见其青翠美丽。青瓷多作茶具，是唐人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陆羽在《茶经》中曾将越窑列为瓷窑之首。青瓷器物主要有罐、壶、瓶、杯、碗、盂、灯、盒、匙等。壶多为短嘴长柄，受波斯萨珊银器影响，还出现了凤头壶、扁壶。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釉凤头龙柄壶就是受波斯风格影响烧制的作品，造型别



秘色瓷碗

唐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  
出土  
高7.1厘米，口径25厘米



致，装饰繁缛，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瓶中最有唐代特点的是双龙耳瓶。杯也有受到外来风格影响的高足和小环耳杯。青瓷装饰手法有刻花、划花、印花、堆贴等，以线刻出花鸟、山水、人物等图样，圆熟流畅。唐朝前期青瓷器物风格较为简朴，多为素面，后期逐渐变得华丽。青瓷还专供宫廷使用，由朝廷设官督造，所以又称“秘色瓷”。法门寺地宫出土了16件越窑秘色瓷，它们釉面清澈青绿、晶莹润泽，使人们得以一睹唐代秘色瓷的风采。

白瓷生产地主要分布在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山东等地，其中河北临城的邢窑最有名，与越窑并称。邢窑白瓷在盛唐以后通行天下，既生产精细的瓷器，也生产较粗糙的瓷器，白瓷器成为贵贱通用的日常用品。此外四川大邑、江西景德镇的白瓷也很有名，景德镇的白瓷被称为“假玉器”。白瓷的制造是在胎上先挂白化妆土，然后再上白透明釉，釉色白中闪黄。到唐后期，白瓷器更为体薄釉润，胎釉皆白，更为光洁纯净。器形朴素大方，有罐、壶、瓶、碗、盘、枕、烛



台、玩具等。白瓷也吸收了一些外来的工艺风格，如牛头形、虎头形杯，便是仿照波斯金银器造型制造的，刻画的花纹有些也吸收

白瓷长颈瓶

唐

1957年河南陕县出土  
高22.2厘米，口径6.9厘米



白瓷唾壶（左）

唐

河南陕县出土  
高16.5厘米



白瓷灯（右）

唐

1956年河南陕县出土  
高30.5厘米



## 绞胎瓷枕

唐

1956年河南陕县出土

高7.7厘米，长14.7厘米

这个似木纹状的瓷枕是用两种不同颜色的泥料做坯，然后交叠拧绞施釉烧成，是唐代出现的新品种。



了波斯器皿、织锦上的纹样特点。

除青、白瓷外，黄釉、黑釉、花釉、绞胎等品种也成熟起来。黄釉瓷在唐代开始盛

## 寿州窑瓷汤瓶

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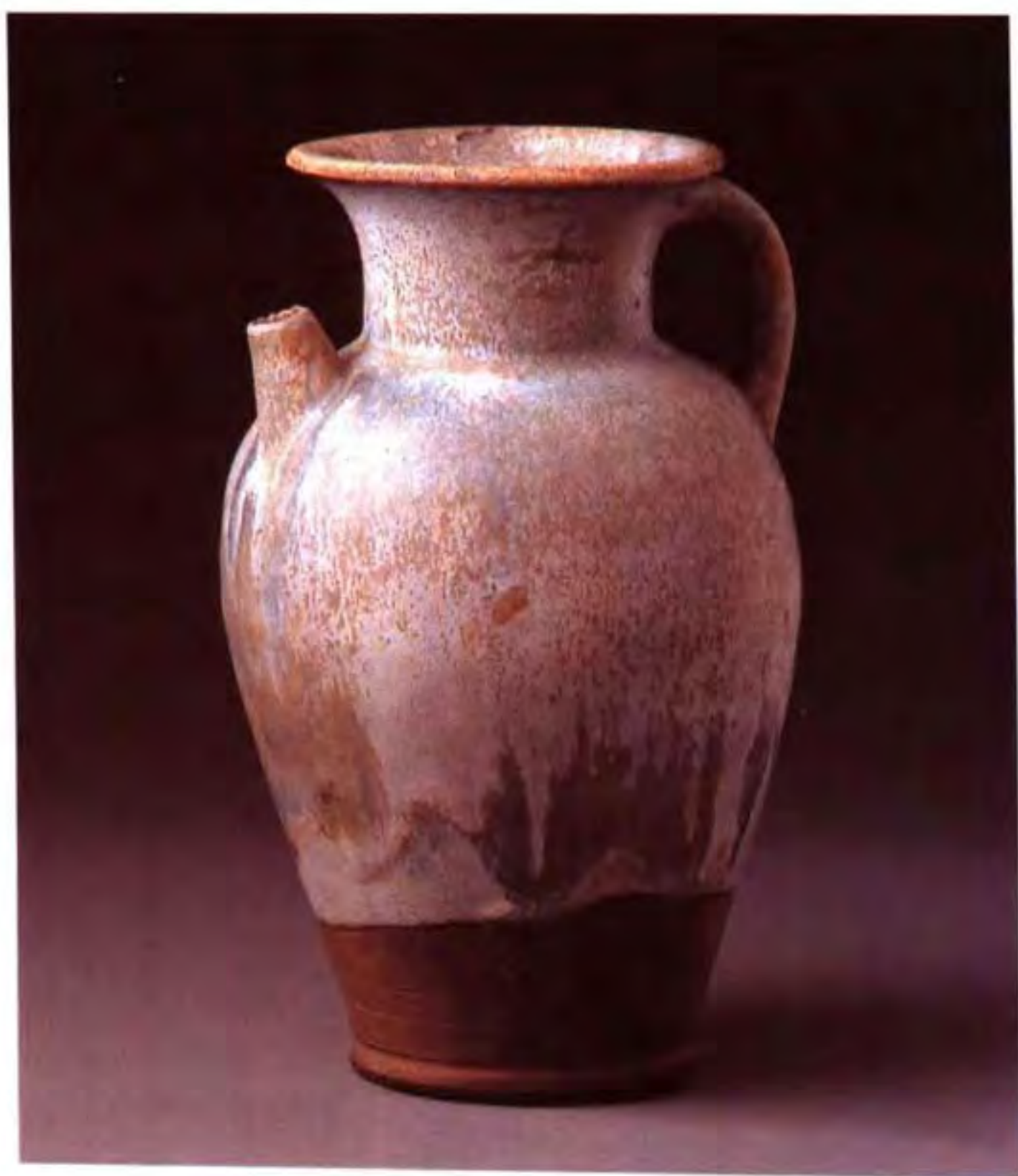
高21.9厘米，口径6.3厘米



行，安徽、河南、陕西、山西、河北都有生产，以安徽淮南寿州窑最有名。黄釉瓷一般胎体厚重，胎上挂黄化妆土，再上透明黄釉，釉面光滑，有碗、盏、杯、钵、枕等器物。黑釉瓷主要产于陕西、河南、山东，以山东淄博窑产量最大。产品主要是碗，也有瓶、壶、罐、炉等，风格质朴大方，釉色漆黑晶莹。花釉瓷是在深色釉上涂上浅色斑点，然后烧制而成，色彩鲜明，风格挥洒奔放，主要产于河南、山东，以河南鲁山窑最有名。器物有罐、壶、瓶、盘等。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花瓷腰鼓，黑釉白斑，风格雄浑豪放。绞胎是陶瓷新工艺，是糅合白褐两种瓷土，然后成型上釉，烧成后纹理类似木纹，自然而又变化多端。这种瓷器多是小件，有杯、碗、碟、枕等。

此外，为了加强对青瓷器物的装饰，在刀刻花纹外，唐代产生了用笔描绘的釉下彩绘工艺，即在瓷坯上用褐彩、绿彩画出图样，然后涂透明青釉，高温烧成。这种釉下彩绘瓷器主要是长沙铜官窑和四川成都邛崃窑烧





花釉瓷壶（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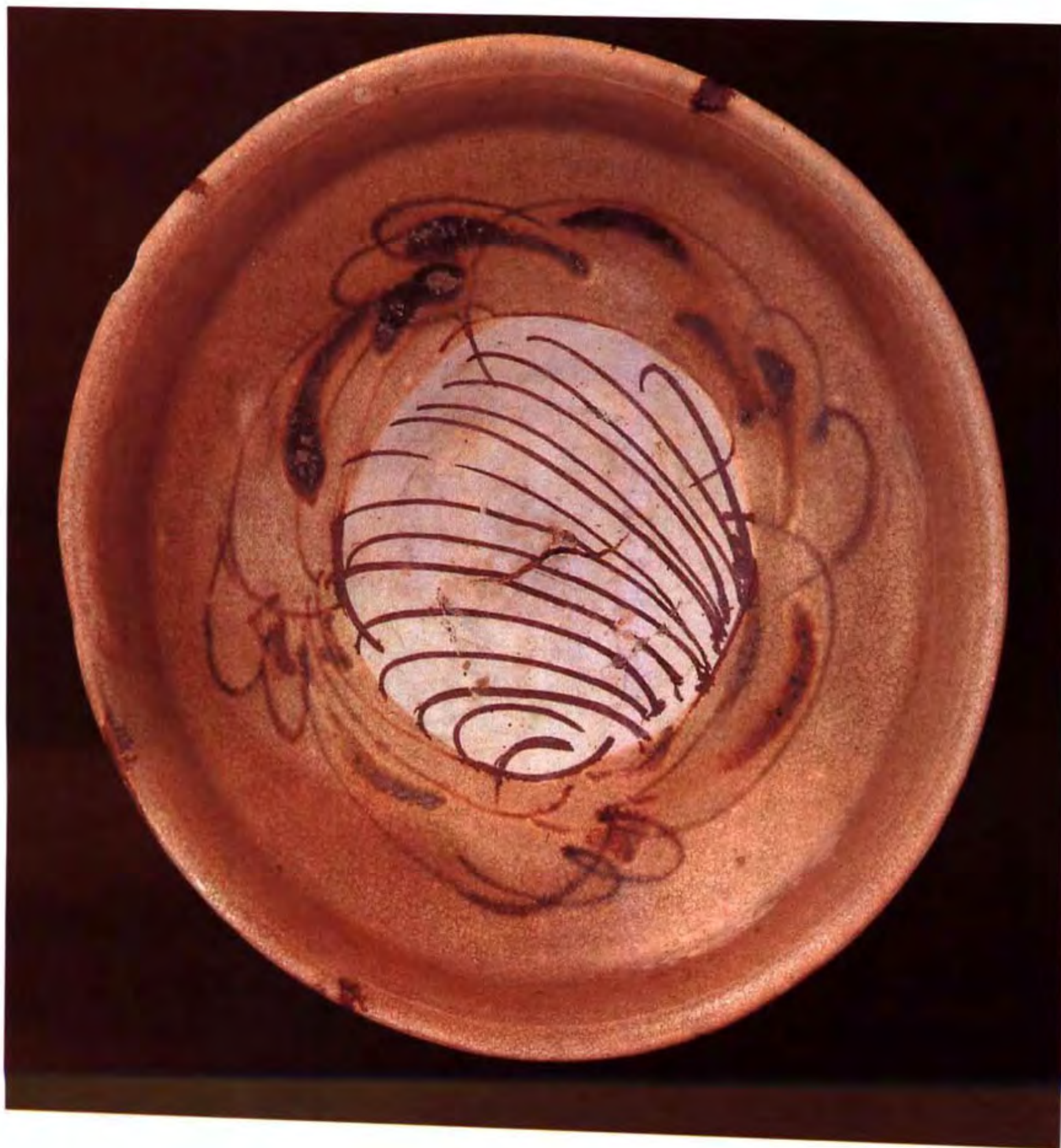
唐

1956年河南陕县出土  
高30.9厘米，底径9.1厘米

黑釉蓝斑瓷罐（右）

唐

高38.3厘米，口径16.1厘米



青黄釉绘兰草瓷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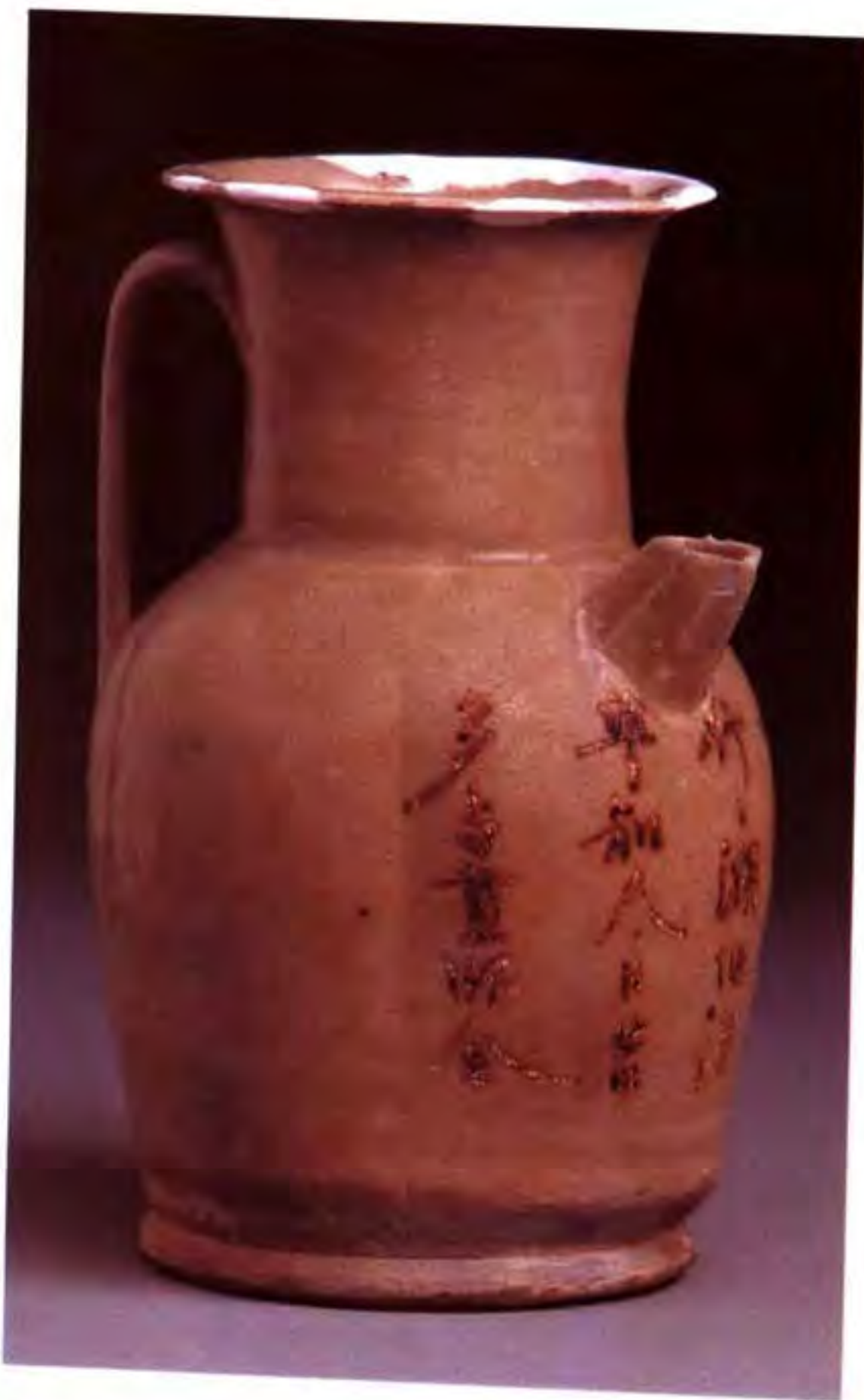
唐

1978年湖南长沙铜官窑址出土  
高4.1厘米，口径15.5厘米



青釉褐彩诗句瓷壶

唐  
1983年湖南望城出土  
高19厘米，口径9.5厘米



制，前者产量很大，在当时的外贸港口扬州、明州地区出土很多，说明曾大量出口。彩绘器物有壶、罐、瓶、盒、玩具等，用笔豪放，恣肆挥洒，题材有山水、花鸟、书法等，风格类似水墨写意画。唐代的釉下彩绘工艺尽管还不成熟，但为后代的瓷器彩绘打下了基础，在陶瓷工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 四、流光溢彩金银器

出土的唐代金银器迄今已有1000多件。收藏最丰富、最有价值的有两处：一是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共出土了270件唐代金银器，据考证，都是盛唐时期邠王李守礼的家藏之物；另一处便是著名的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中共出土121件金银器。这些金银器包括碗、杯、壶、瓶、药器、装饰品和宗

狮纹金花银盘

唐  
1956年陕西西安八府庄东北出土  
高6.7厘米，口径40厘米





教器物，不但数量大、品种全，而且制作精湛，纹饰细致，这是唐代金银器与此前先秦、两汉金银器最明显的区别。

从李守礼家藏如此众多的金银器便可以看出，当时贵族生活盛行使用金银器。史书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时上层社会竞尚奢华，皇室贵族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金银器，皇帝赏赐大臣、外国使节，以及地方官吏向皇帝贡奉，金银器也是重要的物品。唐文宗曾经赏赐翰林学士王源中二十四只金碗，淮南节度使王播一次向文宗进献了三千四百只银碗。

唐代金银器的制作有官营，也有私营。官营有政府机构少府监所辖“金银作坊院”，专门制作皇室贵族生活以及赏赐大臣、外国

使节等所需器物。何家村李守礼家藏的金银器就都是官府作坊的产品。各地官府也有金银器作坊，产品主要用于进贡朝廷。民间有作坊制作金银器贩卖，当时长安市场上有不少制造和出售金银器的店铺。唐朝前期，金银器制造主要在长安及附近地区，后期江南地区的金银器制造业迅速发展，成为重要产地。

唐代金银器制造技术已经非常复杂精细，许多器物都是使用多种工艺程序制作出来的。从出土器物可以看到当时的浇铸、焊接、切削、刻镂等工艺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代银熏球，外壳镂花，制作得极为精致，内套盛放香料的小碗，香气可以透过外壳飘散到外面。最令人叫绝



鎏金银熏球

唐

1963年陕西西安沙坡村出土  
直径4.8 厘米





莲瓣花鸟纹高足银杯

唐

1963年陕西西安沙坡村出土  
高5厘米，口径7.2厘米

的是，盛放香料的小碗是通过两个转动灵活的平衡环与外壳连接，各层连接的轴相向垂直。不管外壳如何倾斜转动，都转化为平衡环的转动。小碗凭借稳定的重心，始终保持平衡状态，香料不会洒出来，堪称巧夺天工。另外，唐代许多金银器的造型与纹饰都显现出明显的异域色彩，反映了唐代的金银器制作受到中西亚流行的金银器的强烈影响，这一特点使得唐代的金银器更加绚丽多姿、流光溢彩。

### 五、艺术化的铜镜

由于瓷器、漆器的兴起和普遍使用，唐代的铜器制造业并不兴盛，但是铜镜却异军突起，成为唐代远超前代的手工艺品。出土和传世的唐代铜镜繁多，它们构图自由奔



双鸾铜镜

唐

直径24.2厘米



放，线条刻画流畅。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双鸾铜镜是纹饰最为优美的一种。此镜的背面是两只展翅飞翔的鸾鸟，口中各衔一条寓含“长寿”意义的绶带，翩翩起舞，从中可见唐代铜镜的审美风格和精细的铸造技艺。此外还发现了螺钿镶嵌的铜镜，制作更为精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高士宴乐纹嵌螺钿铜镜是罕见的珍品，它出土于河南洛阳，直径23.9

厘米。这种把镜背漆贴螺蚌贝壳薄片构成图纹的镶嵌工艺运用到铜镜上是盛唐的首创。

当时铜产量有限，主要用于铸钱与铸镜。唐代政府曾颁布禁令禁止铸造铜镜以外的其他日用铜器，同时社会上盛行以铜镜作为礼品馈赠他人，因而造成了铜镜制造业的兴盛。唐代的铜镜无论产量、种类和制作工艺都远非唐前历代可比。当时扬州以及并州

高士宴乐纹嵌螺钿铜镜

唐

1955年河南洛阳出土  
直径23.9厘米





是全国铜镜制造中心，扬州的铜镜驰名天下，名品江心镜、百炼镜、方丈镜常常作为贡品进贡朝廷。

### 第三节 都市繁荣· 商业兴隆

#### 一、繁华两京：长安与洛阳

##### （一）都城长安

长安，这个中国古代最著名、最繁华的都市，是汉唐盛世的象征，也是古代都城的代表。

长安城位于关中平原中部、渭河南岸。关中平原自古就是沃野千里、山水宜人之地。唐朝以前，汉、隋等朝代都曾以长安为都城，进行了近千年的开发、建设。隋朝在此兴建了大兴城。唐朝建立后，定都于此，在大兴城的基础上进行扩建，并恢复了长安之名。

唐长安城旧址在今西安市所在地，当年建在龙首原的南麓，以龙首原为基地，向南展开，直至曲江池畔，面积约83平方公里，约为现今西安城的七倍半有余。长安城的整体建设布局、形式基本都依照隋大兴城，只是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增修、扩建，但后来城市的规模、建筑的壮观、人口的密集、经济文化的繁荣则远非隋朝可比。唐都长安是当时

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市之一。

长安城分为外郭城、宫城、皇城三部分。

外郭城又名京城，是一般居民和官员的住宅区。它呈东西较长、南北略短的长方形。史书记载，东西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长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周长六十七里，城墙高一丈八尺。据考古工作者实测，东西

长9721米，南北长8651米多。有十二个城门，东西南北四面各开三门。外郭城从东、西、南三面环抱着皇城和宫城。

宫城位于京城中轴线最北部，宫城的外墙是外郭城墙的一部分。这里是皇帝和皇族居住的地方，也是朝廷所在地。宫城东西长四里，南北长二里二百七十步，周长十三里一百八十步，城墙高三丈五尺。南面有五个门，正门为承天门；北面有两个门，正门玄武门就是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地方。南北门都有重兵把守。城内包括太极宫、东宫、掖庭宫三部分。太极宫是皇帝居所，东面的东宫是太子居所，西面的掖庭宫是妃嫔们居住之所。宫中有十六座大殿和许多楼台庭阁，正殿为太极殿，是“中朝”即政治中枢所在地。周围墙外东西两侧设有门下省、中书省、弘文馆、史馆、舍人院等，是皇帝近臣和撰写诏令、文书的办公处所。太极殿北面有两仪殿，是举行“内朝”的地方，只有少数大臣可以进入此地与皇帝商讨国事。正门承天门建有门楼，是举行外朝大典的地方，每逢改元、大赦、元旦、冬至大朝会以及阅兵等，皇帝都要登上承天门主持。此外，宫城内还有山水池塘等供皇帝后妃等游玩的地方。

皇城位于宫城南面，北面与宫城有一条横街相隔。这里是政府机关所在地，其内设有尚书省、太仆寺、御史台、鸿胪寺、都水监等百官办公的衙署。皇城东西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长三里一百四十步，周长十七里一百五十步。南面有三个门，东、西各有两个门。城内有东西向道路七条，南北向道路五条。

此外，京城内外还建有两处皇宫。唐太宗时，为父亲李渊在京城外东北角修建了一座避暑宫殿。唐高宗时又进行扩建，定名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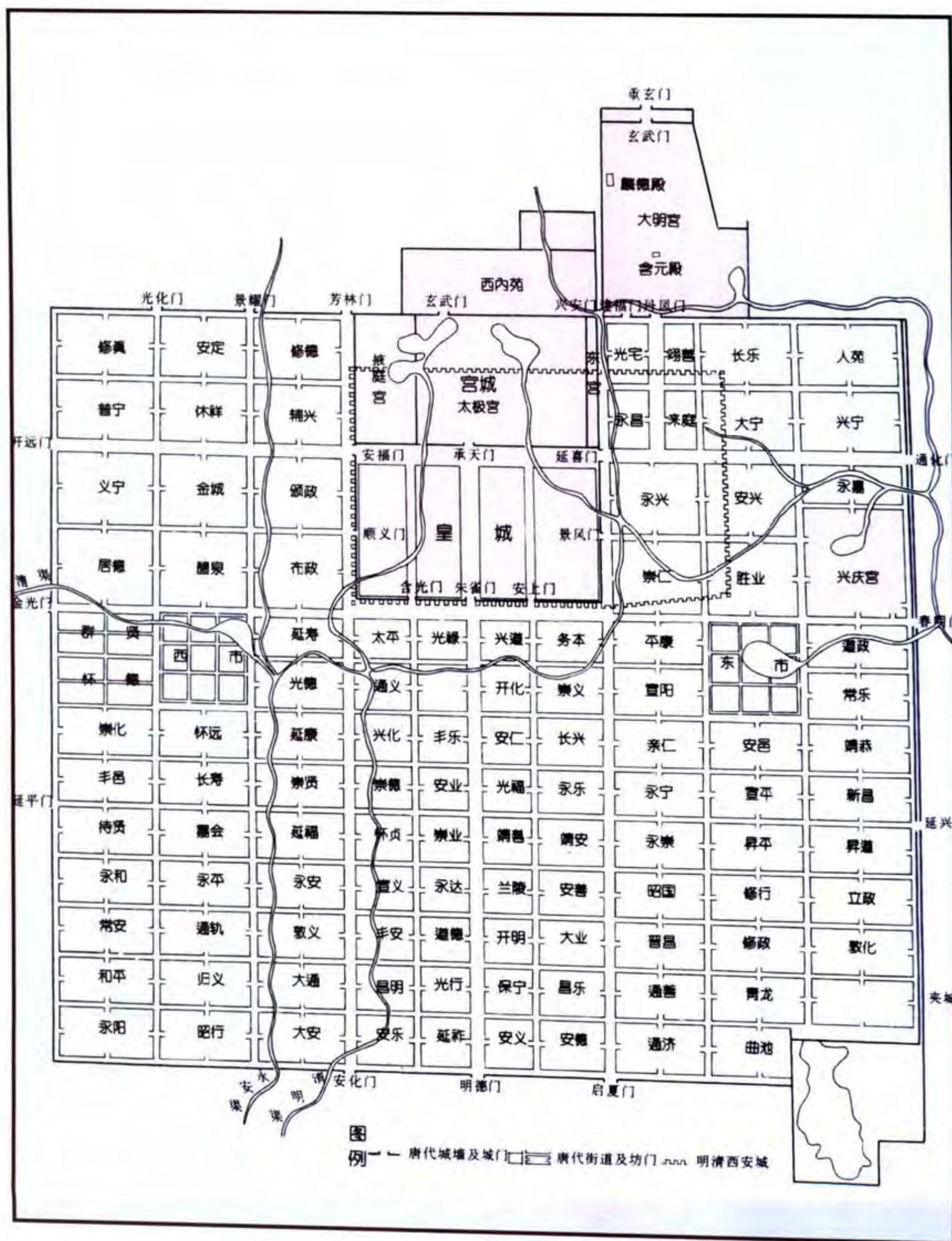


大明宫，并将朝廷迁到此处。此后，朝廷基本都设在这里。城内东面偏北建有兴庆宫，是唐玄宗在其旧居兴庆坊修建的，唐玄宗时期朝廷便设于此地。这两处皇宫与太极宫合称“三大内”。比较起来，大明宫建在龙首原上，地势较高，俯瞰长安城，规模最为宏大，气势雄伟；兴庆宫建于盛唐，宫殿建筑最为豪华，园林风景最为优美。

长安城规划整齐、对称，布局严密，城

内共有南北向街道十一条，宽一百步，东西向街道十四条，分别宽一百步、六十步、四十七步。最大的一条街名朱雀街，宽达147米，纵贯南北，是中轴线，将长安城分为东西对称的两部分。北面位于皇城内的一段称为“天街”，纵贯皇城，两旁槐树成荫。最宽的街道是宫城与皇城之间的横街，宽约440米，实际上是一个广场。整个城市极为壮观。

纵横交叉的街道把长安城整齐地划分成



唐长安城图





下水道铁闸门

唐

1954年陕西西安唐长安城  
西内苑出土

高72.4厘米，宽65.5厘米，  
厚4厘米

一个个方块，如同围棋棋盘。白居易在诗中描绘道：“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这些方块形街区称“里坊”，是居民居住的地方。城内总计有一百一十坊，以朱雀大街为界，东西各有五十五坊。坊外有围墙，四面各开一门。坊内有南北东西十字街道，通向坊门。王公大臣也居住于这些里坊中，他们的宅第往往占地较广，高墙深院，建筑豪华。

城内还辟有两个专门的商业区，称为东市、西市，分别位于城东南和西南两端对称的地方，大体呈方块形，各占两坊之地。据考古勘测，两市长宽均约1000米。两市内各有两条东西街、两条南北街，街宽约14米至16米，将市场划分成“井”字形，形成九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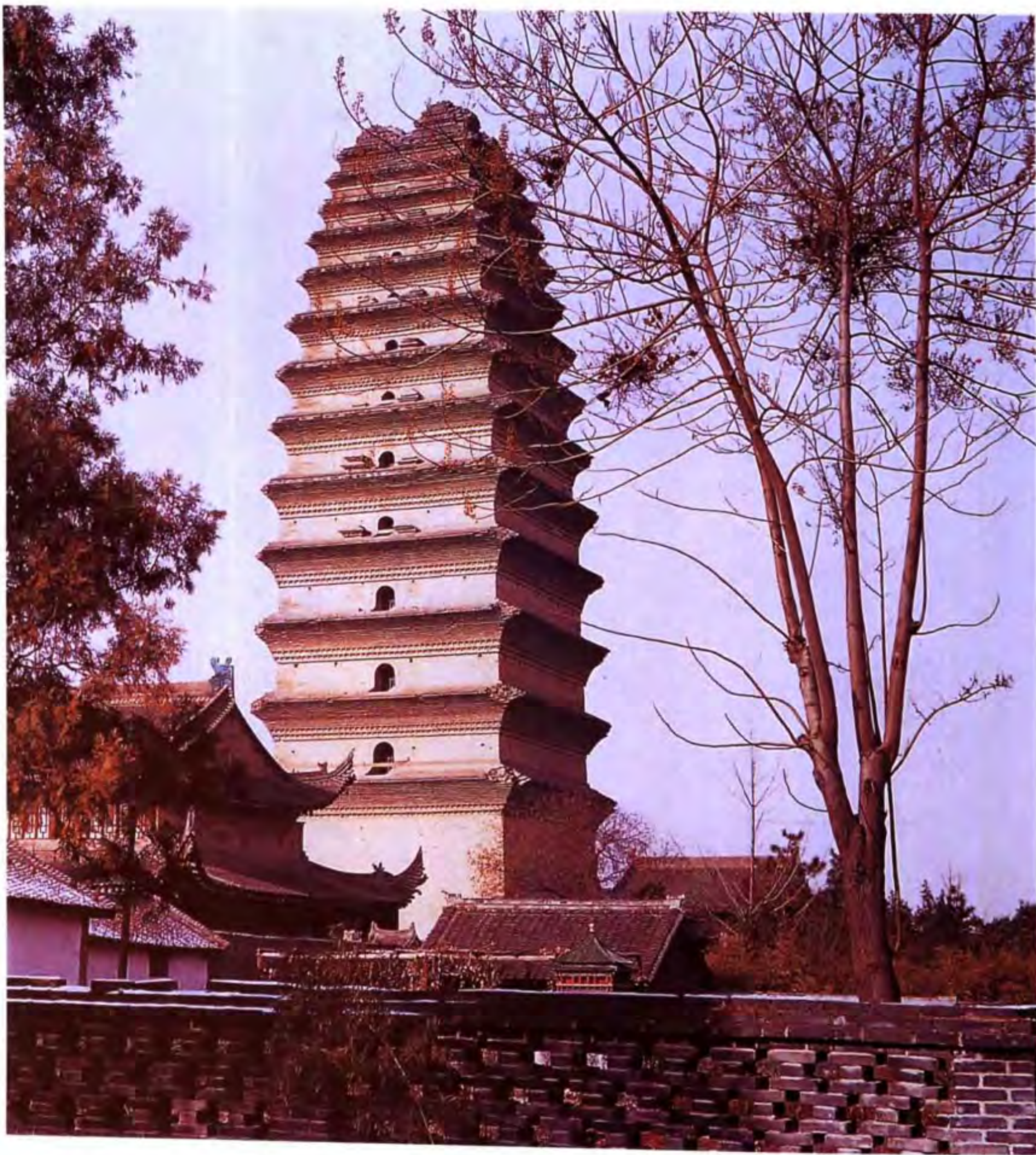
方块。每个方块四面都临街，店铺就设在四面。东市有二百二十行、四千多家店铺，西市也差不多。管理市场的官衙也设在其中。长安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商业中心。两市内排列着几百个行当、数千家店铺，四方奇珍宝货，毕集于此。西市内来自西域、波斯、大食等地的胡商尤其多，他们经营的店铺、货物别有风味，特别引人注目。

长安城东南角有著名的湖泊——曲江池，这一带是长安的风景区，名为“芙蓉园”。曲江池面积约70万平方米，周围园林面积约144万多平方米。盛唐时期进行了疏浚整修，使得芙蓉园风景更为秀丽。这里烟波明媚，湖光潋滟，水中碧波红莲相映，岸上柳荫四合，花木环绕，使得游人流连忘返。皇帝妃嫔、王公贵族、士子文人、市民百姓都经常到此游玩。为方便皇家来此游宴，还特地修建了夹城复道，与大明宫、兴庆宫相通，从皇宫可以直达曲江池。每年新春时节，长安人倾城出动，到这里游春踏青；进士发榜之时，这里更是新科进士举行盛大庆祝活动——“曲江大会”之地。此外，长安城北有禁苑，是专供皇家游猎、娱乐的场所。禁苑周围有墙，东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三里。苑内修建有离宫、球场等等。

长安城内还有两座保留至今的极为著名的佛塔——大雁塔与小雁塔，均在今西安城南。

大雁塔现高64米，共七层，平面为正方形。塔身耸立于高台之上，气势磅礴，是中国楼阁式佛塔的优秀代表。大雁塔当年建于长安城晋昌坊的慈恩寺内，称慈恩寺塔。慈恩寺是唐高宗做太子时，为追念母亲长孙皇后建造的，规模极大，有房屋1897间，雕梁画柱，极尽奢华。寺塔是唐高宗时期由高僧玄奘主持修建的。塔为五层，高十八丈，砖





小雁塔

位于陕西西安

表土心。武则天长安元年（701）重修。慈恩寺与佛塔当时便是人们的游览胜地，长安的戏场也多集中在这里。尤其是每年新科进士都要在慈恩寺塔上题写姓名，“雁塔题名”的美谈更使这座佛塔名扬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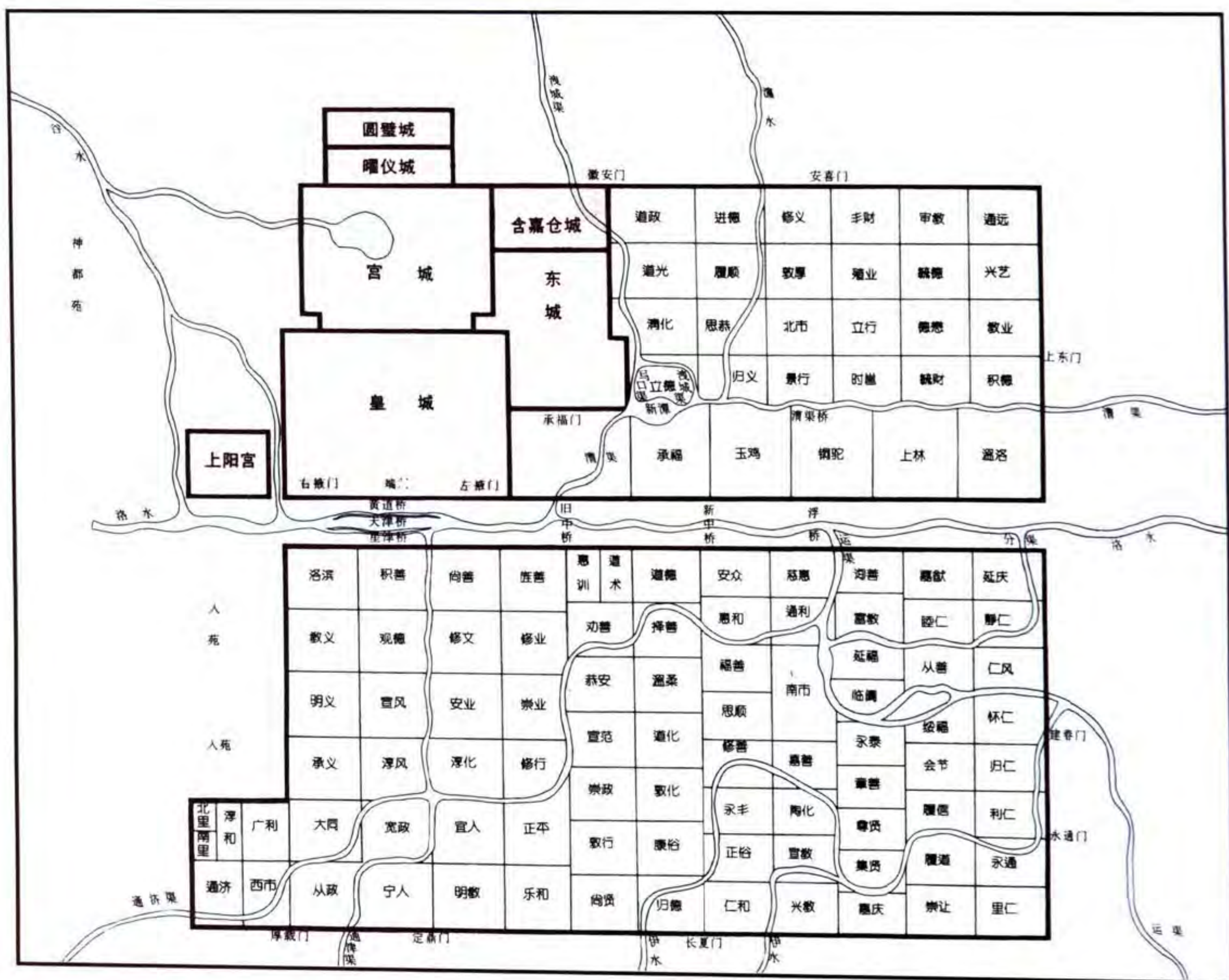
小雁塔现存十三级，高45米。当时位于安仁坊内，塔与所在的献福寺都是唐中宗李显为向父亲唐高宗献福而建造的。小雁塔修建时是十五级，因规模小于大雁塔而得名。小雁塔塔形秀丽，与雄伟浑厚的大雁塔交相辉映，成为唐代长安和今日西安的重要景观。

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常住人口有百万左右，不仅有皇室贵族、各级官员、禁军将士，还有各地来京的举子、商贾、工匠、倡优、艺人，众多的外国来使、少数民族人士以及僧尼、道士等等。长期居住的外国人达到万家以上。

长安城市管理非常严格，城内驻有大量禁军。各城门都有士兵把守。城门、东西两市与里坊门每天早晚定时开放与关闭。六条大街设街鼓，每晚击鼓，通知市民回家，鼓声过后便关闭坊门。夜间有卫兵在街市巡逻，凡在街头者都要遭到棒打惩罚。每年只有正月十五元宵节前后三日夜晚坊门不闭，允许市民上街游玩。





唐洛阳城图

## (二) 东都洛阳

洛阳是唐朝的东都，与长安合称东西两京。虽然地位不及长安，但是由于其地理位置近于东部沿海，便于朝廷控制东南的政治、军事、经济，而且依山傍水，城内河渠纵横，尤其是大运河的开凿，使其水运交通非常方便，因此唐代很重视对它的建设经营。唐高宗至唐玄宗的百余年间，皇帝经常率百官到洛阳暂住，武则天更长期居留洛阳，使洛阳成为与长安并列的政治中心，商业与城市建设也随之迅速繁荣发展起来。

洛阳城的规模不及长安，对它的规划建设始于隋炀帝时期，隋朝还将天下数万家富商大贾迁到了洛阳。唐朝的建设基本上是

在隋朝的基础上进行的。洛阳城与长安城市局大体相同，但小而紧凑。

外郭城平面基本是正方形，东、南各开三门，西、北各开两门。宫城与皇城限于地形，不在中轴线上，而建在西北角的高坡上。北面是宫城，皇城围绕在外面。宫城与皇城地处全城最高处，不仅风景秀美，而且可以俯视全城，突出了皇权的至高无上。

宫城内建有几座宫殿，武则天时在宫廷中修建了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为三层；又在明堂北建造了五级的天堂，以放置大佛像。这两座高层建筑当时非常宏伟壮观。西北部是宫廷园林，有山水、小岛和亭榭台阁等建筑。城外西北方向与长安一



样建有方圆数十里的御苑，称为神都苑。苑内有假山、湖泊与宫殿建筑，而且营建了各具特色的十六院，成为苑中之园。专家认为，这座皇家园林是清代圆明园的滥觞。洛阳城也与长安一样，由横平竖直的东西南北街道将全城划分成棋盘一样规整的里坊。城内有贯通南北的三条大街，其中正对宫城与皇城正门的定鼎门大街是主干道，宽达121米。城内共有一百零三坊，坊内有十字街道，四面开门。里坊比长安小，街道也较窄。

洛阳也是商旅贸易集中的城市，城内辟有三处集中的大市场，城东有南市与北市，西南角有西市。市内店铺商行鳞次栉比，货物堆积如山。南市最大，有一百二十坊、三千余家店铺。三市都傍依河渠，货船可以直达市场，运输货物极为方便。河渠内常常停泊着万余艘商船，岸上车马堵塞道路。三市附近的里坊中住满了来自各地、各国的商人。

另外，城北与宫城、皇城相连处建有著名的含嘉仓城。

长安、洛阳两座都城的规划和建设，以其宏大的规模、磅礴的气势、严整的格局，展现了中国古代盛世的风采，同时也显示了皇权的至尊与威严，体现了严格的统治秩序与贵贱分明的等级制度。它们是中国城市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在世界城市建设史上也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两京的规划、建设不仅为后世所袭用，也为少数民族政权和外国所效仿。例如，当时地处东北的渤海国政权，其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村）的布局便完全仿照长安城；而日本的平城京、平安京等都城的兴建也都参照、借鉴了长安、洛阳的规划制度。这些都被考古勘察发掘所证实。

## 二、市肆林立·商贾如织

唐初武德四年（621），废除了社会上行用的隋代五铢钱，开始铸行新的货币。这种新的货币就是今天常能见到的唐代货币——“开元通宝”。“开元”是开辟新纪元之意。“开元通宝”不仅是唐代商业高度繁荣的一个标志，而且开辟了古代货币发展的新纪元。

农业、手工业产品的繁盛和交通的日益发达，为商业繁荣奠定了基础。唐代不仅出现了一批前所未有的店肆林立、市场活跃的大都市，乡村集市也空前兴旺、普及；不可胜计的商贾日夜奔波往返于水陆之间，贩运货物，进行长途贸易。“商人重利轻别离”，商妇怨成为唐诗经常吟咏的重要题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贾的活跃和商业的兴旺。

除了长安与洛阳两大都市商业极为繁荣外，唐代最繁荣的商业都市首推扬州，其次为益州（今四川成都），当时号称“扬一益二”。扬州坐落在长江与大运河的交汇点上，水陆交通方便，四通八达，是唐代两京之外的第三大都市，也是当时最繁华的商业城市和对外贸易港口之一。据记载，扬州“十里长街市井连”，“夜市千灯照碧云”，街上遍布市肆店铺，夜间灯烛辉耀，照如白昼。城中商贾云集，家财巨万的富商大贾数以百计，



开元通宝

唐

直径2.4厘米，重4克





西域人骑驼陶俑

唐

1954年山西长治王琛墓出土  
高89.7厘米，长26.5厘米



富庶甲天下。益州的繁荣富庶也不逊色，而其地风光之美、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百工之富，还要超过扬州。苏州和杭州是中唐以后兴起的大都市。至唐后期，苏州人口的稠密、市场的热闹，几乎可以和长安、扬州相比；杭州城也是万商云集，百货齐聚，开有店肆三万家，商船绵延二十里。广州则是海船往来停泊的著名外贸港口。

此外，在各地水路交通要冲，还有一些地区性商业城市。这些商业城市、网点之间，商贾的车马、舟船穿梭往返，形成了一个联通全国的商业网。当时人描述国内四通八达的运输贸易说：天下的港口要津聚集着千万艘舟船，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交易往还，昼夜不息。

乡村的集市贸易也迅速发展。这种集市称为“草市”，大多设在城市近郊、交通要道或较大的村镇。唐代草市遍及各地，多出售农副产品和土特产。有的草市由于越来越繁荣，逐渐形成了城市和地方政治中心。草市外，还有定期的集市，隔日或隔三五日聚集一次，称为“集”或“虚”，已与今日农村的集市相同。

尽管唐代如同历代一样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但是获利的丰厚刺激着人们争相从事商业经营，商贾人数越来越多，同时造就了一批腰缠万贯的富商巨贾。唐高宗时，长安大

商人邹凤炽家资巨万，曾声称如果他以一匹绢买终南山上一棵树，树买完了，他的绢仍然有余。唐朝末年，富商王酒胡曾经出钱三十万贯资助修缮长安朱雀门，又出钱十万贯助修安国寺，足见其财力的雄厚。

不仅国内商业兴隆，唐代的海外贸易也极为繁盛，与海外诸国的贸易数额之大、货物品种之多、交易之频繁，都远非前朝可比。

对外贸易分为陆上和海上两途。陆上主要通过西北陆路，即著名的丝绸之路，与中亚、西亚、欧洲保持着密切的商贸往来。通过海道来华贸易的国家有日本、新罗（在朝鲜半岛）、林邑（今越南中南部）、真腊（今柬埔寨）、骠国（今缅甸）、诃陵（今印尼爪哇）、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天竺（今印度）、波斯（今伊朗）、大食（阿拉伯帝国）、拂菻（东罗马）等几十个国家，其中以波斯、大食与中国贸易最为密切。此外，中国商船也远航到了南亚、西亚、非洲一些地区。由于对外贸易的扩大与频繁，外国商人纷纷涌入中国，有的常住各大城市，开设店铺，出售海外商品，各地的胡商店铺、胡姬酒肆成为引人瞩目的一景。中唐时期，长安的胡商多达二千人以上，他们多居住、经营于西市附近，使得西市成为国际性的市场。唐朝后期，仅扬州一地就居住着数千名以波斯、大食为主的外商。许多外商长期居住，逐渐汉化，有的还在唐朝政府担任了官职。



## 第六章

# 民族融合 华夏一统



在唐朝周边，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北方的突厥和回纥、西南的吐蕃、南方的南诏以及东北的靺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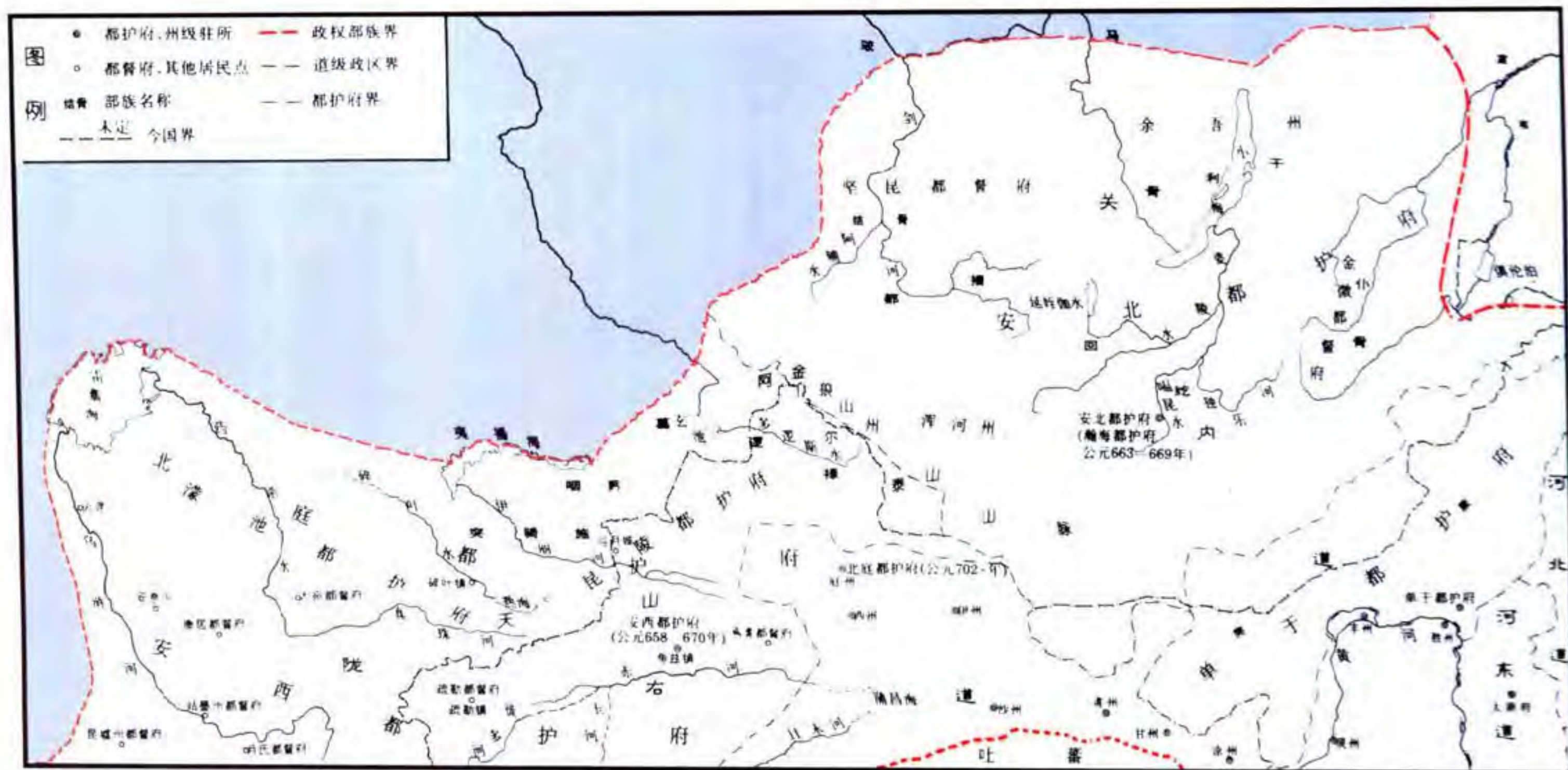
边疆各族在与汉族的交往中，一方面吸收汉族的先进经验，同时也以自己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种种创造给汉族以影响。

由于唐王朝国力强盛、文化先进，以唐为中心，各族间的交往空前频繁，关系十分密切。其中，吐蕃与唐朝更是“和同为一家”。当时有些少数民族当权者和中原王朝也不时发生摩擦，有时甚至连年开战。不过，总体上说，唐王朝执行的是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使得各民族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并且以汉族为中心进一步融合，在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相互补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唐帝国这一统一的多民族的强大国家。

### 第一节 天可汗与突厥

突厥族在公元6世纪时游牧于金山（今阿尔泰山）一带。因为金山形似战盔的“兜鍪”，俗称“突厥”，故以此作为部落的名称。金山矿藏丰富，突厥兴起之前是柔然的锻工。因为他们掌握熟练的冶铁技术，所以具有高于其他游牧民族的生产力。据史书记载，突厥部队的兵器中有弓、矢、鸣镝、甲、稍刀和剑等，而当时的其他游牧民族，很少见到类似的记载。后来，突厥逐渐向东迁徙，北齐天宝三年（552）破柔然，首领阿史那土门在鄂尔浑河流域正式建立突厥汗国，并成为北方最为强大的游牧国家。突厥疆域最广时，东到辽海，西达西海（今里海，一说咸海），南到阿姆河南，北到贝加尔湖。隋开皇二年（582），突厥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





唐代北庭都护府、安西都护府示意图

东突厥在隋末战乱中盛极一时，几乎完全控制了东北亚地区。唐高祖李渊起兵叛隋，为借重突厥的力量曾向其称臣。唐初，东突厥兵力达百余万，不断向南攻扰，抢劫财物，俘掠人口，以至有人建议放弃都城长安，以躲避突厥。李世民坚决反对这种错误主张，力主积极抵抗。他即位不久，颉利可汗率突厥兵攻入渭水便桥以北，兵临长安城下。虽然当时唐朝兵力不如突厥，但唐太宗毅然扣留进城打探虚实的使者，亲率六骑出宫城北门玄武门，来到渭河边隔河斥责颉利可汗。颉利不知唐军虚实，只见将领整军待阵，胆怯而退。唐太宗力除边患，在贞观三年（629）看准突厥内部矛盾重重，派李靖、李勣等率十余万大军分路出击，次年生擒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

战争结束后，唐王朝将突厥降众中约半数的人口安置在西起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东至幽州（今北京）的地区，置羁縻府州进行管辖，仍以突厥贵族为都督、将军。羁縻府州是唐朝在周边归附少数民族部落中创建的一种特殊行政区划。羁縻府州的都督、刺史由部落原来的首领，包括国王、可汗、叶

护等各色君长担任，朝廷颁发印信。羁縻府州的辖境是原来部落或国的领域，部落首领保持原有的称号和权利管理内部事务，“都督”、“刺史”只是唐王朝授予的称号而已。这一新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力量的增强和大一统局面的相对安定，也有利于各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唐朝又让其余的突厥人约万家人居长安，其酋长拜将军、中郎将，五品以上者达百余人。唐王朝突厥名将阿史那社尔深得太宗信重，死后陪葬在昭陵旁。陪葬昭陵的突厥人还有阿史那忠。唐太宗开明的民族政策既解除了唐初的北方边患，也有利于突厥的发展。这些举措在北方各族中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唐太宗被各族尊称为“天可汗”。

南迁后，突厥族从游牧经济转向农业经济。后来，东突厥一度复国，即“后突厥”，但基本上对唐朝采取睦邻政策。武则天曾应突厥可汗之请，赐谷种四万斛，杂綵五万段，农器三千件，铁四万斤，并许通婚。唐玄宗时，北边突厥、汉族人民一起养畜种田，商品交易规模也很大，唐朝每年用数十万匹帛



## 突厥石人

唐

1961年新疆温泉阿尔卡特墓  
地出土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  
馆

高 285 厘米



锦换取突厥马匹。突厥人在和汉族的交往过程中明显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天宝三年(744),后突厥被北方新崛起的回纥族所灭。

西突厥占有今新疆和中亚大部分地区,处于中西交通要道上,对唐朝和印度、东罗马、波斯等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沟通作用。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因攻扰唐朝,唐军大败沙钵罗可汗,灭西突厥。702年,武则天在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设北庭都护府,和此前设立的安西都护府分掌天山南北广大地区,保证了丝绸之路的全面畅通。

突厥人有在墓前立石人作纪念的葬俗,为我们留下了他们昔日的雄姿。在新疆阿尔泰山、天山、准噶尔西部山地的辽阔草原上,屹立着不少突厥石人。其中一件发现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阿尔卡特墓地,高285厘米,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石

人由花岗岩雕刻而成,身材魁梧,相貌威严,大眼,阔脸,八字胡须,颈饰项圈,身着窄袖翻领长衣,右手托杯于胸前,左手在腰间握长刀,腰系宽带,腰间左侧另佩有小刀,脚蹬皮靴,呈八字形面东而立。这件雕像是典型的突厥武士石人,生动地反映了自6世纪活跃在北疆草原尚武好战的突厥贵族或武士的形象。

突厥有自己的文字,发现于今蒙古国境内鄂尔浑河上游呼舒柴达木湖畔的阙特勤碑,就是用突厥文和汉文合书的。阙特勤是后突厥苾伽可汗之弟,阙是人名,“特勤”为突厥语,是贵族子弟的称号。唐开元十九年(731)阙特勤死,唐玄宗派人前往吊祭,次年立此碑。碑的正面和左右两侧是突厥文,背面是汉文。这块碑对研究唐朝与突厥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 第二节 回鹘与高昌故城

回鹘初称回纥,是铁勒的一部,散居在今蒙古国境内色楞格河流域一带,臣属于突厥汗国。因不满突厥贵族的奴役,隋末唐初一再进行反抗,唐贞观元年(627)曾大败东突厥,声震北方。唐太宗时期,回纥与唐关系日趋密切,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愈益频繁,并曾助唐击败西突厥。回纥灭后突厥后,尽占其地,辖地东起兴安岭,西至金山,俨然成为北方最强大的民族。唐玄宗册封其首领为怀仁可汗。“安史之乱”时,回纥多次派兵帮助唐朝廷平定叛乱,收复长安和洛阳。此后,有成千的回纥人留居长安。

由于回纥与唐交往密切,受唐文化影响也比较明显,逐渐从游牧转向半定居化,上



层统治者开始建立城市、宫室，妇女们也有了粉黛文绣之饰。与此同时，摩尼教自汉地传入回纥，并成为国教得到传播。唐贞元四年(788)，回纥可汗请唐改称回纥为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吐蕃占领陇右以后，唐王朝丧失监牧之地，战马奇缺，因而不断地用绢、茶换取回鹘马匹。回鹘把唐的丝绸、茶叶转贩西域。此外，唐朝和西域、中亚的交通必须借道回鹘，也使回鹘人受益匪浅。后来，回鹘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争乱，又屡遭天灾，国力大为削弱。唐开成五年(840)，回鹘被它原来的属部黠戛斯打败，被迫进行大迁徙，其中西迁甘州的一支成为裕固族的祖先，西迁到西州、龟兹的一支是维吾尔族的祖先。

有一块著名的碑刻——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发现于今蒙古国境内，由粟特、突厥和汉文三种文字刻写，为唐长庆年间(821—



贾忠礼抄《论语郑氏注》残叶

唐

1964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  
长27厘米，宽20厘米

绿地染纈

唐

1967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  
长50厘米，宽14厘米



## 高昌故城“可汗堡”

位于新疆吐鲁番



824) 回鹘内宰相颉干伽思等立。毗伽可汗是回鹘九个部落的首领，受唐王朝册封为保义可汗。碑文记述了回鹘汗国建立以后至保义可汗时期（808—821）与唐朝的关系，及摩尼教传入回鹘汗国的情况，为研究回鹘西迁新疆的历史提供了线索。

西州是唐王朝于贞观十四年（640）在今新疆地区设置的，领高昌、柳中、交河、蒲昌、天山五县，治所在高昌，即今吐鲁番东南的高昌故城。唐玄宗天宝时期这里有居民近五万人，大部分是汉魏以来屯戍当地的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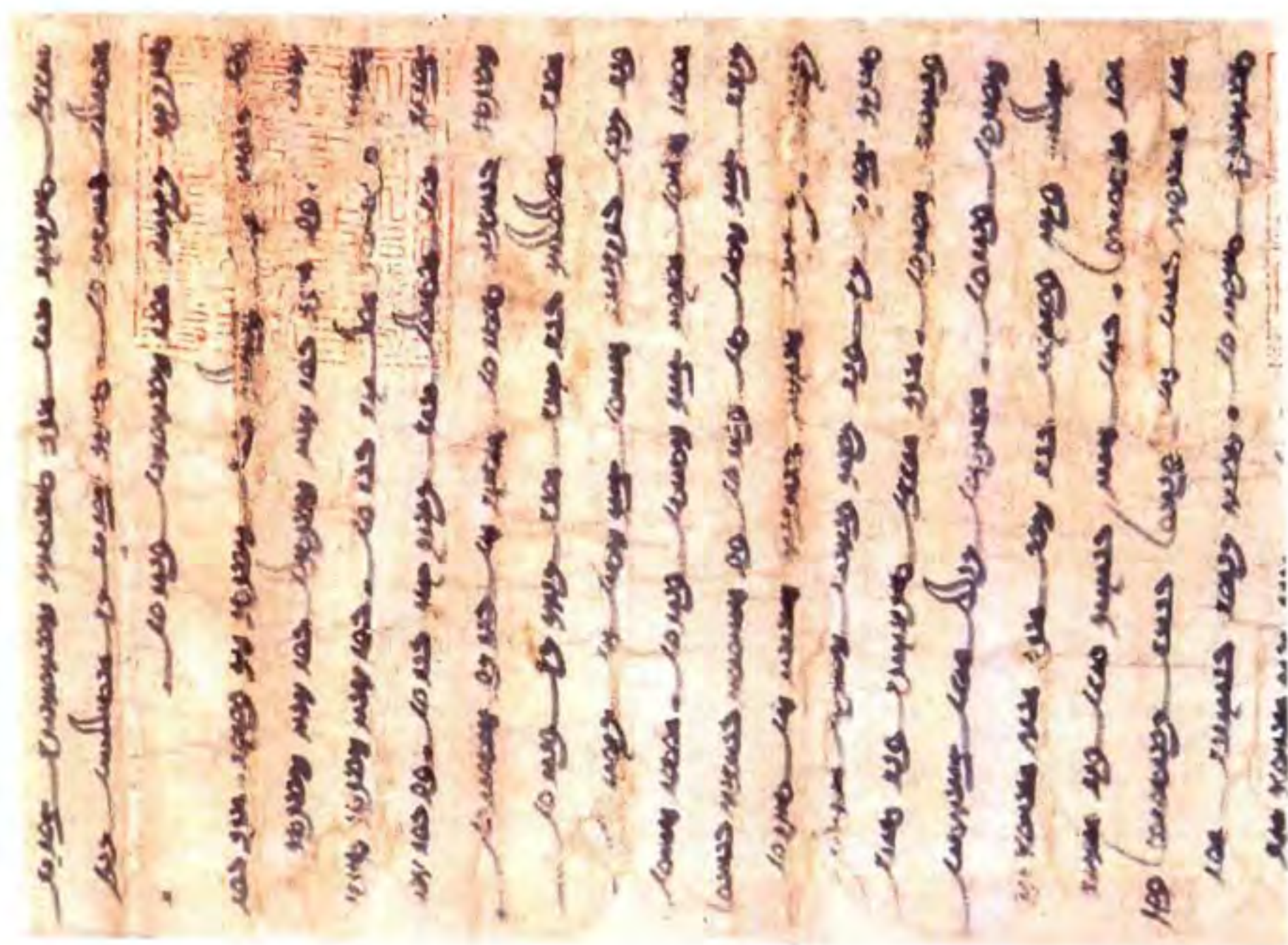
人后裔。唐朝在西州推行与内地相同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及办学校等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制度。由于西州扼天山南北通道，又当中西交通要冲，是唐朝经营西域的军事重地，高昌还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城市。在高昌故城的北边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附近，有一处西晋至唐代的居民公共墓地。由于那里气候极为干燥，因而保存下大批西州时期唐代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反映了新疆与内地的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

回鹘人西迁西州后，高昌故城成为其国都。现存的故城遗址是高昌回鹘时期在唐代高昌城的基础上改建增筑的，分内城和外城。外城周长约5公里，平面呈不规则方形，夯筑城墙残高5米至11.5米，遗存有五座城门缺口。外城有寺院和民居遗址。内城大致在外城的中间，周长约3.5公里，城墙夯筑，城门已不存。内城主要是宫城及寺院建筑。在内城中间偏北处有一座堡垒式建筑，平面略呈不规则椭圆形，周长约700米，内有残高约15米的土坯塔和一些殿基残迹，俗称“可汗堡”，可能是宫城。外城东南部有塔基和残窟，窟内有壁画。外城的西南部有四合

## 回鹘文写本长卷（局部）

唐

新疆吐鲁番出土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外景  
位于新疆吐鲁番

院式的寺庙遗迹，也残存有塔基。城内保存的种类繁多的遗物，以回鹘时期摩尼教壁画、经典、文书和佛教壁画、塑像、经典及各种文字的文书数量最多。其中一件回鹘文写本长卷，纵30厘米，横261厘米，上面的朱文印鉴为“大福大回鹘国中书省门下……诸宰相之宝印”。这些唐朝廷中的称呼被用在回鹘文的文书里，说明回鹘在官制上学习唐朝，也设立了三省六部制，并以三省的长官为宰相。

回鹘信奉摩尼教，为什么会留下许多佛教遗物呢？原来，汉唐时期西域绿洲诸国主要流行佛教。佛教自3世纪沿塔里木盆地北缘和南缘由西向东渗透，逐渐发展成为各国的国教，隋唐时期达到鼎盛。而吐鲁番地区自汉代以来居民一直以汉人为主，具有深厚的汉文化传统，佛教更是兴盛。回鹘进据高昌建立起高昌回鹘王国后，逐渐放弃摩尼教，改奉当地盛行的佛教，以接近西域旧居民，在政治上是十分合宜的。所以，回鹘不仅改建摩尼教寺院为佛寺，还动土兴建了新佛寺。

不过，现在高昌故城内残垣断壁，已很

难看到昔日佛寺的景象了，而坐落在吐鲁番县城东北约50公里处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保存较好，还能看到一些9世纪以后回鹘时期的宏伟石窟寺建筑和精美壁画。维吾尔语“柏孜克里克”意为“美丽的装饰之所”。这里壁画题材丰富，色调以红为主，配以浅红、蓝、黑、黄等色，因此画面显得艳丽热烈。许多供养人画的是回鹘人，供养像旁有汉文和回鹘文双行并书的榜题。在画风上，它既受到龟兹、于阗佛教艺术的影响，又和敦煌石

佛像壁画  
唐  
新疆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第69窟





窟晚唐至宋时期的壁画有着某些相同点，表明了它在佛教艺术东西传播路线上的重要地位。令人气愤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英国、俄国和日本的探险队纷纷来到这里，他们剥取了大量壁画，携走了很多塑像、文书，使石窟遭到严重破坏。

### 第三节 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

松赞干布是唐代时建立的吐蕃王朝的首领，文成公主是唐王朝宗室女。他们结为夫妇的动人故事，一千三百多年来一直在汉藏两族之间传颂不息，成为民族团结的象征。

位于中国西南隅的青藏高原，是世界上离天最近的地方，那里伸手似乎可以触摸到漂浮的白云，仰头好像可以透视湛蓝的天穹。它充满神奇，令人神往。然而，这片雪

域高原空气稀薄缺氧，气候恶劣，条件艰苦，即使在今天也令许多人望而却步。文成公主这位宗室女子，却肩负起开启汉藏两族友好交往的伟大使命，跋涉万水千山，从长安来到西藏。

藏族的远祖是羌人的一支，长久以来居住在青藏高原一带，种植青稞、荞麦，畜养牦牛、羊和马。公元7世纪初，松赞干布继承祖、父两代开创的基业，征服了青藏高原上的羌族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国家。松赞干布是吐蕃的第一代赞普，意为“雄强的男子”。他把首都从琼结迁到逻些（今西藏拉萨），确定了文武官职制度，制定了法律，参考梵文创制了拼音文字。松赞干布非常热衷接受周围各族的先进文化，拓致了天竺（印度）的学者、尼婆罗（尼泊尔）的手工业技师和大食（阿拉伯）的医生，但他最倾慕的还是中原的大唐文化，决心要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

《步辇图》

唐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纵38.5厘米，横129.6厘米







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像

西藏拉萨布达拉宫法王洞中  
供奉

634年，第一批吐蕃使臣到达长安，唐朝很快派使节回访。松赞干布提出了迎娶唐朝公主的请求。经过一番周折，贞观十四年

(640) 唐太宗终于同意把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关于求婚的情节，唐代大画家阎立本在他的历史画卷《步辇图》中有真实的描绘。图中，唐太宗端坐在步辇上，身边簇拥着几个宫女，有的抬辇，有的扶辇，有的执扇，有的张伞。站在唐太宗对面的是三名男子。第一人头戴幞头，身穿红色圆领袍服，双手执笏板，他是朝廷的引班礼官。在他身后站着一位穿小联珠纹窄袖锦袍、拱手肃立的人，此人就是松赞干布派往唐朝求婚的使者吐蕃大相禄东赞。另外一人也是朝中的陪同官。

贞观十五年正月，文成公主由江夏王李道宗陪同进藏与松赞干布结婚。松赞干布亲自到河源（今青海兴海东南）迎接公主，并为公主修建了唐式宫室。公主带去了第一批入藏的汉人，其中不少是手工业工匠，还将大批书籍、种子和手工业技术传到了吐蕃。此后，松赞干布又派遣贵族子弟到长安入国学学习诗书，求取蚕种及敦请造酒、碾硃、纸





松赞干布陵

位于西藏琼结吐蕃王陵



墨工匠。唐人陈陶《陇西行》有“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的诗句，说明这次和亲对吐蕃吸收汉文化贡献不小。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了近四十年，受到藏族人民的极大尊重。她从长安带到吐蕃的释迦牟尼像至今仍供奉在拉萨的大昭寺内，在喇嘛教中她被视为绿度母的化身。“度母”就是藏语中

的“卓玛”，藏族佛教传说中观音的化身。松赞干布死后葬在琼结的吐蕃王陵，又叫“藏王墓”。最近对那里进行的考古调查已发现了二十座陵墓，松赞干布的1号陵顶小底大，呈覆斗形，现存高度18米，历经千年沧桑仍巍然耸立，十分壮观。

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唐朝又将金城公主嫁给吐蕃的一位赞普，使两族的交往愈益频繁和扩大。

在唐蕃关系中，吐蕃有时对唐朝发动掠夺奴隶和财物的战争。唐朝前期，虽然已基本上有效地控制了西域，但为阻止吐蕃争夺西域，双方在那里进行过长期的拉锯战，互有胜负。“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乘机占领了河湟陇右和西域的广大地区。唐大中二年（848），汉人张议潮在沙州（今敦煌）起兵逐吐蕃，先后收复了沙洲、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等河西大部分地区。秦州（今甘肃秦安西北）、原州（今宁夏固原）等地也先后摆脱了吐蕃的控制，重新归附唐朝。在敦煌莫高窟第156窟的晚唐壁画中，有一幅《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这是一幅珍贵

文成公主带至吐蕃的释迦牟尼像

西藏拉萨大昭寺供奉







的历史画卷，表现了唐大中五年（851）唐宣宗敕封张议潮为河西十一州节度使后，张议潮统军出行的场面。整个画面长8.5米，高1米多，人物逾百，骏骑八十多，队列浩荡，旌旗猎猎，表现了这支队伍的势不可当和摆脱吐蕃政权奴役和压迫后的欢快气氛。

唐代后期，两族间仍有战争，但也一再建立盟约，恢复睦邻关系。在拉萨大昭寺前，至今屹立着一通“唐蕃会盟碑”，它是汉藏友好的象征。

“唐蕃会盟碑”又称“长庆会盟碑”或“甥舅和盟碑”。它是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建立的。碑上刻唐穆宗和吐蕃赞普可黎可足结立舅甥之谊，汉蕃社稷协同如一的盟文。因为吐蕃先后有两位赞普和唐朝的两位公主联姻，所以赞普可黎可足自称甥，称唐穆宗为舅，表达了汉藏两族历史悠久的亲密关系。碑高4.78米，宽0.95米，厚0.50米。碑身四面刻字。正面刻汉藏文两体对照的盟文。盟约规定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戈，互不侵犯。碑的左、右两侧刻唐朝和吐蕃参加这次会盟的官员职衔名单，左侧唐官十八人，右侧蕃官十七人，也是汉藏文两体对照。碑的背面刻藏文七十八行，叙述唐蕃舅甥二主结约会盟的始末，是非常重要的唐朝和吐蕃关系的

史料。

《张议潮统军出行图》（摹绘）

唐

甘肃敦煌莫高窟

#### 第四节 德化南诏

南诏是公元7世纪至9世纪以云南的洱海和滇池地区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这个政权存在了二百余年，基本上和唐帝国相始终。

唐朝初期，洱海地区分布着六个较大的乌蛮部落，史称“六诏”。《新唐书·南诏传》说，乌蛮语称王为诏，所以“诏”可理解为王、首领、酋长，也可理解为部落的意思。其中的蒙舍诏地处五诏最南边，故又称“南诏”。当地民族复杂，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蒙舍诏是最进步的地区，已有了很发达的农业。649年，蒙舍诏建立了奴隶制的“大蒙国”，以巍山为首府。8世纪时，皮罗阁在唐朝的支持下征服各诏，建立起统一的国家，通称为南诏，迁都太和城。南诏全盛时辖有今云南全部、四川南部和贵州西部等地。

今云南大理太和村西南的南诏太和城遗址，立有一块高3.9米、宽2.4米的石碑，名为“南诏德化碑”。它是赞扬唐代南诏国王阁



南诏德化碑（拓片）

原碑位于云南大理南诏太和城遗址



罗凤的业绩以及南诏和唐朝关系的重要碑刻。约立于阁罗凤时期的765年至766年间。这块碑很早就引起人们的注意，唐人樊绰在他所著的《蛮书》中最早提到了此碑。碑文作者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南诏官吏郑回，但根据文中的自述，应该是汉人王蛮盛。他在南诏做清平官，相当于宰相。碑文叙事详尽得体，词句生动感人，是南诏国留下的优秀长篇散文。书体在行楷之间，遒劲秀拔。虽然经历了千余年的风雨剥蚀，碑文残损严重，行数不详，每行大约九十字左右，但它记述了南诏政权建立初期的一系列重要史实；碑背面存有的四十一行职官题名，提供了南诏

初期的职官制度和许多民族参加南诏政权的情况，是研究南诏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唐朝支持南诏的统一，并积极给予扶植，部分原因是为了牵制日益强大的吐蕃政权在洱海地区的势力扩张。唐玄宗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册封南诏王皮罗阁为“云南王”，此后，不少南诏最高统治者接受过唐王朝的册封。汉人郑回则任三代南诏王的清平官，地位显赫。8世纪中叶以后，南诏归附吐蕃，和唐朝之间发生过战争。前述的南诏德化碑碑文就是阁罗凤发现背弃唐朝对南诏不利，抒发对唐朝友好关系的怀念。他曾对臣属说：“我家世世臣奉唐朝，常受封赏，后世若容许复归于唐，当指此碑给唐使看。”阁罗凤的孙子当政后，终于在贞元十年（794）恢复了同唐朝的和睦关系，唐德宗册封他为“南诏王”。以后南诏与唐时战时和，但经济和文化交流从没有间断过。

南诏基本上模仿唐朝的官制，相当尊重儒学。汉族的典籍和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的字帖也传到了南诏。汉人手工业者把纺织技术输入南诏后，南诏的纺织品质量可同唐朝媲美。

南诏德化碑所在的南诏国第一座都城太和城，位于云南大理附近，西负苍山，东临洱海，扼下关和大理的咽喉，地势十分险要。该城东宽西窄，南北城墙均自佛顶寺山麓向东延伸到海边，各存有3300米左右，最高处约达3米，全部用垒土夯筑而成。城址由于苍山溪流的冲刷，地面已无明显的建筑遗迹，只有一些南诏式的橙黄色夹砂陶片、带釉陶片及有字瓦等物。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几片在云南巍山龙圩山南诏遗址出土的建筑材料，依稀表露着南诏都城的景象。

遗址内这些有字的瓦和陶片，质地青灰色，相当坚硬，瓦上印有“宽慎”字样。这些

有字瓦

唐

1956年云南巍山南诏遗址出土

土

残长17.3厘米







南诏建筑材料

唐

1958年云南巍山南诏遗址出土

方形花砖（左）

莲花纹瓦当（右）

直径残长14厘米

滴水瓦（下）

残长17.3厘米，高9.1厘米

文字类似汉字，有些字与太和城遗址有字瓦上的字相同，所以可以断定这处城址和太和城时代相同。经研究，这种形似汉字的文字就是南诏国时期的“白文”。南诏国的官方文字是汉字，南诏德化碑通碑用汉字就是明证。白文是利用汉字记白蛮的语音，或将汉字的笔画略作增减而成的一种表意记音文字。这种文字创始于南诏时期，一直沿用到明清时代。

几件方形花砖、滴水瓦和莲花纹瓦当，也都是陶质青灰色，其形制和纹样都与唐长安城大明宫和兴庆坊出土的砖瓦几无二致。南诏曾多次派遣子弟到四川成都学习，并请汉人到南诏传授学业。大量的汉族农民和工匠进入南诏，使南诏境内“城池郭邑，皆如汉制”，不少建筑都是在汉族工匠的参与下建成的。

代表南诏国建筑艺术最高水平的是大理



千寻塔

位于云南大理



南诏王细奴逻及后妃从者像  
云南剑川石钟山石窟狮子关  
区第3号



崇圣寺古刹内的千寻塔。千寻塔是由汉族工匠恭韬、微义设计建成的，高69.13米，共有密檐十六层，平面呈方形。它是层数为偶数的中国古塔之最。塔基座呈正方形，高度是整座塔的五分之一，全部用砖砌成，西面开塔门。看到千寻塔很容易让人想到西安的小雁塔，因为它是典型的唐代密檐式塔中的精品。根据塔的形制和云南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以及佛教传播到云南的时间等分析，千寻塔的建造年代应在唐开成（836—840）以后。此后历代均对其有所修缮。

此外，在云南省剑川县西南，有一处剑川石钟山石窟，它开凿于南诏王劝丰祐时代（824—859），相沿三百年之久。里面的佛、菩萨造像很多面部圆满，具有盛唐风格。不同于内地石窟寺的是，这里特有的世俗化宗教信仰“本主崇拜”也进入了佛教石窟，一些窟雕有南诏王和后妃、侍从像，他们的冠服是研究南诏服饰制度的珍贵材料。

## 第五节 渤海国：车 书本一家

唐代渤海国，是698年到926年以靺鞨的粟末部为主体建立的民族地方政权，其属地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主，包括今朝鲜东北部和俄罗斯滨海边区在内的广大区域。

靺鞨人是居住在东北的古老民族，最早称肃慎，秦汉以后称挹娄、勿吉，隋唐时称靺鞨。靺鞨还是女真族——满族的先世。靺鞨人主要分布于松花江、牡丹江、乌苏里江流域和黑龙江中下游，东到日本海。原来有众多部落，六七世纪时逐渐兼并为七大部。他们从事农业、饲养业，也从事狩猎。其中居粟末水（今第二松花江）附近的粟末部地处南端，较为先进。武则天圣历元年（698），粟末部首领大祚荣开始建立政权，初称“震国”。开元元年（713），唐玄宗以大祚荣所部



置忽汗州，以大祚荣为都督，封渤海郡王，从此其辖区就以“渤海”为号。

渤海国接受唐王朝的册封，成为唐朝的一个羁縻州，一个地方行政机构，同时又是地方的民族政权，和唐王朝既是中央和地方关系，又是藩属关系。渤海王室为了加强和巩固渤海贵族集团的统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积极向唐朝学习，输入中原的进步文化、典章制度，推动了渤海社会的发展。9世纪初，终于统一了渤海各部，被誉为“海东盛国”。9世纪下半叶，渤海由于内部矛盾和动乱走向衰落，最终被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所灭。

渤海国的地方行政制度与行政区划完全仿照唐王朝，分为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五京之一的上京龙泉府是渤海国都城，遗址在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自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这里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探发掘，逐步探明了都城的形制和布局。从上京龙泉府的形制、布局，建筑物的样式和风格，以及出土的陶瓷器皿、陶瓷砚台、砖瓦、铜镜、铜带饰等器物看，渤海受唐文化影响极深。

已探明的上京龙泉府的形制和布局，均系仿照唐长安城而建，全城平面为正方形，东西约4.6公里，南北约3.4公里，周长16公里。城墙由石块砌筑，外有壕沟。共设十个城门。城内有笔直的东西向大街五条、南北向大街三条，居中的一条南北向大街最宽，从正南城门通至宫城的南门，相当于唐长安城的朱雀大街，并把全城分为东西两城。其余的大街纵横交叉，将全城划分为许多规整的长方形区域，内设坊。宫城在城的北部中央，平面也呈方形，周围筑石墙。宫城的前部相当于长安城的皇城，为官衙所在地。宫城的后部中央为王宫，相当于唐长安城的太



极宫。宫内有五个大殿自南向北排列在中轴线上，俗称“五重殿”。前两殿规模最大，为典礼和朝会之所，后三殿应为寝殿。五个大殿左右两侧是嫔妾和内侍的住所。王宫的东面是禁苑，有水池、楼阁、假山等。

这样的描述如果尚不够生动，那就让我们回到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出土的精美建筑砖瓦上，从中可以看到渤海国在建筑装饰上也以唐朝为样板。建筑材料中有一块残砖，陶质，上有清晰的“上京”两字。另有一块牡丹纹方砖，因为是用来铺设典礼和朝会之所的地面的，所以非常漂亮。它长、宽各39厘米，厚5厘米，砖的中心是一朵盛开的撒瓣牡丹，在它的四边和

上京龙泉府宫城第2宫殿遗址

唐  
位于黑龙江宁安



“上京”残砖

唐  
黑龙江宁安渤海上京龙泉府  
城遗址出土  
残长14.5厘米，宽18.8厘米





牡丹纹方砖

唐

黑龙江宁安渤海上京龙泉府  
城遗址出土

四角又各有长在卷曲枝叶上的牡丹一朵，显得十分雍容华贵。牡丹在中国民间向来是富贵的象征，尤其受到唐王朝宫廷的推崇，所以唐代的建筑物多有以牡丹纹样做装饰的时尚。这种喜好显然也波及到边远的渤海。不仅如此，中原地区的宫殿和佛殿，殿顶全用板瓦仰俯铺盖，脊上装饰黄绿色琉璃兽头，在正脊两端各矗立着一个高大的琉璃鸱尾，使殿宇显得更为壮丽。渤海建筑也取法这种形式。收藏品中有一块板瓦，长43.1厘米，高8.3厘米，色黑质坚，在上端的偏左处有一似“保”字的捺文。它的色泽、形状不仅与唐朝磨光的黑色筒瓦极为相似，并且还仿效唐朝在子口处捺文的形式。此外还有绿琉璃釉兽头，在渤海五重殿和佛殿的屋脊上都有使用。它残高26.5厘米，外面为绿色，张嘴



“保”字板瓦

唐

黑龙江宁安渤海上京龙泉府  
城遗址出土



翘舌，四个犬齿尖利外露，两眼圆睁，两耳上卷，脑后有两个尖角，嘴、耳内均呈淡黄色。另一件折扇式琉璃鸱尾，外涂绿釉，残长81厘米，宽36厘米，出土于上京东城的寺院遗址周围，也应是佛殿殿顶正脊两端的饰物。通过它可以想见当时渤海都城的宏丽和佛教的兴隆。

渤海国弘扬佛教，兴修了许多寺院。在上京龙泉府已发现了九处，城内七处，城外两处，很多佛殿规模可与王宫大殿相比。在“朱雀大街”北端东侧的佛寺，正殿面阔五间，进深四间。佛坛在殿的中央，塑像虽然已残碎缺失，但从九个石基上可以推测它们分别是一佛、二僧、二菩萨、二童子、二力士，这与中原佛寺的组合形式基本相同。

1980年在吉林和龙发掘了渤海贞孝公主墓，墓中的壁画和出土的墓志是渤海国的重要遗迹和遗物。墓志为汉字阴刻，楷书正体。文章对仗工整，显示了渤海人的汉文化功底。墓志记载贞孝公主是渤海第三代王大钦茂的第四个女儿，729年卒。她的墓室和甬道上有壁画，描绘了武士、内侍、乐伎、侍从等等。人物圆脸朱唇，面庞丰腴，或头戴幞头，或系抹额，穿红、青、黄、紫、赭色圆领袍，腰束革带，脚穿靴或麻鞋，处处闪烁着盛唐艺术风姿。这个墓的壁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渤海国的绘画水平。

唐王朝的灿烂文化浸润和陶冶着渤海人，渤海派大批留学生到长安学习，经常有人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渤海的一位国相曾在长安考中进士，后来他的儿子也考中进士，被传为佳话。唐朝大诗人温庭筠送文采



琉璃鸱尾

唐

黑龙江宁安渤海上京龙泉府城遗址出土

残长81厘米，宽36厘米



绿琉璃釉兽头

唐

黑龙江宁安渤海上京龙泉府城遗址出土

残高26.5厘米

飞扬的渤海王子回国时，曾写下一首热情洋溢的诗篇，它不仅表达了诗人的私人友情，也说明了灿烂的文化把内地和边疆亲密地联系在一起：

“疆里虽重海，车书本一家。

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

定界分秋涨，开帆到暑霞。

九门风月好，回首即天涯。”





## 第七章

# 丝绸之路——东西方交流的桥梁

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就已存在。后经几代王朝的开拓，它成为古代中国从内地出发，横贯亚洲，连接欧洲和北非，同西方进行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宗教以及科技等交流和传播的漫长交通线。不过，在古代它没有统一的名称，而“丝绸之路”这一充满魅力的名字，是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Richthofen）在他的《中国》一书中首先使用的。他所说的丝绸之路仅指两汉时期经中国西域地区，连接中亚的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继以通达印度的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这条古老的贸易通道，中国古代书籍早就有记载，近代考古发现也多有证实，在西汉武帝（前140—前88）派遣张骞通使西域，使西汉王朝和西域正式建立起关系之前就已经开通。所谓西域，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地理概念，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

区，核心部分包括今中国新疆及部分中亚疆土。后来，随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些外国考察家到中国西北考察，发现了大量的古代中国和西方进行贸易及文化交流的遗迹、遗物，使丝绸之路这一名称和它的历史作用日益彰显。

丝绸之路的开拓，到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朝出现了鼎盛局面。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不平凡的时代，是继西汉以后出现的又一个而且更为强大的帝国。就世界范围来看，唐朝国力超凡，疆域辽阔，是当时最重要、最繁荣、最先进的国家。它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灿烂的文化成就以及海纳百川的恢弘气势，使亚洲各国以及不少欧洲、非洲国家钦羡不已，不顾千山万水的阻隔，争相与唐朝交往，这就自然而然使唐朝成为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心。这一时期唐朝与西方之间的交通，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





远远超过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空前繁荣。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唐代众多充满异域风情的文物，充分体现了那个繁花似锦的时代的风貌，能够引发人们格外的遐思。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唐代遗物是曾经散落了的古代文明的珠玑，用它们完全可以串联出一部唐朝中西交流史。

音……

诗中的情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唐俑中多有反映。例如，在唐长安城郊出土的盛唐时期的中级官吏鲜于庭海墓中，随葬品中有许多高27厘米至29厘米的陶骆驼，似乎墓主人冥冥中尚在遥听那悦耳的驼铃。正是由于唐代处于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往来

陶骆驼

唐

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庭海墓出土  
高27厘米至29厘米

骑骆驼胡人俑

唐

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庭海墓出土  
高39.4厘米，长47厘米

## 第一节 无数铃声遥过碛

“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

唐朝诗人张籍这首脍炙人口的《凉州词》，写的正是丝绸之路的繁华景象。诗中的安西不是指今日玉门关外的安西县，而是泛指当时安西都护府辖境内重镇龟兹、焉耆、于阗、疏勒等广大地区。诵读这首诗，诗人诉之听觉的铃声，会使人产生如见骆驼商队的遐想：在从凉州边地通向安西边疆的辽阔无垠的沙漠戈壁，上一列长长的望不见头的骆驼商队，满载着美妙的丝绸，缓缓地向遥远的目标行进。骆驼颈上的悬铃摇荡碰击，打破空寂原野的安谧，发出响亮悦耳的声





胡人俑

唐

1955年陕西西安韩森寨出土  
高29厘米

《米继芬墓志》(拓片)

唐

1957年陕西西安土门出土



于东西方之间的驼队络绎不绝，相望于道，所以，在事死如生的唐中上层人士墓葬中，陪葬骆驼俑蔚成风尚，甚至皇亲贵胄也不例外。尤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陶骆驼背上驮着丝绸，驭手几乎都是表情各异的胡人，而且精美异常。

吐鲁番地区古称高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唐朝在此设西州，置高昌县。这里受中原影响，普通人死后多用人物俑随葬。人物俑的相貌和衣饰基本是中原人物形象，但与中原烧制而成的唐三彩俑不同，一般用木、泥制作并加彩绘，还穿着丝绸衣物。此外，在绘画艺术方面，中原风格的画风至迟在东晋时期已传入吐鲁番地区，表现仕女“曲眉丰腴，肌胜于骨”的盛唐画风，长时间影响了以新疆为中心的西域艺术。中原的棋艺，也在唐代传入吐鲁番地区，对贵族的休闲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鼎盛时期的丝绸之路，总长7000多公里，东起中国长安或洛阳，西至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但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地缘政治形势等变化，其走向、路线多有变动，不过大致由东向西可分为三段：东段是中国内地道，自长安出发，经陇西高原、河西走廊至玉门关或阳关；中段从阳关、玉门关以西到达古称葱岭的帕米尔和天山山脉西端北麓的伊犁河下游一带，又称中国西域道；西段指帕米尔以西，通常称为中国境外道。

西段境外道大体分为三条主要通路：一条从帕米尔经瓦罕山谷进入今阿富汗境，向南越过兴都库什山，往东南到达巴基斯坦和印度；一条翻越帕米尔，经过塔什干附近的费尔干纳盆地，西行至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转入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至地中海沿岸，进入欧洲或北非；还有一条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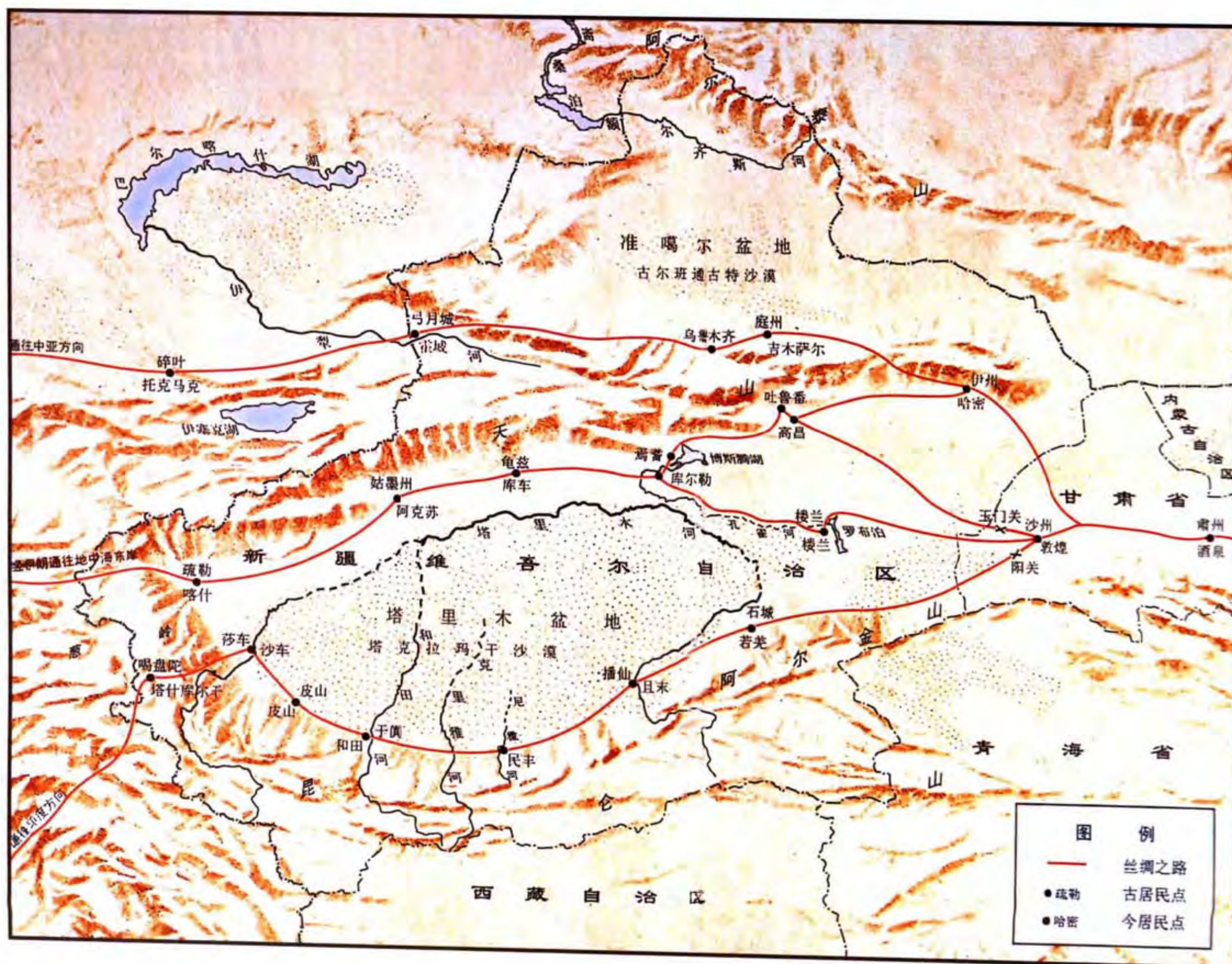
中亚西北行，经咸海、里海、黑海以北大草原，进入中北欧地区。

丝绸之路中段的西域道，主要部分在今中国新疆地区，唐代有南、北、中三条道路：南道，指昆仑山北麓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沿之间的东西通道，其主要的交通点有今天的若羌、且末、和阗和莎车，继之从塔什库尔干越过帕米尔，可南下到印度或西行到西亚诸国。中道指从高昌（今新疆吐鲁番）沿天山南麓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沿之间的通道，经过的主要交通点有古楼兰和今天的焉耆、库车、阿克苏；由此或经喀什西越阿赖山脉进入中亚，也可越过天山进入中亚。南道和中道早在汉代就基本开通。北道是隋唐时期在天山北麓开辟的，即从玉门关经古伊

州、北庭、轮台，进至今乌鲁木齐北，然后过伊犁河及楚河上的碎叶（在今哈萨克斯坦境内），进入咸海以西的中亚。

西域道由于有广阔干旱的沙碛和高峻寒冷的雪山阻碍，成为丝绸之路的咽喉地段，因而也形成了中西文化的荟萃之地。著名学者季羨林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甘肃的敦煌和新疆地区。新疆地区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大量唐代文物，不但充满汉文化、域外文化和本地区文化的多元特色，而且由于特有的干旱气候条件，保存了大量在内地不易保存的丝织品、木制品、纸卷等珍贵文物。

新疆地区丝绸之路示意图  
黄玉成、张洁绘制





身着胡服的唐人

唐

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庭诲墓出土

高45.3厘米



唐朝与西方这种四通八达的便利交通条件和为发展贸易而采取的开明政策，使来华的西方各族人数众多，规模空前。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居住着来自欧亚各地的侨民，成为古代稀有的国际大都会。米继芬就是生活

在唐都城的中亚米国人。据他的墓志记载，其家族世代官宦，父亲来到唐朝后，得到朝廷重用，历任辅国大将军、左领军卫大将军。米继芬本人任职禁军，其长子也在唐府兵中为官，幼子为景教大秦寺僧人。这样的侨民家庭在长安很多。开通的社会风气，使长安人的衣食住行都受到西方影响，甚至宫廷里也引为时尚。

波斯银币和东罗马金币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通货。在唐长安城遗址出土有波斯萨珊王朝库斯老二世时期（590—627）的银币。其两面都用模子打压成花纹，正面是国王头像，背面正中是波斯国教祆教的祭坛和祆神。唐高宗时，波斯萨珊王朝破败，王子卑路斯率残部流亡长安，其子曾回国图谋恢复王位未遂，父子均客死长安。这枚银币有可能就是他们带到长安的。东罗马金币是在陕西咸阳底张湾出土的，是查士丁尼二世时期（565—578）的货币。正面是国王半身像，背面是女神像。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东罗马扶苏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石绿、金精等物，太宗回赠绫绮等丝织品。唐玄宗开元时，东罗马仍不断来唐朝贡，金币可能是历次使臣带来的。从金币上面的穿孔看，它们可能曾作为外国的珍品被悬系或缝缀做装饰品使用过。

波斯银币

唐

1955年陕西西安唐长安城遗址出土

直径2.9厘米



丝绸之路贸易的大宗货物是丝织品，数量巨大，品种繁多。新疆出土的唐时期的丝织品，几乎囊括了当代丝织品的主要品种和织造技法。唐代不仅输出丝绸，丝织技术也广泛西传。中亚、西亚经过学习，改进中国的技术，生产的丝织品又反过来东传，在新疆发现有粟特锦和波斯锦。东西方的织造技术和图案风格都体现出相互交流的成果。

唐朝造纸业较前代规模更为扩大，加工技术有所提高。公元5世纪初，纸从内地沿





鸾鸟戴胜纹锦

唐

1969年新疆吐鲁番出土  
长19厘米，宽14厘米

丝绸之路传到新疆；至迟在6世纪，新疆就有了当地自造的纸；大约在7世纪，造纸术已从新疆外传到中亚的撒马尔罕。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唐朝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应中亚地方王公的请求出兵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结果战败，大批被俘的唐朝

士兵被送往中西亚。战俘中很多人是熟练的手工业者，其中的造纸工匠在撒马尔罕建立了穆斯林世界的第一家造纸作坊。随着西亚阿拉伯帝国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昌盛，作为文化用品的纸的使用与制作也大大推广开来，并相继传入欧洲和北非的埃及。



写经纸

唐

1928年新疆吐鲁番哈拉和卓出土  
长100.7厘米，宽25.9厘米  
这件写经纸纤维交结紧密、均匀，说明唐代造纸舂捣精细，打浆度高，是质量较高的植物纤维纸。



丝绸之路，特别是在其鼎盛时期，对于东西方各个方面的交流和相互影响的贡献，怎么评价也不过分。

## 第二节 众教东来

丝绸之路的又一贡献是把佛教传到中国，时间一般推定在公历纪元前后的两汉之际。除佛教外，经过丝绸之路还陆续从西方传来了其他的宗教，如祆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唐代早期和中期对这些外来宗教都很尊重，例如，唐朝在长安和洛阳均曾建有火袄祠。

### 一、佛教

佛教是公元前五六世纪由释迦牟尼在古印度创立的。公元前3世纪，由于孔雀王朝阿育王的扶植，佛教被定为国教并开始向域

外广为传播。一些高僧长途跋涉经过西域来到中国内地，建庙传经，以浸润的方式逐渐将佛教普及到汉族民间。开始时人们对佛教没有多少认识，只是当作神仙方术来信奉。至魏晋尤其是南北朝时期，由于得到统治阶级的倡导，佛教有了很大发展。佛教的各种流派，也都从印度相继传入中土，佛教典籍被大量翻译成汉文。到了唐代，佛教传播进入鼎盛时期，并与本土文化相结合而高度中国化，形成了多种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流派。

唐王朝宣扬佛教的同时，曾把它与中国传统的儒、道两家并列为“三教”。国家有重大节日或庆典时，皇帝则诏令三教在廷殿讲论。三教的讲论最初是相互贬低和诋毁，后来逐渐发展变化为相互补充甚至彼此融合，纷纷论证三教互有所长，不可偏废。从其效果看，这不能不说是佛教中国化的重大举措。这时，佛教信仰业已深入到民间，对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学、建筑、雕刻、绘画和音乐等方面影响很大，丰富了中国文化艺术的宝库。同时，由于唐朝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佛教传播中心实际上已由印度转移到中国。唐朝的佛教文化对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国影响巨大。

唐代的佛教遗迹遗物不胜枚举，著名的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北京房山云居寺等处，都保存有大量唐代佛教的造像、壁画、石经和写经。敦煌莫高窟的历史、艺术价值已广为人知。龙门石窟中武则天时代建造的奉先寺卢舍那佛像，其高度和伟岸虽不如北朝时期云冈石窟的大佛，但它与旁边的胁侍菩萨及武士雕像的精美则无与伦比。小型的石佛造像分布地域广，而且丰姿别致。四川省博物馆展出的一尊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的石刻观音头像，高41厘米，其雕刻之精

石观音头像

唐

1954年四川成都万佛寺遗址  
出土  
高41厘米





美亦堪称绝伦。观世音是佛教的重要菩萨之一，佛教徒认为他是慈悲的化身，救苦救难之神。唐代的观音信仰流传极广，而且由男神变为女神，逐渐世俗化。有件初唐观音石像，观音头戴高耸花冠，冠正面上方是一结迦趺坐的化佛，下方是摩尼宝珠。观音神情庄严，双目微垂，仿佛正在凝神聆听着世间的苦难。同时出土的石雕金刚力士像，筋肉隆起，须发奋张，虽然残缺严重，但可以想象他怒目圆睁，一手紧握金刚杵，一手握拳出击护法时的凛凛威风。这一造型是唐代典型的金刚力士形象。此外，在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也出土有许多唐代汉白玉石刻佛教造像精品。

## 二、祆教

陕西西安的一座唐墓里出土了一方墓志（藏于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其形制和一般唐人墓志一样，大致为方形，长39.5厘米，宽35.5厘米，但却是用汉文和中古波斯的婆罗钵文对照书写而成的。通过志文得知墓主人是苏谅妻马氏，苏谅和妻子马氏都是波斯萨珊王朝（226—651）王室贵族的后裔，萨珊王朝灭亡后流寓中国。他们在中国不仅可以使用自己的文字，而且信奉自己国家的国教祆教。

祆教是中国对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称呼。该教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创立，公元3世纪被波斯萨珊王朝定为国教，遂在中亚盛行。因为祆教认定世界上的光明和黑暗二者是善与恶之源，人应该弃恶从善，崇拜光明，所以敬拜火光和日月星辰。中国因其拜火与天，又称之为火祆教或拜火教。祆教首先传入中国新疆，南北朝时内地就有了奉祀祆教、崇拜天神胡天的记载。唐朝来华经商的胡人很多，他们不少是



石金刚力士像

唐

1954年四川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

高86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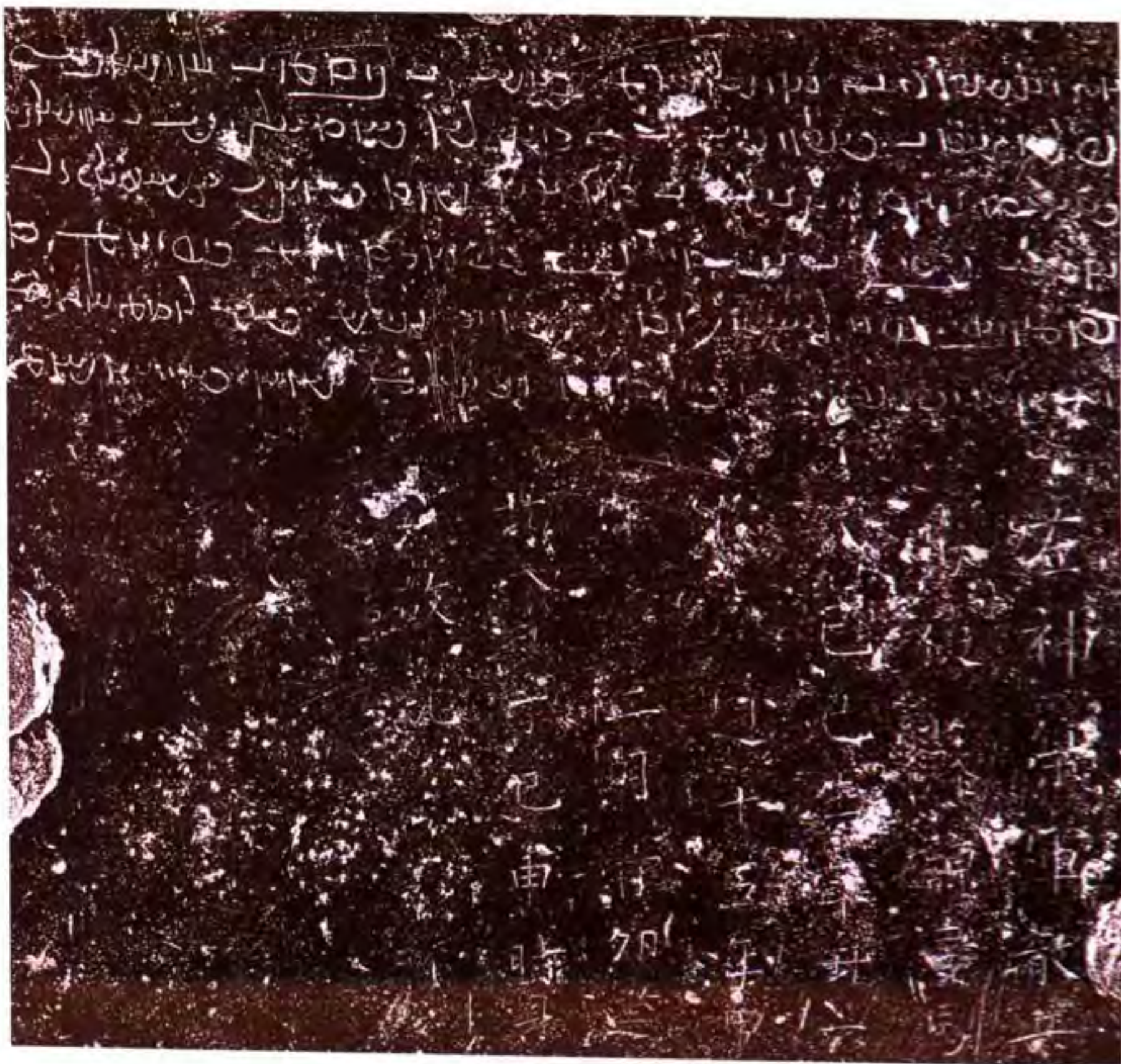
祆教徒。唐朝推行宽容的宗教政策，不仅为他们建祠，供其每岁祈福，还设立了萨宝府等专门的机构和官员进行管理。都城以外，

《苏谅妻马氏墓志》拓片

唐

1955年陕西西安出土

长39.5厘米，宽35.5厘米





许多州特别是河西走廊诸州也建有袄祠。

### 三、摩尼教

20世纪初,外国探险者在新疆吐鲁番等地发现了大量多种文字的摩尼教经书断简,石窟壁画中也有摩尼教的内容。同时,在敦煌文书中,也出现了汉文摩尼教残经。这些都说明摩尼教曾经在这一带广为流行。1981年夏,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65号窟内坍塌的沙土时,意外地发现了保存完好的3件粟特文和5件回鹘文文书,其中一件尤为引人注目。它是由九张纸粘连而成的长卷,高26厘米,长268厘米,上存墨书粟特文135行。在长卷的接缝处和低行书写的地方还钤有朱色印鉴。文书的中间是一幅工笔重彩的插图,并有一行金字标题。由于它的篇幅和精致程度,很长时间人们以为这是一件经卷。经过日本粟特语专家吉田丰博士和回鹘语专家森安孝夫博士多年的努力,终于转写、释读出这8件文书,原来全部是摩尼教徒的书信。那么,是什么书信如此冗长、讲究呢?原来,摩尼教的教主住在巴比伦,在他之下整个教团分成十二个教区,各教区又把信众分成一般信徒、僧尼、三

十位默奚悉德、六位拂多诞、一位慕闾等五个等级。这封书信就是东方教区一位拂多诞写给本教区慕闾的一封问候、致敬信。全信自始至终是问候和颂扬,没有其他具体内容,而且钤有印鉴,所以它属于教团公文性质的书信。通过这封书信,我们可以推论,当时东方教区的慕闾曾经住在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这一发现为研究摩尼教团的组织以及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创立的宗教。其教义是将原有的琐罗亚斯德教和印度传入的佛教以及由东罗马传入的基督教糅合而成,宣传善恶二元论。但摩尼最终不被容于波斯,六十岁时被处死。摩尼教徒也受到统治者的迫害,纷纷逃离出境。摩尼教徒的大量出境,使摩尼教得以更迅速地向东西方传布。3至6世纪,摩尼教已遍及中亚和地中海沿岸各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

根据宋代《佛祖统纪》一书记载,摩尼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唐武则天延载元年(694)。事实上,西域与内地的交往在唐初已经非常频繁,商人、僧侣、使节来往不断,甚至还有大量的西域人迁居塞内,所以摩尼教

粟特文摩尼教徒书信

唐  
1981年新疆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出土  
长268厘米,宽26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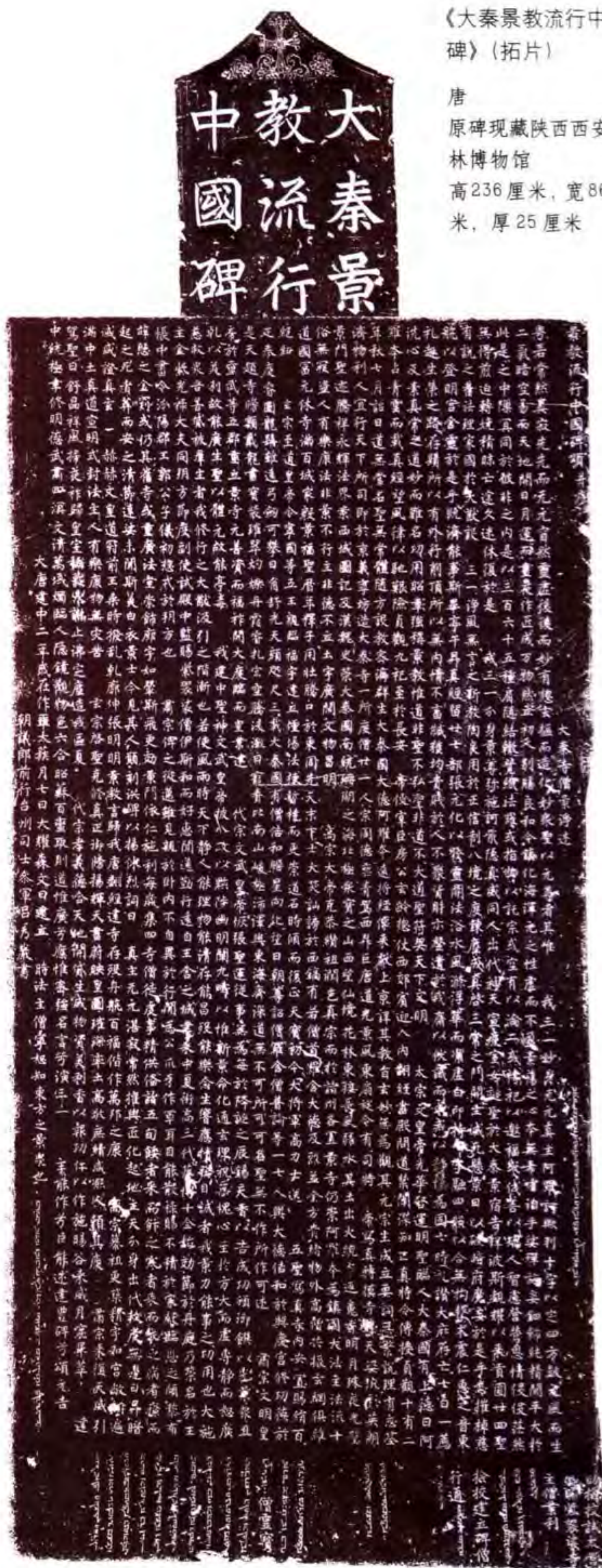
很可能在此之前已经在内地民间传播了。武则天临朝称制后，对摩尼教给予了比较高的地位，专门让外来的传教师在宫廷里讲经。唐玄宗虽于开元二十年（732）下令禁止摩尼教，但仅限于内地信教的汉人，并不强制西来的摩尼教徒改变其信仰。安史之乱中，唐政府借助漠北回鹘的兵力平叛。回鹘军攻入洛阳后，回鹘可汗接触并喜欢上了摩尼教。763年，回鹘撤兵归国时，回鹘可汗请了四位摩尼教师到回鹘传教。后来，摩尼教成了回鹘的国教。唐政府在内地也先后为摩尼教徒建了八所寺院，使摩尼教一跃成为仅次于儒释道三教的中国第四大宗教。840年，回鹘汗国西迁到新疆、甘肃一带，摩尼教的中心随之转移。在吐鲁番发现的摩尼教文献残片，就多是公元9世纪至10世纪间回鹘人的遗物。回鹘人对摩尼教的信仰一直持续到14世纪伊斯兰教完全征服新疆为止。

#### 四、景教

景教在中国的传播，大体可见于陕西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这件著名的唐代碑石珍品，全高2.36米，宽约0.86米，厚约0.25米。碑额题有碑名，额上部刻有立于莲花座上的十字架。碑背素面无字。正面下部及左、右两侧用叙利亚文和汉文合刻了七十名景教僧人的名字和职衔。正面碑文由景教僧景净撰写，正书32行，每行62字，分序和颂两部分。它在唐德宗建中二年（781）被立于都城长安（今西安）的大秦寺内，寺毁后长埋地下，明朝天启五年（1625）出土。出土地点诸说不一：或说在陕西省周至县，或说在西安，还有一说是在西安和周至之间。此碑一面世，就引起了轰动。陕西民间流传有罗马帝国派人盗碑或买碑未遂的故事。据说，后来有好几个基督教国家都翻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片）

唐  
原碑现藏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  
高236厘米，宽86厘米，厚25厘米





刻了此碑。这块碑石如此受中外瞩目，是由于它详细记载了景教传入中国的情况。

大秦是中国古代对罗马帝国的称呼。它与中国自汉晋时代就有外交往来，后于公元4世纪末分裂为东西罗马。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以今土耳其一带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继续与中国保持往来。景教是唐代对基督教的支派聂斯脱利派的称谓。428年，聂斯脱利派与当时作为东罗马帝国国教的基督教正统派分裂后，开始逐渐向东传播，流行于西亚、中亚地区。根据碑文记述，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大秦国主教阿罗本到长安，受到太宗礼遇，被请到皇帝的藏书楼翻译圣经。贞观十二年，太宗下令准其传教，并由朝廷资助在长安建造了景教礼拜堂大秦寺。

唐太宗死后，高宗继承了宽容的宗教政策，除长安外在各州置景教寺，使景教得到很大发展。玄宗时，曾将前代五位皇帝的画像安置于景教寺，还曾召集景教传教士在兴庆宫修功德。此后，肃宗、代宗、德宗都支持和保护景教，使景教进一步发展。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叙述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教规，而且记述了景教在唐太宗至德宗一百四十余年间的传播交流情况。它已成为研究景教的最重要的文献，同时也是研究唐王朝与东罗马帝国宗教文化交流、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

## 五、伊斯兰教

与佛教、基督教并列称世界三大宗教的

大食人俑

唐  
传陕西西安出土  
分别高27厘米、29厘米





伊斯兰教，也是在唐代经西域东传中国的。由于唐代典籍中没有发现伊斯兰教传入的直接史料，因此，对其传入时间学术界一直持多种主张，但一般认为至迟在8世纪中叶。传播的途径和方式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陆上和海上），在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人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中逐渐传入的。

610年前后，在阿拉伯半岛的麦加，穆罕默德宣布自己受到天启，被真主选为先知，受命传播一种新的宗教。这一宗教被称为“伊斯兰”，信奉此宗教的人叫作“穆斯林”。632年，穆罕默德去世时，大体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形成了伊斯兰教国家。随后，在伊斯兰教旗帜下迅速向外扩张，到8世纪初，阿拉伯人已经控制了中亚大部分地区，疆域到达帕米尔高原，临近唐代的西域。8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的版图，东起印度河流域，西临大西洋，北界咸海，南至尼罗河，成为地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

唐代以来称阿拉伯帝国为大食。唐朝同大食的正式官方来往颇早。据史书记载，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八月，大食国开始遣使朝贡。此后，直至贞元十四年（798），大食向唐朝正式遣使朝贡近四十次。民间的往来，肯定更早也更频繁。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十余件异常精美的伊斯兰玻璃器，就是大食自798年中断向唐朝遣使朝贡后，经由陆路或海上交通，通过贸易进入唐皇室宫廷的。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交通，陆路是从阿拉伯半岛经波斯及阿富汗到达新疆的天山南北，再经青海、甘肃直至长安一带；海路由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出发，经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分别到达广州、泉州、杭州和扬州等地。随着大食日渐强盛，在与唐朝交往的所谓“四夷”当中，大食的使节、商人受到较高礼遇，被视为大国之宾。伊斯兰教在



唐代的传播和发展，就是伴随着大食人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等中亚人来华贸易甚至留居进行的。不过，伊斯兰教在唐代虽然传入，但影响远不及佛教，也不能和景教、祆教和摩尼教相比。唐代中国早期的伊斯兰教徒，主要是入籍的大食人等，他们生活在长安、川滇和东南沿海的几个港口。目前发现留存下来的有关唐代伊斯兰教的遗迹、遗物很少，不过传为西安出土的那些弓着背、背着行囊、手握水壶的大食人唐俑，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他们不远万里来华的艰辛旅程。

贴塑玻璃瓶

唐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

高21厘米，腹径16厘米



### 第三节 玄奘西天取经

明代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在中国可以说家喻户晓，它描写的是唐僧取经的神奇故事。这本书虽然描写人、神、怪极尽想象之能事，但它却并非完全虚构。唐僧原型是唐朝初年的一个真实人物，而九九八十一难的旅途，正是艰难崎岖的丝绸之路。

唐僧俗姓陈，名祿，洛阳缑氏（今河南偃师）人。他十三岁出家，法名玄奘，曾游历各地，后来到长安大庄严寺挂褡。在游历中，他遍访名师，受学、讲学、问难，颇有心得，同时接触到各派理论。当时，佛教在中国传播至少已有六七百年的历史，很多重

要的经典译成了汉文，有的甚至不止一个译本。但玄奘深感由于佛经翻译存在讹谬，疑难问题很多。为了解决佛教典籍的来源不一、原本不全造成的翻译上真伪难辨，使人无所适从，他发愿亲赴印度，广求佛教本源，进行参验。唐太宗贞观元年（627），玄奘终于开始了他西天取经的旅程。

他从长安出发，经凉州（今甘肃武威），不顾当时的出关禁令偷越玉门关，然后取道当时丝绸之路的中道，孤身穿越沙漠，到达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从那里沿天山南麓西行，经焉耆、龟兹（今新疆库车），越凌山，经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粟特诸国境，过铁门（今乌孜别克南部布兹嘎拉山口），进入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国境，然后沿今巴基斯坦北部，过克什米尔，进入北印度。在印度，玄奘仍像在国内一样到处游历，求教名师。他到过尼泊尔南部，巡礼了佛教六大圣迹，遍访五天竺（古印度别称），并在当时印度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学习五年。后来，他的佛学声名传播五天竺，成为公认的第一流学者，被称为“大乘天”。贞观十五年（642）春，玄奘携带多年搜集到的657部佛经以及佛像、花果种子等踏上返国的旅程。他从巴基斯坦北上，经阿富汗东北，折向东，穿越帕米尔高原南侧的瓦罕山谷，取道昆仑山北麓的于阗、且末，即丝绸之路的天山南路，于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二十四日回到长安，受到唐太宗的热烈欢迎。玄奘取经，历经千辛万苦，历时十余年，行程五万里。他在旅途中忍受的孤寂和遭遇的困难，其实何止九九八十一。

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的唐代绘画作品，有两幅多少保留下一些取经人的形象。一幅是《高僧像》，为9世纪末10世纪初的墨描纸画，高46厘米，宽30厘米，现

《玄奘取经图》（拓本）

原碑建于1933年，在陕西西安郊外兴教寺，内有玄奘墓塔。





藏于英国博物馆。这幅画中白描的高僧，方面大耳，弯眉、细眼、直鼻，双唇紧闭，身穿袈裟，盘坐在枯树前的方形毯上，双手作禅定印，目光直视而精神内守。在他面前放着一双云头履，身边有一水瓶，枯树枝上挂一串念珠和一只行囊。这或许是表现西行路上小憩的情景。另一幅是《携虎行脚僧图》，9世纪作品，绢画，高79.5厘米，宽53厘米，现藏法国吉美博物馆。画面是一位从印度取经归来的硕学僧人。他脚穿草履，背负满载经卷的书笈，与虎相伴而行。

佛教自印度经过中亚向中国传播，据历史记载，确曾有无数僧人“西天取经”，上述画面表现的身负重载、步履沉缓、面容刚毅，恰恰是他们的最好写照。玄奘正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他实现了中古史上一次艰险伟大、富有成果的旅行。玄奘回国后，在长安慈恩寺主持规模宏大的译场，夜以继日地翻译佛经，共译出佛经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唐高宗麟德元年（664）玄奘去世，葬于长安兴教寺。有关玄奘大师的遗物，1977年陕西铜川玉华宫遗址出土了一件玄奘



《高僧像》

唐

现藏英国博物馆

题名的石佛座。玉华宫是唐初兴建的一处离宫，唐高宗即位后将其改为玉华寺。玄奘为专心翻译佛经，于显庆四年（659）由长安移居此寺。石佛座就是他在玉华寺期间留下的。这件珍贵的遗物高36厘米，上部的莲花座径长49.5厘米，佛座下部侧面刻有“大唐龙朔二年三藏法师玄奘敬造释迦佛像供养”。



兴教寺外景

位于陕西西安





玄奘题名石佛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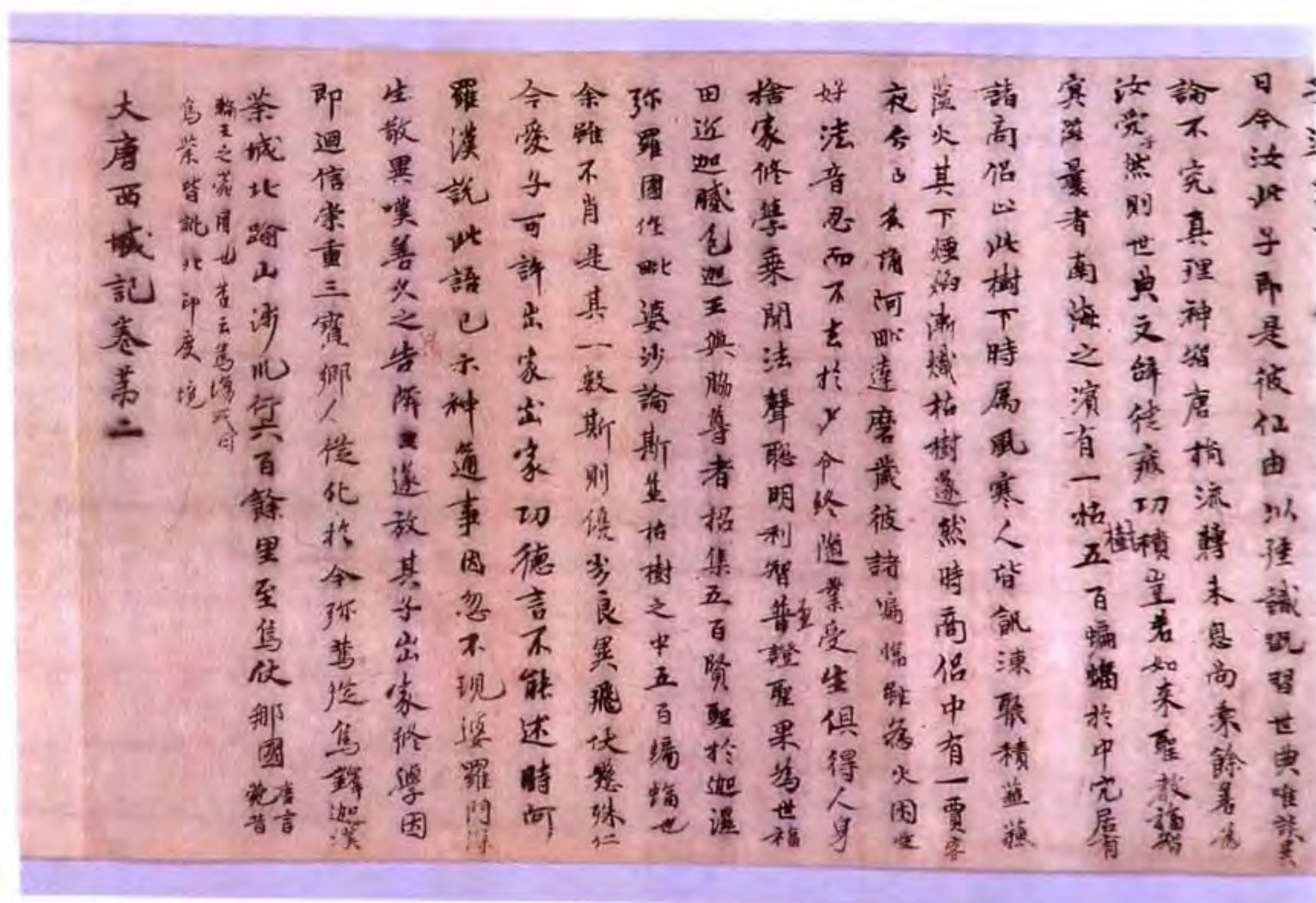
唐

陕西铜川玉华宫遗址出土  
高36厘米，上径49.5厘米

玄奘除为佛教的流传和佛学理论的研究做出巨大贡献外，他还遵照唐太宗的意旨，将自己赴印度游学所亲身经历和得自传闻的一百三十八个以上的国家、城邦和地区的旅行见闻口授弟子辩机，由其笔录而成《大唐西域记》一书。该书共十二卷，十万余字，记述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以行程先后为序，包括今中国新疆和中亚诸“斯坦”国家、阿富汗、

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地，为后人留下了7世纪中亚、南亚等地区自然地理形势、交通、物产、民族、语言、历史、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和风土人情等大量珍贵史料，至今仍是研究中亚、南亚地区古代史、宗教史和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文献。考古学家曾根据书中提供的线索，发掘和鉴定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历史遗址和文物，如印度历史上著名的那烂陀寺以及王舍城等遗址的发现，都得益于《大唐西域记》的正确记载。《大唐西域记》一书现存版本较多，其中英国博物馆和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分别藏有得自敦煌莫高窟的唐人写本前3卷残卷，这是该书现存最早的版本。此书还被译成英、德、法等国文字，在世界上影响巨大。

唐代西行寻求佛法的高僧，还有义净。他是继玄奘之后又一位到印度和东南亚地区求法游历的僧人。他在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载了初唐时六十位中国僧人去印度求法的事迹，以及当时印度与中国往来的主要通道情况。



《大唐西域记》写本

唐

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



唐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空前盛况，从上述“西天取经”的记载中可见一斑。

#### 第四节 被遗忘的使臣

玄奘声名远播，名垂青史，而另一位继他之后四次奉旨赴印度，将大唐帝国与五天竺诸国的交通和文化交流推向一个新阶段的重要人物，却鲜为人知，他就是唐朝敕命使臣王玄策。历史对他的命运是很不公平的，无论生前死后他都只是一个孤寂的旅人。

王玄策官运不佳，一生仅做到五品的中级官吏，所以在正史中不够立传资格。他的运气也不及玄奘，呕心沥血所著《中天竺行记》一书（图三卷，文十卷），以及官府主要依此修撰的《西国志》，宋代以后竟先后丢失，使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赫赫功绩从此被埋没；甚至后人将一些找不到出处和来源的王玄策的记事，也转移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里。1990年，在西藏吉隆的一块光洁的崖面上，发现了一些镌刻文字，现残存阴刻楷书24行，共计222字，许多已漫漶不清，但碑文中有“……左骁卫长史王玄策宣”字样，碑铭正中额题篆刻阳文“大唐天竺使出铭”。这块摩崖碑刻一经发现，立即引发了学者们的热切注意和讨论。据研究，它是唐高宗麟德元年（664）王玄策第四次奉敕使印度时所刻勒的。由于当时唐朝和吐蕃关系出现裂痕，所以碑铭意在颂扬大唐威德，警告吐蕃，同时也记录了王玄策出使印度的功绩。“大唐天竺使出铭”是迄今为止在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通汉文碑铭，比现矗立于拉萨大昭寺前的著名唐蕃会盟碑早出一百六十五年。

王玄策的遗迹怎么会出现在西藏吉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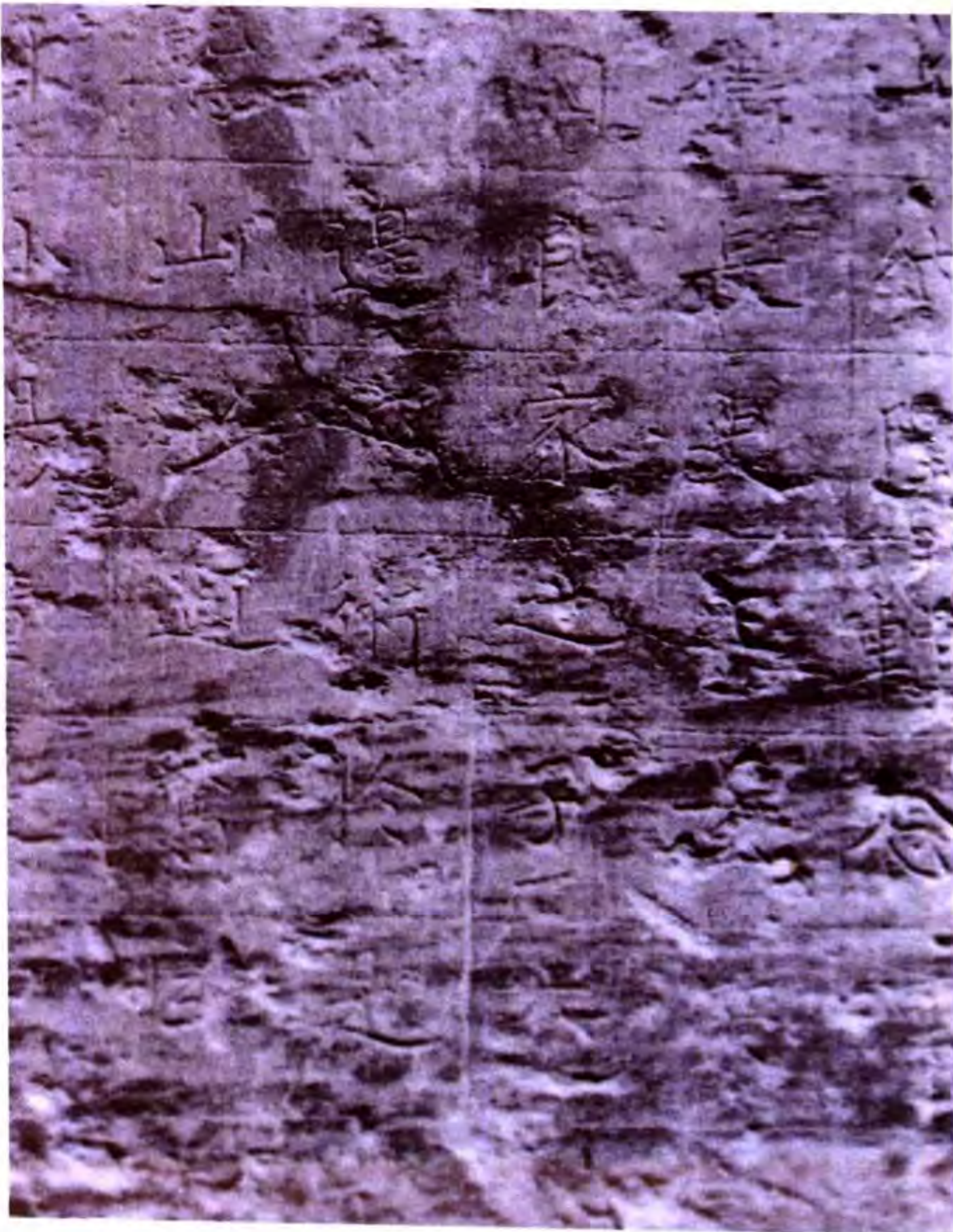
呢？原来，他四次奉敕前往五天竺活动，每次的使命和经历不同，经由的路线也不尽相同。他既走过当时中西交通的干道丝绸之路，也曾取道从古河州入吐谷浑到达吐蕃首府逻些城（拉萨）的唐蕃古道，然后从西藏西南部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加德满都谷地，由尼婆罗国（今尼泊尔）进入印度，即所谓吐蕃尼婆罗道。王玄策在唐朝初年选取了这条出使路线，使他成为开创这条古代国际通道的第一人。这条道路对加强汉藏和藏尼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都曾起过重要作用。

现今中尼边境的吉隆县，很早就是沟通藏尼的交通孔道，经此可由藏南直达加德满都。唐代以后此地一直是喜马拉雅山地区陆

《大唐天竺使出铭》石刻碑铭（局部）

唐

位于西藏吉隆





路交通的主要山口通道。例如吐蕃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公主进藏，请尼泊尔工匠在拉萨开凿石佛像、修筑寺庙等，就是经由这条孔道。唐代吐蕃文化中来自南亚的因素，很多可能就是通过尼婆罗传入的，因为它与印度邻接，受影响很深。西藏博物馆保存的一尊释迦牟尼鎏金铜像，是8世纪的作品，高63厘米，堪称印度风格佛教造像的佳作。相传，在信众最初请画师为释迦牟尼画像的时候，由于佛祖威严的光芒使得画师不敢直视，只好通过水面的倒影来描绘，所以释迦牟尼的衣纹有如水波涟漪。其实这种表现手法属于典型的印度佛教美术两大滥觞之一的秣菟罗艺术风格。从秣菟罗经过尼婆罗传到吐蕃是

释迦牟尼鎏金铜像  
西藏博物馆藏



很便捷的。

王玄策四次出使的时间，大约在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至唐高宗麟德二年（665）之间。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二十二年中四次往返印度，我们不能不为他的勇气和毅力所折服。王玄策的使命包括送婆罗门（印度）客使回国，取印度制糖之法，以及为大唐培养梵语翻译人员，往佛祖涅槃处送袈裟等。其中第二次是贞观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647—648），赴印度取制糖之法。中国制糖的历史很久，但主要是麦芽糖。屈原《楚辞》中虽然提到甘蔗，当时也喝甘蔗汁，但把甘蔗汁变成糖在中国用了一千多年时间。唐太宗时中国已用甘蔗制糖，但水平不高，所以《新唐书》中记载了李世民派人去印度学习制糖技术。这位使者就是王玄策。他不畏艰险，不辱使命，在短短的一年内取得制糖之法，而且从印度请来了制糖的匠师和僧侣。中国引入制糖之法并加以改进，制出的糖在颜色和味道上都超过了印度，史书说“色味逾西域远甚”。更有趣的是，印度把白糖称做Cini，意为“中国的”，这是因为后来印度的白糖制作技术是向中国学的。王玄策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丰富中国人民的食品做出了重大贡献。

## 第五节 遣唐使与鉴真东渡

在唐朝，丝绸之路不仅向西方大大扩展，而且在前朝的基础上继续跨海朝东朝南开拓。这条海上交通线，被后人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唐初开始与东瀛日本的交往，主要是宗教和文化交流，后来随着海路的不断延伸，



不仅增加了驶往日本的商船，也开展了与东南亚及南亚、西亚沿海诸国的易货贸易和使臣来往。

日本奈良市著名的东大寺大佛殿西北正仓院内，至今收藏有许多奈良时代（710—784）圣武天皇的遗物，包括不少贵重文物。它们一般都制作精致，年代明确，其中有相当数量是中国唐朝的物品。这足以证明丝绸之路从长安向东延伸至日本后，一批批不畏艰险的遣唐使和赴日的中国文化使者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古代日本为了汲取中国的优秀文化，自唐朝开国以后，继续沿袭遣使入隋的旧制，派出遣唐使。从630年（唐贞观四年）第一次遣使，到838年（唐开成五年）最后一次入唐，日本使臣抵达长安达十五次之多。894年（唐乾宁元年），日本政府又准备派遣使臣，但终因财力负担太重，加之航行艰险而作罢，从此正式停止派遣遣唐使。当然，这与日本吸取唐文化渐趋饱和，以及唐朝的日益衰落不无关系。但是民间往来的商船并没有就此中断，从839年直至907年唐灭亡为止，仅有文献可考的日唐间船舶往来就达三十七次之多。日本著名僧人圆仁以及惠萼就曾搭乘这样的船只来往于唐朝和日本之间。

遣唐使要在难波（今大阪）上船，通过濑户内海从博多（今福岡）出发。早期，航线取北路，过对马海峡后，沿朝鲜半岛西岸北行，再沿辽东半岛东侧南下，穿越渤海，在山东半岛登陆，然后取陆路赴洛阳、长安。7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朝鲜半岛的新罗与日本关系一度不睦，遣唐使船改取南岛路，由九州南下，沿南方诸岛向西北跨中国东海，在长江口一带登陆，再由运河北上。自8世纪70年代以后，航线改取南路，由九州西边的五岛列岛向西南横渡东海，在长江以南的



和同开珎

唐

1970年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

直径2.4厘米

苏州、明州一带登陆，转由运河北上。使团的规模由开始的两艘遣唐使舶增至后来的四艘，总人数由一次二百四五十人增至五百人以上。为利于向唐朝学习，使团人员的选拔是很严格的，除使团官员外，随行者多具较高文化修养和经验，很多是日本的饱学之士和各行业的专家里手。这些留学僧和留学生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如吉备真备，在华留学十七年，回国时带去大量中国书籍和文物。他后来在日本任左大臣，致力于日本的改革和推广唐朝文化。阿倍仲麻吕（晁衡）在中国和诗人李白、王维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因归航受阻留在唐朝廷做官。空海和尚则将佛教密宗从唐朝传入了日本。遣唐使大量输入中国的经史子集，使中国文化风靡日本社会，渗透到思想、文学、艺术和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同时随船带来了大量对唐朝的赠品和其他货物，回程又带走不少唐朝的答礼与特产，不仅促进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也发展了互通有无的贸易往来。1970年，在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了一枚日本奈良朝元明天皇和同年间（708—714）铸造的银币，直径2.4厘米，形制和重量与唐代的“开元通宝”钱完全相同，而且钱文中的“珎”即为“宝”字的简写，“开珎”也是仿效“开



元通宝”的简称，甚至两种钱上的“开”字几无二致。从一枚小小的钱币，也可以看出唐朝对日本影响之深刻。

僧人是丝绸之路上不畏艰险的至诚过客，他们在传播宗教和文化方面，曾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唐朝和日本之间的交流更是如此。日本入唐留学生姓名可考的只二十余人，而随遣唐使及商船来华的僧人见于文献的达九十余人。他们在中国巡礼名山圣寺，求师问法，并将大量佛经、佛像和佛具等带回日本，对促进日本的宗教文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日本时代最早的经筒，为925年道贤法师制，发现地在山西五台山。这件日本特有的盛放佛经的容器，虽然已属于唐以后五代的制品，

但经筒的作用以及发现地点，却与唐代佛教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关系密切。

中国从隋代开始流行末法思想，由此产生了三阶教和刻藏佛典的房山云居寺石经。日本慈觉大师圆仁于838年随遣唐使到中国，847年学成归国，并开始将这种末法思想传入日本。日本人认为，1052年进入末法时期，信众在不安和恐慌中，为了使佛教经典永传后世，从平安时代（794—1192）中期起盛行将经典放入经筒后埋入经塚，以修功德。日本考古在各地发现了大量经筒，而且出土了不少中国南方专为日本烧造的陶瓷经筒。

道贤法师的经筒为铜制，圆形鎏金，盖已失。筒高17.4厘米，口径5厘米。筒上镌楷书铭文：“倭国椿谷椿山寺，奉纳三部经一卷，为父母菩提敬白，延长三乙酉年八月十三日道贤法师。”道贤是日本知名僧人，他为父母祈福安康、追善供养的经筒为何会流传到五台山呢？原来，这与唐代流行的日本僧人朝拜五台山圣迹有关。五台山是唐代佛教圣地，被奉为文殊菩萨显灵之所，不少名僧住在山中，大看法场。圆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唐朝每年派遣敕使送香花衣钵给山中十二大寺，设斋举办千僧供养。朝拜此山的普通僧俗信众更是络绎不绝。日本平安朝的不少入唐僧人如圆仁、惠萼等都曾朝拜五台山圣迹。不仅如此，日本上流社会也崇敬五台灵山，桔皇后在承和十一年（844）特派惠萼入唐，将亲手做的绣文袈裟和宝幡镜夜施给五台山。庆元元年（877）济诠入唐时，日本上自天皇，下至公卿，都施舍大量黄金，作为五台山文殊菩萨的供养费用。所以，道贤法师经筒出现在五台山，实际是传承唐代以来日本对中国佛教圣迹的敬仰。据考证，道贤并未到过中国，他的经筒应是10世纪初托人辗转带到五台山的。

道贤法师经筒  
山西五台山发现





随着遣唐使的往来，也有不少唐朝僧人东渡日本，其中鉴真大师是举世公认的楷模，他对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非同寻常的巨大贡献。

鉴真原是扬州大明寺名僧、律宗大师。当时，日本佛教由于戒律不完备，僧人无法按照律仪受戒。733年，日僧荣睿、普照随遣唐使来到唐朝，寻访十年，终于发现佛法精湛的鉴真和尚，决定邀请他到日本传授戒律。鉴真欣然接受邀请。742年，他不顾弟子们的劝阻，毅然下决心东渡。由于地方官的阻挠和海上风浪险恶，鉴真先后四次渡海失败。第五次他在海上遇风暴，竟漂流到海南岛。但他矢志不渝，虽然双目失明，仍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又回到扬州再次出发。753年冬，他终于搭乘日本遣唐使团的船只成功东渡。次年，鉴真以六十六岁的高龄到达日本，进入日本首都奈良时受到隆重盛大的欢迎。

这一年，鉴真在奈良东大寺设立戒坛，为十位和尚举行了受戒仪式，这是日本僧人正规受戒之始。759年，他与门徒建成律宗的总本寺唐招提寺，这座寺庙是日本佛教建筑艺术的杰出成就。鉴真赴日携带了不少佛经、佛像和佛具。他还亲自校订写本佛经的讹误，鉴定并传授草药知识。同行弟子中还有西域胡人和东南亚的昆仑人和占婆人，他们将雕塑、绘画及建筑等唐朝文化成果传播到日本。763年，鉴真大师在日本去世。为纪念他，弟子用干漆夹纆法制成鉴真像，安放在唐招提寺的金堂中。1980年，时隔1226年，日本敬送这座干漆夹纆像短期回国省亲。在北京期间，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供奉展出。永垂青史的鉴真大师，这位中日文化交流的特别使者，受到了故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在唐代，朝鲜半岛上的新罗国与中国内地的交流也是相当频繁的。7世纪下半叶，新



鉴真干漆夹纆像

罗统一了朝鲜半岛，派往唐朝的使节、留学生等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乾陵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有一幅客使图壁画。壁画上绘有六人，前方三人戴着纱罩笼冠，穿红色长袍，其中一人手持象牙笏，他们是唐朝鸿胪寺负责礼宾的官员。后三人则是外国使节，其中第二人头戴羽毛帽，有的学者认为是日本遣唐使，但更多的学者根据其所戴之冠，认为是新罗使臣。不管此人身份如何，唐朝与朝鲜



《桂苑笔耕集》(清抄本)

新罗人崔致远著



《客使图》壁画

唐

1971年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  
出土

半岛频繁的文化交流是无可怀疑的。早在唐初，十部乐曲中就有高丽乐。新罗所属的百济人，把从中国学得的西域乐舞传入日本，称吴伎乐。当时，在唐朝沿海很多城市有“新罗坊”，有接待新罗人的“新罗店”，有的地方还设有“勾当新罗所”，可见新罗人在中国为数众多。这些新罗人中崔致远最为著名。他十三岁入唐求学，十九岁中进士，所著《桂苑笔耕集》流传至今。这本书是他在中国为淮南节度使掌管文书期间所作部分诗文的合集，其中许多是他起草的公文。文章多为骈体，文采飞扬，显示了深厚的汉文化素养。

## 第六节 海上丝绸之路

6世纪之后，无论是中国还是阿拉伯世界，航海知识与航海技术及经验都有了长足进步，这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唐代，中国已经能建造长达二十丈的大

海船，可载六七百人。按唐制一尺可折31.1厘米计算，这种船长约62米之巨。由于结构合理，船体高大，唐船的载重能力和抗风能力都超过了大食海船，在抵抗波斯湾的惊涛骇浪中占据了优势。这不仅改变了两汉时代远洋贸易需要辗转换乘别国商船的情况，连素以造船和航海著称的阿拉伯人也都喜欢乘坐中国船。与此同时，阿拉伯人的商船当时在印度洋各处航行，也十分活跃。在海外贸易以及文化交流需求日益扩大的刺激下，唐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传统的陆地丝绸之路的补充，大大地繁荣起来。

当时中国从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东南沿海登舟，均可渡海东通朝鲜、日本，向西则有“广州通海夷道”。唐代地理学家贾耽对这条中西海上交通航线有详细的记载。它从广州出发，越过南中国海，横穿马六甲海峡，到达当时南海中的大国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然后经马来半岛西岸，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和印度，从印度再驶向阿曼湾，抵达波斯湾头的重要商埠



巴士拉(今伊拉克境内),最终到达阿拉伯帝国的首都报达(即巴格达)。这样一条航线扬帆远航走下来,大约只需要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大大缩短了中国去东南亚、南亚尤其是西亚阿拉伯地区的距离,成为沟通中西经济文化的又一条重要通道。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高18.7厘米,口径1厘米的唐代青瓷凤首执壶,是1954年在广东广州出土的。广州是唐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之一。江面上停泊着来自师子国、婆罗门(古印度)、波斯(今伊朗)、昆仑(今中南半岛南部及南洋诸岛一带)等处的“南海舶”,不计其数。据史书记载,每天抵港的外国商船有时多达十余艘,各种货物

堆积如山。它们运来象牙、犀角、香料和珠宝等各种名贵物产,换取丝绸和瓷器之类的货物。唐代瓷器工艺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善于吸取外国工艺品中优美的造型和纹样装饰。这件瓷器就是学习波斯银瓶,加以改造,做成中国人民喜爱的凤鸟形象。在印度尼西亚南部曾出土过白瓷凤首执壶,与这件非常相似。这件青瓷凤首执壶可能是一件准备起运外销的瓷器。

由于当时从海路来自各国的商旅云集广州,唐朝开始在广州设立市舶司,专管对外贸易,征收舶脚税。外商多集中居住,信仰各自的宗教,设蕃长协助政府解决有关纠纷。由于对外贸易的兴盛,除广州外,明州



青瓷凤首执壶

唐

1954年广东广州出土

高18.7厘米,口径1厘米,底  
径7.6厘米



卷发陶俑

唐  
传陕西西安出土  
高 28 厘米



(今浙江宁波)、江都(今江苏扬州)以及泉州等沿海港口也发展起来。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卷发陶俑,传为陕西西安出土,高 28 厘米。俑的相貌和衣装都不同于来自西方的深目高鼻的胡人俑,脸庞圆而鼓,赤足,袒

青瓷碗

唐  
伊朗尼沙布尔出土  
高 4 厘米,口径 14.3 厘米



裸上身,带有项圈和腕钏,显然属于被唐代称为昆仑国的南海诸国人。唐俑中有不少这种卷发、肤色较深的昆仑人形象,说明东南亚地区在海上交通中非常活跃。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作过一首《骠国乐》诗,骠国是唐人对缅甸的称呼。诗中写到唐贞元十七年(801),骠国王派王子率乐工不远万里赴唐朝献乐通好。他们到达长安后,受到热烈欢迎。“骠国乐”水平颇高,他们的精彩表演轰动了长安。

在海上丝绸之路,从唐代开始,瓷器逐渐成为中国对外输出中最大宗的商品。阿拉伯人十分喜爱中国的瓷器,阿拉伯人盛赞华瓷的制作工艺。晚唐时,中国瓷器开始输入埃及,并很快征服了埃及。埃及人称瓷器为“绥尼”,意思就是“中国的”。西方对中国瓷器的需求量非常大,开罗南郊的福斯塔特遗址曾经是伊斯兰时代最古老的城市,当时华瓷从海路运到红海各港口上岸,集中到这里,然后再由此转运到亚历山大港、摩洛哥及马格里布(除埃及外的北非地中海沿岸诸国)。20世纪初,这里考古发掘出数十万陶瓷残片,已辨明的中国陶瓷就有 12000 片之多,其中年代最早的属于唐代,有唐三彩、邢窑白瓷以及越州的窑瓷。这种陶瓷贸易热潮同样冲击着波斯。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唐代越州窑生产的青瓷碗,它是日本已故著名中国陶瓷学者、越州青瓷专家小山富士先生 1966 年捐赠的。这个碗高 4 厘米,口径 14.3 厘米,出土于伊朗的尼沙布尔,是唐朝的外销瓷。当时,波斯不仅输入华瓷,而且得到唐三彩和邢窑白瓷后,很快采用中国瓷器的样式,加进自己民族的风格,创制出华丽的波斯三彩和白釉蓝彩陶器。1973 年,在浙江宁波唐代鱼浦门遗址附近出土了一只木船,可惜船体残破过甚,已无法测知它的形制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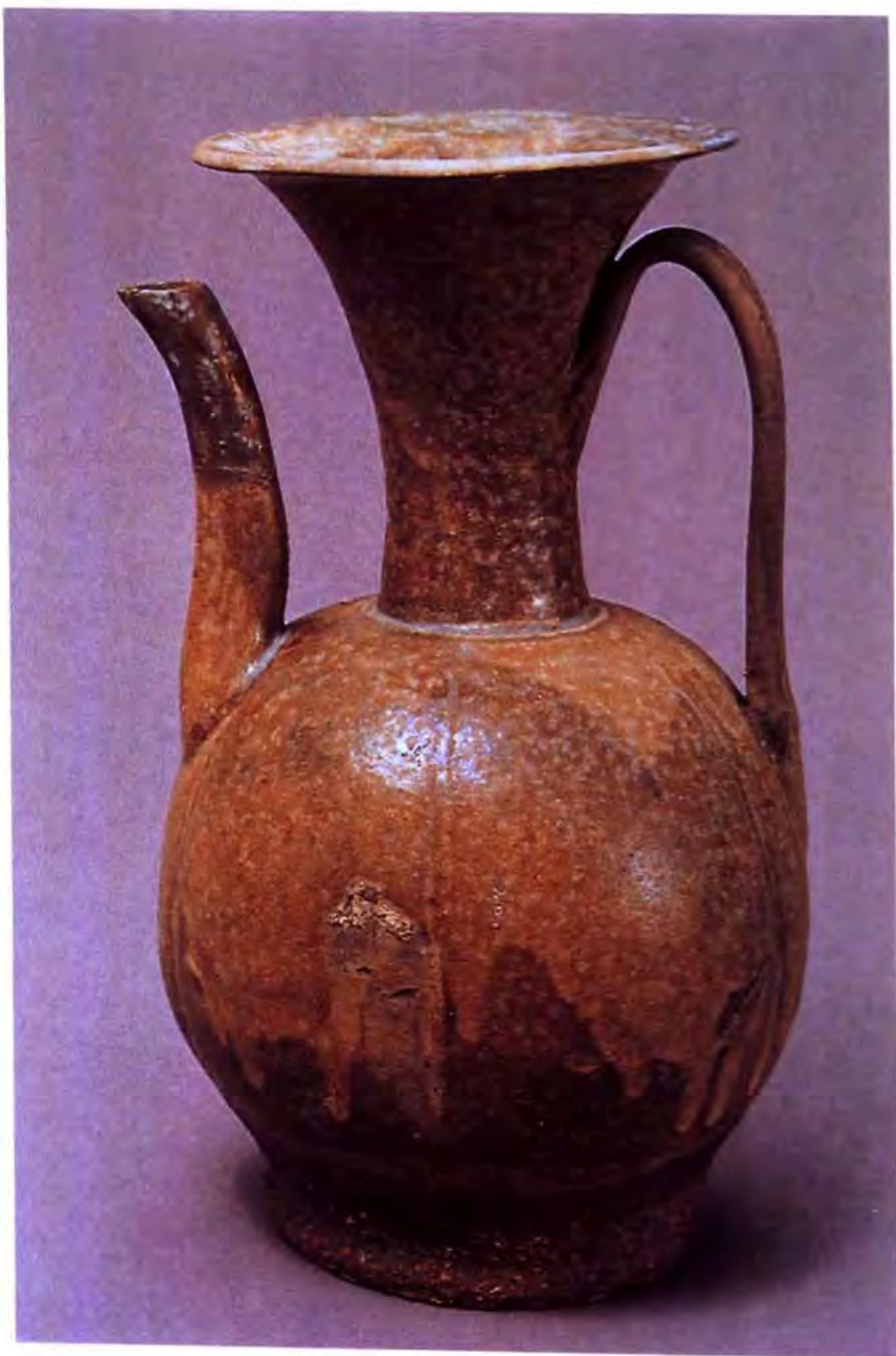
规格，但同时出土的700余件瓷器、木器，却令考古学者惊喜不已。鱼浦门是甬江、奉化江和余姚江三江汇合处，自古就是重要的水运码头，这条船应当是唐代的海上贸易船。一些瓷器上有“大中二年”款识，这是唐宣宗的年号，相当于公元848年。唐代向朝鲜半岛以及日本运销的瓷器之多更不在话下，日本福冈鸿胪馆遗址出土了许多八九世纪中国越州窑、长沙窑等的瓷器。

随着水下考古这项新兴的事业在中国的发展，通过对古代沉船的打捞，中国自唐代开始日益兴盛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已越来越明晰。瓷器与丝绸不同，沉重易损，大宗的瓷器贸易若靠传统的驼队陆路运输是难以想象的，把大量中国陶瓷普及到西方世界主要依靠的是海上交通。因此，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又被称为“陶瓷之路”。

## 第七节 异域风采

经由丝绸之路所产生的中西文化的相互撞击、融会，使唐代文化艺术洋溢着激动人心的夺目异彩。仅从几件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唐代文物，就可大略领略这种异域风情。

牙雕佛传造像是佛教徒随身携带念持用的龕像，它令中外佛教美术学者深感兴趣。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作品是用整块象牙雕成的，由两片对合，可开可合。合起来只有手掌大小，是一头圆雕大象，身驮一位怀抱舍利宝塔、衣着华丽的贵人。打开后，每面各分二十七格，一格一景，浮雕着佛祖从出生到涅槃的经历，即佛传故事。在世界各地现存的佛传雕刻品中，往往选择释迦牟尼生涯的重大场面，组成四相、五相、八相图；



而这件作品表现的场面多达五十余个，包含的人像、动物、车、塔等，总数近三百个，且局部施以彩绘，目点墨，唇涂朱，实在是一件匠心独具、十分难得的作品。造像中人物的面貌、姿态以及服饰，都充满了异域情调，说明它应该来自中亚，而大象脚踏的台座使用的壶门形式，却是采用汉文化的传统。这件牙雕佛传造像，据说是清嘉庆年间云游的喇嘛在甘肃榆林窟大佛殿内的积沙里挖出的，所以很可能是当年西域的佛教信徒或前往西域的唐人信徒带到内地的。

陕西西安沙坡村出土的鹿纹十二瓣银碗

青瓷水注

唐

日本福冈鸿胪馆遗址出土  
高20厘米，径13厘米





牙雕佛传造像

唐  
甘肃安西榆林窟发现  
高15.8厘米，厚7.5厘米

是一件食器，高4厘米，口径14.7厘米。它经锤击成型，碗壁锤出十二个起伏的U形瓣，内底中心刻画一只花角立鹿。古代中国喜欢用鹿作为吉祥装饰图案，因鹿与“禄”谐音，象征高官厚禄。但中国式的鹿角是“肉芝顶”，即平角形，和西方的鹿角多做花角形不同。此外，碗壁的U形装饰瓣和中亚、西亚6世纪银器的风格也很相似，所以这件银碗被学者认定是粟特人的制品。使用金银器皿

不是中国固有的风习，自5世纪以后，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金银器皿在上层社会日益流行，但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大多是由丝路输入的舶来品。这种情况到了唐代才有所改观。唐代开始大量制作金银器，但经历了由模仿西方到逐渐摆脱其影响走向中国化的进程。唐代金银器制作工艺主要取法西亚波斯萨珊、中亚粟特和罗马拜占廷，尤其与粟特关系更为密切。粟特是分布在中亚阿





姆河和锡尔河流域的古国，自汉朝以后与中国的经济、文化联系密切。唐代新疆、甘肃等地建有粟特人的东方聚落，生活在唐朝各地的粟特人很多。与鹿纹十二瓣银碗一起出土的还有一件环柄银杯，它的造型显然也是受到粟特带把杯的影响。

瑞兽葡萄纹铜镜又称海马葡萄镜、海兽葡萄镜等，流行于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并传播到日本。其主题纹饰由数个高浮雕瑞兽



鹿纹十二瓣银碗

唐

1963年陕西西安沙坡村窖藏出土

高4厘米，口径14.7厘米



环柄银杯

唐

1963年陕西西安沙坡村窖藏出土

高6.3厘米，口径7厘米



海兽葡萄纹铜镜

唐

1956年河南陕县出土  
直径21厘米



连珠鹿纹锦

唐

1966年新疆吐鲁番出土  
长19.5厘米，宽16.5厘米



和葡萄蔓枝叶及果实组成。瑞兽和葡萄组合寓意什么？它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如何？由于这耐人寻味的主题纹饰，日本学者称它为“多谜之镜”、“凝结了欧亚大陆文明之镜”。希腊、罗马、波斯等建筑装饰和器物上有禽兽葡萄纹，从史书记载看，葡萄这一物种是张骞出使西域后带回中原的，但葡萄图案的出现要更早些。在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出土过一件年代约在前800年至前500年的陶罐，上面绘有田园和葡萄叶蔓。汉唐时代的丝织品都有以葡萄做花纹图案的，葡萄还经常出现在唐人的诗句里。瑞兽纹饰在中国更有传统，四神十二生肖镜、四兽镜、六兽镜等在六朝末年就已流行。所以瑞兽葡萄镜应该是唐代工匠受丝绸之路传来的西方艺术的影响，把中国传统的瑞兽和葡萄两种纹



饰加以结合创作出来的富于神秘浪漫色彩的动人之作。这种瑞兽葡萄卷草纹样还被用在唐长安城大明宫的铺地方砖上。

丝织品和瓷器是中国的传统手工艺，唐朝一方面大量向西方输出产品和制造技术，同时也吸收中亚、西亚的某些造型和纹饰，使唐代手工艺出现令人耳目一新的面貌。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一件大联珠鹿纹锦，用二十个大联珠纹组成一个大圆圈，联珠纹圈内织出一只鹿，鹿略有变形夸张，身体肥硕而四腿很短，呈行走状，昂首挺胸，头上的大角锋利，身上装饰大圆点。联珠纹是唐代丝织品上常见的纹样，主要是受波斯萨珊王朝图案的影响而出现在西域和中原地区的。唐代丝织品一般喜用联珠将纹样分隔成各种花纹单元，如联珠内置猪头、鸾鸟、对禽、对兽和团花等。在唐代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中，吐蕃使者禄东赞拜见唐太宗时穿的衣服上便织有联珠纹图案。

初唐瓷器盛行“胡瓶”造型。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青瓷双螭耳尊，高60.8厘米，鼓腹，细颈，小口，双耳极富装饰效果，是这类作品的佳作。长沙窑的瓷器是唐代的主要出口品之一，日本、朝鲜、东南亚和西亚都有出土。出于对外来文化的喜好和迎合输入国的趣味，长沙窑的许多瓷器图案采用胡人乐舞、狮子和葡萄等带有异域色彩的图案。黄釉褐斑“何”字贴花瓷壶造型是中国式的，并在短流和两个系下各涂一块褐斑，上贴带有中国“何”字的模印花纹，但狮子和束叶葡萄纹却有一种异域情调。

唐代文物这种融合中西方文化艺术造型的异域风采，绵绵不断地影响着后世器物制作。



青瓷双螭耳尊

唐

高60.8厘米，口径12厘米，  
底径15.5厘米



黄釉褐斑“何”字贴花瓷壶

唐

高23.9厘米，口径10.5厘米



## 第八章

# 灿烂的唐代文化



### 第一节 文坛异彩

#### 一、千古唐诗

唐朝是诗的时代、诗的王国。唐诗是流传千古的中华文化瑰宝，是唐代文化最为辉煌的成就。

唐诗无论是数量之多、作者分布之广、题材之丰富、风格之多样、表现技巧之高超，还是在社会上的普及和受喜爱程度，都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流传至今的唐诗近五万首，作者达二千三百余人。这些作者中不仅有文人墨客，而且上至皇帝后妃、王公大臣，下至野老村夫、倡优婢女，以及僧尼道冠、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唐诗的题材涉及山川风物、人情事理、礼俗民风、政治历史、文化艺术等等，内容极为广博，几乎囊括了社会

生活的各个方面。体裁形式上，不仅上承前代的五言与七言古体诗臻于炉火纯青，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以及歌行体、新乐府等形式也都得到蓬勃发展，盛极一时。至于诗人创作技巧之高超、语言运用之绝妙，从流传至今的诸多名诗、名句中我们可以充分领略到。更值得注意的是，诗歌在唐代受到大众的普遍喜爱，在唐人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诗人白居易曾经讲到他在长安到江西三四千里的路途上，所经乡学、佛寺、旅舍、行船之中，常见题写他的诗句的，所遇士人、庶民、僧徒、孀妇、少女等等，每每有吟咏他的诗歌的，足见其时诗歌的流传、普及与各阶层人士对它的爱好。

唐诗前后经过了三百年发展历程，其间诗风变幻，流派纷呈。唐初，诗坛虽仍弥漫着南朝齐梁宫体诗的浮艳诗风，但是有些



诗人已有新的突破与贡献。如沈佺期、宋之问，他们的诗在语言锤炼、气势流畅上都与齐梁诗有所不同，为唐代律诗的发展成熟奠定了基础。初唐诗坛的代表人物要数“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南朝宫体诗的狭隘内容和华靡风格，开创了诗歌的新领域与新诗风。尽管他们的革新尚不成熟，但是，题材广阔、气韵生动的唐诗正是由他们的作品发端的。继四杰后，陈子昂是态度更鲜明的诗歌革新人物。他力倡“风雅寄兴”、“汉魏风骨”，主张以此优秀传统改革靡丽诗风。他的代表作《感遇诗》自然清新，气势雄浑，意境悠远，体现了全新的诗风。其名篇《登幽州台歌》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襟怀广阔，慷慨苍凉，震撼人心，为千古绝唱。他的诗被认为是初唐向盛唐诗歌转变的里程碑。

诗至盛唐，与整个社会发展同步，也进入了繁荣的巅峰时代。开天盛世，诗人灿若繁星，不朽之作频频涌现，并且形成了风格鲜明、成就卓著的山水田园诗和边塞诗等流派。除李白、杜甫这两大巨擘之外，还出现了许多名家及佳作，如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物王维、孟浩然，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等等。孟浩然的五言绝句“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妇孺皆知。王维的田园诗名声更著，他晚年隐居终南山，诗歌多描绘山中景致与隐居闲情，意境空灵清幽。如《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等等，都是田园诗的代表作。边塞诗在盛唐时代大放异彩，与当时的政治环境、边境形势与士人精神息息相关，诗歌多描写边疆大漠长河的壮丽风光

和士人建功报国的雄心壮志以及思乡思亲的真挚情感，多气势雄浑豪壮，情感慷慨悲凉。如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不仅是边塞诗的名篇，而且曾被推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之涣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也都是边塞诗的名句。

中唐以后，国势式微，但是诗歌成就仍然可观，涌现了一批杰出诗人。除李、杜之后最为著名的白居易外，还有元稹、刘禹锡、韩愈、孟郊、张籍等。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反映社会现实的新乐府诗异军突起，并形成了一场倡导诗歌改革的新乐府运动。这场运动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他们主张文章、诗歌应该为时代、为现实而作，并带头写作通俗易懂、反映时事的新乐府诗，从而使诗坛形成了一股强劲的现实主义潮流。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元稹的《乐府古题》十九首以及叙事诗《连昌宫词》等都是代表作。此外如李绅的《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等，也是



李白像



新乐府运动潮流中出现的杰作。

晚唐诗人最著名者是李贺、李商隐、杜牧，他们的诗各具特色，受到当世和后人的推崇与喜爱。李贺的诗想象丰富，诗句绮丽，充溢着浪漫主义色彩，被称为“长吉体”。“黑云压城城欲摧”、“天若有情天亦老”等名句流传至今，不断被人们称颂。李商隐开创的“无题诗”自成一体。无题诗意旨较为隐晦，词句多清丽工巧，情感婉转曲折，其中“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等成为吟咏爱情的千古名句。杜牧与李商隐齐名，号称晚唐“小李杜”。小杜的诗以七言绝句最胜，或咏史，或抒情，或写景，形象鲜明，风格清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霜叶红于二月花”等诗句口耳相传，几乎妇孺皆知。在他们之后，处于唐末乱世之中的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诗人，则继承了新乐府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他们的诗语言平易通俗，内容多反映唐末的民生疾苦，成为唐诗的最后篇章。

杜牧行书《张好好诗》(序)

此诗见于杜牧《樊川集》，由诗人自书，墨迹藏故宫博物院。



觅到他们的踪影。

### (一) 采石矶与诗仙李白

采石矶在今安徽马鞍山西南的翠螺山麓、长江东岸。此处峭壁耸立，水流湍急，山石峥嵘，松竹繁茂，自古就是文人骚客游赏之地。李白、沈括、陆游、文天祥等名人都曾到此游玩，留下了大量题咏诗句。

此处还有许多建筑古迹，其中最宏大、最著名的是太白楼。太白楼又称谪仙楼、太白祠、青莲祠，是后人为纪念李白而建造的。李白晚年寓居当涂，经常来此游览赋诗。此楼始建于唐元和年间，其后屡毁于兵火又屡次重建，一直保留至今。采石矶的峭壁上有一块突出的石台，传说李白于酒醉中，从此处跳入江中捉月而溺死，所以称“捉月台”。这当然只是后人的附会而已，但是也说明了李白受到的崇拜——人们觉得这位诗仙不应当死于寻常床榻，所以给他构筑了一个如同他的诗歌一样浪漫的结局。

离此不远有李白墓。唐上元三年(762年)，李白在当涂因病去世，始葬于龙山东麓。元和十二年(817年)，李白好友之子宣歙观察使范传正依据李白生前的意愿，将其迁葬于当涂青山西麓，为之建墓，并亲自撰写了墓碑，同时在墓旁建立了李白祠。

采石矶与李白墓千百年来成为人们纪念、凭吊这位伟大诗人的名胜之地。

唐诗是中国诗歌的巅峰，而李白正是站在巅峰之上的巨人。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生于西域碎叶(巴尔喀什湖以南、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的一个商人家庭，少年时随家人迁居蜀郡绵州昌明县青莲乡(今四川江油)。他生活在盛唐时期，胸怀大志，又才华横溢。从二十五岁起，他便满怀理想漫游四方，虽然一直没有得到机遇施



展政治抱负，但是写下了许多流传后世的诗歌。由于诗才名传遐迩，天宝元年（742）他四十二岁时，被唐玄宗征召到长安，做了翰林学士。但是正如他在诗中表达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孤高狂放的性格使得他在朝廷无法容身，所以只住了三年便离开长安，重新开始了漂泊生活。

安史之乱爆发后，已经五十多岁的李白怀着建功立业之心，投入永王李璘的军队参加平叛。但是刚刚即位的唐肃宗害怕永王割据东南争夺帝位，故将之视为叛逆，进行诛讨。李白受到牵连，被判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行至半路被赦免。此后，李白意气消磨，六十二岁时病死于安徽当涂。

李白的理想绝不是当一世的游吟诗人，他像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士人一样，希望能辅佐君王治国安邦，“谈笑为君静胡沙”。但是历史捉弄了他，他的性格也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一个政治家。他一生壮志未酬，仕途坎坷。然而，这种经历却将他造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诗人。

李白素来被称为浪漫主义诗人。他才华横溢，情感奔放，诗句直抒胸臆，喷涌而出，清新自然，全无雕琢，而且气势夺人，恣肆豪放，千年以来无人可与比肩，所以被尊为“诗仙”、“谪仙”。他的许多名诗、名句脍炙人口，千古传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些诗句，稍有文化的中国人几乎无人不知，也必将永远受到人们的喜爱。

## （二）杜甫草堂与诗圣

杜甫草堂位于成都，是后人为纪念诗人杜甫建造的一处园林。园中花径蓬门，曲桥荷池，幽深而清雅。园内建有杜甫的纪念祠堂。杜甫在唐乾元二年（759）以后曾暂居成

都，在浣花溪畔建造了房屋，住了三年有余，度过了一段较为平静的生活，在此写下了二百余首诗歌。草堂其实是仿造杜甫的草房而建的。原先的草房至唐末五代时就已不存，五代诗人韦庄等为了纪念杜甫，特地在旧址建造了茅屋，北宋又增建了祠堂，后经历代扩建，成了如今的规模。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与诗仙李白同站在唐诗巅峰上的是杜甫。他与李白是同时代人，后世常常“李杜”并称。

杜甫（712—770），字子美，因为曾经做过工部员外郎，人称“杜工部”。他是河南巩义南瑶湾村人。村中有座酷似笔架的山峰，称为笔架山。山下现今还保留着一座清静朴素的小院，据称是杜甫的故里。大门旁的墙上嵌有清代河南知府张汉所立石碑，上面镌刻着楷书字体的“诗圣故里”。杜甫生于斯也葬于斯，现今康家店邱山岭上杜甫墓尚存，墓前还有清代地方官所立两通石碑。

杜甫出身于没落世族之家，青年时代也曾外出漫游，寻求报国机遇，并创作诗歌。他也有“致君尧舜上”的治国大志，可惜与李白一样，终生未能实现抱负，只做了几任小



杜甫像



官。寓居长安时，他一直过着“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失意、困顿生活。后来经历“安史之乱”，杜甫四处逃亡，饱受饥寒交迫、颠沛流离之苦。战乱过后，他仍然贫困潦倒，漂泊为生。大历五年（770），这位伟大的诗人贫病交加，死于岳州附近的客船上。

杜甫一生饱经忧患，尤其是亲身经历“安史之乱”的大灾难，亲眼目睹民间百姓水深火热的苦难；他关注社会，忧国忧民，对于贫富悬殊的现实、百姓的深重灾难、豪门权贵的奢侈淫逸，内心充满忧患与愤懑不平。他的诗歌内容大部分都是描写现实生活，反映民间疾苦、抨击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其名篇如《兵车行》、“三吏”、“三别”等，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百姓担负沉重的兵役、徭役，“子孙阵亡尽”，“有吏夜捉人”，痛苦呻吟于水火之中的惨境。

杜甫的诗流传至今的有一千四百多首，几乎可以构筑一部中唐时期的社会史。所以

成都杜甫草堂



杜诗被誉为“诗史”，杜甫也被尊为“诗圣”。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句，便足以令他千古不朽。

### （三）名篇与名胜

滕王阁、黄鹤楼、寒山寺——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胜，它们驰名天下并不仅是凭借风光的秀美、建筑的宏丽，更多的是因为吟咏它们的唐人诗赋流传千古。

滕王阁位于江西南昌赣江边上，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653）至显庆四年（659）之间，是唐太宗的弟弟、滕王李元婴在洪州（治所在今南昌）任职时所建，以其封号命名为滕王阁。滕王阁素有“江西第一楼”之誉，与湖南岳阳楼、湖北黄鹤楼并称江南三大名楼。

唐上元二年（675）九月九日，滕王阁重修竣工。洪州官吏在此大宴宾客，席间年轻的王勃撰成《滕王阁序》，成为千古传颂的名篇。其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联，描绘出一幅美不胜收的图画，更是受到人们的激赏。从此，滕王阁随着王勃的名篇而名声大噪。

王勃并非以《滕王阁序》美文成名，他更重要的成就是诗歌。他是唐初诗坛“四杰”之一，在突破南朝华靡诗风、开创盛唐诗歌新风上功绩卓著。他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也是尽人皆知的名句，如今人们赞颂友谊时还经常引用它。可惜天妒英才，这位才华超群的诗人年仅二十八岁便溺水而亡。

黄鹤楼在今武汉蛇山西端山巅，相传始建于三国时期，唐朝时仍然巍然屹立。楼阁峥嵘飘渺，望之似仙宫，传说许多神仙都是在此驾鹤升天。历代许多名人到此游赏题诗，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唐人崔颢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



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传说此诗一出，连诗仙李白登楼都不敢再题诗，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吟诵着这首诗登楼赏景，更不知有多少人吟诵着它抒发不胜古今的情怀。

寒山寺在苏州阊门外枫桥镇。枫桥始建于唐代，后被毁，今日的石桥是清末建造。枫桥南面不远便是寒山寺。寺建于梁天监年间，相传唐朝贞观年间高僧寒山、拾得在此住持，遂更名为寒山寺。唐朝诗人张继路过此地，写下了《枫桥夜泊》一诗：“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诗传扬天下，引得南北过客不断来此游玩题咏，于是普通石桥、寻常佛寺成了天下名胜。寺院历经沧桑，张继诗原先有明代文徵明所书石碑，字迹已残缺模糊，至清末又由俞樾再次书写重刻。诗中所咏古钟早已失传，清代光绪年间，寺院重修时仿照旧钟式样又新铸了一口大钟。如今，许多海内外游人专程到此游赏，希望能体味一下当年诗人愁眠客船、夜半闻钟的感受。

#### （四）白堤与白居易

杭州西湖上有一条长堤，从孤山通向断桥，原名白沙堤，为了纪念唐朝诗人白居易对杭州水利的贡献，人们将它改称为“白堤”。原来，唐朝后期长庆年间，时任杭州刺史白居易为了兴修水利、造福一方，在西湖上增筑了堤坝，竣工后还作了一篇《钱塘湖石记》，将管理湖水的办法刻在石上。不过，实际上白堤并不是白居易修建的堤坝，而是当年白居易经常游赏的地方。

李、杜之后，白居易在中晚唐诗坛又竖起了一座丰碑。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曾担任太子少傅，人称白香山、白



白居易像

太傅。他生活在中唐时代，与好友元稹合称“元白”。元稹，字微之，也是当时名满天下的诗人。

白居易自幼才华出众，十几岁时就写出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名句。二十九岁时，他考中进士，其后入朝为官。中唐朝廷政治斗争形势险恶，白居易一度因直言获罪，被贬为江州司马，唐宪宗元和末年以后得到升迁，担任显官。为避开政治旋涡，他请求外调，先后任杭州、苏州刺史，治理地方，取得了一定政绩。晚年退居洛阳香山，信奉佛教，自号“居士”，吟咏不辍。七十五岁时，白居易去世。如今洛阳龙门东岸香山还有白少傅墓可以凭吊。

白居易主张文章、诗歌应该为时代、为现实而作，他与同时的元稹、刘禹锡等文坛领袖都提倡并带头创作通俗易懂、反映时事的新乐府诗，从而引发了一场诗歌改革的新乐府运动。白居易终生致力于创作，留下了三千多首诗。他的诗继承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尤其著名的是以《秦中吟》、《新乐府》为



代表的讽谕诗。其中有许多讽刺现实、抨击权贵、揭露横征暴敛、反映民间疾苦的名作，如《卖炭翁》、《观刈麦》、《杜陵叟》等。“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牙锯齿食人肉！”“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做地衣！”这些诗句已经成为人们了解中晚唐社会矛盾的最鲜明生动的历史记载。除了这些反映现实的诗歌外，白居易写情也堪称圣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至今读来仍然动人心魄。

白居易的诗风最鲜明的特点是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有民歌韵味，因而受到各阶层、各民族人士的普遍喜爱。在新疆若羌县曾发现唐朝回纥诗人坎曼尔抄录的《卖炭翁》，朝鲜、日本等国家也争相传抄白居易的诗，可见白诗流传之广和喜好者之众。

#### （五）薛涛与薛涛笺

成都望江楼号称天府蜀都四大名胜之一，园内绿竹茂密，曲径通幽，极为雅致。这一名园是为纪念唐朝女诗人薛涛而建，遍植绿竹也是因为薛涛平生爱竹。园中还有清代建筑的濯锦楼、崇丽阁、吟诗楼等楼台亭阁，以及薛涛井与薛涛墓，均是后人为凭吊这位才女而建造的。

与望江楼同样驰名的是“薛涛笺”。这是一种浅红色小幅纸张。传说薛涛喜欢写小诗，嫌纸张篇幅太大，所以创制了这种小幅彩纸，专用来写诗以赠送友人。后来蜀中的文人觉得这种纸用起来很方便，纷纷仿效，并把这种纸起名为“薛涛笺”。薛涛制笺成为一段诗坛佳话，薛涛笺也风行蜀地，并成为一种地方特产，宋代以后历代均有仿制。如今真品已经无存，但是从四川夹江造纸博物馆中陈列的染色古纸上还能依稀想见薛涛笺的面目。

唐朝是一个诗的国度，产生了许多才华不让须眉的女诗人，薛涛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和代表人物。

薛涛，字洪度，生活在中唐时代。她原本是长安宦门之女，因父亲做官移居蜀中。薛涛自幼聪慧绝伦，才思敏捷，十几岁时，诗名已经传扬于外。父亲去世后，她孤苦无依。当时的西川节度使韦皋闻其诗名，召她来陪酒吟诗，于是落入乐籍，成为蜀中有名的诗妓。她与当时的才子名士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牛僧孺等都有交往与诗词唱和。韦皋还曾经奏请授予她校书郎的官称，虽然事情未果，但是“校书”的美名却流传了下来，竟成为后世娼妓的雅称。元稹曾赞美她“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王建更赞赏这位“万里桥边女校书”，“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

薛涛诗最负盛名的是她的《春望词》。诗中道：“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若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风花日将老，佳期犹渺渺。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春望词》不仅展现了她出众的诗才，也透露了她身世的不幸和内心的孤凄、悲凉。

薛涛晚年隐居于成都浣花溪畔。当时蜀中造纸业很发达，蜀纸运销各地，浣花溪一带是造纸作坊集中之地。传说她不仅在这里创制了薛涛笺，还曾亲自参与过造纸工作。薛涛去世后就葬于今日望江楼附近，这里因此成为后人凭吊这位盖世才女的名胜之地。

#### （六）敦煌写本王梵志诗

唐诗流传下来的有数万首，湮没无闻的自然更多。有幸的是，20世纪在敦煌遗书中发现了一些当时人手抄的唐诗写本，使得一些失传千年的唐诗重见天日。这其中最有价值的是王梵志的诗。

王梵志不是名人，史籍中关于他的记载



不多，只知道他大约是盛唐开元以前人，生活年代应该在唐朝前期。他的诗是在敦煌遗书中发现了他的二十八首诗的手抄本以后，才引起人们的关注。据目前统计，王氏诗作有三十个卷子、数百首诗。

王梵志的诗全是五言，词句通俗，质朴无华，很像民歌；内容多是描写民间贫家、富户以及府兵、僧道等的真实生活，讥讽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劝诫世人，生活气息十分浓厚。他的《贫穷田舍汉》详细描画了贫穷农民饥寒交迫的生活：“贫穷田舍汉，巷子极孤凄。两穷前生种，今世做夫妻。妇即客春棒，夫即客扶犁。黄昏到家里，无米复无柴。男女空饿肚，状似一食斋。里正迫庸调，村头共相催。幞头巾子露，衫破肚皮开。体上无裤袴，足下复无鞋。……门前见债主，入户见贫妻。舍漏儿啼哭，重重逢苦灾。”《富饶田舍儿》则描述了富足人家的生活和以钱打通官府的现象：“富饶田舍儿，论情实好事。广种如屯田，宅舍青烟起。槽上饲肥马，仍更买奴隶。牛羊共成群，满圈豢豚子。窖内多埋谷，寻常愿米贵。里正迫役来，坐着南厅里。广设好饮食，多酒劝且醉。追车即与车，须马即与使。须钱便与钱，和市亦不避。索面驴驮送，续后更有雉。官人应须物，当家皆具备。……纵有重差科，有钱不怕你。”诗将当时社会的贫富悬殊描写得淋漓尽致。

从现有的诗作看，可以说，王梵志的诗艺术价值远不如历史价值，与其当作艺术作品欣赏，倒不如当作社会生活的真实画卷看待更为宝贵。

## 二、华章流韵

### （一）韩柳两大家与古文运动

论一代文豪，古来素有“唐宋八大家”之



韩愈像

说。唐代两大家，即韩愈与柳宗元。

韩愈（768—824），字退之。因原籍为昌黎郡（今河北昌黎），又称韩昌黎。他是中唐人，不仅是散文家、诗人，而且是思想家。他做过国子博士、国子祭酒（最高学府国子监的长官），在文坛享有盛誉。他主张文章应该“言之有物”，去除陈词滥调，其文章情感真挚，气势充沛，见解精辟。他因上书极言反对唐宪宗迎佛骨，被贬到边远的潮州（今广东潮州）做刺史。北宋时期，为了纪念这位文坛领袖，人们在潮州城东笔架山麓建立了韩文公祠，此后经过历代重修保留至今。祠中有多块石刻碑记，最著名的是宋代苏轼撰写的《潮州韩文公庙碑》，文中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这成了后世评价韩愈的名言。韩愈的作品有《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存世。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人称柳河东。他与韩愈同时，也是散文大家和思想家。他的文章内容触及政治黑暗与社会现实，语言鲜明生动，尤其



是寓言，短小而寓含讽刺意义，其中《黔之驴》的故事后世家喻户晓。他也善于写景，刻画入微，情景交融，感人至深。他的思想具有进步性，他著文反对“天命”等神学观点，并谴责贪官污吏，揭露政治黑暗。《捕蛇者说》等都是尖锐揭露现实、文字犀利生动的名篇。柳宗元因为参加了唐顺宗时期的政治改革运动，失败后被贬到永州（今湖南永州），后又调为柳州刺史。他死于柳州后，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为他建立了一座庙，南宋时改为柳侯祠，如今这里已修成公园。祠内有著名的“荔子碑”，文章是韩愈为祭奠柳宗元而撰，由苏轼书写，三大名家集于一碑，人称“韩诗苏书柳事碑”。祠堂附近还有柳宗元的衣冠冢。柳宗元有《河东先生集》四十五卷传世。

韩、柳二人虽然政治主张、思想倾向不同，但是在推动文学改革运动上观点、行动一致。由他们倡导的这次文体改革运动被称为“古文运动”，主旨是废弃南朝齐梁以来只讲究形式而内容空洞的骈体文和虚浮文风，

提倡恢复秦汉以前言之有物、情感真实的古文文体；主张“文以载道”，即以文章阐明思想、承载大义。所以这场运动号称“复古”，其实是革新。韩、柳两位大家是这场文学改革运动的领袖，在历史上一直并称“韩柳”。

## （二）传奇·变文·曲子词

唐代的文学园地除了唐诗以外，还盛开着一朵奇葩——传奇，即早期的小说。因为其中一部作品名为“传奇”，后世就将同类作品称为“传奇”。

唐朝以前，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尚未成形，只是笔记一类作品中记载了一些片段的轶事、传说，作者并没有刻意去创作，所以没有出现比较完整的作品。到了唐代，由于城市日益繁荣，社会生活也丰富复杂起来，市井说唱类文艺形式开始流行，给小说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同时社会禁锢较少，文人思想比较自由，他们开始了有意识的创作。于是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流行起来，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其中名篇有《柳毅传》、《莺莺传》、《红线传》、《霍小玉传》、《李娃传》、《枕中记》以及《玄怪录》等。这些作品或描写男女冲破礼教、争取爱情的故事，或描绘一些神怪灵异故事，大多情节曲折，语言生动。后世许多戏曲、小说都取材于这些传奇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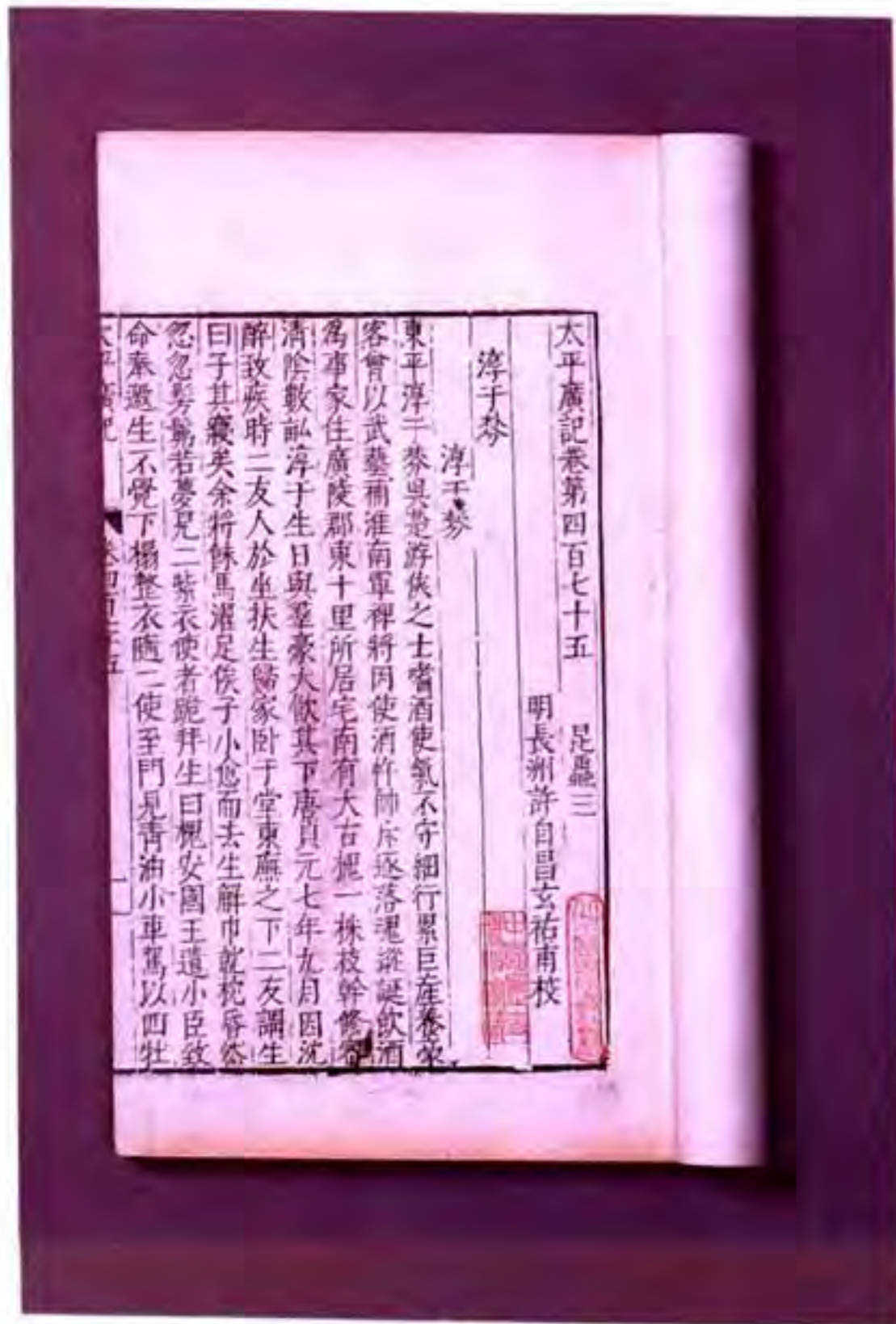
唐代传奇虽然篇幅较短，内容也比较简单，作为小说显得还不成熟，但它开创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先河，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可低估。

除了流传于世的文学作品外，敦煌石窟中还发现了大量的唐代民间通俗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因为流传于下层民间，属于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所以传世的不多。敦煌发现的这些作品给唐代的文学宝库增添了一些极为难得的藏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中国古典文学史。

### 《淳于棼》明刊本

唐 李公佐著

又名《南柯太守传》，是唐代传奇的代表作品之一。





这其中最主要的是变文和曲子词。

变文是一种以讲解佛经为主的说唱文学，有点像今日的弹词、鼓书一类艺术形式。唐朝佛寺和街头巷尾常常有人讲唱变文，宣传佛教教义，也有的讲唱一些民间故事，教化百姓。由于通俗易懂，故事性又强，变文很受民间百姓欢迎。敦煌发现的变文作品有王昭君、伍子胥等历史故事，有孟姜女等民间传说，还有大量宣传佛祖修道、佛法战胜邪恶的故事。它是后世民间说唱文学如宋元话本、明清鼓词等的滥觞。

曲子词是由无名作者创作的流传于民间一种歌词，与诗不同，它的句子长短不一，更富韵律，便于歌唱。敦煌发现的曲子词语言质朴自然，内容非常丰富，多描写民间生活，比如《女人百岁篇》、《丈夫百岁篇》写普通男女一生的经历，真实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人们认为它是五代以后兴起的文人词的雏形。唐朝中期以后，已经有文人开始了词的创作，如张志和、刘禹锡、韦应物等，都有优秀作品流传于世。其中作品最多、影响最大的是温庭筠，他的词多写闺中女子情态，词采华美，工于雕琢，开五代花间词之先风。敦煌曲子词则填补了以往民间词作品的空白。到五代与宋，词这种文学形式大大兴盛起来，文人趋之若鹜，形成了蔚为大观、与唐诗齐名的宋词。

## 第二节 艺苑群芳

### 一、翰墨风骨

唐朝是中国古代书法发展的鼎盛阶段，尤其是楷书发展的巅峰。千余年来，楷书书体不出唐人规矩、风范，至今人们所临摹、学



《莺莺传》明刊本

唐 元稹著

《莺莺传》是唐代传奇小说成熟期的作品。

习的仍然是唐代颜、柳、欧等楷书大家的作品。

#### (一) 楷书之巅峰：欧体、颜筋、柳骨

走进西安的碑林，我们不仅可以从林立的碑刻内容中了解历史，更可以欣赏到唐代书法名家们的宝贵真迹。后世尊奉的楷书之祖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的真迹在这里都

《九成宫醴泉铭》(拓本)

唐 欧阳询书

原碑现存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





## 《颜氏家庙碑》

唐 颜真卿书  
藏于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



## 《玄秘塔碑》(拓本)

唐 柳公权书  
原碑现存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

可以见到。

唐代书法大家辈出，超越了任何一个朝代。皇帝也都喜欢书法，唐太宗将前代书法



大家王羲之的名作《兰亭序》作为殉葬品，可见对于书法爱好之深。唐初书法主要是继承晋代王羲之、王献之的书体，书法名家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其中欧阳询影响最大，后世称为“欧体”。他的字骨格劲峭，法度严整，代表作有《九成宫醴泉铭》等。

开一代书法新风的是颜真卿（708—784）。他是盛唐时人，为人忠贞耿直，历经唐玄宗到唐德宗四朝，做过监察御史、尚书、刺史、御史大夫等高官。安史之乱中，他任平原太守，坚守城池抗击叛军，立下战功，被封为鲁郡公，后人因此称其为颜鲁公。安史之乱后，在朝廷与藩镇的战争中，他受命安抚藩镇叛军而被扣押，于威逼利诱下，誓死不屈，被叛军杀害。他字如其人，端庄方正，气势雄浑，形体敦厚，称为“颜体”。南宋诗人陆游诗中曾说：“学书当学颜。”后世颜体影响巨大，被视为楷书正宗。他的传世作品很多，有七十多种，以《多宝塔碑》、《麻姑仙坛记》等最负盛名。

与颜体差可比肩的是“柳体”，它的开创者是柳公权（778—865）。柳公权是唐中期人，稍晚于颜氏，曾任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太子少师等官职，刚直敢言。他曾学习颜真卿、欧阳询的书法，但汇合各家，自成一派。他的字疏朗严谨，骨格劲挺，号称“柳体”。当时官贵之家竞相请他为亡人书写碑志，若不由他书写，子孙会被认为不孝，可见柳字在当时的名气。他的名作有《玄秘塔碑》等。

颜真卿与柳公权并称“颜柳”，有人根据他们字体的特点，评其为“颜筋柳骨”。时至今日，他们的书体仍是习书法者必须首先学习、临摹的经典。

## （二）草书圣手：颠张醉素

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描绘的醉仙中有



一位书法家：“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这位潇洒、放纵的书法家即张旭。张旭是盛唐时人。他的草书最为著名，故被誉为“草圣”。据说他醉后下笔尤为奇特，被列为神品。其传世真迹有《古诗四帖》，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另一位同是醉仙的书法家是僧人怀素（约725—785）。他也善草书，传说他曾因为家贫无纸可书而种植万余株芭蕉，用芭蕉叶练习书法。他同样嗜酒，醉后喜作狂草。他的传世真迹较多，有《食鱼帖》等等。

怀素与张旭齐名，二人同样好酒而善草书，所以并称“颠张醉素”。

唐朝书法不仅流传后世，而且影响及于国外。自唐以来，日本、朝鲜不少人士到中国学习书法，并且搜求颜、柳、欧等大家的书迹，作为学书楷模和宝物收藏。

## 二、丹青霞彩

唐代绘画名家辈出，丹青作品气象万千，是中国绘画史上璀璨的一页。今天我们仍能从传世或临摹的《步辇图》、《虢国夫人游春图》、《簪花仕女图》、《五牛图》等名画以及墓葬、石窟的壁画中领略唐代画苑的繁花似锦气象。

### （一）阎立本与历代帝王图

阎立德、阎立本兄弟是唐初著名画家，最善画人物故事。

阎立德（？—656）不仅擅长书画，而且曾为朝廷设计冠服、车舆、伞扇、陵墓等，是位工艺美术家。

阎立本（？—673）是唐太宗的近臣，朝廷高官，他的画享有盛誉，很受唐太宗欣赏。他善画人物、车马、楼观、佛道等。由于特殊的地位与环境，他创作了不少唐太宗与大臣们的画像，有《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



阁功臣像》等。流传下来的有著名的《步辇图》、《历代帝王图》、《萧翼赚兰亭图》等。《步辇图》描绘了唐太宗接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派遣的和亲使臣禄东赞的场面，不仅画出了唐太宗作为“天可汗”的威严，而且记录了汉藏两族友好往来的历史事实。此画既是艺术珍品，又是宝贵的历史资料，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历代帝王图》画了汉昭帝到隋炀帝共十三位帝王，人物形象个性鲜明，与历史记载相合，并寓含褒贬之意，极有价值。原画被劫到美国，现存波士顿博物馆。

### （二）画圣吴道子

唐代最杰出的画家是盛唐时期的吴道子（约685—758）。他自幼孤贫，以画工为业，二十多岁时就已声名鹊起。唐玄宗闻其名声，把他召进宫做了宫廷画师。

吴道子一生作画很多，是罕见的多产画家。他最擅长佛道画，长安、洛阳两京的寺观里他画的壁画据说有三百多面。他在长安寺观画壁画时，观者如堵，甚至为之惊呼喧哗。他画的人物、佛像、神鬼、山水、台殿、

白瓷砚

唐

1957年河南陕县出土

高7.2厘米，径14.8厘米



草木皆为当朝之冠。吴道子的成就还在于他在画法上有所创新。他吸取西域画家的凹凸法,并有所发展变化,使得其画作栩栩如生,富有立体感。据说他绘制的壁画上的龙在天阴下雨时,鳞甲飞动,如同活了一样。他画的人物尤其生动,衣带飘飘,如同被风吹拂,留下了“吴带当风”的美名。他抛弃传统的工笔画法,采用线条粗细不同的疏笔画法,开创了后世水墨山水的画风。传说他曾遵唐玄宗之命描绘嘉陵江风光,他去漫游了一趟,回来后只用一天便在大同殿壁上将三百里山水全部勾勒出来。

由于他的成就和创新,吴道子被后世尊为古今独步的“画圣”,他的艺术风格也被称作“吴家样”。可惜他的画没有真迹流传下来,只有后人的摹本。日本大阪美术馆藏《送子天王图》传为吴道子真迹,但多半可能是摹本。

### (三) 画中有诗的王维

唐代的山水画有两种风格、两个画派。一派是唐朝宗室李思训、李昭道父子所创的

金碧山水画派。李思训有战功,被封为大将军,所以人称“李将军山水”。他们的山水画工细华丽,设色精妙,金碧交映,所以称为“金碧山水”。李思训的传世作品有《江帆楼阁图》、《明皇幸蜀图》等,前者尤其著名。

另一画派是以王维为代表的水墨山水画派,对后世影响极大。王维(699—761)不仅是盛唐著名诗人,同时还是卓有成就的书画家。他崇信佛教,后半生隐居田园,最喜画水墨山水。他笔下的山水宁静、空灵、淡远,表现了崇尚虚无的人生境界。苏轼评价他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后世对他推崇备至,奉为水墨画始祖,他的画被列入神品。传世的作品有《辋川图》、《雪溪图》等。

泼墨山水是唐朝出现的一种独特画法,以王洽为代表。王洽性格狂放,往往酒后将墨泼于纸上,用手脚肆意涂抹,自成山水。这种画法由于浪漫不拘而受到人们的喜爱,被后人继承,形成了一个画派。

### (四) 张萱与周昉的仕女图

仕女画在唐代画苑中绽放异彩,特别引

《虢国夫人游春图》(摹本)

唐 张萱绘







人瞩目,《簪花仕女图》、《虢国夫人游春图》等驰名后世,成为古代仕女画的代表作。唐代仕女画的划时代成就在于题材上突破了前朝贞女烈妇的狭窄范围,注重表现贵族妇女的日常生活,富于生活情趣。画中的仕女形象多浓妆艳抹,锦衣华服,画面浓艳华丽,不仅令人赏心悦目,而且真实反映了唐代贵族妇女的生活场景和衣饰风俗。

仕女画成就最著者是盛唐张萱和中唐周昉。

张萱是唐玄宗时的宫廷画师,他画鞍马、屏障、宫苑都很出色,最擅仕女画。他的真迹已不传,幸好有宋徽宗摹写的《虢国夫人游春图》(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捣练图》(现藏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流传于世,使我们得以领略他的风格与成就。前一幅画描绘的是杨贵妃的姐妹虢国夫人等一行人骑马游春的情景,画面生动,不仅表现出杨氏姐妹的显赫与骄纵,而且也是唐代贵族妇女生活风俗的写照。后一幅画描绘了宫廷妇女从事捣练、理线、熨平等工序的劳动场景,充满生活气息。

周昉开始学画时模仿张萱的风格,其后自成一家。他所画仕女颇有风姿,不仅表现了唐代的丰腴之美,而且注重人物神情的描

绘。宋人将他与吴道子等并称为人物画四大家。他的作品流传于世的有《纨扇仕女图》(现藏故宫博物院)、《调琴啜茗图》等,表现的都是宫廷妇女雍容华贵的形象、富贵悠闲的生活。由于时代的变化,他画的仕女形象更为华美,但是似缺乏张萱画中妇女形象的生气。

唐代仕女画代表作《簪花仕女图》(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相传也是周昉的作品。此画笔法细腻,设色浓艳。但也有专家认为应是一幅揭裱下来的屏风画,是无名画匠的优秀作品。

#### (五) 韩马戴牛

唐人尚武好骑射,有爱马的风俗。画马之风也很盛行,许多画家喜爱、擅长画马,名家有韩幹、曹霸等。

韩幹是盛唐时人,他画马重视写生,特点是一改往昔重视画骨的传统,画肉而不画骨,且善于表现马的动态美。唐玄宗时韩幹被召入皇宫,曾画过西域进献的玉花骢、照夜白等名马。他有许多以马为题材的画,如《照夜白》、《牧马图》、《战马图》、《八骏图》等。后代许多画马名家都继承了他的画风。传世作品有《照夜白》(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牧马图》等。

《簪花仕女图》(摹本)

唐 周昉绘





《五牛图》

唐 韩滉绘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画牛也有名家。唐德宗时期的宰相韩滉最善画牛。著名的《五牛图》（现藏故宫博物院）是他的代表作。五牛形态各异，神态自然，富有生活气息。而韩滉属下的一位官员戴嵩也善画牛，他画的牛野性毕露、筋骨遒劲，有人认为远胜韩滉，其存世作品有《斗牛图》。

韩幹画的马与戴嵩画的牛都被认为是极

品，可相媲美，所以有“韩马戴牛”之称。

#### （六）壁画珍品

壁画是唐朝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敦煌等地石窟中保留了一些唐代壁画外，更可贵的是在已经开掘的唐朝墓葬中发现了不少既有历史价值又有艺术价值的壁画作品。

敦煌现存唐窟二百余个，其中有大量壁画。题材虽然都是佛教内容，刻画的多是西

《观鸟捕蝉图》（壁画，摹本）

唐

1971年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出土







方极乐世界的场景，但实际上优美的山水风光、富丽的楼台殿阁、欢快的歌舞场面都是唐人世俗生活的写照。唐代壁画刻画的佛教内容被认为比前代更加世俗化，充满人情味，从这些画面中人们不仅可以了解唐代社会生活、文化娱乐、民风习俗等各个方面，而且可以欣赏到那些唐代无名画匠的艺术成就。

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乾陵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等墓葬中的大型壁画。这些壁画规模之宏大、色彩之艳丽、人物形象之传神、生活气息之浓郁，使人无不惊叹。永泰公主墓的壁画共有五十多幅，有的已剥落，壁画题材多是侍女与仕女。墓室东侧高大的《侍女图》最为引人注目。两组侍女各持拂尘、如意、扇子、烛台等器物，在一位袒胸侍女带领下前行，她们身材丰满修长，衣着富丽，裙带飘飘，神态生动，呼之欲出，如同生前随侍公主一般。

章怀太子墓壁画内容更为丰富，表现了唐代宫廷的仪仗、来使、打球、出行等诸多场景。墓道东壁所绘《客使图》，画面上共六人，其中三人形象、衣饰可以明显看出是胡人，表现了少数民族使者前来吊唁墓主的情景。西壁所绘《打马球图》，画面上有二十多个打球者，他们执缰持杖，纵马驰骋，生动

地再现了唐代贵族男子打马球的风俗。《观鸟捕蝉图》描绘的是三位仕女仰观飞鸟、捕捉鸣蝉的生活图景。此外，懿德太子墓和昭陵的长乐公主墓等墓葬中也有许多壁画。

这些地下的唐代绘画珍品真实地显现了大唐雄风，并且为中国美术史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侍女壁画

唐

1953年陕西咸阳底张湾出土



《阴线石雕侍女画》(拓片)

唐  
1961年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  
出土



### 三、鬼斧神工

#### (一) 唐陵石刻

唐代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陵墓雕塑是最为集中的体现。分布在渭

北高原上的诸多唐代陵墓，地上有护卫墓主的石人石兽，地下有代替活人殉葬的陶俑，堪称一座座大型雕塑艺术馆。

唐太宗的“昭陵六骏”是古代陵墓雕刻艺术中的一组经典之作，也是塑造战马最出色的雕刻艺术品。唐太宗为了纪念随同自己平定天下立下卓越战功的六匹坐骑——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特勒骠、青骊、什伐赤，命令画家阎立本和工匠将六骏形象刻于石上，制成石屏，并亲撰赞词，由书法家欧阳询书写，置于昭陵北阙下。20世纪初，飒露紫、拳毛騧被盗往美国，另外四骏虽被割裂，但幸得留存国内，现陈列于陕西省博物馆。六骏中的飒露紫在战斗中被敌箭射中，随从的武士丘行恭冒着战火下马为其拔箭，石刻像刻画了丘行恭为其拔箭的形象。战马肌肉紧绷，昂然挺立，马头贴近丘的头部，既刻画出战马的坚强，又体现出马与人的情谊，被认为是六骏中刻画最精彩的一匹。其

顺陵狮子

位于陕西咸阳





他几匹都呈昂首竖鬃、四蹄翻飞、迅疾奔驰状，如同正在冲锋陷阵一般。六骏的形象生动地表现出了战马的雄健与勇猛。

乾陵御道旁的石狮也是石雕艺术精品，它有3米多高，形体壮硕，线条粗犷，形象凶猛威严。另有十对石人作为侍卫者列侍于陵前。他们身形魁梧，高达4米，面容庄重，手执长剑。巨大的石狮与石人共同护卫着帝陵，烘托出了大唐帝国君主的威严气势。乾陵还有六十一座宾王像，可惜都没有了头部，但从身体还可以看到他们手持笏、腰横刀、脚踏靴的装束，体会到唐代雕刻浑厚的艺术风格。乾陵的翼马即飞马，是很有特色的石刻作品，它们躯体粗壮，两侧有飞举的双翼，并刻有云纹，也显现出雄浑厚重的风格。

位于陕西咸阳城北的顺陵是武则天母亲的陵墓，与帝陵相比规模并不大，但它的石狮却颇引人注目。立狮高近3米，体态雄健，爪牙锐利，双目圆睁，显得格外凶猛。此外



还有坐狮三对，也有近3米高，在石刻坐狮中是体积最大的。

乾陵翼马

位于陕西乾县

总的来看，唐代的石雕多体现了体态高大、雄浑厚重的艺术风格，正与大唐帝国恢弘强盛的气势相一致。

## （二）多姿唐俑

唐代的艺术品给人印象最深也最常见的大概就是千姿百态的陶俑了。唐墓中往往随



女睡俑

唐

1954年山西长治王琛墓出土  
高10.5厘米



## 三彩骆驼载乐俑

唐

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庭海墓出土

骆驼高58.4厘米,长43.4厘米;  
舞俑高25.1厘米

葬大批陶俑，数量之多、样式之丰富、制作之精细，都胜过其他朝代。陶俑虽然是出于工匠之手的殉葬品，但是不少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有的堪称艺术精品。

人物俑是数量最多、最多姿多彩的。乾陵章怀太子墓，西安城郊的独孤思贞、独孤思敬墓等都出土有形象生动、威严的文武官员俑，武士俑与侍女俑更为多见。最为精彩的还是乐舞俑。唐代朝野上下都喜爱音乐歌舞，皇宫中有乐舞宫伎，官僚贵族家中蓄有

家伎，民间也常举行歌舞表演，所以墓葬中常用乐舞俑殉葬，以便使主人在地下仍然有乐舞相伴。这些乐舞俑大都成组，每人各执不同乐器，各有不同舞姿，摆放开来，便成为栩栩如生的一个乐舞演出场面。其中最有趣的是西安市郊鲜于庭海墓出土的驼载乐舞俑。骆驼上载有乐舞俑五人，都是男性，深目、高鼻、卷须，一望便知是西域胡人。前面的坐者弹奏琵琶，中间的立于骆驼上，挥舞手臂，张开嘴巴，似在演唱。另外三人各





十二生肖陶俑

唐

1955年陕西西安韩森寨出土  
高36.5厘米至42.5厘米

三彩镇墓兽

唐

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庭海墓出土  
高67.5厘米(左), 63.2厘米(右)

持不同乐器，分坐两边，似乎是伴奏者。这组少数民族的乐俑形象活泼生动，令人似闻胡乐声声。

唐代墓葬中还出土有十二时辰俑，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十二生肖俑。将十二时辰神陪葬于墓中，有驱邪、守护之意，旨在维护墓主人四时平安。唐代的一般百姓都可以以此随葬，所以常见出土者。其中最有情趣的是人身兽头的十二时辰俑，以史思礼墓出土的一组最为生动。它们虽然头部是动物，下面却完全是人身，而且身穿广袖长袍，拱手，恭敬肃穆；头部依据动物特性的不同，神态也各异。将它们排列起来，俨然是一幅妙趣横生的动物朝拜图。

镇墓兽是陵墓的守护神，在唐墓中是常见之物。为了体现镇墓驱邪的威力，镇墓兽多塑造得张牙舞爪、鬃毛倒竖、怒目圆睁、呲牙咧嘴，有的身下还压着野兽，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 (三) 佛门瑰宝

#### 1、敦煌宝藏

敦煌本是西北的边陲小镇，但是这里历代开凿的数百个佛教洞窟与藏经洞发现的万





莫高窟外景  
位于甘肃敦煌



卷文书,使得它成为世界文物、艺术宝库,吸引着海内外无数学者与游人的目光。

敦煌曾经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重镇,佛教也是通过这里从中亚进入中原内地。常有僧人路过或居留此地,传播佛教或翻译经文。4 世纪以后,佛教在这里已经有广泛的

社会影响。4 世纪中叶,大体是东晋与“五胡十六国”时期,人们开始在崖壁上凿建石窟,在洞窟中凿刻佛像、绘制佛教故事壁画等,以弘扬佛教。敦煌境内共有石窟 550 余个,包括莫高窟、榆林窟、东西千佛洞等,其中以莫高窟规模最大、最为著名。

泥塑供养菩萨

唐  
甘肃敦煌莫高窟出土  
高 62 厘米



莫高窟又称“千佛洞”。根据碑文记载,此地首开石窟是在前秦建元二年(366)。经过陆续开凿,至唐代窟龕已达千余。唐以后陆续还有开凿,元代以后方停止。洞窟保存至今编号的有近 492 个,分布在鸣沙山的峭壁上,上下分层排列,最高处达五层。洞窟上下左右排列、相邻,密密匝匝,层层叠叠,远望如同蜂窝一般。其中大多是僧人居住过的僧房或掩埋尸骨的洞窟,只有少数保存有壁画、塑像等。据统计,现存壁画共 45000 余平方米,据说按画面高 5 米计算,连接起来有 25 公里长;彩塑佛像有 2400 多尊。这些洞窟成了世界佛教艺术的宝库。此外,洞窟中还出土了汉、西夏、回纥以及叙利亚等八种文字的经文。莫高窟规模之大,开凿持续时间之长,壁画、彩塑之多,不仅为中国



石窟之冠，世界也罕有其匹，1987年被联合国列为第一批世界人类珍贵文化遗产。

莫高窟的洞窟分别开凿于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各个时代。隋唐是其中的鼎盛时期，属于这一时期的洞窟有300多个，塑像有670多尊。

在洞窟中，佛像是僧众、信徒的供奉对象，也是有价值的雕塑艺术作品。塑造于不同时代的佛像，面容、身形、衣着都有所变化，各具特色，反映了各个时代的审美观念和雕塑艺术的发展。比如，北魏佛像身穿袒露右肩的袈裟，有浓郁的印度色彩。而西魏佛像则穿上了中国式的宽大袍服，面形与体形也较前清瘦、修长。经过研究，人们认为这正符合了从中原传来的魏晋至南朝崇尚秀骨清相和宽衣博带的审美观念与风俗。唐代塑造的佛像最大的高达30余米，是莫高窟佛像中最高大的。塑像技艺也比前代有很大进步，身体比例适当，人物形象较有个性，面容丰满、庄严，衣着也更流畅。菩萨则趋向女性化，面容秀美慈祥，衣着也更美丽。

壁画描绘的大多是佛教故事，以此教化众生，宣传佛教。这些壁画有的是单幅，有的是连环画，叙述的故事情节十分清晰。比如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故事、九色鹿解救溺

人故事、五百强盗成佛故事等等，都宣扬舍身救人、因果报应、弃恶从善等宗教教义，画面色彩鲜明，人物形象生动，好看而易懂。这些壁画不仅是珍贵的美术作品，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而且通过神佛、天国景象再现了当时社会的现实生活图景，包括房屋建筑、家具用品、生产工具、衣服装饰，驾牛耕地、播种、打场、捕鱼、狩猎、屠宰、盖房等劳动场面，及出游、旅行、送别、嫁娶、丧葬、沐浴、宴饮、习武、下棋、奏乐、舞蹈、百戏等生活娱乐场面，成为一幅全景式的社会风俗画卷，为后人研究当时的生产、生活、风俗、建筑、艺术等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百科全书式的形象资料。

著名的“飞天”是敦煌佛教艺术中最为生动活泼的形象。飞天描绘的是佛教中能歌善舞的天神翱翔于天空的姿态，展现了极乐世界的美景。这一形象自十六国时期便出现在壁画中，至唐代，飞天形象发展至高峰，塑造出了姿态各异、裙带飘飘、灵动优美、飞翔于云端的众多天女形象。这些飞天形象体现了唐代艺术家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表现力，而唐代民间发达的歌舞艺术无疑也给他们提供了充分的创作素材和美的启迪。

与这些艺术作品相比，对历史学家来说，更大的宝藏是埋藏于洞窟中的万余卷文

《乐舞图》(壁画，临摹)

唐

敦煌莫高窟第220窟





书,即所谓“敦煌遗书”。这些文书自发现至今百余年来,令中外学者梦牵魂萦。

开启神秘的藏经洞、发现文书的是一位名叫王圆箓的道士。关于洞窟的发现有许多具有戏剧色彩的传说。据说,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王道士在敦煌莫高窟太清道观住持修道,雇佣了一位杨姓贫士为他抄写道经卖钱。五月的一天,杨某在今编号第16窟的洞窟内工作,休息时吸烟,无意中将引火的芨芨草插进北壁墙缝,发现长长的草棍竟然插不到头,他感到奇怪,敲了敲,觉得里面好像是空的,于是告诉了王道士。夜间,王道士与杨某一起挖开墙壁,竟发现了一个秘密洞窟,其中收藏着5万件自十六国到北宋

的汉文、胡文手写本文献以及绢画、石碑等资料。这个惊世发现后来震动了世界,学者惊呼“整个人类的历史都在敦煌”,由此形成了一门综合性学问——敦煌学。

可惜的是,王道士并不懂得这些文献的真正价值,只知道肯定是有钱的东西,于是他选取了部分精美的绢画与写本,分送当地士绅与官员。这些珍贵文献因此开始流散出去。后来,一些外国探险家、学者等获悉此事,纷纷到敦煌寻宝,他们利用王道士的愚昧无知,骗买、盗取了许多文书,并运送到国外。现在,英、法、日、俄等许多国家的图书馆、博物馆等都藏有敦煌遗书。经过一些中国学者和政府官员的尽力抢救,得以保存下来的敦煌文书,分别收藏在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处。

敦煌文书中不仅有佛经抄本,而且包括一些失传的文学作品抄本,以及大量极有价值的户籍文书和买田、租地等契约文书,它们已经成为研究中古时期历史尤其是唐史必须研读的重要文献资料。

当今中外有许多学者毕生从事敦煌文书的研究工作,敦煌学已经成为一门超越国界的世界性学问。

## 2、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洛阳城南约13公里处,此地龙门山和香山两山相对,中间有伊水 flowing。两山峭壁之上都开凿有洞窟与佛龕,绵延1000多米。窟、龕之内凿雕了各式佛像。据统计,现存窟、龕2100余个,佛塔40多座,造像有10万余尊。龙门石窟的开凿始于北魏,洞窟主要是北朝与唐前期开凿的,到中唐以后,逐渐衰落,北宋续有开凿。北朝洞窟集中在西山,唐代洞窟则分布在东、西两山上。

奉先寺卢舍那大佛  
位于河南洛阳





龙门石窟的代表窟是唐代开凿的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像窟。此窟实际上是一个露天的大龕。大龕位于山崖高处，正面龕壁高达35米，规模宏伟，气势雄壮，龕前方视野广阔。龕中有11尊佛像，正壁主尊的卢舍那大佛坐像，通高17米有余，头高4米，耳朵长近2米。佛像面容丰满端庄，神态安详和善，双目凝视前方，嘴角微含笑意，显示了至尊地位，又具有高度的真实感与亲和力。左右两旁雕有二胁侍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通高都在10米以上，刻画也非常精致优美。弟子形象忠厚朴质，菩萨形象温柔和善，天王身着甲冑威严雄壮，力士怒目瞪视凶猛有力。这组造像布局协调，造型优美，九尊佛像性格鲜明，形态各异，历来被评价为唐代佛教艺术的精品和代表作。尤其是主佛卢舍那大佛像，以独特的富含女性韵味的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令人叹为观止。大概因为佛像面容秀美，民间传说它是按照武则天的形象雕凿成的，这种传说更吸引了人们前来瞻仰。据研究，这一大龕和佛像确实是武则天时期建造，可能是唐高宗为追悼父亲唐太宗而开凿，武则天还曾经资助过脂粉钱两万贯。

从龙门的唐代佛像可以看出，佛像的衣冠服饰更趋中国化，面容形象较为丰硕，同时更为写实，更富生活气息，不仅反映了唐代的审美情趣，也显示了佛教日趋中国化与世俗化的历史趋势。这些艺术品在中国美术史长廊中占有着重要位置。

### 3、乐山大佛

四川乐山以东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合处，有一座山一样雄伟的大佛，千年来端坐江边，俯瞰着滔滔江水，人称乐山大佛。

这座大佛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弥勒佛坐

像。它依凌云山西壁凿岩而成。大佛通高71米，头宽10米，鼻长5.6米，耳长7米，眉长5.6米，眼长3.3米，嘴长3.3米，颈高3米，肩宽28米，膝至脚背高28米，脚背宽8.5米。佛像面容慈祥瑞庄，体形魁伟而匀称，双目微睁，俯视着千年人世沧桑。

佛像开凿于唐玄宗开元初年（713），完工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历时九十年，跨越了唐朝中期的盛衰转折。佛像建造的发起人是僧人海通。他在凌云山结庐修行，见到每年夏汛季节江流咆哮奔涌，常常造成墙倾楫摧、舟毁人亡的惨剧，便立志开凿佛像，以镇风涛。由于佛像工程浩大，海通没有等到完工便去世了。此后西川节度使韦皋继承

四川乐山大佛  
唐





了他的事业，继续组织工匠开凿。佛像竣工时，还建造了七层楼阁覆盖，佛身也涂有丹彩，在佛像后侧还构筑了完善、巧妙的排水系统，以避免佛像受山水冲蚀，对于佛像保存至今起了决定性作用。如今虽然覆盖大佛的楼阁已毁，佛身色彩也已减淡，但是大佛整体保存完好，使人们得以亲眼目睹这个举世闻名的奇迹。

这座建造于盛唐时期的大佛是艺术与科学技术结合的成果，它不仅是唐代雕刻艺术的一个巨型实物标本，而且表现了唐朝人在科技方面的智慧和创造精神，它的惊人的雄伟也正是盛唐气势的一个形象体现。

#### （四）古今第一“塑圣”

以上列举的雕塑艺术品大都出于无名民间艺术家之手，唐代也有青史留名的雕塑家，最有名的是杨惠之（713—755）。

杨惠之是盛唐时人，传说曾与吴道子一起学画，号为画友。后来吴道子声名大噪，杨惠之便焚毁笔砚，专攻雕塑，以与吴道子抗衡。他雕塑的许多作品闻名一时。据说他曾

为艺人留杯亭塑像，像成之后，人们从背面便能看出是留杯亭。他还创立了千手观音形象，并开创了“塑壁”这种后世很流行的艺术形式。后人称赞他的雕塑“古今第一”，誉为“塑圣”。他还著有《塑诀》一书，但未留存下来。此外，吴道子的雕塑也很有成就，艺术风格与他的绘画相类。可惜他们的作品都已失传。

## 四、乐舞百戏

形象活泼、生动的歌舞伎乐俑在唐俑中为数不少，西安唐墓中出土的一组“坐部伎”陶俑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组。这组乐俑约高11厘米，人物均跪坐或盘坐，手中分别持筚篥、拍板、横笛、排笙、琵琶、箫等乐器，似正在演奏，正是当时宫廷乐舞中“坐部伎”的形象。此外，唐代壁画中也会绘有千姿百态的乐舞图，敦煌壁画中还描绘了许多欢快、热闹的民间乐舞场面。这些作品不仅是唐代雕塑、绘画艺术成就的体现，而且反映了唐朝音乐歌舞艺术盛行的社会风气，更是人们了

乐舞陶俑

唐

1955年陕西西安出土  
高11厘米至11.5厘米





解、研究唐代音乐歌舞艺术的最真实、最形象的资料。

唐代是音乐歌舞艺术盛行的时代。宫廷、官府节日宴飨、送往迎来等各种庆典都要以音乐歌舞烘托气氛、助兴添彩，盛大节庆中还常组织千百人参加的大型歌舞表演；贵族富户家中多蓄养音声人、歌舞家伎，以满足宴客、娱乐之需；民间戏场与街头巷尾也常有杂技、歌舞戏等表演。除了专事表演的众多倡伎艺人外，皇帝妃妾、官绅仕女、庶民百姓中都不乏善丝竹、能歌舞者，并常以此自娱自乐。这种爱好与风气，使得唐朝的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蓬勃发展。而唐朝社会的开放风气，中外、胡汉文化艺术的频繁交流，使得唐朝的音乐、歌舞等艺术广泛吸纳外来因素，因而更加生机勃勃，多彩多姿。

盛唐时期，由于国家安定富足，唐玄宗本人又酷爱艺术并富于才能，音乐歌舞等艺术也进入全盛之期。这一时期，宫廷管理乐舞的机构——教坊得到极大发展；唐玄宗还在宫廷内设置了梨园，选取数百名最出色的

男女艺人，亲自指导他们进行排演、训练；宫廷外也设置了左右教坊，集中了大量歌舞百戏等优秀人才，给予优厚待遇，让他们专门从事技艺训练与表演。这些更促使唐朝音乐歌舞艺术走向高潮。

#### （一）大珠小珠落玉盘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么》。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描绘了一位曾为长安倡女的商妇夜半在江船上弹奏琵琶的情景。诗人闻琵琶而泪湿青衫是别有所感，我们却从诗句中看到了这位女子高超的演奏技艺和乐曲的感染力。

诗中的《霓裳》和《六么》都是唐朝流行的乐曲。《霓裳》就是《霓裳羽衣曲》，原为印度乐曲，引进后经过唐玄宗等的加工润

骑马奏乐三彩俑

唐

1972年陕西礼泉李贞墓出土  
高 36 厘米至 37 厘米





吹排箫乐伎壁画

唐

1953年陕西咸阳底张湾出土

高195厘米，宽93.5厘米



色，改定名称，成为唐朝最有名的乐曲。《六玄》也称《绿腰》、《录要》，同样是流传极广的乐曲。两首乐曲总体风格都较为柔曼优美，从诗中看，曲中也有激越高昂之处。除此以外，唐朝流行的乐曲还有《凉州》、《破阵子》、《水调》、《玉树后庭花》、《雨霖铃》、《何满子》等。《凉州》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是西域边塞风格的乐曲，据说音调最为“豪嘈”，大约是豪放激昂而音声震耳。《雨霖铃》传说是杨贵妃在马嵬坡被缢死后，唐玄宗在蜀中“夜雨闻铃”不禁肠断，为了寄托哀思而作。这种说法说明这首乐曲的风格凄凉悲切。《何满子》传说是唐玄宗时一位民间艺人临刑前所作，唐诗中有“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之句，可见乐曲悲哀凄惨，令人闻之泣下。这些乐曲都被称为大曲。

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曲子词，在文学史上被认为是五代、宋时兴起的文人词的源头。这些曲子词并不是单纯的文学作品，它们与音乐密不可分。它们最初出于民歌，经过整理加工，成为用于演唱的歌词。敦煌曲子词的曲调有《天仙子》、《破阵子》、《柳青娘》、《浣溪沙》等名目。这些曲子可以填入歌词歌唱，也可以用来演奏；可以由曲调写歌词，也可以由歌词创作乐曲。许多乐曲后来成了文人填词的曲牌。

唐朝宫廷举行宴会、典礼时必定演奏音乐，并伴以舞蹈，这种音乐称为“燕乐”或“宴乐”。唐高祖时制定了九部乐，太宗时期又改定为十部乐。十部乐是：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亦作扶南）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从名称就可以看出，除了前两部属于中原音乐外，其余八部都是外来的或少数民族风格的音乐。唐玄宗时，将宫廷乐舞编为“坐部伎”与“立部伎”两类，各有固定的表演内容。“坐部伎”由六部乐舞组成，演奏丝竹细乐，舞者三人至十二人，规模较小，风格清雅；“立部伎”由八部乐舞组成，规模较大，以鼓与金钲伴奏，舞者六十人至一百八十人，气势雄壮。盛唐时期，又规定将传统“先王之乐”作为雅乐，用于宫廷礼仪；将融入了“胡部”乐的乐曲作为宴乐。从这些乐曲足见唐朝统治者对于外来音乐艺术的包容与喜爱，也可以看出唐朝音乐受到的强烈的“胡风”影响。

与“胡乐”流行同时，多种外来或少数民族乐器也被引进中原，流行起来。琵琶就是当时从西域传来的，其余还有羯鼓、箜篌、笙簧、五弦等等，也广为流行。当时宫廷与民间出现了许多音乐家、歌唱家和演奏家。唐玄宗就是个既能作曲，又会演奏多种乐器，尤其善击羯鼓的音乐家。念奴和永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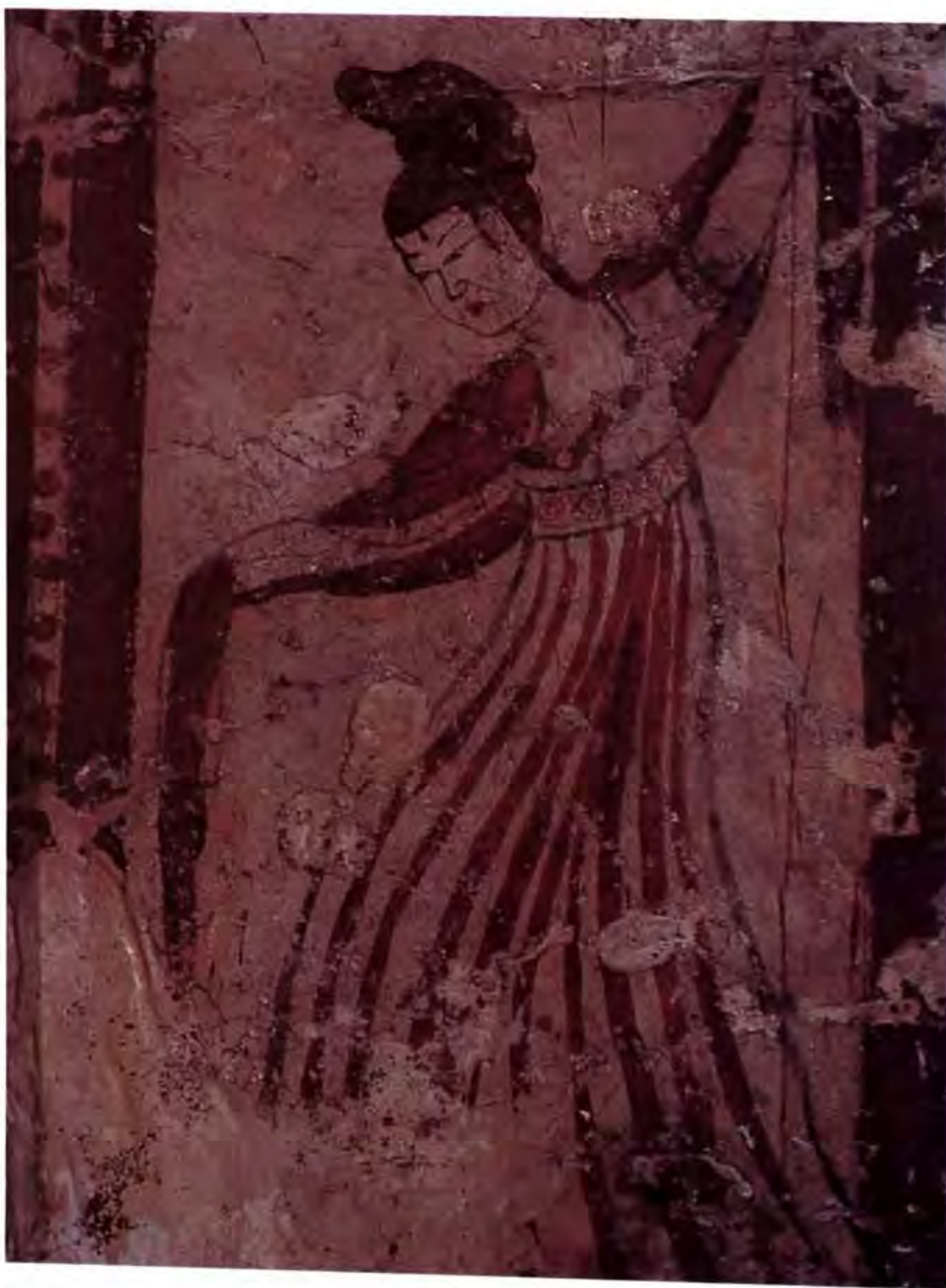
是盛唐时期的著名宫廷歌女。念奴歌声迷人，又善表演，唱歌时秋波流辉，歌声如出云端，钟鼓笙竽都无法压过。永新不但善歌，而且能创新声，她的歌“喜者闻之气勇，愁者闻之肠绝”，有极大的感染力。一次，唐玄宗在勤政楼举行盛宴与民同乐。楼下观众成千上万，人声嘈杂，无法进行演出。高力士于是命永新出来唱歌，歌声一起，广场立刻寂静无声。康昆仑与段善本都是琵琶高手。传说唐德宗贞元年间，他们曾在长安东西两街较量技艺。东街康昆仑号称“琵琶第一手”，他登楼弹奏一曲后，西市楼上出现一女郎也弹奏此调，曲妙入神。康昆仑惊服，要拜她为师，后来女郎卸装，才得知原来是庄严寺的和尚段善本。琵琶名家还有曹刚、裴兴奴、曹妙达等人，其中许多都是西域人。

## (二) 霓裳羽衣与胡旋

古代乐、舞不能完全分开，“大曲”其实就是大型歌舞曲，是声乐、器乐、舞蹈的组合，演奏音乐时伴以歌唱、舞蹈，载歌载舞。

唐朝的舞蹈分为软舞、健舞两大类。前者风格柔婉优美，节奏比较舒缓；后者动作矫捷雄健，节奏比较明快。不过它们的区分并不那么严格，各时期也有所不同。软舞有《绿腰》、《垂手罗》、《春莺啭》、《乌夜啼》、《回波乐》等，健舞有《胡旋》、《柘枝》、《剑器》、《胡腾》等。这些舞蹈都是比较小型的表演性舞蹈。

《霓裳羽衣曲》也称《霓裳羽衣舞》，是唐代舞蹈的代表作。杨贵妃最擅长此舞，它也因为杨贵妃而名传千古。杨贵妃的侍女张云容也善舞霓裳，杨贵妃曾赞美她的舞姿如同“红蕖（荷花）袅袅秋烟里”。霓裳羽衣舞可以独舞，也可以群舞。唐朝宫廷在盛大节日庆典时曾多次举行由数百宫妓表演的大型霓裳羽衣舞。宫妓们身穿孔雀翠衣，周身佩



带珠翠、缨络，头戴步摇冠，宛如仙女一般翩翩起舞，望之如入虚无飘渺的仙境，因而受到人们的特别喜爱。白居易曾赞道：“千歌百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

盛唐时代还有一位舞女谢阿蛮，最善舞《凌波曲》，深受皇帝、贵妃喜爱，时常受到赏赐。这应该也是风格比较柔美舒缓的软舞。

剑器舞是一种健舞，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描绘了这种舞蹈的风格：“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燿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公孙大娘的剑舞冠绝一时，

红衣舞女壁画

唐

1957年陕西长安执失奉节墓出土

高116厘米，宽70厘米





参军戏俑

唐

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庭海墓出土

高46厘米

据说是身穿军装舞动宝剑，模仿战斗姿态，当时号称“雄妙”。可见是一种英武矫健的战斗风格的舞蹈。

“胡旋”出自西域，原出于康国（今乌孜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唐朝时传入长安。盛唐时特别流行，杨贵妃、安禄山都善舞胡旋。白居易的《胡旋女》描写了唐玄宗时胡旋舞风行、“臣妾人人学圜转”的情形。胡旋舞动作主要是快速轻盈地旋转，舞者在一小圆毯上随着乐曲节奏旋转如风，两脚始终不离毯子。“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此外，还有“胡腾”舞，也是西域舞蹈，

出自石国（今乌孜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是男子独舞，动作主要是快速多变的腾跳踢踏，风格刚健勇武，也属于健舞。表演这些舞蹈的大多是“肌肤如玉鼻如锥”的“胡人”。

唐朝民间节日娱乐活动中盛行“踏歌”，这是一种自娱自乐性的舞蹈，即一群人手拉手，一边歌唱，一边随着歌声以脚踏地。李白诗中有“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之句。唐朝前期，元宵节时朝廷曾经组织几千宫女与民间青年女子在长安灯下踏歌三日三夜。

民间街巷之中还流行一种歌舞戏，就是有一定故事情节，演员扮成角色的一种戏剧化的歌舞。当时流行的有《陆参军》、《兰陵王》、《踏摇娘》等剧目，往往男女合演，边歌边舞，观众围成圆场，一呼百应，齐声唱和。武则天时曾经下令禁止妇女表演俳优之戏，说明当时这种表演很流行。这种艺术形式虽然当时并不成熟，但它却是后世戏曲艺术的雏形，所以在戏曲艺术史上很有价值。

### （三）鱼龙百戏

“百戏”是各种技艺表演的统称，其中主要内容就是今日的杂技。唐代杂技名目繁多，包括竿技、绳技、球技、马技等，有的是继承传统而来，有的是从西域新传入的技艺。每逢皇帝诞辰等节日，朝廷常常要召集各地最优秀的艺人到宫中表演百戏，这是极受欢迎的节目。许多唐诗描写了当时演出的盛况和艺人们卓越的技艺。

竿技往往是由艺人头顶长竿，另一人沿竿爬上，进行各种惊险表演。盛唐有位竿术伎王大娘，她在兴庆宫表演时，头顶百尺长竿，竿上装有木山，山上有小儿出入表演歌舞，引起人们的惊叹、赞赏。当时神童刘晏写诗赞道：“楼前百戏竞争新，惟有长竿妙入神。”还有一位三原竿伎王大娘，头上长竿居



然能载十八个人，并行走自如。唐后期幽州女艺人石火胡的竿技更绝妙。她头顶长竿，上支有弓弦五条，五个女孩各踩一条，穿五色服装，表演破阵乐舞，俯仰来去如飞，令观众目眩心惊。

绳技类似今日的走钢丝，表演者多是女子。在两柱之间拉起绳索，高达数丈，由绳伎踩在绳上，表演各种动作，有时几个人同在绳上，踩肩踏顶，叠上三四层人，又翻身掷倒，稳稳当当落在绳上。时人叹为奇观，动作的惊险使得“万人肉上寒毛生”。

球技是由艺人登踩一二尺高的彩画木球，球转而行，同时做各种优美的舞蹈动作。

马技也称舞马，即今日的马戏或马术表演。西安发现的唐代鎏金舞马衔杯银壶上，就刻镂有舞马屈膝衔杯的场面，印证了史书记载的舞马盛况。唐朝宫廷中常常举行马技表演，唐玄宗时最盛，宫中有舞马百匹。驯马者不仅有男性艺人，也常由宫女们指挥马队进行表演。她们身穿盔甲，腰佩刀剑，挥舞旗帜，或骑马奔驰，或指挥马匹排成各种队形，做各种精彩动作。有多首唐诗描绘、赞美宫女们的马技表演，称赞她们雄姿勃勃的表演连擅长骑射的少数民族来宾都心悦诚服。舞马以外，还有舞象、舞狮等表演。

“百戏”本来出自民间，在民间表演自然更普遍。当时长安的慈恩寺等地设有戏场，常有演出。其他城镇街市也常有艺人卖艺，进行各种技艺表演。

除了杂技外，街头与寺院中讲唱这种艺术形式也很流行。一般讲唱佛经故事，也涉及世俗男女故事，称作“俗讲”，它的文字记录本称为“变文”。这种讲唱类似今日的评弹、大鼓等艺术形式，很受一般市民欢迎，演出时常常围得人山人海。



### 第三节 学术宗教

舞马衔杯银壶

唐

1970年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

#### 一、儒学史学

##### (一) 开成石经与儒学复兴

西安碑林中规模浩大、极为珍贵的一组碑刻是《开成石经》，又称《唐石经》。它是唐文宗开成二年(837)为了校正儒家经书而刻制的，它记录了唐朝统治者尊崇儒学的国策和致力于统一儒家经典的努力。

自魏晋玄学冲破儒学的一统天下之后，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基本上是儒、佛、道三教并行、思想多元的时代。唐朝统治者虽然在政治上实现了大一统，但是在思想领域并没



有定立一尊，而是实行了兼容并包、尤重儒学的政策。唐代历朝皇帝都很重视和倡导儒学。唐太宗尊奉孔子为“先圣”，并设立弘文馆，招纳儒士，兴办学校，增置生员，首倡“周孔之教”。当时四方儒士会集京师，多达八千余人，史称“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唐高宗不仅亲自隆重祭孔，还追赠孔子为“太师”。唐玄宗则更进一步抬高孔子的地位，追封为“文宣王”，提倡儒学。而唐代的学校教育无论官学、私学都以教授儒家经典为主；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便是儒学，其中“明经”科更是专考儒家经学。在统治者的崇儒政策和大力倡导下，唐朝士人大多皓首穷经，儒学迅速发展，呈现出复兴的趋势。

经学即训解儒学经典之学。南北朝以来，经学有南北学派之分，隋时南北经学出现了合流的趋势。至唐代，政治上的统一与统治者对于儒学的重视，推动经学进入大一统时代。唐太宗贞观四年（630），鉴于儒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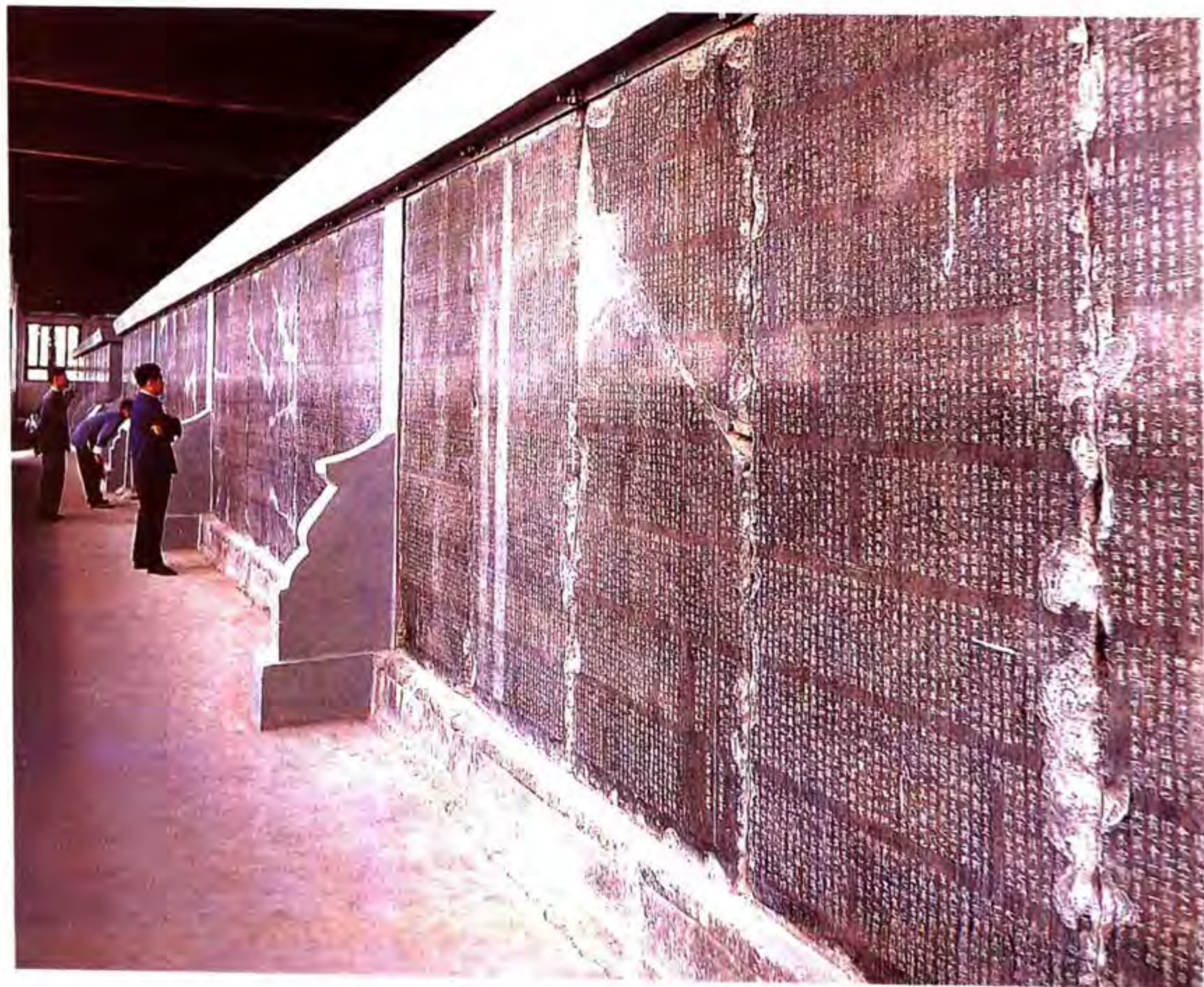
经籍年代久远，辗转传抄，文字讹误甚多，诏令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颁行天下，以方便士人学习。贞观十四年（640），又鉴于“儒学多门，章句繁杂”，兼南北经学其说不一，妨碍科举取士，诏令孔颖达等撰写五经义疏，为五经作解释注疏，意在将以往的纷纭异说统一起来。孔颖达等诸多名儒通力合作，撰定义疏一百八十卷，定名为《五经正义》，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全国，作为科举士子习经的标准读本。从此，儒家经学获得了空前的统一。此举既有助于推广儒学思想，方便科举取士，但同时也使得士人墨守成说，束缚了经学的发展。唐玄宗不仅亲自为《孝经》作注，还将儒家经典合为九经，规定科举以九经取士。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根据宰相兼国子祭酒郑覃的建议，将儒家九经文字刻于石上，立于长安城内务本坊国子监太学（中央官学）内，以供士人学子校正经书，防止传

《开成石经》

唐

现存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





抄讹误。这便是“开成石经”。石经共包括114块刻石，两面刻文，共228面。字体为楷书，标题为隶书。刻有《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孝经》、《论语》、《尔雅》、《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十二部经书，另附《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两书，共计65万余字。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对于弘扬经学、文化事业有很大贡献。唐末变乱中，石经曾被弃于荒郊，五代后梁时重新移至城里。经文屡经改刻、补刻，保存至今，使今人得以看到这样一组不同凡响的碑刻，从而领略唐代这一文化工程之浩大。

对于儒学的复兴，唐后期韩愈的地位与功绩无可比拟。他不仅是文坛领袖，同时也是儒学旗手。他终生高扬兴儒反佛大旗，力图恢复儒学的统治地位；同时对于传统儒学纲常理论进行了发挥、改造。针对佛教法统，他提出了儒家“道统”说，以孔、孟道统继承人自居，以恢复、传承道统为己任。他的学生、朋友李翱对他的理论又做了进一步发挥。他们的学说对于宋代儒学的重振、道学的兴起起了奠基作用。

## （二）八史与两通

唐代史学的突出成就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官修史书制度的确立和“唐八史”的撰成，二是两部私人撰写的史学名著《史通》与《通典》的诞生。

官修史书是东汉以来的传统，但是并没有形成严格的制度，唐朝是这一制度的确立时期。唐朝中央设立史馆负责修史，并规定由宰相监修，显示了对于历史的重视。以后历代基本都继承这一制度，保证了中国历代历史记载的完整。

由于朝廷重视，又有宰相监督、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唐朝修史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官修前朝史书共有六种——《梁书》、《陈

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另外还有私人著作两种——《南史》、《北史》，合称“唐八史”，在历代撰修的正史“二十四史”中占了三分之一。

此外，唐朝还出现了两部史学家个人撰写的著名史学著作——《史通》与《通典》。

《史通》的作者是刘知几（661—721），他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刘知几自少年时代便对历史产生了兴趣，青年时代做官之余专心研究历史，后来担任修史官职，前后参与和承担修史工作二十年。他感到官修史书难以抒发自己的见解，于是私下撰著了《史通》这部辉煌的史学名著。《史通》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分为二十卷，对于史书的体例、史官的建置、史书撰述方法、人物评价与历史观等都有详细的论述，对唐以前的史学做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基础。这部著作受到历代史学家的重视，迄今仍有许多学者对它进行研究，被评价为中国史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通典》的作者是杜佑（735—812）。他经历唐玄宗以后六朝，任官长达六十年，历任各部官员，后又居宰相、节度使显位。由于久任地方与中央要职，又长期管理财经方面事务，他对典章制度非常熟悉。为了从历史中寻求治国之术，为治理由盛转衰的唐王朝提供借鉴，他花三十多年时间撰成了《通典》一书。《通典》专门记述历代的典章制度沿革，对财政、经济、兵法、刑律、地理以及少数民族与外国风土习俗等都作了系统的考证叙述。它是中国第一部典章制度史，开创了这一专史新体裁。此后，在它的基础上，宋代产生了《通志》、《文献通考》两部同类著作，合称为“三通”，到清代又发展成“十通”，可见《通典》对于史学著作体裁的开创



之功。

## 二、佛道之盛

在尊儒的同时，唐朝统治者对于佛、道二教也给予了极大礼遇，佛教与道教因此得到迅猛发展，进入了全盛之期。

### （一）法门寺与崇佛之风

位于陕西扶风的法门寺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刹，始建于东汉末年，至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唐时，这里是香火最为兴旺的皇家寺院，唐朝皇帝曾经前后七次在这里瞻仰佛骨或迎接佛骨进宫供奉，这是唐朝对佛教最为盛大的顶礼膜拜活动，也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盛事。

佛教在唐朝受到历朝绝大多数皇帝的崇奉与礼遇。唐太宗曾赐佛经给京城和地方官员，并对玄奘的取经、译经活动给予极大支持，经常召其入宫探讨佛理，并亲自为其所译佛经作序。武则天出于特殊的政治目的更是极力崇佛，明确宣布佛教在道教之上，又命宣传《大云经》，自诩弥勒佛下世，并且在各地大建佛寺，广造佛像。后期的宪宗、宣

宗、懿宗、僖宗、昭宗等也都崇奉佛教。

唐朝皇帝之所以将法门寺作为朝拜圣地，是因为其佛塔内收藏有佛祖舍利与罕见的佛骨。据记载，佛祖释迦牟尼灭度二百多年后，统一印度的阿育王大崇佛法，鼓励僧侣到外面传教，在世界各地建造了四千八百座寺院，又取佛祖舍利分置于四千八百个宝匣内，分葬于各寺院。法门寺就是中国境内珍藏佛祖真身舍利的十九座寺院之一。佛塔地宫中还藏有佛骨，唐代史籍对此有明确记载。

唐朝朝廷尊奉这里的佛祖舍利为“护国真身舍利”，对佛骨更是热诚膜拜，曾前后七次迎奉、瞻仰，盛况空前。第一次开示佛骨是唐太宗时。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敕准岐州刺史开启地宫，展示佛骨。当时京城内外的僧俗人众争相前去观看，每天都有千人聚集在佛塔下，轰动一时。唐高宗在位时捐钱重修寺院宝塔，又迎佛骨到长安、洛阳两京供奉；皇后武则天捐赠了绢一千匹和自己所用衣帐等，并为佛骨专造了金棺银椁。此次迎送持续了四年之久。其后，武则天、唐

法门寺塔地宫遗址  
位于陕西扶风





肃宗、唐德宗都曾迎奉过佛骨。

规模最大的是唐宪宗、唐懿宗时期的两次。唐宪宗十四年(819),皇帝诏命宦官率领宫女三十人,手持香花,到驿站迎接佛骨,在宫中供奉三天。王公贵族、平民百姓奔走施舍,竟有为此倾家荡产者,还有人烧顶灼臂以表虔诚。唐懿宗时的一次迎奉排场更大,挥霍无限。自咸通十二年(871)就开始准备,制造宝帐、香车、幡、幢、盖等,全部用珍宝锦绣作为装饰。咸通十四年(873)春,正式到法门寺迎接,自京城至寺院数百里之间,车马昼夜不绝。一路由禁军仪仗引导。佛骨到京后,彩棚夹道,士女云集,音乐沸天,香火烛地,念佛声震耳欲聋。皇帝亲行迎接之礼,迎入宫内道场三日。这次迎佛骨的盛况创中国佛教史之最。

数次迎奉佛骨,皇家供奉的大批珍宝器物,便都被收藏进塔内地宫中。咸通十五年(874),地宫彻底关闭。此后一千多年以来,这些宝物一直埋藏于地下,无人知晓,这座古刹也没有引起太大关注。

1981年,由于佛塔的倒塌,人们发现了塔内所藏宋、元时期所刻的佛教经卷和唐、明等时代的铜、石佛像等。至1987年,在拆除残塔、清理塔基时,竟意外地发现了距地面约1米深的地宫!

这是一座真正的地下宝库。地宫内藏品异常丰富。这些宝物大多是唐代皇室迎送佛骨的供奉品,包括金银器、琉璃器、瓷器、漆木器、珠宝玉器、锦绫丝织品等,共达千余件,有很大一部分属于价值连城的一级文物。其中各式金银器物造型精美,质地华贵,器形罕见,都是当时极品,今日更成为稀世之珍。唐僖宗供奉的一套制茶工具极为难得,展示了唐代上层社会饮茶的风气与排场,为了解中国古代的“茶道”提供了真实



器物。出土的秘色瓷器,破解了关于它的千古之谜。琉璃(即玻璃)器物显现了中西亚风格,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物证。成匹丝织品的发现也是重大收获,这批丝织品包括锦、绫、罗、纱、绢、绮、绣等诸多品种,并首次发现了加金丝织物;刺绣品更是巧夺天工,精美绝伦。总之,这些文物、艺术品对于中国的纺织史、服饰史、美术史、风俗史、佛教史都有重要的补充甚至改写作用。法门寺地宫的发现,如同出土了一座博物馆。

更令世界尤其是海内外佛教界震惊的是4枚佛指骨的重现于世。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地宫文物时,惊异地发现了传说中的佛骨。第1枚藏于两尊石刻天王守护的八重宝函中,每层宝函都是金银珍宝制作、装饰;第2枚置于室内灵帐中;第3枚藏于后室下小龕内织物包裹的铁函中,内套两层宝函和一层水晶椁、一层白玉棺;第4枚安置在地宫前室的菩萨舍利塔中。经过鉴定,其中第3枚为灵骨,即佛祖真身指骨;其余3枚为影骨,即摹制的佛骨。

地宫文物和佛骨的发现,不仅使法门寺骤然间名扬海外,吸引着佛教信徒和游客络绎不绝地前往朝拜和观赏,同时也使人们对

金塔和佛指舍利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地宫出土



唐代佛教之盛和社会生活有了更直接、深切的了解。

## （二）佛教宗派与反佛思想

佛教经过在中国数百年的发展，尤其是唐代的兴盛，逐渐形成了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等几支重要的佛教派别。这些宗派大都创立或成熟于唐代。它们有着各自独特的理论体系、教规戒律、修行方式、势力范围及传承法系等。这些佛教宗派的形成，标志着佛学理论体系、哲学思想的成熟，也使得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佛教中心。

禅宗是佛教中国化最为彻底的一派，也是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派。禅宗的根本宗旨是强调主观精神的领悟，提倡“顿悟”，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无须外求，也无须念佛、诵经、坐禅等繁缛的修行方式，只要了悟于心，觉悟佛理，即可“见性成佛”，将成佛完全归之为主观的觉悟。由于其修行方式比其他宗派简单省力，使得佛教更为世俗化，因而受到各阶层人士的欢迎，在唐代后期盛行起来。晚唐以后，其他佛教宗派都逐渐衰落，禅宗一枝独秀，取得了垄断地位。其提倡的内心顿悟学说，对于后世宋明理学、心学的产生有直接影响。

以禅宗为代表的佛学虽然是宗教教义之学，但是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撞击与融合，也成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学术文化的组成部分。

在举世若狂的崇佛风气中，反佛的思想与呼声也从未停息过。唐初的傅奕、吕才都曾著书立说反对佛教，后期的韩愈更是反佛斗士。他们或从无神论角度反对佛教的神学迷信，或从正统儒家立场批评佛教违背纲常伦理，或从国家利益角度抨击佛教损害国计民生、危及朝廷统治，都对佛教与佞佛之风

展开了批判与斗争。韩愈由于上书极言反对迎佛骨，措词激烈，请求将佛骨“投诸水火”，并引史实证明凡是敬佛的帝王都寿命不长，而惹恼唐宪宗，被远贬边州。他们的反佛著述与言论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占有重要位置。

不仅反佛思想与舆论一直存在，唐代后期还发生了一次著名的灭佛运动。由于佛教盛行，建寺造像耗费了大量资财，众多僧尼免税免役，不事生产，又导致赋税减少而坐食人口大增，寺院还广占田产与奴婢，这一切使国家财政收入受到严重损害。鉴于这种状况，不断有人提出抑佛、裁佛主张。唐武宗于会昌年间将其付诸实践，全面实施抑佛政策，史称“会昌灭佛”。此次共拆除佛寺四万余所，勒令僧尼二十六万余人还俗，没收田地数千顷，释放奴婢万余人，佛教受到严重打击。不过，这一政策也只实施了短暂的数年，唐宣宗上台后，便又恢复了崇佛政策。

## （三）道教的成熟

陕西周至县东南的秦岭山麓中有座楼观台，相传是老子著《道德经》并筑高台讲经之地。唐高祖曾经亲临此地，拜谒老子，并进行了修缮扩建，命名为宗圣宫。自此，楼观台成为道教圣地。

与佛教走向全盛同时，道教在唐代借助“天时”也十分活跃、兴旺。所谓“天时”，即李唐统治者为了借助神权提高皇室地位，自命为道教先祖老子李聃的后裔，对道教推崇备至。唐朝建立不久，唐高祖便明令规定道教在儒教和佛教之上，为三教之首。唐太宗时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前。唐高宗时，又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时期，对于道教的推崇更达到登峰造极地步：老子地位不断提升，被尊为“玄元天皇大帝”；玄元庙升格为宫，一切依宫阙之制，文宣王孔子也只能列侍在玄元皇帝左右；又诏令道



士、女冠隶属宗正寺（管理皇室宗族事务的机构）；在各地广置道观，玄宗亲自带领大臣到玄元皇帝庙祭祀；设立崇玄馆、崇玄博士，令士人学习老子《道德经》等道家典籍，并在科举中开设了道举；又命人搜集亡逸，整理道经，勘成道藏，分送各道；玄宗还亲自注释《道德经》，并礼尊道士，设坛受箓，学习道术，将道教几乎推上了“国教”地位。在朝廷倡导下，崇奉道教蔚成风气，道教得此扶植，自然蓬勃兴盛起来。据记载，唐代道观共有一千九百余所，道士达一万五千余人。不过，应该看到，尽管有皇家的崇奉，唐代道教的规模与发展程度还是远逊于佛教。

与成熟的佛教相比，道教原本处于较为原始的状态，其教义内容庞杂，教规戒律、宗教组织等也不成熟。唐代的崇道国策与道教的兴盛，也推动其理论体系等走向成熟、系统化，形成了一定的经典、教义、戒律、修炼仪式、宗教组织等，逐渐发展成为正规的宗教。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道教学者，对于道教的义理、历史、修炼方术以及相关的医药学、养生术、哲学等进行研究，著书立说，不仅促进了道教的发展，更丰富了传统学术文化内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 第四节 科技发明

唐代丰足的经济生活、深厚的文化积累、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以及频繁的中外交流，从各个角度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一时期科技取得了辉煌成果，有不少划时代的创造发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至少有两项在这一时期取得重大进展，即雕版印刷术问世、火药开始应用于战争，而指南针也

有可能是产生于这一历史时期。

#### 一、雕版佛经与写经纸

印刷术是文化发展与传播的重要标志与里程碑。目前发现的中国古代最早的印刷品都是唐代作品。

四川成都望江楼唐代墓葬中出土有刻印于唐代中晚期的《陀罗尼经咒》，纸为茧纸，轻薄而透明，印品边上刻有“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等字。西安地下也先后出土了刻印于唐代中晚期的《陀罗尼经》汉文与梵文两种印本。最为精美的是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刻印于唐咸通九年（868）的《金刚经》长卷（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经卷全长有十四尺，为卷轴装，卷首刻印说经图，图后为经文，卷末刻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等字。图版、文字极为清晰，佛像刻画得尤其精致、细腻、美观，刻印技艺已经相当成熟。而韩国庆州释迦塔所出《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刻印于751年（唐天宝十年）前，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唐代印本，是由中国传入当时的新罗国的。

《陀罗尼经咒》（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本）

唐

1944年四川成都出土

长31厘米，宽34厘米





写经纸

唐

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  
高23厘米，宽843厘米

这些印刷品都是用雕版印刷术刻印而成，它们印证了一个确凿的事实：雕版印刷术至迟在唐代已经问世。

中国古代的印刷术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雕版印刷工艺比较简单，一般是选用纹质细密坚实的木材作为原料，以梨木、枣木为佳，锯成一定大小的木板，然后刨平，把写好的文字或图像反贴在木板上，用刀刻出反写阳文（字画凸出）；之后刷上墨，铺上纸，再用棕刷在纸上均匀刷印，揭下纸张，便成为印刷品了。唐代时这种刚刚问世的印刷术主要流行于民

间，用于大量刻印佛经，此外也用于印刷医药、历法等书籍。据记载，白居易的诗也曾被雕印出卖。唐末，有人在成都书铺中看到许多雕版印刷的书，有字书、小学读物，也有阴阳占卜的书籍，说明雕版印刷已经很普遍了。

雕版印刷术在问世之初虽然主要用于印刷佛经，但是此后对于文化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中国的印刷品与印刷术也先后传到朝鲜、日本等国，韩国出土的印刷品正说明了印刷术对于中外文化交流的促进作用。

造纸术在唐代进一步成熟，纸浆舂捣更

《金刚经》

唐

1900年甘肃敦煌千佛洞发现  
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馆



为精细，纸质更为细密均匀。同时产纸区域扩大，造纸术在各地传播开来，纸张产地大大增加，浙江、四川、广东、扬州、江西、安徽、山西等地都有造纸业。宣州府泾县出产的纸名“玉版宣”，又名“宣纸”，它以檀树皮为原料，纯白、细密、柔软、均匀，质地坚韧，吸水力强，由于质量上乘，被列为进贡朝廷的贡品，后来成为中国传统的文房四宝之一。新疆等边远地区也有造纸业，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新疆吐鲁番哈拉和卓旧城出土的唐代写经纸就是一种纤维紧密均匀的植物纤维纸张。此外，纸张加工技艺有不少创新，出现了一些进行各种装饰的纸张，比如染色、印花纸，加蜡处理的“硬黄”纸，用金银粉装饰的“金花纸”、“银花纸”、“洒金银纸”等，还发明了“水纹纸”和“研花纸”。一些加工纸张十分名贵。

社会对于纸的需求量很大，由于纸张产量大增，因而用途也不再限于书写、绘画，而是扩展到官府、商家的文书、账簿、祭祀烧的纸钱，并用于造灯笼、糊窗户等，从而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唐代时，中国的造纸技术还传播到了中亚地区，并由此陆续传到西亚、北非和欧洲。

## 二、星像图与大衍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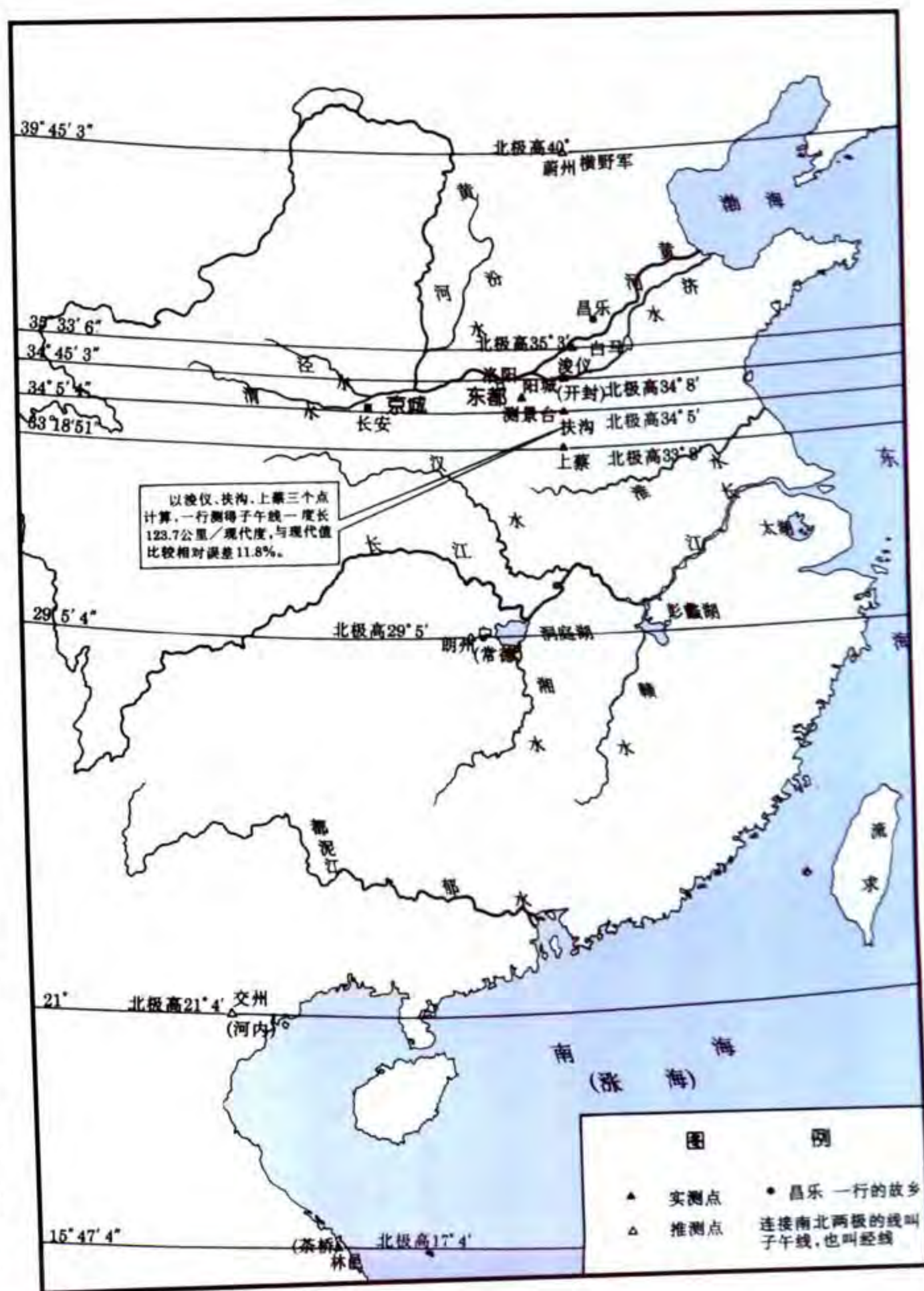
日月运行、星辰流转等天文现象自上古以来就是人们热衷探讨、破解的自然之谜。由于中国古代有着将人事兴亡与天象变化密切结合的思想传统，因而天文星象及与之相关的历法成为受到特别重视的科学门类。唐代是天文、历法科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

敦煌石窟曾发现一幅绘于唐初的绢质星图，上面绘有1350多颗星，按照每月太阳所在的位置，分12段将赤道附近的群星用圆筒投影的办法画出，手法与现代投影法相似。

它是世界现存最早的星图，现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它证实了唐朝人对于天文星体的观测、认识水平。

天文与历法密切相关，唐代近三百年中，曾先后修订了八次历法。唐朝初建，便制定并颁行了新历。唐高宗时，又颁行了李淳风制定的麟德历，这部历法受到后代好评，被认为是当时较为精密的历法。李淳风还在前人基础上进行改进，制造了新型的浑天黄道仪，以便更准确地观测日月星辰的运动。但是这一仪器不久就亡佚了，未能流传下来。

盛唐时期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天文、历法 僧一行测量子午线示意图





学家僧人一行(683—727)。他的成就将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学推向了新的高度。

一行自幼博览经史,尤其精于天象、历法、阴阳、五行等学问。开元初年,由于麟德历行用已久,误差较大,唐玄宗征召一行进京,命他主持修订新历。一行接受使命后,为使历法与实际天象相符,要求实际观测太阳位置与运动。在朝廷支持下,一行请梁令瓚等能工巧匠制造了黄道游仪与浑象仪。后者发展了前代张衡的水运浑象,以水激轮,一天一夜运转一周;并且安装了自动报时器,由两个木人每一刻自动击鼓、每一时辰自动撞钟,这在天文钟与机械史上都是一大创造。一行利用这些仪器进行观测,取得了关于日月星辰运动规律的新资料,在天文学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由此出发,在制定历法中采用新的数据,提高了精确度。

为使新历法适用于全国各地,他还领导了在全国疆域内的大规模的地理测量工作。测量选择了十二个点,内容包括北极高度,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日太阳在正南方的日影长度。从实测中,一行得出了南北两地相差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北极高度相差1度的结果。换算为现代计量单位,就是南北相距129.22公里,北极高度相差1度。这个数据实际上是地球子午线1度的长度。一行的数据与现在的测量值111.2公里相比虽然误差较大,但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用科学方法进行的子午线实测,是中国古代科学家对于世界科学的一个重大贡献。

经过一系列实测准备后,一行最终编撰成新历——大衍历。大衍历被认为是当时最精确的历法,较为正确地掌握了太阳运动的规律。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历法体系的完全成熟。直至明末采用西方方法编历之前,各代修订历法都是仿效大衍历的结构模式。

唐代还出现了王希明《步天歌》这样的通俗天文学著作,它以七言诗歌形式讲述星图中的星官与星辰,是一部优秀的科学普及作品。与敦煌出土的星图一样,它们都说明了天文知识在当时的流传与普及。

### 三、地理图志

敦煌石室中曾发现唐代所修《沙州都督府图经》、《西州图经》等地方性的方志抄本,内容包括建制沿革、地理位置、山川、河湖、池沼、户口、城镇等,还有一幅地理图残卷。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唐朝最早的地方志原件。这些地理著作都是采取以图为主,附以说明文字的形式。它们反映了唐代地理学的发展。

由于疆域辽阔,唐朝统治者迫切需要了解各地的山川风俗、户口物产,以便进行有效治理,所以很重视编纂全国性的地理著作。朝廷要求地方政府进行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并定期奏报中央。图经五年一修,每年上报朝廷。

地理学在政府的支持下得到了很大发展,地理著作大量出现。最早的著作应推唐太宗四子李泰组织编写的《括地志》,这是一部规模巨大的地理总志。全书五百五十卷,叙述了唐初十道、三百六十州、一千五百五十六县的政区沿革、山川形势、关津故城、亭台殿堂、河流沟渠、风俗物产、名胜古迹、人物故事、冢庙寺观等。最为著名的私人著述是贾耽的地理著作、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以及僧人玄奘的《大唐西域记》。

贾耽(730—805)曾任宰相,他好学而尤其钟情于地理学,数十年间不断致力于探查各地地理、风土等。他编纂、制作的地理著作与地图中,最重要的是《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和奉唐德宗之命绘制的全国



大地图《海内华夷图》。《海内华夷图》是古代著名的地图，图广三丈，纵三十三尺，比例尺为一寸折一百里。图中以黑色书写古时地名，以红色书写当时地名，以便辨认，这一创造为后世历史地图沿用。可惜这幅地图早已亡佚。

李吉甫(758—814)的《元和郡县图志》是流传下来的古代著名地理著作。李吉甫也曾任宰相要职，为了给统治者提供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管理必需的地理知识，他于晚年著成《元和郡县图志》五十四卷。这是一部全国性的地理著作，记述了当时全国十道所属各州县的沿革、交通、山川、户口、贡赋及古迹等。此书原本附有地图，由于附图于南宋时亡佚，所以后来便只称《元和郡县志》了。这部书被后人评价为“体制最善”，后代同类著作虽然有所损益，但大体不出其范围。它至今仍是历史、地理学研究者必备的重要典籍。

由僧人玄奘(596—664)口述、辩机笔录的《大唐西域记》，是一部关于西北边疆和中亚、南亚的地理著作。这部传世名著记述了玄奘经过的一百一十个国家、地区与耳闻的二十八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风土人情、气候物产等情况，不仅使当时人开阔了眼界，增进了对外面世界的了解，而且为后世直至当代研究古代中亚、印度等国家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 四、《新修本草》与千金方

《新修本草》是唐朝政府组织人力编撰的，它是中国第一部由国家颁行的药典。

唐代中医、中药学有很大发展，制定一部新的本草是社会的需要。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唐政府组织长孙无忌等高官与专家数十人集体编修新本草；同时颁布命令，征



孙思邈像

集天下药物，以供编书。两年之后，《新修本草》撰成并颁行天下。全书分五十四卷，分为药图、药经、本草三部分，图文并茂。共收入药物八百四十四种，除了纠正以往本草经籍的错误外，又增补新药一百余种；书中详细记述了药物的性味、产地、功效及主治的疾病。《新修本草》颁行后，很快流行全国，对于医家统一、合理用药起了积极作用。但这部书未能全部保存下来，只留有部分残卷，现存有一些影刻、影印本；此外，后世本草书中保存了它的一些内容。

唐朝还有两部举世著名的私人医药学著作问世——《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

孙思邈(581—682)被后世尊为“药王”。他一直生活在民间，常常亲自上山采药，进行试验研究，并且关心百姓疾苦，治病救命，受到民间爱戴。今陕西耀县城东的风景胜地五台山，被称为“药王山”，传说便是孙思邈的隐栖故地。那里的摩崖造像精美异常，还保留了历代一百五十多通名碑。其中一些碑刻如“千金宝要”、“海上方”、“孙真人进上唐太宗风药论”等名碑记录了孙思邈的医学





《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理论与药方，弥足珍贵。此外，还有供奉孙思邈的殿堂与传说中的药王洗药池及手植柏树等。虽然这些遗迹多半是后人附会，但是

足以说明这位视人命若千金、悬壶济世的药王深入人心的名望。

孙思邈是唐初的名医，在一生医学实践的基础上，他对医术与药物进行了数十年不懈的求索、研究。鉴于当时的医方书籍卷帙浩繁，寻检困难，往往耽误治病救人，他花费毕生精力，编成了简易实用的两部医方书——《千金要方》三十卷与《千金翼方》三十卷。这两部书是孙思邈集五十多年的临床治疗和采集、应用药物的经验，结合历代医学典籍编撰而成。内容包括中医理论与各科临床诊断、治疗、针灸、食疗以及预防、卫生等，收录了八百余种药物和五千三百多个药方，记载了各种药物的采集、炮制以及治疗方法、医药知识等。孙思邈兼采前代各医家之长，又不拘古代医经、前人旧说，结合自己的实践，大胆创新、发展，开创中医学一代新风。这两部书在中国医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提梁银药锅

唐 煎药用具

1970年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

通高18.5厘米，口径19.3厘米





带盖银药盒  
唐 藏药用具  
1970年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  
出土  
高2.9厘米，口径4.3厘米

## 五、飞火：火药走向战场

如果说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造纸、印刷、指南针三项大有益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话，那么火药的发明对于当时的人类，或许只能说是一种弊大于利的创造。它原本萌发于人们对长生不老、成仙得道的追求，最终却成了人类自相残杀的工具。

火药从炼丹炉走入战场，是在唐代末期。据研究，至迟在唐哀帝天祐年间（904—907），中国已经正式使用火药武器——飞火，即用弓箭或抛石机将火药团射到敌方城楼上。这种兵器将远射与燃烧结合在一起，增强了远距离的杀伤力。火药武器的使用使得中国军事战争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从冷兵

器时代进入了热兵器时代，因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为此后宋代发明爆炸性火器奠定了基础。从此，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战争与残杀上升了一级，血腥味更加浓烈。

## 六、数学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城市、水利等各种工程的兴建，尤其是天文、地理学的进步，也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唐代国学中设立有算学馆，专门培养数学人才。生员们主要学习“十部算经”，其中包括唐朝人王孝通所著《缉古算经》。为了加强数学教育，唐高宗还曾令太史令李淳风与算学博士注释古代的算经，作为教科书，“十部算经”等古代算术经籍因此得以流传后世。



## 第九章

# 多彩的社会生活



### 第一节 衣食住行

#### 一、服饰·发髻·化妆

五彩缤纷的唐代绘画、壁画、彩塑、陶俑等艺术品的流传或重现于世，使得人们对于唐朝人的服饰已不陌生。

《礼宾图》、《步辇图》以及诸多文武官员陶俑使得唐代皇帝、官员的冠冕袍服清晰地呈现在后人面前。《簪花仕女图》、《捣练图》等生动刻画了唐代贵妇仕女高髻华服的美丽形象。永泰公主、章怀太子墓等墓葬中数不清的壁画、陶俑展现的多彩服饰更令人眼花缭乱。而众多胡服男女陶俑又使我们有幸领略唐代服饰流行的胡风胡韵。

从服饰风格角度论，唐朝是一个绚丽多彩、浓艳张扬的时代。

#### （一）男装与官服

唐朝男子服装分为常服与冠服（或冕服），也就是便服与礼服两类。

常服是贵族官僚以及平民百姓日常穿用的，款式、质料虽因贵贱贫富而千差万别，但主要部分基本相同，一般都是头戴幞头，身穿圆领袍衫，腰系革带，脚穿皮靴或履。

幞头，又称“折上巾”，是一种裹发的头巾。一般是用黑色布帛、纱罗等制成，有的里面加上衬物，可以折叠成各种形状，包裹住头发，外面一般上翘或下垂两翅、两脚。早期为软裹，微向前倾，后期逐渐演变为硬裹。据说它起源于军旅之中，后来流行起来，成为日常装束，皇帝、百官以及平民百姓都经常使用。唐代幞头式样很多，而且随时尚不断翻新变化。此外，也戴帽子，帽子有纱帽、毡帽、席帽、锦帽、羊毛制的浑脱帽等。长度过膝者有袍和衫。袍是夹或绵制，衫是单



衣，以圆领为多，有宽袖，也有窄袖。袍衫内可穿汗衫或夹，绵短袄；袍衫外束带，还可加穿“半臂”，即半袖外套。袄子是冬天穿的，比袍短。内穿裤，有单、夹、绵等不同种类。承袭北朝风俗，男子也穿裤褶，即大口裤。从唐代壁画等留下的图像看，劳动者所着袍衫往往较短，显然是出于劳动的需要，一般多是本色麻布制作。士人未入仕常穿白色袍衫，平民则多着褐、皂色或本色麻布粗服。脚下着靴或履，靴一般是皮革制作，履用丝、麻、棕、藤、草等编制。麻鞋与草鞋都是下层百姓经常穿用的。

冠服是皇帝、百官在朝会等正式场合穿戴的服装。为了体现皇权的威严和严格的等级制度，唐朝对于皇帝、太子和百官冠服有繁缛的规定，总体样式是宽衣博带、高冠革履。

皇帝冠冕中有衮冕、通天冠、翼善冠、进德冠、远游冠、白纱帽、乌纱帽、平巾帻等十几种名目，以与服装搭配使用。其中衮冕最为常用，即冠上置冕板，两端垂珠纓。衮冕服的纹饰是左右膊上绣日、月各一，领后绣有星辰，此外还有排列成行的山和龙，上衣用深青色，束宽革带，带上系佩、绶、印章等饰物。敦煌莫高窟 220 窟壁画为唐初绘制，画中皇帝的冠冕前后垂旒，上衣深青，下裳绛红，脚下着履，应该与唐初皇帝冠服式样近似。冠服穿着繁琐，所以除了重大祭祀、朝会外，皇帝一般都穿常服。也有人认为，盛唐后除了衮冕外，其他冠服基本上形同虚设，皇帝冠服日益向常服靠拢。《步辇图》中乘坐辇车的唐太宗和大臣、侍从们，都身着长衣，头戴幞头，脚穿靴子，穿的就是常服。唐初确立了赤黄色为帝王服色，皇帝常穿黄色袍衫。

百官的冠服包括朝服，为陪祭、朝贺、礼



男陶俑

唐

1958年陕西西安杨思勳墓出土

高52.5厘米



麻鞋

唐

1972年新疆吐鲁番出土  
长25厘米



《帝王图》(壁画, 临摹)

唐

敦煌莫高窟第220窟



宾、大宴会等重大场合穿用，依品级有严格等级规定，有弁服、进贤冠、法冠、平巾幘、黑介幘等名目；还有公服，比朝服简便些，为

平常公事场合穿用，式样、颜色、纹饰及饰物也有等级差别。唐代《礼宾图》中有三位接待贵宾的唐朝大臣，他们都是峨冠博带、长袍大袖，显然是着朝服盛装。唐前期还规定了百官的服色，即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妻子随丈夫服色。颜色之外，各品级服装质料、纹饰有等级差别，所佩的腰带、饰物也有玉、金、银、铜、铁等差别。此外，官员还有鱼袋与佩刀等饰物。服色虽然各个时期规定有所变更，但是以紫、绯（或朱）、绿、青四色区别官品高下，逐渐形成常制，并为后世所沿袭。

从总体上看，唐初制定的严格、繁缛的服制，在此后近三百年间有日益松动、简化的趋势。

## （二）妇女服装

唐代的女装是中国古代妇女服装史上的华彩篇章。唐代仕女画中那些盛装的仕女形象，总会令人惊叹她们服饰的浓艳与华美。

与男装一样，妇女服装也有便服与礼服

三彩女坐俑

唐

1953年陕西西安出土  
高28.5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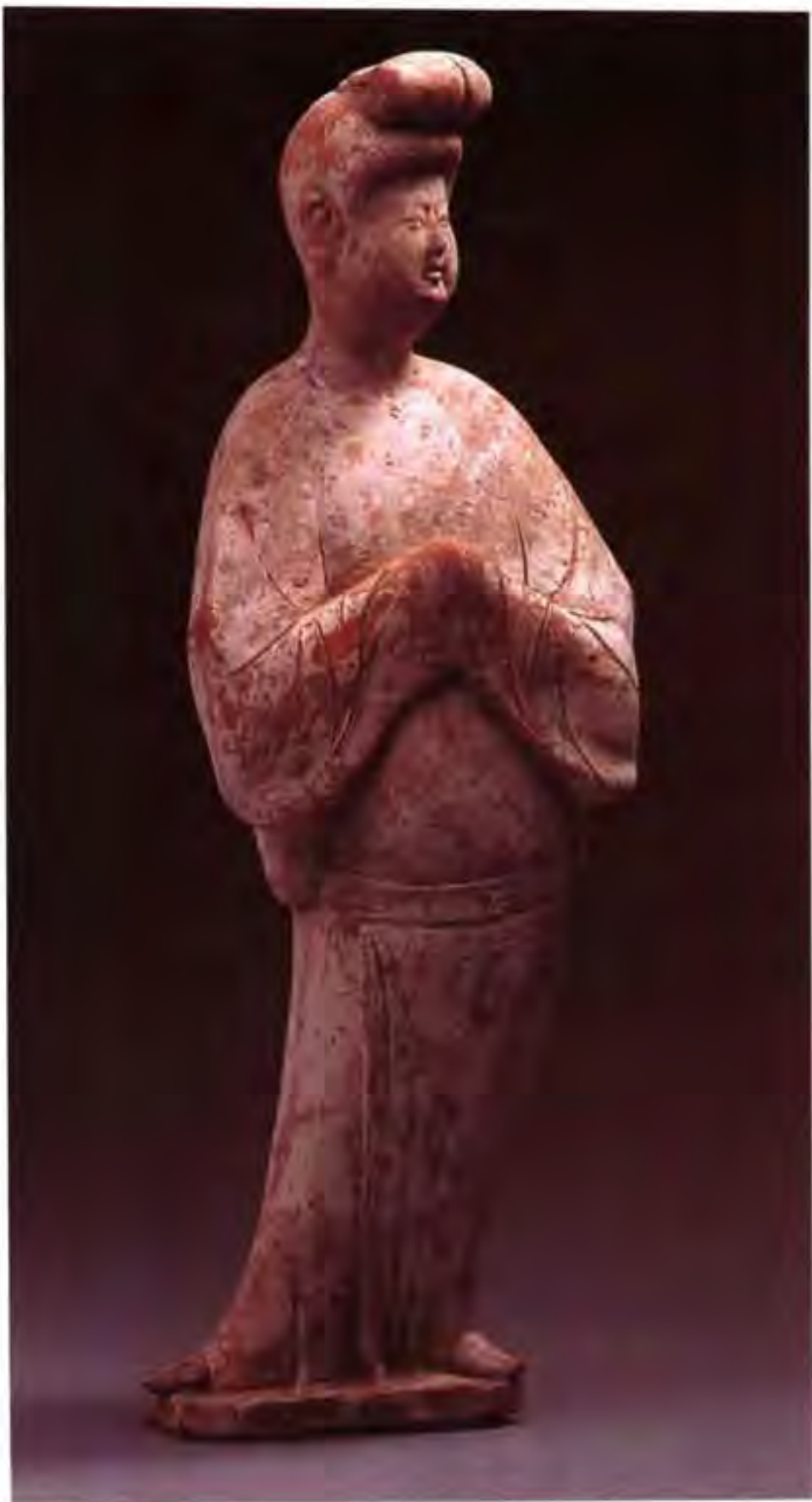




之分。与男子一样，宫廷后妃与贵族命妇也有冠服制度，按照等级身份规定了她们在礼宾、宴会等正式场合穿戴的衣着、首饰等等。如皇后有祔衣、鞠衣、钿钗礼衣三等礼服，颜色、式样、佩饰各有不同，分别在受册、助祭、朝会、亲蚕、宴宾等不同场合穿用。命妇与女官依品级、场合的不同也有翟衣、钿钗礼衣、礼衣、花钗礼衣、大袖连裳等形制不同的礼服，同时佩戴不同数量的花钿以及佩、绶等不同饰物。事实上，妇女穿用礼服的场合极少，而且随着风俗的日益奢靡，严格的服制被打破，到后期，妇女服装基本上是各随所好，贵贱无别了。唐代艺术作品中常见的女装主要还是便服。便服没有什么等级限制，妇女可以随心所欲根据时尚和爱好选择穿戴，尤其是随时尚变化，花色、式样不断翻新，因而显得多姿多彩。

妇女服装款式千变万化，但主要部分还是衫（或襦、袄）、裙、帔三大件。

衫、襦、袄都是短上衣，衫是单衣，襦、袄是夹或绵的。衫袄用布、罗等制作，有红、绿、黄、绯、白等各种颜色，襦上还常绣有各种花样。衫袄有并领、交领、翻领、圆领等样式，盛唐时期还有半袒前胸的低领口样式，有人称为“袒领”。衣袖或宽或窄，一般



穿男服女陶俑

唐

1953年陕西西安杨思勳墓出土

高51厘米

来说，唐朝前期衫袄较短小，衣袖较瘦，后来逐渐流行宽大，袖子也越来越宽。

裙子特点是较肥长，束在上衣外面，一般流行束得较高，及于胸前，因而显得更长。裙子常用六幅布帛拼制而成，大约相当于3米多宽，更讲究的则用七幅或八幅布帛。唐



绛红罗地蹙金绣半臂

唐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



戴帷帽骑马仕女泥俑

唐

1973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

出土

高46厘米



富贵人家妇女追求奢靡华丽，有的裙子打几十个褶。裙上还有印花、刺绣、绘画、穿珠、镶宝等各种装饰。腰上系带，带上结有各种花样，长长垂下，平添风采。

帔是一种长披肩，搭在肩背上，飘垂到腰间，又称“帔子”、“帔帛”等，是由西域传入的服饰，唐代妇女穿用很普遍。帔有很强的装饰作用，一般用绫、帛、丝、罗等较轻薄的织物制成，颜色多为红、绿、黄、紫等。此外，还有半袖外衣，套在窄袖上衣外面，式样与男子“半臂”相似而略有不同，女子半袖外衣多为对襟，领口较低。这种服饰也是由西域传入的。永泰公主墓壁画中的侍女帔帛之下，可以清楚看到身穿这种半袖外衣。

妇女服装颜色没有什么限制，唐代流行较为艳丽的颜色，尤其是红色更为妇女所喜爱。不同颜色的衫（襦、袄）、裙与帔、“半臂”搭配，加上各种饰物，使得妇女服装格外色泽缤纷，艳丽夺目。不过，这些服饰主要是中上层社会妇女穿用的，下层贫穷妇女常穿青色衫裙，而作为贱民的婢女服装颜色

前期，裙子一般较瘦，后期走向宽肥。裙子多以绸、纱、罗等织物制成，颜色以红、黄、绿居多。红裙被称为石榴裙，最受喜爱与欣赏，唐诗中有许多吟咏石榴红裙的诗句。裙上打褶，有单色，也有几种颜色间隔制成的。

《宫女图》（壁画，临摹）

唐

1961年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

出土





基本上都是青、绿色，所以“青衣”成了婢女的代称。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唐代妇女有一种领口低开、半裸前胸或不着内衣、仅披轻薄纱罗而裙腰高束的服装样式。我们在唐墓壁画中就可以看到宫女们半袒前胸、微露双乳的形象。这种服装风格很受时人崇尚，唐人有许多诗句吟咏女子“粉胸半掩凝暗雪”、“半露胸如雪”的美丽。这种唐代特有的大胆、浪漫的妇女服饰风格，体现了唐人对于女性身体自然美与性感美的欣赏，也从一个角度反映出唐代社会风气的开放、礼教束缚的松弛。

妇女外出尤其是骑马出游，戴帽子很普遍。女帽样式很多，最有特色的是幂䍦和帷帽。幂䍦也来自西域，尖顶，形如斗笠，帽沿下垂有布帛，长可过膝，既防风沙，又可遮住面目、身体。唐初北方妇女出行常戴幂䍦。此后逐渐改革，形成了帷帽，帽沿垂下的布帛或纱网变短，只及脖颈处。这种帷帽起初也是旅行者为遮蔽风沙而戴，后来流行起来，妇女出行也常戴它。到盛唐时期，帷帽也退出时尚舞台，妇女喜戴胡帽。胡帽自然也是来自西域、吐蕃等少数民族，它们样式不一，多为尖顶，以皮毛或毡等制成，上面还常绣花。女鞋包括靴与履，履用锦、布、线、草等做成，式样常有变化，有高头、小头、平头等。高翘式履头很盛行，在唐代绘画上常可见到仕女们履头高翘。妇女外出骑马多穿靴子，日常一般多着线鞋。有些地区的妇女也穿木屐、皮屐。

唐代妇女还有穿着男装和胡服的爱好和风气。她们不仅穿男式的袍衫，而且戴幘头、着靴子，与男子服饰完全一样。在唐代壁画、陶俑中可以看到不少男装宫女形象。胡服也曾是妇女时装，受到妇女的喜爱，窄袖紧身、



《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供养像》  
(壁画，临摹)

唐  
甘肃敦煌莫高窟第130窟壁画临摹

反领左衽、皮靴毡帽的胡服妇女形象比胡服男子更为常见。

### (三) 发髻与化妆

唐代妇女发髻式样繁多，而且随时尚经常变化。留下的发式名称就有几十种，如半翻髻、反绾髻、乐游髻、双环望仙髻、回鹘髻、愁来髻、归顺髻、凌虚髻、祥云髻、朝云进香髻、奉仙髻、飞髻、百合髻、抛云髻、抛家髻、慵来髻等等。

我们看到的发式形状，比较常见的有高髻，即发髻高梳于头顶。《簪花仕女图》等绘画与壁画中的盛装仕女都是高髻，这应该是盛装时的发式；也有的发髻虽然堆于头顶，但并不高，这应该是平民妇女或仕女的日常发式。另有一类是垂髻，如著名的“倭堕髻”，即发髻偏垂于一侧，如同堕下，显得俏丽、风流。还有一类常见发髻是双髻，这是侍女与未婚少女的常用发式。她们的发髻都是中间



双髻、高髻陶女俑

唐

分别高31.4厘米,31.6厘米



银簪、银钗

唐

分别长33厘米、29.6厘米、  
29厘米

分开,有的梳成圆形,有的梳成环状,位置或高或低,有上翘,有平梳,也有垂于两侧的,所以唐朝诗文常称婢女为“双鬟”。假髻



也很流行,有用头发,也有用木头做的,有的还涂上黑漆或彩色花纹。发髻上常常插戴簪、钗、步摇、梳子等各种金玉首饰和花朵作为装饰。以梳子作为装饰很流行,有的妇女头上甚至插戴十几把梳子。唐代仕女画中的盛装仕女高髻上插戴大朵牡丹,美丽而华贵。这种形象成为一种鲜明的唐代风格。

妇女化妆风格偏向浓艳,颜面化妆花样纷繁。我们见到的唐代女俑,小小的面孔往往是浓妆艳抹,粉面桃腮,柳眉红唇,还有多样妆饰。

颜面化妆最基本的程序是涂粉与胭脂。粉一般是白粉,但也有朱粉。除了涂于面部,由于妇女常穿露颈袒胸的服装,在颈、胸、手部也常涂粉。两腮则多“施朱”,即涂红色胭脂,所以诗文多称“红妆”。唇上涂口脂,以红色为主,也有粉红、黑色,涂饰的唇形也有多种花样,并且不断变化。

除了这些常见妆饰外,还有几种妆饰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

唐代妇女格外重视眉毛的修饰,而且眉毛式样不断变化,各时期有不同的时尚。唐诗有“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的名句,诗人虽然另有深意,但也反映了女子对于画眉的重视和时尚的不断变化。唐玄宗曾命画工作《十眉图》,有横云、斜月等十种美妙名称。在如今能见到的唐代妇女形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式样的眉毛,其中尤以类似宽大树叶的阔眉式样最为独特有趣。画眉一般是用黑色,但是也流行过“翠眉”,也就是画绿色眉毛。受吐蕃风气影响,唐后期还流行过倒八字眉。与历代相比,唐代妇女对于眉毛的修饰可算达到了极致。

面部妆饰还有许多花样。一是在额头涂黄粉,称作“额黄”,唐诗中有不少关于“额黄”的描绘。二是用绸布、金箔或彩纸剪成



各种花样，贴在眉心，称作“花子”或“花钿”，从唐代妇女形象中可以看到有圆形、菱形、月形等式样，颜色主要是红、绿、黄。三是在两颊点上红、黄色斑点或月、钱等图样，作为妆饰，称作“靨”或“妆靨”。四是在两颊各涂上一抹红色，以增妩媚，称作“斜红”。在出土的唐代女俑颜面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化妆花样。

中唐时期，妇女曾流行化“胡妆”。白居易详细描绘了元和时期妇女流行的“时世妆”：“女为胡妇学胡妆，……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鬓椎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这种来自吐蕃的胡妆，成为当时妇女竞相追求的时尚。

## 二、饺子·点心·胡食

新疆的唐代墓葬中曾经出土饺子、馄饨、胡饼、面条与各式花样的点心，它们的形状几乎与当代食品一般无二。在如此边远的地域，食品已可以和今日媲美，可见唐朝人的饮食生活已经非常丰富、发达。

根据文献与出土文书的记载，可知当时北方地区包括首都长安，人们的主食以粟米（黄米类）饭和麦子做的面食为主。皇室贵族可以享受到南方贡奉的稻米，但是日常食用稻米较少。而南方地区则以稻米饭为主，也可以吃到面食。

主食品种极多，可以分成饼、糕、饭、粥几大类。其中多种来自域外的“胡食”，在当时非常流行，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食品。唐人生活的胡化风气在饮食中表现得极为明显。

面食以饼的种类为最多，实际上包括了今天的馒头、包子和面条等，只是当时都以



镶绿白料饰鎏金铜镜

唐

1955年陕西西安出土  
直径4.8厘米



女舞俑面部

唐

1973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  
高31厘米

饼为名而已。饼的种类有：胡饼、蒸饼、煎饼、薄饼、烧饼、笼饼、米饼、汤饼、环饼等，面食还有饅饅、餠子、饅饅等名目。这些面



食有蒸、烤、煎、炸、煮等各种制作方法。蒸饼是蒸食的馒头类食品，只是形状可能比馒头稍扁平一些。胡饼、烧饼、饅饅都是当时人常吃的从西域传入的食品。胡饼类似今天新疆的馕，个头多半很大，有一般胡饼，也有油胡饼、肉胡饼和胡麻饼，胡麻饼类似今天的芝麻烧饼。白居易在忠州任上曾经给友人寄送胡饼，诗中说：“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可知当时胡饼不仅长安人常吃，川蜀地区也已制作胡饼。饅饅有人认为可能是一种带馅的面点。飰子，在唐人著作中经常出现，是当时人常吃的面食，有人认为是一种油炸的带馅圆形面点。环饼也是一种油炸面食，据说类似今日的馓子。汤饼也称煮饼，是放在沸水中煮食的，一般认为就是面条。夏天吃凉面，称作“冷淘”。煮食的面食中还有馄饨，它形如弯月，内装馅料，放入水煮，类似今日的水饺。飰饅是用刀切或手搓成条、块状，放入水煮的面食，有人认为类似今日北方流行的“拨鱼”。当时长安市场有许多卖现成面食的店铺。

新疆吐鲁番唐墓曾出土了一组正在进行炊事劳动的女俑，四个女子分别簸粮、舂捣、推磨和擀面烙饼，旁边还放置一个饼釜，上面正烙大饼。这组陶俑不仅再现了唐代妇女的劳动形象，而且反映了当时人制作面食的情形，因此特别珍贵。

糕，应该是较为精细的点心类食品，可以用面也可以用米制作，史书记载有水晶龙凤糕、玉露团等很多名目。新疆出土的各式花样的面食也应该属于精制的点心类食品。此外，还有米做的粽子等点心类食品。

饭包括稻米饭和粟米饭、麦饭、豆饭等，粥有粟米粥、稻米粥、麦粥、面粥等，都是当时人最常吃的食物。也有加上调料、药物的各种精细做法，如青精饭、团油饭、王母饭、雕胡饭、茗粥、饴粥等。

由于民族间和国内外交流的频繁，唐代副食品种也空前增多。一般常吃的肉类有牛、羊、猪、马、驴、鹿、鸡、鸭、鹅、鱼、虾、蚝、蚌等。北方主要食肉，受游牧民族影响，羊肉尤其占主要地位，而江南以鱼类、

饺子、点心

唐

1972年新疆吐鲁番出土







陶磨、陶碾、陶碓和陶井栏  
唐  
1954年山西长治王琛墓出土

水产品为主。豆腐等素食制作方法也非常精细多样。蔬菜有葱、韭、姜、蒜、瓜、葵、菠菜、芹菜、萝卜、葫芦、芥菜、蔓菁、莲藕、芋头、竹笋、藜藿等，还有新引进的茭苳、菠菱等。酱菜也是常用食品。常吃的水果有葡萄、枣、石榴、柑橘、甜瓜、梨、李子、桃、樱桃、荔枝等。吃糖与甜食也很普遍。

随着食物品种的增多和调料的丰富，烹饪技术也有很大提高。唐代的美味佳肴种类丰富、名目繁多。宴会菜品更是极其丰盛，席上常有几十种花色品种，名贵菜肴数不胜数，并已出现美观的花式菜点。长安还有专门承办酒席的食店，三五百人的饮食立等可办，可见饮食业的兴旺。



劳作女泥俑群  
唐  
1972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  
高9.7厘米至16厘米





白瓷茶瓶

唐

1956年河南陕县出土  
高16.7厘米，口径9.6厘米

### 三、茶具·茶经·茶道

众所周知，饮茶之风源自中国古代，但中国古人是如何饮茶的，人们却不甚了解。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整套

唐朝晚期的茶具，其中包括烘焙器、碾筲器、贮茶器、烹煮器、饮茶器等，让现代人第一次看到了如此精致、考究的中国古代整套茶具实物，从而得以领略古人煎茶、饮茶程序的繁复与讲究。

饮茶之风并不始于唐代，但是至唐代大盛并普及于各地。唐初饮茶风气主要盛行于南方，北方饮茶的人不多；盛唐以后，从坐禅僧人开始，饮茶风气开始普及、推广，此后逐渐成为南北各地僧俗、贵贱各界的普遍习俗。

由于“风俗贵茶”，唐代茶园面积空前扩大，名茶种类繁多。当时茶树种植遍及今四川、陕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江苏、贵州、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三四十个州，其中上等茶产地有峡州、光州、湖州、彭州、越州等；还出现了众多名品，如剑南蒙顶石花、湖州顾渚紫笋以及天柱茶、阳羨茶、紫英茶、祁门茶等。有的学者推断，唐代的茶叶年产量曾高达上亿斤。随着饮茶的普及，各地城乡集市卖茶的店铺林立，行人投钱即可取饮。茶已成为贵贱皆嗜饮，与米、盐一样不可须臾离开的日常食品。



鎏金莲瓣银茶托

唐

1957年陕西西安出土  
高4厘米，口径17.4厘米



当时制作茶水有两种不同方式，即冲茶与煎茶。冲茶较为简单，即将茶末放入瓶缶中，用开水冲灌后，即可饮用。煎茶即煮茶，程序较为繁琐，主要有几个步骤：首先需将饼茶炙干、碾碎、箩好，成为细茶末；然后煎水，对水的要求很高，需要选择好水；待水沸到一定火候时加入茶末，用竹器搅动，还可加入盐以调味；最后分入茶盏饮用。每个步骤都极为细致、讲究，尤其重视火候与手法。法门寺出土的成套唐代茶具就印证了上述的煎茶过程。煎茶成了一种专门的技艺，有专门从事此道的“煎茶博士”。至晚唐时代，又出现了“点茶”法，即先将茶末放入茶盏中调成膏状，然后注入沸水进行搅动，然后饮用。这种点注方法也很讲究技巧，据记载，有的点茶能手在注水搅动时，能使水纹显现出各种图像。

由于饮茶风气的盛行，唐代还出现了专门论述饮茶的专著，其中最著名的是《茶经》。《茶经》的作者陆羽（约733—804），字鸿渐，是中唐时期人。他嗜茶成癖，隐居苕溪，撰成此书。书中分为十题，即“茶之源”、“茶之具”、“茶之造”、“茶之器”、“茶之煮”、“茶之饮”、“茶之事”、“茶之书”、“茶之略”与“茶之图”。该书对于茶的性状、品质、产地、种植、采制、烹饮、器具都作了详细的描述。陆羽因此被后世奉为“茶神”、“茶圣”。

唐代诗文中有不少吟咏烹茶、饮茶的内容。诗人卢仝感谢友人赠送新茶，作诗赞道：“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神灵。七碗吃不得，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茶的妙用以及和文人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茶道”一词在唐代也已出现，更反映了当时烹茶、饮茶、



品茶已经不仅是解渴、满足口腹之欲的饮食活动，而且成了一种包含着精深技艺和高雅情趣的文化艺术享受。尤其是文人与僧人，更是将饮茶当作一种怡情养性、消愁解闷、悟道学禅的文化活动和待客交友之道。

葵口浅底白瓷茶碗

唐  
高4.3厘米，口径14.3厘米

#### 四、住宅·家具·车马

西安中堡村唐墓中曾经出土一套住宅模型。这套模型采用中轴线和左右对称的布局，由八座房屋组成，分前后两进，后院还有一座层峦叠嶂的假山与鸟儿嬉戏的水池。此外，山西长治唐墓中也出土有陶制的院落



鎏金飞鸿银笼子

唐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  
高17.8厘米，直径16.1厘米  
笼为盛放茶饼的用具。



## 三彩假山

唐

陕西西安出土



模型。这是生者为死者建造的另一个世界的居所，它们应该也是唐人现实生活住宅的真实写照。

从模型看，唐朝人的住宅已经与存留至今的明清以来的四合院民居基本相近。正中轴线先后排列着大门、中门、庭院、中堂、后院、寝室等，两厢对称，各有厢房以及厨房、厕所等房屋。后院中有的还有楼阁、亭台、假山等建筑。门上有门楼，大门处有的设立门

屏，以遮蔽内宅。规模更大的则分为几重院落，但每一重院落基本都是四合院格局，只是多了些楼台亭阁而已。根据记载，当时贵族住宅常常占地十余亩至数十亩，有的甚至占据了长安一坊之地。

贵富之家有的还在住宅中建造园林，或者在郊外另辟别墅，凿池堆山，栽种花木，供休憩游赏。唐代的私家园林不少，最有名的如王维的辋川别业、宰相李德裕的平泉山庄等，后者建造花费巨万，如同仙府。白居易晚年在洛阳也建造了“十亩之宅，五亩之园”的园林式庭院，园中水竹相映，亭台桥船俱全，诗人在其中吟咏休闲，待客交友，怡然自得。一些著名私家园林不仅是主人休憩、宴客之地，也常有公卿士大夫慕名前往游玩。

唐人的居室家具常见的有床榻、橱柜、几案等。陕西富平的李凤墓曾出土一件唐三彩小榻，为长方形，四周镂空，榻面还绘有花纹（现存陕西省博物馆）。榻即低矮的小床，是唐人日常坐卧的家具，在唐代绘画中很常见，李凤墓所出者为仅见的一件实物模型。另外，唐代家具最为突出的变化是出现了高足家具，因为它和古人席地而坐生活习惯的改变有着极大关系，所以颇为引人关注。这一时期出现的高足家具主要是绳床和椅子。绳床类似现代的靠背椅，最初主要是寺院使用，后来普及到民间，由此演化出了“倚床”，即“倚子”或“椅子”。椅子有用木材，也有用藤、竹等制作的。敦煌五代时期的壁画中有人肩扛椅子的形象，从画上看，当时的椅子很像带有靠背的较高的马扎。唐代后期，使用椅子已经很普遍。这说明古人已经开始从使用矮家具席地而坐，逐渐变为使用高脚家具垂腿而坐了。

唐朝人远途出行或是骑马，或是乘车。

## 三彩方柜

唐

1955年陕西西安出土

高13.5厘米，长16厘米，宽12.1厘米





男子多骑马，妇女多乘车。马是唐人的重要交通工具。上至皇家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男子出行多骑马。盛唐时期，由于社会风气开放，妇女外出也经常骑马。我们在唐代绘画与雕塑中可以看到许多妇女骑马奔驰的英姿。不过妇女乘车还是居多。此外，地位较低或贫穷的男女骑驴也很常见，有专门出租驴的行业，有的客店也养驴备客租赁。车以牛车为最多，可以载人，也可用于运输。有的车上装有毡棚和其他饰物。此外，还有马车、驴车、驼车等。车有的是私家的，也有专门对外出租的车家，出行或运送东西可以租赁。皇家还有专用的辇、舆类交通工具，这类交通工具没有轮子，需要人抬扛。《步辇

图》便表现了唐太宗乘坐辇舆的情景。老病的贵臣也被特许在宫廷中乘坐肩舆。与此相类的交通工具民间有些地区也使用，各地有篮舆、担子、兜笼等名目，一般妇女、老弱者常常乘坐。这类交通工具类似今日的滑竿，有的还装有顶棚与帘子。人们认为它们就是后世轿子的前身。

## 第二节 文化娱乐

### 一、郊游揽胜

《宫乐图》（摹绘）

《虢国夫人游春图》是传世的名画，画面 唐





## 青白釉陶牛车

唐

1957年河南三门峡出土  
高11.6厘米，长8.9厘米

将唐代贵妇骑马出游的场面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诗人杜甫的《丽人行》正为这幅画作了注解，诗中描写虢国夫人等贵妇的游春活动说：“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可见唐代妇女游春风气十分盛行。

唐朝人非常喜爱户外郊游活动，妇女也

不例外。每年正月新春直至三月清明节前后，都是人们春游踏青的好时节。长安、洛阳等大都市的市民或骑马或乘车，纷纷出城到郊外游玩。曲江池等风景名胜之地的园林、水畔处遍布着游春揽胜的男女们。人们还携带帐篷、餐具等等，选择景色优美之处，在草地上设席野餐，举行“探春之宴”。妇女们还常把红裙插挂在周围当作帷帐。人们饮酒谈笑，观景赏花，有的士人不拘礼节，在草地上脱衣摘帽，尽兴欢笑。

春暖花开之日，赏花又成为人们热衷的活动。长安、洛阳的园林、花圃中，游人如织，或驻足花树下观赏，或设席畅饮。百花中唐人最喜牡丹，每到春暮牡丹盛开时，市街上车马奔走，人们竞相寻找、观赏名花珍品，有的寺院、道观因为栽种牡丹而门庭若

## 蓝釉陶驴

唐

1956年陕西西安出土  
高23.5厘米，长26.5厘米



市。皇宫与官贵府第常常举行赏花活动与宴会，家中栽种牡丹的人家都要邀请亲友前来观赏。唐朝人对于花尤其是牡丹的喜爱达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皇家、贵族、士人无不醉心玩赏牡丹，宫廷中栽种品种名贵的牡丹，私家庭园也多栽牡丹。有的人为搜求奇花名品不惜一掷千金。妇女们喜欢佩戴牡丹，仕女画中美女发髻上常插戴鲜艳夺目的大朵牡丹。诗人们吟咏牡丹的诗句不可胜数，其中李正封的“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尤为著名，“国色天香”由此成了牡丹的代称。爱花、赏花风俗在唐朝一直盛行不衰，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色彩与乐趣。

春日里，妇女、儿童还喜爱荡秋千、放风筝等户外活动。荡秋千在唐代非常盛行，起初是宫女们玩，后来民间也流行起来。春季寒食、清明前后，风和日丽，绿草如茵，是妇女荡秋千的大好时节。诗人王建有《秋千词》描写少女荡秋千的情景：“少年儿童重秋千，盘巾结带分两边。身轻裙薄易生力，双手向空如鸟翼。下来立定重系衣，复畏斜风高不得。傍人送上那足贵，终赌明珰斗自起。回回若与高树齐，头上宝钗从坠地。”从诗中看，少女们用首饰赌输赢，看谁荡得最高。风



三彩骑马女陶俑

唐

1972年陕西礼泉张士贵墓出土

土

高36.8厘米，长26.5厘米

筝当时称为“纸鸢”，新疆阿斯塔那唐代壁画中有一幅儿童放风筝的画面，可以看到所放风筝和放风筝的情形与今天完全一样。

## 二、竞技运动

北宋画家李公麟绘有《明皇击球图》和《五王击球图》，描画了唐玄宗及五位亲王打

《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临摹)

唐

甘肃敦煌156窟壁画

宋氏是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的夫人。此图为宋氏夫人春游画卷。





马球的场面。陕西章怀太子墓中也有一幅唐人打马球的壁画。陶俑中男女骑马打球的形象更为活泼生动。西安大明宫遗址中还曾经出土一块石碑，上面刻有“含光殿及球场”、“唐大和辛亥岁乙未月建”字样。大和是唐中期文宗皇帝的年号，说明唐文宗时曾经在皇宫内修筑球场。诸多文物和文献记载都证实了球类运动在唐朝的盛行，而马球是最能体现时代风尚的一种运动。

唐代的球类运动是一种竞技活动，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杖击球，一类是以足踢球。

击球活动中，马球是最重要的一项，前

面所述文物表现的都是马球运动。

马球，当时称作“击鞠”，是从吐蕃传来的竞技运动。从绘画中看，球一般为红色，参加者骑在马上，持球杖纵横驰骋击球，双方对垒，以进球多少定输赢。这项运动在唐朝宫廷、贵族社会和军旅中极为流行。马球大约是唐初随着吐蕃人的进入而传入长安等地的，自唐中宗时开始，由于皇帝的爱好，首先在宫廷中兴盛起来。此后唐朝的十几位皇帝都是马球爱好者，有的还亲自参加比赛，唐玄宗、唐宣宗、唐僖宗都是马球高手。唐中宗时，吐蕃来使迎娶公主，宫廷中曾举行了一场马球比赛，由皇家亲王、驸马与吐蕃

骑马击球彩绘女陶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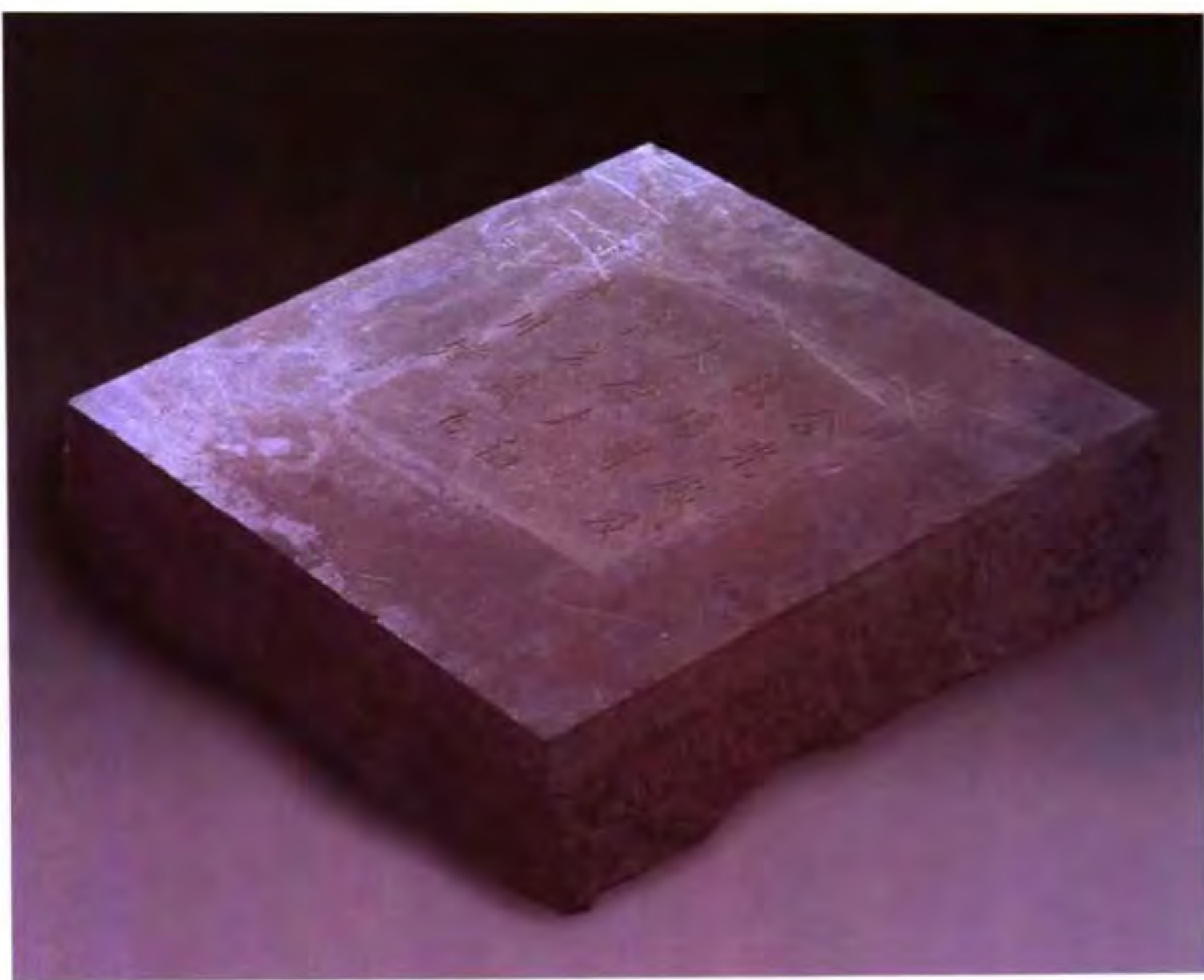
唐

1958年陕西西安出土  
高32厘米至36厘米





来使比赛。当时的临淄王李隆基东驰西突，所向无敌，皇家队最终赢得了胜利。盛唐时马球更为兴盛，唐玄宗每月都要和诸王打几次球。当时不仅皇宫中有球场，骊山华清宫、长安等城市以及各军州都建有球场。有的贵族家中也建有球场，一位驸马在家中修筑球场时，为免尘土飞扬，曾经用油洒地。为陪皇帝打球，宫廷中还设置有“打球供奉”，培养训练专业人才。由于这项运动与军队战斗相近，有益于操练士兵，所以曾被列为军队训练项目。军旅中经常举行马球比赛，中央禁军和地方军队中有不少军将都擅长打马球，有的还因此获得升迁。不仅武人，文士



含光殿“球场”石志

唐

1956年陕西西安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出土  
边长53.5厘米





也以此为乐为能，每年新科进士发榜后，照例要在月灯阁举行打球盛会，四面看棚鳞次栉比，常有数千观众。

由于马球运动非常激烈，常有受伤者，唐朝中期出现了骑驴击鞠运动。这种“驴鞠”较为平缓，不仅受到男子喜爱，宫廷和民间妇女也有参加者。另外，妇女还有徒步持杖打球活动，称为“步打”。王建《宫词》中有“寒食宫人步打球”的诗句，这种活动大约主要是宫廷妇女的竞技游戏。

踢球也是唐代流行的竞技活动，当时称为“蹴鞠”、“蹴球”。据研究，蹴鞠运动在唐代有很大发展与改革。所踢的球逐渐从实心改革为充气，有了球胆与外皮；另外，还设

置球门，两队角逐，各以射进多少球比赛胜负。这已经和当今的足球运动很相像了。宫廷中皇帝、宫女们都常进行这种活动，军队中也流行蹴鞠运动。踢球也有其他花样和竞技规则，有的比赛踢得高，最高能达到数丈；有的是几个人对踢，不让球落地；有的是一个人独踢，用头顶、肩膀等表演花样。总之，蹴鞠类活动不仅有两队进行的竞技比赛，也包括了其他各种花样的踢球技艺游戏。

拔河比赛是唐代宫廷经常举行的竞技游戏，皇帝、妃嫔们以之作为娱乐。唐中宗时命三品以上文武百官在宫廷球场上拔河，有的高官年老体衰，摔倒在地，半天爬不起来，惹得观看的皇帝、妃嫔们哄笑不已。更多的是宫女、宦官们举行的拔河比赛，有时皇帝高兴了也一起参加。这种游戏在民间也颇为流行，有些地区节日里常举行拔河活动，增添了喜庆欢乐气氛。

摔跤活动，唐代称为“角抵”、“相扑”，是当时极受欢迎的竞技表演活动。宫廷举行盛会，都有角抵表演，几代皇帝都爱好观看这种活动。宫廷中还设有专业的“相扑朋”，即专门的摔跤队，进行训练表演，供皇帝观赏。民间也广泛流行角抵活动，各种节日盛会，角抵是颇受欢迎的节目，常常观者如堵。街市、广场上常有角抵力士卖艺，其中还有妇女。

狩猎，是贵族阶层酷爱的野外活动。唐朝皇家贵族本出于军功世家，而且受游牧民族风尚影响很深，他们常常到山林或御苑狩猎，不仅消遣作乐，也用以显示英雄本色。章怀太子墓中有一幅狩猎出行壁画，生动再现了皇家的狩猎活动。画面上共有四十多个骑手，前面四匹轻骑开道，后面两匹骆驼载运物品。队列中一人执旗，数十骑并列，有的架鹰，有的抱犬，骏马劲健，四蹄翻飞，簇

三彩狩猎俑

唐

1972年陕西乾县出土  
高37厘米，长27厘米





拥着骑高头大马的主人，向前疾驰。画面上旌旗猎猎，烟尘滚滚，一派气魄宏大、热烈紧张的狩猎场面。永泰公主墓出土的三彩骑马狩猎俑也逼真地再现了唐人狩猎的英姿。

### 三、博弈游戏

新疆阿斯塔那唐墓中出土了一幅唐代仕女弈棋绢画。画中两位女子正在聚精会神地对弈，一位纤指中捏着棋子，正准备落下。棋盘清晰可见，与今日围棋很相似。

下棋是唐人日常喜好的最普遍的娱乐消遣活动。唐代流行的棋类游戏最主要的是围棋。围棋在唐代获得较大发展，至晚唐时代已经与今日的围棋相差不多。帝王公卿、文人学士、平民百姓中都有好棋者和棋坛高手。宫廷中翰林院还设置了“棋待诏”职位，召天下围棋国手专门研究棋艺，并陪帝王下

棋，因此出现了一些青史留名的围棋名家，如王积薪、顾师言等等。

对弈也是唐代妇女喜爱的娱乐活动，宫廷妇女更常以此消磨时日、排遣寂寞。“美人宫棋”成了诗人、画家津津乐道的题材，以此为题材的唐诗不可胜数，留存下来的绘画也不止上述一幅。唐代还流传一段女子围棋高手的轶事：翰林院围棋国手王积薪棋艺高超，一次投宿客店，灭烛之后，听见隔壁店主婆媳在黑暗中以口对弈，王记住了棋局，天明后复盘，自愧不如，于是拜店主为师，从此棋艺大长，天下无敌。这段故事不一定真实，但是唐代民间妇女喜好下棋于此可见一斑。

唐代还盛行一种与棋类相似的博弈游戏“双陆”。唐代仕女画中有双陆图，史书也有许多帝王后妃玩双陆的记载。这也是一种双



狩猎纹高足银杯及局部

唐

1963年陕西西安沙坡村窖藏出土

高7.4厘米，口径6.3厘米



方对阵的竞技游戏，有学者认为它的玩法与现代跳棋有点相似。唐玄宗在宫中玩双陆时，每到要输时善解人意的杨贵妃便放出白鹦鹉搅乱棋局。王公贵族有人沉溺于此，废寝忘食，民间有以此赌博者，有人甚至为此倾家荡产。

类似的博戏还有象棋、弹棋、叶子戏、选格、藏钩等等，这些都是人们日常消闲娱乐的游戏活动。

端午节前后百草竞生之时，妇女有“斗百草”的习俗，就是采摘各种异草，比赛各人的花色品种等。唐诗中有“归来见小姑，新妆弄百草”的诗句。“斗百草”可能主要是少女们的游戏。

大型博戏活动以斗鸡最为盛行，民间常常在清明节举行斗鸡活动，这是唐人的一大乐事。唐太宗、玄宗等几乎历朝皇帝都是斗鸡爱好者，民间也有许多热衷此道者。盛唐

时斗鸡达到极盛，宫廷中设立鸡坊，蓄养了千只雄鸡，并召集了五百小儿，专门饲养、训练并表演斗鸡。斗鸡小儿贾昌特别受宠，富贵显赫，以致民谣传言“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受宫廷风气影响，一时间长安城无论贫富男女，都以养鸡、斗鸡为事。直至唐末，斗鸡活动一直持续不衰，许多唐诗都描写了民间斗鸡的盛况。

#### 四、节日风俗

唐代的节日已经与当今传统节日相差无几，每个节日都有特定的民间风俗和游艺娱乐活动。

正月初一是一年之始，唐代称作元日、元旦、新年，这是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自除夕夜，庆祝活动就开始，人们燃烧竹子，以其爆裂之声辟鬼驱邪，这应该就是后世爆竹的由来。元旦时还在门上悬挂桃木符以辟鬼。各地都要举行各种热烈的民间游艺活动，比如表演歌舞、杂技、斗鸡、摔跤等节目。人们纷纷外出观景游乐，走亲访友，举行各种聚会。

正月初七是“人日”，这一天也是喜庆的节日，妇女们将彩纸或丝绸剪成各种美丽的花样，互相赠送，戴在头上或挂在树枝上作为节日装饰。

正月十五，唐代称为上元节。上元节观灯的风俗由来已久，但是形成普遍而热烈的全民游乐活动是在唐代。此夜，城里举行盛大灯会，不禁百姓夜行，街市上花灯照如白昼，男女老少纷纷夜游观灯，到处人流如织、摩肩接踵。皇家宫廷、王公贵族家中也燃放花灯，争奇斗胜。同时还要举行百戏演出和游艺活动。唐中宗还曾与皇后微服出宫，并且放数千宫女出宫观灯。唐玄宗即位之初，上元节时举行盛大灯会庆祝，在京城制作了

弈棋贵妇绢画

唐

1972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

长63厘米，宽54.3厘米





二十丈高的灯轮，上面装饰金玉锦绣，燃放五万盏灯，如同花树一般。宫女千人都身着锦绣，头戴珠翠，施粉涂脂，装饰一新；又组织了长安附近的少女少妇千余人，着丽服，佩花钗，一起在灯下踏歌三夜，极尽欢乐。此后规定每年正月十五前后三夜连续开市燃灯。盛唐时期上元节灯会的奢华排场与热闹气氛，古来未有。诗人张祜描写长安灯会盛况说：“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这些民俗一直延续到今天。

寒食、清明节以郊游踏青为主要内容。

五月五日端午节，民间水乡有赛龙舟的习俗。唐代历朝皇帝都喜欢观赏龙舟竞渡活动。地方官员常常在节日期间组织盛大的赛龙舟活动，由各县、乡比赛胜负。水上龙舟并列，披锦结彩，两岸也搭起彩楼青棚，让人们观看。比赛时，龙舟劈波斩浪，观众欢呼喧哗，场面极为热烈，官府还要赐给胜者彩缎等奖品。

七月七日即七夕，唐代有妇女乞巧风俗。此夜，妇女要拜牛郎织女，向天焚香祈祷，诉说心愿并乞巧。盛唐宫廷中这一活动仪式最盛，宫廷中高搭彩楼，盛陈酒宴，妃嫔宫女们祈拜求恩，乞巧于牛郎、织女二星，并以九孔针、五色线对月穿之，过者为得巧，奏乐庆贺，并欢饮达旦。宫女们还将蜘蛛放在小盒中，天明后查看蛛网稀密，若密说明得巧多，稀则得巧少。这些活动民间纷纷效仿，演化成普遍的民俗。

八月十五中秋节在唐代已是重要的民间节日，此日主要是合家团圆，赏月拜月。文人们往往诗兴大发，留下了许多中秋赏月、玩月的诗篇。南方还有中秋夜妇女踏歌的风俗，妇女联手唱歌舞蹈，一派浪漫、欢腾景象。

九月九日重阳节是个古老的节日，重阳登高是唐代盛行的习俗。此日，人们相携登高远眺，抒怀思亲，游玩饮酒。地势较高、风景优美的乐游原是长安最有名的登临之处，每年重阳节，这里都聚集着许多登高游玩的人。人们还采集茱萸、菊花放在酒中，并以茱萸插头以避邪。王维的名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正反映了唐人重阳节的风俗。

### 第三节 婚丧礼俗

#### 一、婚礼仪节

在敦煌文书中，人们饶有兴味地发现了唐朝的通婚书范本以及关于婚姻程式、礼仪的诸种文书，以及许多描写民间婚俗的曲子词。

婚书分为两幅，一幅是男方家长给女方家长的问候短函，另一幅是婚书正文。婚书正文格式为：某自第几男（或弟或侄），年已成立，未有婚媾。承贤第某女（或妹、侄女），令淑有闻，四德兼备，愿结高援。谨同媒人某氏某乙，敢以礼请。脱若不遗，伫听嘉命。某白。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文书中还有措词轻松的几件离婚文书——“放妻书”的样本。这几件文书都是双方自愿离异所立文书样本，内容大意都是说，既然夫妻不和，必是前世冤家，双方在一起生活都不欢娱，家业也不能兴旺，莫若分离，各自另觅佳偶。有趣的是，文书最后还有对于妻子再嫁的祝福：“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裙娥媚，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一



别两宽，各生欢喜。”“放妻书”充分反映了唐朝人对于离婚的开明态度。

通过这些文书，人们对于唐朝人的婚姻观念与礼仪等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唐朝沿袭古礼制定了婚姻礼仪，即“六礼”，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每一步程序都有繁琐的礼仪规定。不过在实际生活中，尤其是中下层社会，不会履行那么多繁文缛节，婚礼主要程序是男方送婚书行聘和迎娶两项。

根据婚仪规定，男方将婚书用精纸书写后，卷好放入特制的木函中，外面用五色线分三道缠绕，函盖上写明受函与致函人的官

衔、姓名，然后由亲族中选出的正副两位“函使”送达女家，同时送上聘礼。有的富贵人家还有奴婢护送礼品。聘礼包括钱币、布帛、食品以及各种具有吉祥意义的礼品，比如合欢、阿胶、嘉禾等等。到女家后，将聘礼陈列出来，并当众宣读婚书。交接礼毕，女家设宴款待来使，赠送衣物等礼品，并回复以答婚书。

婚期的亲迎之礼是最主要也是最繁复的仪节，许多礼仪饶有特色与趣味。婚礼一般在黄昏举行，由新郎亲自到女方迎娶。程序包括敬告祖先、奠雁、下婿、跨鞍、催妆、障车、弄新妇、拜堂、撒帐、合卺、合髻、却扇等等礼仪。其中最具特色的有：新妇进门跨马鞍，这是北朝鲜卑族的遗风，一直沿袭到近代，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古代掠夺婚的遗俗；下婿，就是女方亲友用各种方法戏弄甚至杖打女婿，这也来自北朝，敦煌文书中的《下女夫词》可能便是与此相关；催妆，即新娘梳妆打扮时，故意拖延时间，夫家要请人或由新郎催促，唐代时兴吟诵诗歌催妆；障车，新娘上车后，新郎要骑马绕车三圈，然后女家亲友拦住喜车不让走，男家出钱物才放行，这一仪式也常以诗歌助兴；青庐拜堂，男家在屋外择吉地设毡帐，称为青庐，也称百子帐，如同今日的蒙古包，新人在其内行礼拜堂；合卺，将两只酒瓢或酒杯用五色线绳连在一起，让新人同饮；合髻，将新郎与新娘的两缕头发绾结在一起，作为结发的象征，这是唐代形成的风俗；去花、却扇，新娘以花、扇掩面，傧相要咏去花、却扇诗数首，新娘才卸去花钗，拿去扇子，露出面容。

从这些礼仪中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尤其是北方地区受游牧民族风俗影响很深，婚礼中融入了许多“胡俗”；另外，唐代诗歌盛行，婚礼的许多程序都有诗歌助兴，所以唐诗中

#### 《婚礼图》

唐

为榆林窟第25窟弥勒经变中的《婚礼图》部分临摹。





留下了大量咏催妆、障车、却扇的诗歌，其中不乏佳作佳句。

唐代还留下了许多关于婚姻的传奇故事，月下老人、夫妻红绳相系的传说后来都成了千古流传的美称与佳话。

## 二、丧葬习俗

唐代不可胜数的出土或传世文物向我们展示了唐朝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几乎可以构成一部完整的物质文化史。而这些文物大多出自帝王、贵族、官员等的墓葬，由此可知丧葬在唐人生活中的重要和当时的厚葬之风。

位于陕西的十八座唐帝陵无疑是最有价值的墓葬。唐代除了末世的两个皇帝葬于别处外，其余十九个皇帝（包括武则天）都葬

于渭北高原的山梁上。这十八座帝陵中除唐高祖陵等四座帝陵是积土为陵外，其余十四座都是在自然山峰上开凿而成，即依山为陵。唐太宗昭陵首开凿山建陵的先例。昭陵建造在陕西礼泉的九嵎山主峰上，墓室是在半山腰穿凿而成，外面没有起坟丘，据记载，深达七十五丈。此后帝王陵寝大都按照昭陵的格式建造，多数帝陵的墓室都是在半山腰穿凿而成，封闭后外面不显形迹。在陵前和山下建造神游殿、献殿、寝宫等建筑，以供朝拜祭祀和日常宫女、宦官等供奉墓主；陵前通道两侧还要树立石人、石马、石狮等，以显示威严。帝陵的地上建筑与石刻以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墓——乾陵最为规模宏大。帝陵周围还建有数目不等的陪葬墓，埋葬的多是皇亲、功臣和近臣。这些陪葬墓有的建造

乾陵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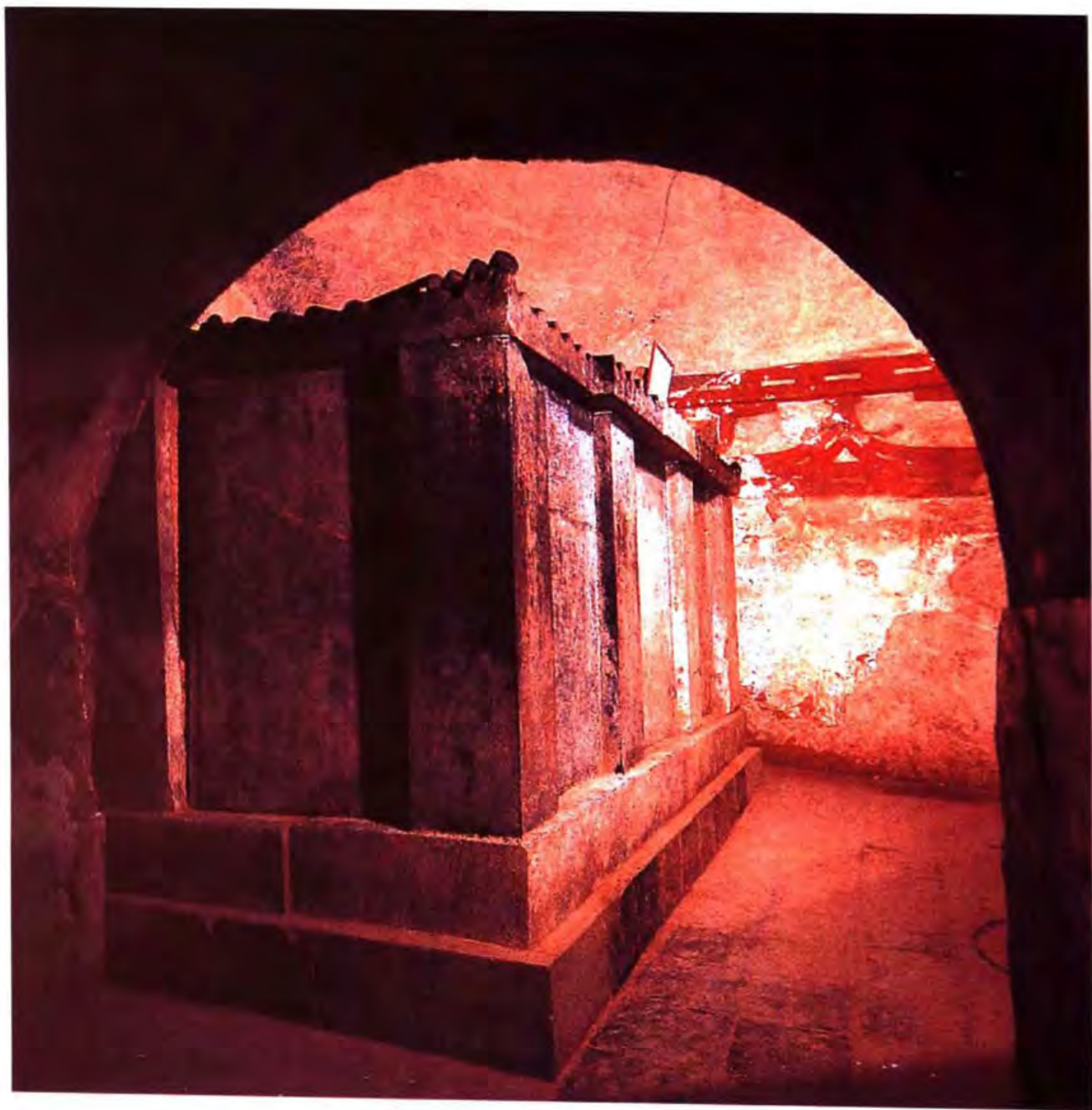
位于陕西乾县





乾陵永泰公主陪葬墓墓室及石椁

位于陕西乾县



得很高大，也有精美的石刻、碑石，陪葬昭陵的开国功臣李勣墓便是代表。

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的墓葬根据地位品级，规模形制不同，一般都竖有墓碑，也列置石柱、石人等等，如同生前的侍从仪卫，但动物以石羊、石虎为主。最有价值的有武则天之母杨氏的顺陵墓葬石刻等。

墓室内流行绘制壁画，一般墓道前部两壁多绘有青龙、白虎，墓室顶部绘日月、星辰，其他各处还绘有鞍马、骆驼、列戟、车骑、仪卫、男女侍从、歌舞乐伎等等。乾陵的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等都以精美的壁画而闻名。今天，人们熟知的作为唐代艺术代表作和表现狩猎、礼宾、打球等社会生活的名画，许多都是墓葬壁画。

帝王、官贵墓室内常常埋藏着大量随葬品，犹如一座座宝库。随葬品很大一部分是陶瓷类和金属类生活用品，包括罐、坛、壶、碗、杯、盘、盒、瓶以及金银首饰等。还有以墓主生前最喜爱的物件随葬的，比如唐太宗酷爱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兰亭序》，他死后这件珍品就被随葬入墓中。更大量的是专门用来陪葬的陶俑，有武士、文官、男女侍从、乐舞伎、胡人等人物俑，也有骆驼、马、牛、羊、猪、狗等动物俑，以及房屋、井栏、磨、灶具等生活用具的仿制品。此外，还有形象凶猛、人面兽身或兽面兽身的镇墓兽。这些陶俑多为彩绘，也有许多三彩釉作品。有的塑造得生动逼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同时真实表现了唐代的社会生活。尤其是三彩陶



俑，更是具有时代特色的艺术作品。唐墓陶俑与壁画、石刻一起成为唐代艺术品的代表作。墓门内置有方形石刻墓志，上面有盖，刻有标题，下底刻写墓志铭，包括墓主的籍贯、生卒年月、生平事迹等。这些墓志成为后人研究历史与人物的珍贵文献。

唐代的丧葬礼仪也很繁缛，有属纆、招魂、小殓、大殓、服丧、吊丧、出殡、下葬、墓祭、拜扫等种种礼仪。研究者认为，延续至今的焚烧纸钱祭奠死者的习俗也流行于盛唐时期。

唐代盛行厚葬之风，唐太宗就曾经批评过勋贵之家厚葬高坟、穷奢极侈的恶俗。虽有多次禁令，但这种风气始终未能废止。王公百官、富豪人家竞相以厚葬炫耀于世，争奇斗富：役使大量人力营造坟茔，陪葬偶人象马雕饰得栩栩如生，灵车冥器皆以金银珍宝装饰，出殡仪仗绵延数十里，搭设几十座帐篷供人吊祭。这些现象屡见不鲜。有的人家迫于风俗流行，甚至倾家荡产以营葬。这种风俗当然和皇家的无形倡导有关。唐懿宗

安葬爱女同昌公主，可以算是唐朝最出格的一次厚葬。陪葬的衣服玩物有一百二十车，以锦绣、珠玉、高数尺的金骆驼、凤凰、麒麟作为仪仗和明器，用木头雕刻成宫殿、龙凤、花木、人畜，以锦绣罗绮做帐幕，幢节伞盖遮天蔽日，出殡队伍长达三十余里。仅赏赐抬棺木的民夫就有酒百斛、食物四十余驼。又冶金作俑，与各种奇珍异宝一起下葬。葬礼中焚烧祭品后，百姓纷纷到灰烬里寻找金银珠宝。如果有朝一日这座墓葬能够重现于世，想来一定会有惊人的收获。

当然，厚葬之风与繁缛礼仪主要盛行于帝王皇室、官僚贵族阶层，平民百姓一方面没有如此财力，另一方面，朝廷对于百姓的丧礼规格，如灵车的种类、装饰，明器的数量等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准逾越，所以自然不会有这么大的排场。吐鲁番发现的大量唐墓多是平民百姓的墓葬，随葬品多数是一般生活用品，有的死者穿的寿衣、鞋竟是用废弃文书的纸张裁制而成。可见丧葬风俗中，贫富悬殊极为显著。



## 第十章

# 晚唐余音——五代十国



长盛不衰固然是历代王朝的强烈愿望和寻求目标，然而，兴衰演变才是历史的常态。隋唐帝国在经历了近三百年的辉煌后，终于黯淡下去，一个混乱动荡的时代出现了，这就是五代十国。

所谓五代，是指先后占据中原地区的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因为五代的名称均在历史上出现过，所以古书中将其名称前均冠以“后”字，以示区分。五代的统治区域主要是在淮河以北、黄河流域一带。当时在淮水以南，还先后存在过九个小国，即吴、南唐、吴越、闽、楚、荆南（南平）、前蜀、后蜀、南汉。这九国加上割据山西的北汉，统称为十国。

五代十国始于907年朱温建立梁朝，终于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共五十三年。如果以宋太宗979年灭掉十国中最后一个小国北汉，从而全面结束五代十国的

历史看，则有七十三年。由于中土大乱，这个时期中国的边疆也处于分裂状态，在北方地区，有新崛起的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916—1125，被金所灭）；河西地区，因唐末无力西顾，存在着实际独立的曹氏政权（1035年被西夏所灭）；西南地区，有继南诏衰落后出现的大理国（937—1253，被西夏所灭）；还有西北地区的回鹘诸政权及青藏高原上的吐蕃诸政权等。

就大势而言，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是晚唐乱世的延续。这是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同时也是从乱世纷争走向统一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变化，都为统一奠定了基础，中国封建社会也从此走出中世纪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统一后的宋朝展示出完全不同于汉唐社会的新面貌。五代十国短暂的分裂后，这种自行大分裂的局面，在中国封建社会再未出现。



第一节 从乱世纷争  
走向统一

一、中原逐鹿

唐末农民战争期间，藩镇势力没有受到严重打击，保存了实力。而后起的藩镇势力猛增，旧的平衡完全打破，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当时，北方诸镇势力最强盛的就是河东（山西）李克用和宣武（河南）朱温，中原五代的后梁、后唐就是在这两大势力的争霸中先后建立的。他们之间的征战，在后梁建立前，通常称为“晋汴争雄”；后梁建立后，则称为“梁晋争霸”。

（一）梁晋争霸

后梁的建立者朱温，宋州砀山县（今安徽砀山）人，曾参加唐末黄巢起义，后叛变降唐，被任命为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全忠，用以围剿黄巢。883年，朱温以功授宣武节度使，此后逐渐势力大增，并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展开激烈攻战。至后梁建立前，宣武、河东两大藩镇势力交锋已二十余年。朱温集团（汴军）逐步由弱而强，以至后来中原无其对手，唐廷也成为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傀儡。907年，朱温废昭宣帝即唐哀帝，于汴梁（开封）称帝。因他曾被唐朝封为梁王，遂以梁为国号，改元开平。当时河东李克用、四川王建、凤翔李茂贞、淮南杨渥诸镇均拒不承认朱梁政权。河北诸镇名义上附属后梁，但仍保留着半割据状态。而两浙的钱镠、湖南的马殷、广东的刘隐等，虽然对梁称臣纳贡，但却保持着割据的事实。所以后梁的版图在中原五代中是最小的。朱温篡唐登上帝位，便置自己于四面树敌的困境。梁从开国到灭亡，大小战争始终不曾停

朝代和国名	创建人	公元年代	灭于何朝何国
后梁	朱温	907—923	后唐
后唐	李存勖	923—936	后晋
后晋	石敬瑭	936—946	契丹
后汉	刘知远	947—950	后周
后周	郭威	951—960	宋
吴	杨行密	902—937	南唐
南唐	徐知诰（李昇）	937—975	宋
吴越	钱镠	907—978	宋
楚	马殷	927—951	南唐
闽	王审知	909—945	南唐
南汉	刘龚	917—971	宋
前蜀	王建	907—925	后唐
后蜀	孟知祥	934—965	宋
南平	高季兴	924—963	宋
北汉	刘晏	951—979	宋

止过，其最大的劲敌就是李克用父子。 五代十国兴亡表

908年，李克用死，其子李存勖继晋王位（李克用受唐封晋王）。李存勖继位后，开始整饬军纪。同年，梁军围攻潞州（山西长治），李存勖亲率大军驰援，大破梁军。910年，成德（治镇州，今河北正定）王镒、义武（治定州，今河北定州）王处直背梁附晋，梁大军北上讨伐，李存勖率军赴援，双方在柏乡（今河北高邑）遭遇。这次交锋，又是梁军大败溃逃，晋军斩首两万多。912年，幽州刘守光发兵侵成德、义武，朱温应刘守光之请亲率五十万大军攻晋，由于兵士畏晋，未战先乱，晋兵数百骑乘夜冲入梁军中袭杀，梁军烧营遁逃，溃不成军。朱温发病，退回洛阳。次年，朱温被其第三子朱友珪所杀，其四子朱友贞以讨逆为名，杀朱友珪自立，是为梁末帝。当后梁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时，河南百姓因不堪横征暴敛，出现了董乙、毋乙起义，虽然被镇压，却牵制了后梁的军事力





鎏金铜观音造像

五代

1958年浙江金华万佛塔塔基出土

高53厘米

五代以后，流行在塔基内放置塔幢和各种佛像。此造像中的观音随意坐于山石上，神态宁静安详，造型优美自然。这种姿态多见于水月观音的形象。

量。在此期间，晋军全力消灭割据幽州（今北京）、沧州（今属河北）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并利用梁欲削弱魏博势力而引发魏博兵变的时机，顺利取得魏博重镇，然后乘胜而下，除黎阳一城外，尽取河北之地，从此梁大势已去。李存勖以魏州（今河北大名）为基地，开始与梁夹河而战。

923年，李存勖在魏州称帝，即唐庄宗，以唐室后裔自称，国号唐。庄宗即位，便大

举伐梁。最后他亲率轻骑自杨刘渡河，从郛州（今山东东平）西下，直取汴梁。梁末帝自杀，百官迎降，前线闻讯，五万梁兵全军解甲，后梁至此灭亡。

梁晋争霸，如果加上唐末汴晋争雄，前后四十年。中原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双方势力此消彼长，最后以后唐的建立而告终，但是中原的混乱局面并未随之结束。这一时期，一个强悍的民族在北方崛起，并在中原逐鹿的混战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就是契丹。

## （二）契丹的崛起

契丹是中国古代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为鲜卑族的别支，其名称最早见于《魏书》。北魏以来，活动于潢水（辽宁西拉木伦河和土河）一带，过着以游牧为主的生活。大约6世纪时，契丹进入史称“古八部时期”。八部即八个部落，各不相统，通过频繁的贡赐和互市，与中原保持着政治、经济联系。唐初，形成了以大贺氏为首的部落联盟，并臣属于唐。为此，唐设置羁縻府州于其居地，依其旧俗，用其蕃帅为府州长官，进行管理。随着部落联盟的不断强大，契丹时常与唐王朝发生冲突，同时也有契丹部落的首领率其部降唐，迁居内地。唐玄宗时，曾在今北京房山设置归义州安置契丹降部。唐后期，成德军节度使王武俊等即出自内徙的契丹部落，河北的“胡化”与割据多与此有关。唐朝后期，遥辇氏取代大贺氏世袭契丹部落联盟首领。

唐末五代时期，中原地区战火纷飞，一些汉人被迫逃到契丹地区谋生，契丹也乘机到中原地区掠夺人口和财物，实力逐渐增强。其中最临近中原边塞的迭剌部耶律氏迅速崛起。受汉文化影响，他们不仅从事畜牧业，还从事农耕，并有了冶铁和纺织等手工



业。10世纪初，耶律阿保机（872—926）成为本部的夷离堇（军事首领），率军在今山西、河北北部掳掠人口和牲畜。当时幽州人韩延徽流入契丹，后成为阿保机的谋士，备受礼遇。他教契丹建牙开府，修筑城郭，开垦荒地，使汉人各安生业，对阿保机建国影响极大。

907年，即后梁建立的同一年，阿保机成为契丹部落联盟的首领。九年间，四出征伐，掠得大量财富，兵力强盛。阿保机连任三届部落联盟的首领，旧有的部落联盟首领选举制已经无法维持，其余七部的贵族害怕丧失自己的权势，联合起来逼他交出大权。阿保机被迫服从，同时以部下汉人众多为借口，提出自成一部的要求，作为交换条件。916年，阿保机骗七部首领赴宴，设伏兵尽杀之。此后，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正式称帝建国，都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国号“大契丹”，建元神册，后东灭靺鞨所建渤海国，向西征服室韦、突厥、吐谷浑、党项各部，南与中原王朝争锋。

后梁时期，契丹多次侵扰幽州，刘仁恭父子据幽州时尚能抵挡，契丹屡攻未得。后梁末年，晋军取得幽州后，大将周德威恃勇而不修边备，致使契丹攻取榆关（山海关），进而又攻取了营州（今河北昌黎）、平州（今河北卢龙），为害渐大。梁晋争霸时，晋兵几次在攻梁得手的关键时刻，因契丹兵入境不得不分兵抗御，遂使梁得以喘息。可见在这期间，契丹已经对中原北部边境构成相当威胁。五代时期，契丹的强盛从不断出兵南下侵扰，发展到后晋皇帝石敬瑭对之称“儿皇帝”，每年除大批岁贡外，还割让了“燕云十六州”。燕山山脉处于契丹的内地，幽州成为契丹的重镇，河北的腹地向契丹敞开，使中原王朝在防御上失掉了有利地形。后晋皇帝

一度企图入主中原，由于各地的强烈反抗，才使这一企图落了空。但是终五代，北部边境忧患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北宋统一后，由于辽的强大，终于形成了南北分庭抗礼的对峙之局。但是，辽对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开



玉堂富贵图

五代 徐熙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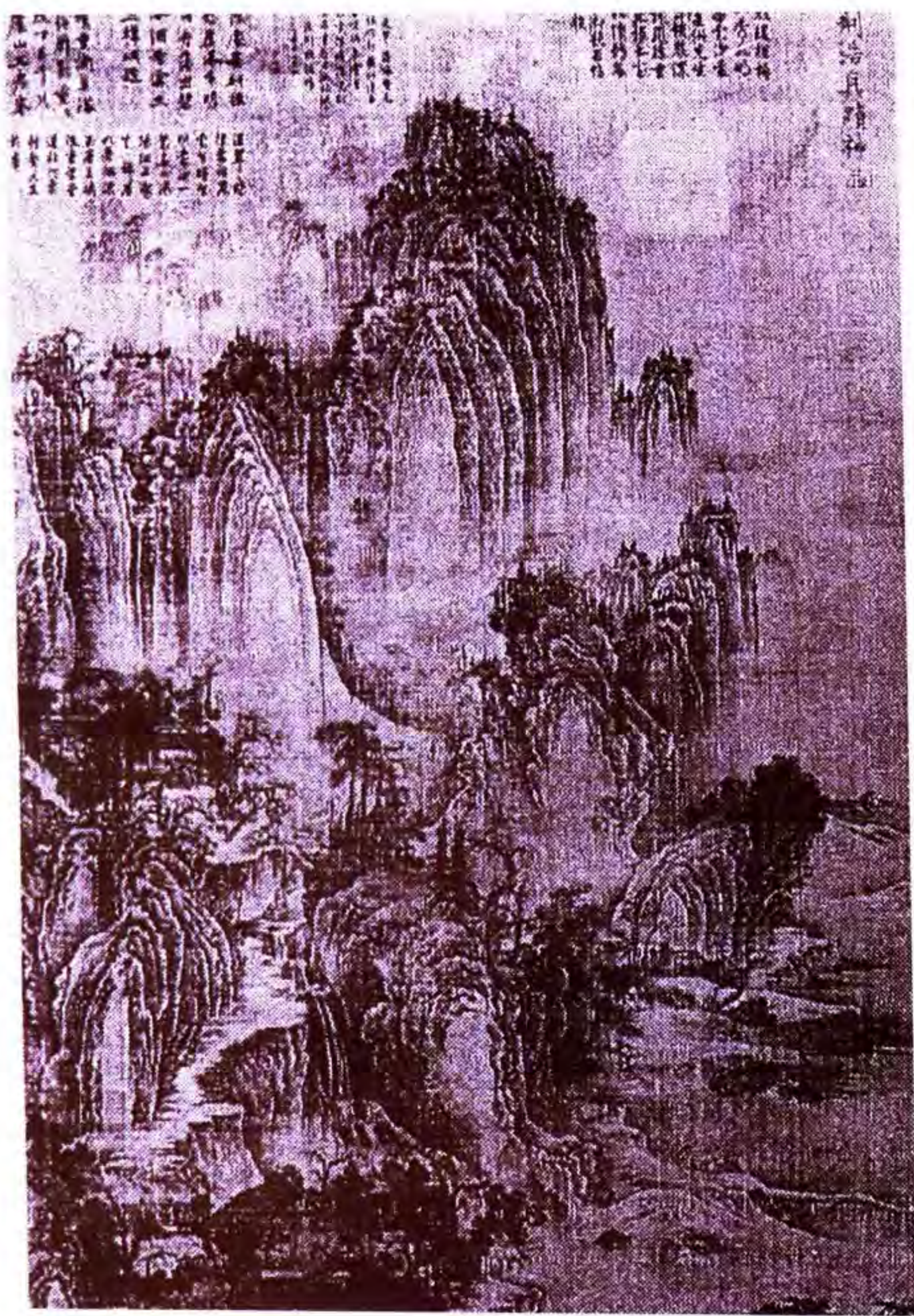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绢本

纵112.5厘米，横38.3厘米

徐熙，金陵人，南唐画家，善画花鸟鱼虫。画法以墨色为主，近乎写意，后人称为“徐体”。





《匡庐图》

后梁 荆浩绘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绢本

纵185.8厘米，横106.8厘米  
荆浩是五代时期北方著名山水画家，乱世中隐居于太行山洪谷。《匡庐图》是一幅全景式水墨山水画，结构严密，气势宏大。宋以后的北派山水画家多以荆浩为宗师。

发，对边疆地区民族间的贸易往来，甚至对中外经济的交流，都起过积极的作用。

### （三）沙陀三王朝

所谓沙陀三王朝，是指继后梁以后，由沙陀军人在中原地区先后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三个王朝。

沙陀族源出于突厥别部。7世纪中叶，唐太宗曾置沙陀都督府，后因受吐蕃逼迫东迁。唐懿宗时，后唐庄宗李存勖的祖父朱邪赤心，因助唐镇压庞勋起义有功，赐名李国昌，并授振武节度使。唐末黄巢起义军攻克长安后，唐廷命李国昌子李克用前去围剿，

李克用因功封为河东节度使，进爵晋王。从此，沙陀骑兵以凶猛强悍而名震中原。

后唐、后晋、后汉三朝，虽是沙陀族人建立，但是实际上统治者本人都是久已内迁汉化的“蕃夷”。三朝都不曾形成一个以沙陀贵族为核心的统治力量，而是不分蕃汉一体使用。施政亦是沿袭唐制，所以与汉族地主所建王朝并无区别。

#### 1、后唐

923年，后唐庄宗李存勖于魏州称帝，同年灭后梁，尽有后梁之地。后梁时期割据一方的岐王李茂贞向后唐称臣，封为秦王。不久李茂贞放弃割据，凤翔（今陕西）遂进入后唐的版图。但是后梁的荆南（今湖北江陵）节度使高季昌，虽归附后唐，受封南平王，实际上却割据一方。远居岭表的南汉主刘龑，曾遣使来聘，但窥测虚实后，“贡亦不至，自是与中国（中原）遂绝”。南方的前蜀、吴仍然拒不称臣。925年，后唐兴兵讨伐，前后只用了七十余天即灭前蜀，令江南诸国大为震惧。

926年，魏博发生兵变，后唐庄宗派兵镇压失利，便命养子李嗣源带兵前往。兵至魏州，李嗣源反与魏州乱兵联合南下，庄宗李存勖被部将所杀。李嗣源入洛阳称帝，是为后唐明宗。

明宗在位近八年，维持了相对平稳的局面。此间，后唐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兼并了东川，明宗对之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933年，明宗死，后唐陷入内乱。明宗的女婿、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了称帝，于936年在晋阳发动叛乱，以割地称臣相许向契丹求援。辽太宗耶律德光亲率军五万攻后唐，败后唐兵于晋阳。耶律德光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晋每年向其输帛三十万匹，并割让燕云十六州，即幽（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县）、瀛



(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涿(今河北涿州)、檀(今北京密云)、顺(今北京顺义)、新(今河北怀来)、儒(今北京延庆)、武(今河北宣化)、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寰(今山西朔州东)、朔(今山西朔州)、蔚(今河北蔚县)等。

## 2、后晋

石敬瑭倚辽主登上帝位，改国号为晋，都开封。为了媚事辽朝，四十五岁的石敬瑭尊三十四岁的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自称“儿皇帝”，奉表称臣。每当契丹使臣到来，石敬瑭便恭敬地拜受诏敕。除每年输帛三十万匹外，每逢契丹有吉凶庆吊事，后晋都要赠送珍宝，甚至契丹大臣也公然向后晋索要贿赂。契丹稍不如意，便对后晋大加斥责，而石敬瑭每每委曲求全。晋使至契丹，往往受到歧视。为此，朝野皆以为耻，国内诸镇也接连反叛。942年，石敬瑭在内外压力下，忧病而死。其侄石重贵即位，是为晋出帝。出帝致书契丹，称孙而不称臣，契丹怒，大举南侵。由于遭到各地的坚决反抗，契丹军进展并不顺利，曾两次撤军。后晋抗击契丹的主帅杜重威，为了做皇帝竟让全军解甲投降契丹，并引契丹军南下。946年底契丹军进入开封，废石重贵，将其全家押解到辽的建州(今辽宁朝阳)，后晋灭亡。

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后，改国号为辽，遂有久据中原之意，于是纵兵四处掳掠，叫作“打草谷”。开封及其四周几百里内，民间财货和牲畜几被抢劫一空；又以赏赐士兵为借口，遣使到处搜刮钱帛，自将相以下至于百姓皆不得免；为了防范诸镇，还将诸道藩镇的长官征调开封留而不遣，将自己的部将派往各地做军政长官。契丹的暴行激起各地人民的强烈反抗，各地将校逐杀辽派去的官吏、据守州郡者。耶律德光对此哀叹说：“我



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遂以天热难以久留为借口，仓促北归。途中，他对臣下说：“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诸道括钱，一失也；令上国人打草谷，二失也；不早遣诸节度使还镇，三失也。”耶律德光病死于北归途中，契丹内乱，数年之间无暇南顾。

## 3、后汉

后汉开国者刘知远，作为一员武将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建立前，他为河东节度使，手握强兵。耶律德光南侵时，晋廷屡诏他会

贴金彩绘浮雕武士像

后梁

河北曲阳王处直墓出土  
高130厘米，宽59厘米，厚8厘米

王处直是唐末五代义武军节度使，卒于后梁龙德三年(923)。武士身着五彩盔甲，手持宝剑，头顶金龙，脚踏卧鹿，刻工刀法细腻，人物造型雄健丰满，神气逼人，堪称国宝级佳品。



## 鳞纹银壶

1954年内蒙古赤峰辽驸马墓出土

高10.7厘米，口径7.2厘米  
此银壶造型美观，壶体满饰鱼鳞纹，肩部有弓形提梁，以银链与壶盖衔接，反映当时契丹族的金银工艺水平。



师，共击辽兵，他却始终不理朝命，专力守御本境静候观望。待耶律德光仓皇北逃时，他先在太原称帝，然后乘虚进入洛阳，将契丹北撤时册立的李从益（后唐明宗之子）杀死，因自称汉宗室后裔，立国号为汉，定都开封。

刘知远称帝后仅一年就病死，年幼无知的汉隐帝刘承祐即位。当时外有方镇叛乱，内有将相倾轧。后外叛虽被平息，但将相相互为仇却愈演愈烈。隐帝也因将相事权过重，不甘为大臣所制，遂与亲信密谋诛杀了当时总机政的杨邠、典宿卫的史弘肇、掌财赋的王章，并派人去杀邺都（今河北大名）留守、枢密使郭威，激起郭威兵变，统兵攻入开封，汉隐帝被乱兵所杀。郭威入城后，便迎立刘知远的侄子、武宁节度使刘赟继位，此

举实为调虎离山，趁机灭之。刘赟还未到开封，边镇报称辽兵南犯，郭威率禁军北上抗御，军至潭州将士哗变，将黄袍披在他身上拥为皇帝，转回开封。刘赟在宋州被杀。951年，郭威即皇帝位，国号周，史称后周。后汉灭亡。

#### （四）偏居一隅的北汉

后周建立后，后汉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刘崇（刘知远的弟弟）于太原称帝。他自称是后汉的继承人，仍用汉为国号，史称北汉。

河东地区在五代政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后唐李克用父子就是以河东为根据地，以河东节度使的身份起家，最终灭掉了后梁。以后的石敬瑭、刘知远也从河东起家，先后建立了后晋、后汉政权。从地理上讲，河





山西平遥镇国寺万佛殿彩塑

北汉

镇国寺创建于北汉天会七年(963),初名京城寺,明代改今名。今寺内万佛殿及殿内塑像均为五代原物。

《射手图》壁画(局部)

五代

敦煌莫高窟 346 窟南壁  
射手头裹红巾,腰束革带,带上斜插两根鱼尾剑,脚穿长筒战靴,作单腿跪地紧拉弓弦状,形象写实。

东离当时的政治中心河南较近,而北边又扼契丹进入中原的通道,五代统治者往往在这里布以重兵,从而给了将领坐大的机遇,同时也为节帅勾结契丹南下中原争权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刘崇能据守河东,也是因为刘知远南下时不肯将河东假借他人,便任命其弟刘崇为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以守住根本之地。刘知远死后,刘崇因素与枢密使郭威有矛盾,于是便招募兵马,充实府库,守境自保,对朝廷之命多不奉行,实际上已成为一方割据势力。其子刘贇入继帝位的消息传到太原,刘崇十分高兴,但不久,刘贇被杀,郭威建立后周。于是刘崇便在太原称帝,声言要报仇复国。为达此目的,刘崇依附于辽,对辽称侄,并经常与辽骚扰后周边境。

北汉辖地为今山西北部 and 陕西、河北部分地区,它是十国当中惟一在北方建立的政权。979年,北汉为北宋所灭。

#### (五) 骄兵悍将

五代时期,政局极度混乱,政权更迭频繁。正如后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所说:“天







《毗沙门天王像》(版画)

后晋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

纵39.4厘米，横25.4厘米  
此为供奉用的单幅佛像，以祈求国泰民安。

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这时期的皇帝多由藩镇节度使起兵夺位。如后梁太祖朱温由宣武节度使夺得帝位；后唐庄宗李存勖、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汉高祖刘知远都是由河东节度使夺得帝位；后唐明宗李嗣源是由镇州节度使，经兵变拥立为帝；后唐末帝李从珂由凤翔节度使起兵，又经兵变抢得帝位；后周太祖郭威则以天雄节度使、枢密使的身份，经兵变拥立而登上皇帝宝座。

唐后期以来骄兵悍将的风习亦有所发展，并由原来的兵变立节度使而转为兵变拥立皇帝。最为典型的是后唐末帝李从珂夺取帝位。后唐末期，由于他抗拒朝命，朝廷派

王思同率禁军合六镇兵前往讨伐。兵临凤翔城下，偏将杨思权煽动兵变，率诸军降从珂，并拿一纸呈给他说：“愿王克京城日，以臣为节度使。”从珂立即在纸上书写“(杨)思权可邠宁节度使”。为了犒赏降军，从珂悉敛城中将吏士民之财。后唐闵帝为了遣侍卫诸军抵御从珂，也倾府库以慰劳之，然而将士全不在意，扬言说：“至凤翔更请一份。”闵帝最后只身无援，被迫兵缢死。李从珂倚兵变夺得帝位，骄兵索赏更加嚣张。正所谓“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

五代时期，由兵变拥立为皇帝者共四人，即后梁末帝朱有贞、后唐明宗李嗣源、后唐末帝李从珂及后周太祖郭威。如果再算上北宋太祖赵匡胤仿郭威以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而夺得帝位，那么五代时期就有五次兵变拥立皇帝了。与唐末期藩镇立节帅有所不同的是，五代自后梁以来，禁军的力量强于诸镇，因而诸镇不能像唐代那样不听调度，凡握有禁军大权的节度使，往往可以左右政局，乃至夺取帝位。几次兵变立帝的主力都是禁军。这是由藩镇专兵权转向朝廷收兵权的过渡。但是五代禁军虽然归朝廷，统辖则由宿将，而且专兵久任，将校士卒亲党胶固，蛮横嚣张。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北宋建立，宋朝君臣处心积虑采取种种办法强干弱枝，才彻底解决了骄兵悍将的问题。

## 二、江南偏安

十国除了北汉仅次于北方外，其余都在中国的南方。这些割据政权，绝大多数都是由唐末的节度使建立。在唐末的混战中，他们摆脱了唐朝廷的控制，并趁中原汴晋两大镇争霸，无力南顾之机，盘踞一方，争城夺地，割据称王。与北方相比，南方的战争规模较小，混乱的时间也较短。特别是割据江



淮之间的杨行密大败朱温大军，遏止其南下，以及后来吴与南唐政权的先后建立，阻止了北方的战乱波及长江流域，使南方诸政权得以稳定下来。尽管时有征战，但是这些割据政权大都采取“保境息民”的政策，注意发展经济，礼遇文士，一般用文人主州县，加上大批中原人士因躲避战乱而投奔南土，对南方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虽然江南诸国也设置节度使，但地狭兵少，多能受制于中枢，所以境内较安定，很少发生重大的变乱。闽、楚两国的覆灭，也是由于王室内部分权力争夺，政局混乱，导致邻国乘虚而入，最终亡国的。尔后出现的留从效占据漳、泉二州，周行逢割据楚地，则是这时期在南方新出现的割据政权，未算入十国内。

### （一）吴与南唐

#### 1、吴

创建人杨行密，庐州（安徽合肥）人，少时孤贫，应募从军，后以武力占据庐州，被唐封为庐州刺史。他苦战江淮间数年，于892年消灭了北方南下的孙儒军，以广陵（今江苏扬州）为中心，尽得淮南之地，因而被唐廷任命为淮南节度使，自此割据江淮。897年，朱温大军攻淮南，杨行密在清口（今江苏清江）一战中，以少胜多，大败朱温军队，使朱温并吞南方的幻想破灭。杨行密保据江淮之间，与朱温对峙。902年，唐昭宗封杨行密为吴王，并让其讨伐朱温。虽然杨、朱之间的地域争夺并无结果，但是江淮与中原的抗衡局面形成。

吴国建都扬州，并逐渐扩地，占有了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之间的土地。905年，杨行密死，其子杨渥继位。当时军权掌握在大臣徐温、张顼的手中。908年，张、徐二人杀杨渥，后徐温又借机杀了张顼，拥杨行密

的次子杨隆演继位，至此军政大权都归徐温执掌。919年，徐温又拥杨隆演为大吴国王，改元武义，置百官，用天子礼。同年，与吴越议和，从此休兵息民，生产恢复发展，逐渐成为五代时期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927年，徐温死，其养子徐知诰继掌朝政，拥杨隆演弟杨溥为帝，改元乾贞。937年，徐知诰废杨溥，自立为帝，是为南唐烈祖。国号唐，都金陵（今南京），史称南唐。

#### 2、南唐

南唐烈祖少时贫寒，后被徐温收为养子，取名徐知诰，称帝后，复姓李，改名昇。他自称唐室后裔，典章制度大体沿袭唐朝，并实行了一些政治上的改革，控制宦官，压抑外戚，缩小相权，整顿吏治，修订法律，重用文吏，改变武人用事之习，将节度使的辟属权收归中央，使其势力受制，难以坐大。同时，他坚持保境安民的政策，休兵息民，恢复发展生产。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南唐境内“渐有中朝之风”。当时南方割据诸政权中，没有能与之相匹敌者。

943年，李昇死，子李璟继位。945年，南唐乘闽国内乱，出兵攻闽，汀（今福建长汀）、泉（今泉州）、漳（今漳州）三州相继

#### 白瓷枕

##### 吴

1956年江苏连云港出土  
长17.8厘米，宽12.5厘米，  
高10.4厘米  
瓷枕最早出现于隋代，唐代以后越来越流行，形制、装饰也日益丰富多彩。





降唐。泉州将领留从效逐走刺史，南唐即任命留从效为泉州刺史。南唐兵乘胜进取福州，闽将李仁达向吴越国求援。947年，吴越兵在福州大败南唐军。从此，吴越并福州。留从效趁南唐军福州大败之机，又夺取漳州，南唐只好承认其割据事实，并封他为清源节度使。

闽亡时，湖南楚国亦内乱。951年，南唐军攻入长沙，灭楚国。一年后，朗州楚降将刘言出兵攻取长沙，逐走南唐兵，尽复楚岭北之地。南唐经闽、楚之役后，实力大衰，欲从此休兵息民，然而北方强大起来的后周对其已觊觎良久。955年，后周世宗出兵征南唐，南唐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于958年尽献江北淮南之地，改用周国号，对周称臣纳贡。此后，南唐与后周划江为界，不仅版图缩小了三分之一，而且失去了近一半的税收来源，形成坐守江南、苟延岁月的局面。961年，李璟死，南唐后主李煜即位。

960年北宋建立后，表面上维持了与南唐的和平关系，先对南唐周围邻国用兵，以除其屏障，并迫使南唐频繁入贡，削弱其经济实力，然后大举南渡，同时联合吴越军做策应。975年，宋军攻入金陵，俘南唐后主，

南唐亡。

## （二）吴越与闽

### 1、吴越

创建者钱镠，杭州临安人，年轻时曾贩盐为盗，后应募当兵，由偏将而主一州之兵。他先后翦除了董昌等割据势力，遂据有两浙之地，即今浙江和江苏省的一部分。唐廷任命他为镇海、镇东两节度使，902年，又封其为越王。907年，后梁建国，钱镠称臣，被封为吴越王。

吴越地狭兵少，地处吴、南唐之东，杨行密占江淮后，吴越处于吴的西、北两面威胁之下，与中原的陆路联系被切断。两国在淮南东部常有激战争夺。为保全自身，吴越对中原诸政权上表称臣，以借中原王朝来牵制吴和南唐，这成为吴越始终贯彻的一项基本国策。932年，钱镠临终时，还嘱其继位人钱元瓘要好好“善事中国”。同时吴越又与闽、楚联姻，一方面使楚在吴背后牵制，另一方面则通过闽与南方诸邦联系。

吴越是五代十国中最为安定的地区之一。统治者重用文士，兴修水利，劝农课桑，手工业和对外贸易也都获得了较大发展。特别是修筑钱塘江捍海塘，是一件利及后世的

###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五代 顾闳中绘 明人摹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纵27.3厘米，横449.5厘米  
顾闳中是南唐画院画家。此图真实描绘了当时南唐中书侍郎韩熙载夜宴宾客的情景。







钱鏐铁券

唐

长52厘米，宽29.8厘米，厚0.4厘米

此铁券是唐昭宗于乾宁四年（897）赐给镇海、镇东节度使钱鏐的。当时钱鏐据有两浙，吴越国实已形成。铁券状如覆瓦，上嵌金字诏书333字，内容包括钱鏐的爵衔、官职、邑地及其功绩等，并赐其本人可免九次死罪，子孙可免三次死罪，如触犯国家的其他法律，有关官员亦不得过问。

功业。由于吴越的营造，杭州也从此成为江南名胜。

北宋建立后，相继展开吞并江南诸国的军事行动。975年，吴越王钱俶（避宋讳，去“弘”字）亲眼目睹了南唐的覆灭。南唐既平，钱俶亦不敢独立，便于978年献纳国土于宋朝，并自请归于汴京，两浙未经兵戈而归于宋。钱俶死后，宋太宗废朝七日，册为“皇帝”，又追封“秦国王”，其待遇之高，在亡国之君中是极其少见的。

## 2、闽

创建人王审之，河南固始人，出身农家。唐末大乱，王审之与其兄王潮应募投王绪军。后王绪因避秦宗权，引兵南下，经江西进入福建。王绪残暴，激起军中怨恨，王潮借机擒杀王绪，被拥为首领。886年王潮攻克泉州，从此在福建立足。893年，王氏兄弟攻取福州，汀、建两州闻风而降。897年，王潮死，王审之继任唐威武军节度使。909年，后梁封之为闽王。王审之在位二十余年，善事四邻，境内安宁；又鼓励耕垦，奖励通商，



高髻拱手陶女俑

闽

1965年福建福州刘华墓出土，高100厘米

刘华是闽惠宗王延均的妻子。女俑头梳扇形高髻，面额丰满，表情生动，造型上尤存唐朝风韵。



开辟海港，招徕外国商旅。泉州、福州成为东南沿海的重要商港。同时，闽礼遇流亡士人，用之为辅佐，并建立学校，兴办教育，福建的经济文化也发展起来。925年，王审之死，闽国陷于内乱中，二十年间，换了五个国主。945年，南唐趁福建内乱之机，攻下建州（今福建建瓯），闽主王延政被俘，闽亡。

后南唐再攻福州，被吴越兵所败。吴越占有福州，而泉、彰二州则为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复夺。978年，留从效的继任者陈洪进以二州版图归宋。

### （三）楚与荆南

#### 1、楚

创建人马殷，许州鄢陵（今河南许昌）人。少为木工，唐末投军秦宗权部，后随秦宗权部将孙儒南下与杨行密争淮南。孙儒败死后，随刘建锋率领的残部向西进入江西、湖南，攻下潭州（今湖南长沙）后立足。896年，刘建锋被杀，众将推马殷为首。此后攻

灭各地群雄，平定湖南，被唐任为武安节度使。907年，后梁封其为楚王，以牵制吴。吴杨行密以尊王（唐朝）讨贼为旗号，楚则以奉侍朝廷（北方诸朝）相对抗。927年，后唐封马殷为楚国王。马殷受册封，遂建国，立宫殿，置百官，皆如天子。楚极盛时，辖区包括今湖南全省、广西大部 and 贵州、广东的一部分。

吴、楚间曾几经兵戈，后双方都着重于保境息民，很少战事，互通商旅成为经常。楚与荆南、南汉也讲和，相安无事。马殷在位期间，奖励农桑，发展种茶、纺织业，尤其重视商业，很快便致富一方。929年，马殷死，其子马希声、马希范先后继位，朝政日乱。947年，马希范死，诸弟争立，楚将亦各自结党，分别立主，互相残杀，从此国无宁日。951年，南唐中主李璟令边镐率军攻入长沙，灭楚。

楚灭亡后，边镐任武安节度使，镇守长沙。一年后，马氏旧将刘言攻取长沙，逐走南唐兵，除郴州在南唐灭楚时被南汉乘乱夺走外，尽复马氏岭北旧地。南唐退兵后，湖南继续混战，刘言被杀，周行逢继立，境内稍定。956年，周行逢被后周任命为武平节度使，实际上割据一方。962年，周行逢死，子周保权继位。不久，衡州（今湖南衡阳）张文表叛乱，周保权向宋求援，北宋大军乘机南下平定湖南全境。

#### 2、荆南

荆南亦称南平，陕州（今河南陕县）人高季兴所建。高季兴少时曾做家僮，后追随朱温，受其赏识，屡得升迁。907年，后梁任命高季兴为荆南节度使，镇守江陵。924年，后唐封其为南平王。

唐末，荆南几经兵家争夺，原八州之地经混战，七州尽为他镇所得，仅剩下荆州（今

铁剪刀

楚

1953年湖南长沙出土  
长21厘米

此剪刀已从唐代以前两股相连的古老形式，改变为类似现代的两股分离、中间以轴相连的形状，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湖北江陵)一州之地。后唐时,高季兴又相继占有归(湖北秭归)、峡(湖北宜昌)二州。据三州之地的荆南在十国中占地最小,势力最弱,四周为强邻所包围,北有中原王朝,西有蜀,东有吴、南唐,南为楚。荆南夹在中间,被称为四战之地。高季兴为图保全,在辖境内保境息民,招集流亡,恢复生产,对外则四面称臣。虽然时有争地之战,但是胜则不敢深入,败则谢罪乞和。928年,高季兴死,子高从海继位,更是对中原王朝及南方的吴、南唐、楚、闽、蜀、南汉到处称臣,借以得些赏赐。

以弹丸之地割据一隅的荆南,之所以数十年间未被强邻所吞并,还因为当时诸方相

峙,互不能下,而荆南在强国之间正好能起到缓冲作用,成为各国之屏障。963年,宋兵南下灭楚路过荆州,高从海的孙子高继冲纳地归降,荆南国亡。

#### (四) 前蜀与后蜀

##### 1、前蜀

前蜀为许州舞阳(今河南舞阳)人王建所建。王建出身于“饼师”之家,自幼贫苦,曾做盗贼、贩卖私盐等。唐末应募于忠武军,后选入神策军。因宫廷倾轧受到排挤,王建出为利州(今四川广元)刺史。当时蜀中大乱,王建自利州入川,招纳亡命,攻城掠地,军势强盛。891年,攻下成都,被唐廷任命为西川节度使,遂据有西川之地。897年,又兼

#### 鎏金铜铺首

##### 前蜀

1942年四川成都王建墓出土  
高37.8厘米,兽面直径29.4厘米

铺首是中国古代建筑物门上的构件,用于启闭或叩门。此铺首底盘制成兽面,兽口衔环,铜质表面鎏金,有很强的装饰效果。





并东川，从而占据整个蜀中地区。稍后，趁朱温围凤翔李茂贞之机，出兵取得汉中及秦（甘肃秦安）、凤（陕西凤县）、成（甘肃成县）、阶（甘肃武都）四州之地，以为蜀中屏障。从此，据有今四川、甘肃东南部、陕西南部及湖北西部地区，其辖地仅次于南唐。903年，唐廷封其为蜀王。907年，朱温建后梁，遣使宣谕各地割据势力，王建拒不受纳，并与吴杨渥以“兴复唐室”为号，移檄诸道，企图与岐王李茂贞、晋王李克用会兵讨梁，因无响应者而作罢。同年，王建于成都称帝，改元永平，国号蜀，史称前蜀。

王建建国后，施行保境息民之策，立法度，安抚百姓，恢复生产，境内始终比较安定。当时唐朝名家世族入蜀避难者甚多，王建虽目不识书，却对文士多加礼用。史称蜀国“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

925年，后唐军攻蜀，前蜀亡。

## 2、后蜀

创建者孟知祥，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人。唐末追随晋王李克用，得其赏识，娶李克用侄女（一说是长女）为妻。后唐庄宗李存勖称帝后，任命孟知祥为太原尹。925年，后唐灭前蜀，任命其为西川节度使，次年赴成都就任。后唐明宗时，孟知祥在成都训练甲兵，修筑城墙，整顿吏治，减轻苛税，实力渐强。后杀掉唐所派的监军，与东川节度使董璋联盟，共抗后唐。后唐明宗派兵入蜀讨伐，无功而返。董璋发兵攻西川，孟知祥乘机反击，一举灭董璋，兼并东川之地。933年，唐明宗无奈承认现实，任命其为东、西两川节度使，并封蜀王。同年，明宗死。934年，孟知祥于成都称帝，仍以蜀为国号，改元明德，史称后蜀。不久，孟知祥死，子孟昶继位。在此期间，后蜀与中原屡有战事，并乘中原多事之时，取得秦、凤、阶、成四州之地，将北部疆界恢复到前蜀最盛时的状况。

孟知祥在位期间及孟昶执政前期，均能励精图治，比之前蜀后主王衍时期，后蜀的政治较为清明。虽然也曾多次北上与中原争夺关中之地，但是境内很少战事，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加上府库之积，无入于中原，因而财币充实。蜀地成为五代时期社会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之一。

北宋灭两湖（荆南、楚）后，后蜀处于宋朝三面包围之中。孟昶惊恐，派人携蜡丸书通使北汉，相约出兵牵制中原。密书为宋太祖赵匡胤所获，为宋灭蜀提供了借口。965年，宋师分路进攻蜀中，连破蜀军。至成都，孟昶出降。前后仅六十天，后蜀亡。

## （五）南汉

南汉为商人后裔刘龑建立。刘龑的祖上因经商，由北方迁居福建，后又移家南海。唐

### 青瓷六系罐

南汉

1954年广东番禺出土  
高19.5厘米，口径6.9厘米，  
底径8.1厘米

这座墓可能是南汉中宗刘晟的昭陵。此墓出土的青瓷造型别致，釉色莹润，是当时青瓷中的精品。





末，刘𣸣的父亲刘谦弃商而官，在广州做牙将，因镇压起义军有功，被任命为封州（广东封川）刺史。刘谦死后，长子刘隐继为封州刺史，以厚币重礼贿赂朱温，得其支持。905年，刘隐被唐廷任命为岭南节度使。后梁建国，又任命他为安南都护，清海（今广州）、静海（今越南河内）两军节度使，封南海王。911年，刘隐死，其弟刘𣸣继位。917年，刘𣸣在广州称帝，国号越，次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据有今广东全省及广西的一部分。南唐灭楚时，南汉曾乘机攻取楚的桂（广西桂林）、贺（广西贺县）、连（广东连县）、韶（广东韶关）诸州，并越岭夺得郴州（湖南郴州），这是南汉辖区最大时。

南汉僻处南疆，远离中原，与南唐、闽、楚为邻。虽与邻国（楚、南唐）曾有战事，但是大多情况下尚能和平相处。延揽中原士人和招徕海外商贾是这个政权的两个特点。唐时，大臣得罪贬谪岭南，其子孙往往流寓不返；唐末，中原人士多因避乱而迁居岭南；而唐所任地方官，遭乱而不得归朝，便也客居岭南。刘隐招集这些中原士人，给予礼遇，用为辅佐，并以文吏治州县，境内少有兵戈之乱。这对中原文化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刘氏政权十分重视招徕海外和各地商贾，广聚南海珍宝，西通黔、蜀，北与岭北诸国贸易，促进了海上贸易和广州的繁华。因地居岭外，四无强敌，内无骄兵悍将，加之商利甚厚，故能维持数十年之久。

970年，北宋派人至南唐，命后主李煜写信劝说南汉后主刘𣸣向宋称臣，刘𣸣将来使打入牢房，并派人送信至金陵痛骂李煜，双方断绝关系，也给北宋提供了讨伐南汉的口实。此时的南汉朝政极乱，边备尽弛，北宋大军南下，内外惶恐，人无战意。971年，宋师攻进南汉都城番禺，刘𣸣投降，南汉亡。

### 三、雄心勃勃的后周

五代时期的江南九国，虽然皆以保境息民为策，经济文化比之唐代亦有进一步的发展，然而，大多地狭国小，实力有限，只求偏安一隅。当然各国的情况亦有不同。蜀与南汉以地利自恃，惟图享乐太平；荆南、闽处于强邻的夹缝之中，只求保全或守境而已；吴越、楚，对外虽时有争战，也不过为了多占几座城池；惟有南唐，地大财阜，兵力强盛。烈祖李昇，素有“混一天下”之志，只是苦于地利不足，时机难得，只好积蓄财力，训练甲兵，以守备攻。他反对攻并闽、楚、吴越，而是静候中原变故，以全力北伐。他死时，南唐府库充实，德昌宫库存就有七百万缗的军器、金帛。元宗李璟继位后，不用宿臣，改变其父的既定之策，用兵闽、楚。适值北方辽军南下攻陷汴梁，中原大乱，南唐却坐失北上良机。而用兵闽、楚，地未加扩展，搜敛所得远不能偿耗损之费，从此国势日衰。当然这其中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如史书所称，南唐“朝无贤臣，军无良将，忠佞无别，赏罚不当”等。总之，南唐统一中国

沧州铁狮子

后周

高5.4米，长6.5米，宽3米，重40吨

铁狮在今河北沧州东南30公里的开元寺旧址。作昂首怒目、奔走长啸状，所显示出的气魄恰似当时蒸蒸日上的后周政权。





的梦想终归破灭。

五代时期的北方，兵戈连年，政权更迭频繁。特别是后晋、后汉时期，契丹铁骑横行，中原的混乱到了极点。后汉仅存在了不到四年便亡国，北方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摧残。

后周建立，才给这个分裂、混乱的时代带来了转机。后周前后存在不过九年，但其两位君主，致力于革除五代时期的积弊陋习，对内施行全面改革，对外进行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军事行动，初步澄清了中原地区自唐代以来近二百年的混乱局面，使战乱中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开始复苏，数十年分崩离析的残局有了统一的端绪，并为北宋的最后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一）乱世新风

后周初建时，由于北汉的割据，其辖地

不及后晋、后汉，而且北有契丹、北汉的侵扰，南有南唐的威胁，境内各地藩镇亦心怀异志，动乱无常。后周太祖郭威在国力尚弱的情况下，定内和外，保境息民。郭威初即位，就先后下诏，南面缘淮水及北面沿边的诸州镇，各守疆域，不得纵兵出境俘掠，而商旅往来不得禁止，以维护边界安定；同时注意争取民心，对北下和南来的饥民、流民，采取种种措施给予妥善安置和安抚，出现了南唐“饥民渡淮而北者相继”，北汉、契丹境内流民“逃入周境甚众”的现象。但对于外来的骚扰、寻衅，后周给予坚决抗击。952年，南唐派兵声援后周兖州慕容彦超的叛乱，被后周大败。同时后周数次挫败了北汉的进攻，打击了其南侵的气焰。兖州平叛后，郭威任命端明殿学士颜玘“权知州事”，这是当时北方以文官掌管州县的开始。后又根据关中京兆、凤翔府等八州所辖军镇恃强难制的情况，于953年下令，州县与军镇各司其职，即民政、军政分工管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方镇在州县的权力。

郭威深知武夫治国的种种弊害，他一反前朝旧习，信重文臣，并任以高位。他选拔李谷、范质、王溥等授以枢密、平章之类要职，并严明法规，严惩贪赃枉法，整顿官僚机构，澄清吏治，开始扭转武人左右朝廷的局面。郭威的政治改革是在积弊深重的历史背景下施行的，为了减少阻力，维持大局稳定，所以进展及力度较缓，但是仍然有着转变颓风、强化中央集权的作用，并为世宗柴荣的进一步改革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柴荣即位后，加速改革步伐，整顿科举，再开制科以搜罗人才；继续澄清吏治，加大力度严惩贪官污吏；整顿军队，严肃军纪，功绩尤为显著。通过改革，社会环境及风气都有了明显的转变。

彩绘乐舞砖雕

后周

1992年陕西彬县冯晖墓出土宁夏回族固原博物馆收藏墓主冯晖是后周朔方节度使、中书令，卒于显德元年（953）。墓中出土砖雕56块，上下二块拼合成一个整形人物，计有二十八人，分列于墓葬甬道两侧，组合成两列完整的乐舞图。刻工十分精美。这是继前蜀王建墓棺槨石座乐舞图后，五代时期乐舞图最重要的发现。





## （二）南征北伐

郭威从邺都起兵进汴梁时，留养子柴荣守邺都。后周建立，又授之以潭州节度使，数年间，境内安然。953年初，柴荣奉诏入京，授开封尹，封晋王，后又兼判内外兵马事。954年，郭威死，遗诏柴荣继位，是为后周世宗。世宗曾说，希望做三十年的皇帝，用十年开拓天下，十年休养百姓，十年致太平，可知其与五代时期的君主大不相同，确有雄才大略。

954年，北汉主刘崇乘柴荣年少新立，政局未稳，联合契丹大举进犯。北汉兵三万与辽骑兵一万，合力南下，柴荣力排众议，决意亲征。高平一战，北汉军大败，契丹军不敢去救，自行撤走，刘崇随亲骑十余人狼狈不堪地逃回晋阳。战后，北汉夺取中原的野心破灭，契丹一时也不敢轻举妄动。

柴荣返回汴梁，即着手整顿军队，以纠正唐末五代以来骄兵悍将之风和“战胜则挟主，战败则投敌”的陋习。本着兵贵精不贵多的原则，他重新整编禁军，留用精锐，斥退老弱，同时招募天下壮士到京城，考校武艺，选取优异，一扫以往养冗兵的积弊，减省冗食之费，增强禁军战斗力。这对控制藩镇跋扈、巩固皇权意义重大。此后军容大变，“征伐四方，所向皆捷”。955年，后周世宗遣将西征后蜀，夺回秦、凤、阶、成四州之地。接着，又遣将南征。从955年11月至958年3月，世宗三次亲征。最后，周师攻陷淮南大部，并进逼长江，南唐中主李璟惧怕周师渡江，遣使求和，答应尽献淮南、江北十四州六十四县之地。双方议定以长江划界，南唐岁贡银十万两，绢十万匹。

后周伐蜀虽只收复四州之地，而不越剑门（今四川剑阁北），攻取成都；征淮南也只夺取江北之地，两国以长江为界。尽管如此，



后周世祖像

后周的版图也大大超过了梁、唐、晋、汉四朝，而且获得江淮之间富庶之地，实力大大增强。更为重要的是，后周声威大震，江南诸国为之慑服，再无后顾之忧。959年，后周开始挥师北向，准备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这次北伐进军神速，出敌不意，仅用四十二天，兵不血刃，收复了宁（河北青县）、莫（河北任丘）、瀛（河北河间）三州十七县及军事要冲瓦桥、溢津、淤口三关（河北雄县、霸州一带）。面对锋芒毕露的周师，契丹重兵收缩于幽州以北，始终未出战。世宗准备直取幽州，却因突发重病，只得在瓦桥、溢津两关设雄、霸二州后匆匆班师。当年，世宗病逝于汴京，享年仅三十九岁，统一大业一度为之驻足不前。然而，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至此已可望结束，中国重新统一的历史趋势已经明朗化了。

后周世宗死时，继位的皇子柴宗训只有七岁。960年，世宗一手提拔、刚上任不到一年的禁军统领、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与其弟光义、心腹赵普等密谋，谎报辽兵南犯，借率军北上抗御之机，上演了一场“陈桥兵变，



黄袍加身”的活剧。这是五代兵变立帝的最后一次，也标志着五代的结束。

## 第二节 经济重心的南移

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是唐代经济发展超过以往朝代的重大原因。唐朝后期，南方已逐渐形成了以若干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五代时期，南方诸国政权基本上就是以这些经济区域为基础建立的。如以成都为中心的前蜀、后蜀，以扬州为中心的吴、南唐，以杭州为中心的吴越，以福州为中心的闽，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汉，以长沙为中心的楚，以江陵为中心的荆南。

五代后期，南方各国的国势多半是走下坡路，然而其经济文化发展却颇为可观，确立了南方经济的领先地位。这不仅因为北方地区战乱不断，中原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水利失修，青壮劳动力被强征入伍，战死疆场，为逃避战争和繁重的赋税徭役，百姓流离失所，耕种失时，而且更在于南方各地战争较少，相对安定。诸国保境息民，奖励农桑，招徕商旅，加上北方大量劳动力南下，南

方优越的自然条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这一切，使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趋势终成定局。

五代时期，各地政权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开始注意把流离的劳动力和荒芜的土地结合起来，恢复和发展农业，以保证封建政府的赋税收入。这些政权主要通过实施劝农、减免两税和鼓励农民垦荒的政策，来吸引逃户归业，流入垦辟荒土，最后达到恢复生产的目的。这种政策和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是一致的，是恢复自耕农所有制的一种途径，同时，地主土地所有制也可以借助劝农垦田而获得发展。特别是后周时期，将营田官庄的土地、房舍、农具、耕牛等分赐给佃户，使营田佃户和官庄佃户转为自耕农，更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特别要提到的是，五代十国时期商品经济十分活跃，尤其是南方地区，不仅前承隋唐，而且推动了宋代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这种发展包括商品种植业、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商业性税收剧增，甚至出现像荆南这样财政收入全靠商税的政权。与以往商品流通中奢侈品为大宗不同，这时期，日用品在市场中所占份额大幅上升。通商的范围，除了区域性范围外，还冲破各地区割据的重重关隘，在南方各国之间、南方诸国与中原政权之间，甚至南方诸国越过中原与北方契丹之间，都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各国之间在经济上的联系明显加强，与政治上各政权之间的相互对立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表明当时中国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为中国政治上的最后统一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 一、连年战乱下的北方经济

五代时期的中原，由于连年战乱和统治

青瓷刻花莲瓣托盏

吴越

1957年江苏苏州虎丘塔出土  
苏州博物馆收藏

通高13.5厘米，最大径14.8厘米

托盏由碗盏和托盘组成，是东晋时期始出现的茶具。此托盏釉色青翠莹润，造型别致优美，是五代末年越窑生产的一件典型秘色瓷器。





者的暴政，百姓不死即流亡，人口大幅减少，经济凋敝不堪，人力财力几到崩溃边缘。统治者为了维持国用，也不得不采取某些劝农耕垦的措施，使部分地区在某段时间里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是从整体讲，北方经济的复苏是后周以后的事情。

战乱对于社会经济的破坏是不言而喻的。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的混乱程度在历史上少见，可谓战乱不息，几无宁日，社会经济遭到严重摧残。拿后唐庄宗李存勖与后梁朱温夹河苦战为例，前后十余年，大小百余战，双方均消耗巨大，后唐财力枯竭，如果不灭后梁，也维持不下去了。

由于战乱，不仅水利失修，而且人工决河的事例也频繁出现。梁晋争衡期间，后梁竟然三次决开黄河，以制晋军。决河酿成的灾害十分严重，导致黄河安流的有利因素至此已难于保持。此后，黄河改道，经常泛滥成灾。从910年至953年间，黄河决口及其他水灾共二十四次之多。山东梁山泊就是这

时期黄河泛滥所形成的。黄河泛滥，致使黄淮之间广大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经常受到威胁，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贻祸无穷。

各地军阀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曾劝课农事，使局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如陈州（河南淮阳）刺史、忠武军节度使赵犇、赵翊兄弟，在秦宗权败亡之前，即纠集丁壮，广储粮草，击败秦宗权别部，得以保全一方。秦宗权败亡后，他们更是招集流亡，恢复农桑。朱温能战胜秦宗权，并吞东方诸镇，得到陈州财力支援是个重要因素。而治下经济恢复最显著、持续时间最长的，当数洛阳的张全义。唐末战乱中，洛阳屡遭兵灾，特别是经过秦宗权及其部将孙儒破坏后，田地荒芜，居民不足百户。唐廷任命张全义为河南尹，带部属百余人进入洛阳。他挑选十八人为屯将，分赴洛阳的十八个属县招抚流散农民，开垦荒地，免除租税，恢复生产。因当时劳动力缺乏，张全义又规定，除杀人者死外其余仅杖责而已。数

#### 彩绘散乐浮雕

后梁

1995年河北曲阳王处直墓出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收藏  
长136厘米，宽82厘米，厚23厘米

此石刻用汉白玉雕成并施彩，表现的是墓主人的散乐队。人物体态丰腴，服饰、发饰等保留了浓厚的晚唐风格。





《扬场图》壁画(局部)

五代

敦煌莫高窟61窟南壁

表现一农妇站立在高凳上，手持簸箕当风扬场的情景。



《农耕收获图》壁画(局部)

五代

榆林窟20窟南壁

下图为一农夫，头戴凉帽，身穿齐膝襦衫和小口裤，正手持镰刀割麦。上图表现一农夫手持木锨扬场，一农妇手持长把扫帚扫场的场景。

年间，洛阳地区无闲田，编户达到五六万。终后梁之世，张全义所辖的河南府，成为中央的财赋基地。

后唐明宗在位的八年，被称为“小康之局”。庄宗的前车之鉴，促使明宗注意改革弊

政，惩治贪暴，安抚百姓，恢复生产。数年内，“年谷屡丰，兵戈罕用”，“府库充实，军民皆足”。当时的开封、洛阳，时称繁盛，商税成为政府收入的主要项目。其实明宗的改革很有限，关键是“兵戈罕用”，创造了一个休养生息的安定环境。

后周建立时，中原大地满目疮痍，经济凋敝。太祖、世宗两代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兴利除弊，安定民生。如招集流亡，奖励耕垦，使农民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从而让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赋役得到保证，社会秩序也渐趋安定；减免苛敛则减轻了百姓的困苦，使之得以安居；限制寺院，减少浮食，并取消寺院田亩免除赋税的特权，迫使坐食僧尼转事农桑，国家财赋和劳动力得以增加；兴修水利，治理黄河，疏通漕路，使阻塞已久的大运河重新通航；还扩建东京（河南开封），繁荣商业，等等。这些措施取得了显著效果，促成了北方经济的复苏。

后周存在时间总共不过九年，有关后周手工业的记载及保留下来的实物不多见。而





且手工业的发展又有其延续性，所以，这里提北方手工业的发展比较合适。

五代时期保存下来的纺织品极为少见，因而也就格外珍贵。中国辽宁省博物馆藏“织成锦金刚经卷”，高29.6厘米，长713.4厘米，为深蓝色三枚纬斜纹地，黄色纬线通梭织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经文楷书，行间织有界栏。这种蓝地黄字经书模仿了蓝叶泥金的写经手法，两幅边装饰有连续的金刚杵纹样。经文尾织“贞明二年（916）九月十八日记”，贞明为五代梁末帝朱友贞的年号。此卷流传到明代，为明鉴赏家收藏，入清后纳入宫廷。

这里还要提到沧州铁狮子，因为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铁铸件。它是953年山东匠人李云为沧州（今属河北）开元寺所铸造。

狮高5.3米，长6.3米，宽3米，重约40吨。

铁狮头顶铸有“狮子王”三字，腹内还铸有隶书《金刚经》文。从狮背驮有莲座看，可能是文殊菩萨像底座。整件系由数百块约30厘米见方的铁块，采用分节叠铸法浇铸而成，铸造工艺极高。

就制瓷业而言，宋代时期北方几个著名的瓷窑体系都先后在五代时期创建起来。这一时期北方的瓷器产品，仍然以白瓷为主，但青瓷的烧制也逐渐普及。瓷器的造型和装饰趋于精巧、秀致、典雅，开宋瓷制造先河。

河北曲阳定窑，始于晚唐，经过五代时期的发展，其声誉逐渐超过邢窑，后成为宋朝名窑之一。定窑以生产白瓷为主，瓷窑结构为马蹄形。从窑址发掘看，出土了各种样式的白瓷碗、盆、盘、灯、枕、罐、瓶等。五



五代钱币

开元通宝

后梁

直径3.5厘米

天成元宝

后唐

直径2.35厘米

天福元宝

后晋

直径2.2厘米

汉元通宝

后汉

直径2.4厘米

周元通宝

后周

直径2.45厘米



代的产品器形，与唐朝比，更加多样化，而且胎体薄，成型稳定，胎釉结合紧密，制作精巧。后周时，官府已就定窑设有专门的税

收部门，可知定窑烧瓷活动的兴盛。

青瓷烧造，以后周时期专门烧制御用瓷器的柴窑最为著名。据传，当时有人问世宗烧制什么样的瓷器，世宗道：“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柴窑据记载是在郑州，但是具体窑址不详。柴窑烧制的器物被形容为“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评价极高。可惜，除了这些赞美之词外，柴窑至今仍是一个不解之迷。柴窑瓷贵在稀少，明代就已经很少见到了。五代时期，青瓷的烧制在北方也开始兴盛，如陕西铜川黄堡窑，就是以烧制青釉瓷器为主。该窑平面为马蹄形，顶部为拱型，俗称“馒头窑”。除主要烧制青瓷外，还有黑、白、茶叶末釉瓷，白釉绿彩或褐彩等。质地坚密，胎釉结合紧密，没有剥釉现象，器壁最薄的只有0.1厘米至0.2厘米，釉色莹润，有玻璃质感。当时已采用一钵一器单件装烧的烧成制度。器物装饰手法也多种多样，比之唐代又有所创新。如采用剔去化妆土的手法，使器物釉下呈显暗纹图案；剔刻结合的刻花手法，犹如石刻中的减地法，使纹样在器物表面突起，收到一种浮雕的效果。这是以前所没有的。在窑址还出土了一批带有“官”字款的青瓷残片，表明这是一处为宫廷烧制贡瓷的民间窑场。就北方而言，黄堡窑无疑是五代时期最为重要的一处青瓷窑场。有专家认为，黄堡窑出土的青釉瓷器，在胎釉质量、器物造型、纹样装饰、工艺特征等方面，可以和同一时期的越窑青瓷相媲美，并为宋代耀州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不知为何，五代黄堡窑却不见于史书记载。有人认为，五代黄堡窑遗址发掘出土的青瓷，和传世的东窑青釉剔花作品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由此认为，东窑瓷可能就是五代黄堡窑烧制并流传下来的作品。

#### 普贤菩萨像

五代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

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

彩色绢画

高59.8厘米，宽17.8厘米

这尊普贤菩萨像立于莲花之上，头戴宝冠，轻纱透体，璎珞钏环披身，形象新颖华美，敷彩浓艳。





## 二、保境安民政策下的江南经济

唐末战乱波及大江南北，南方经济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是南方的战乱持续时间不长，很快就形成了区域性的统一。各割据政权的建立者，面对国贫、地狭、民少的状况，为了自身生存的缘故，大都推行保境安民政策。这为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五代时期，中国南方的社会经济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不仅是在江淮、两浙、荆楚、巴蜀这样一些已经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地区，而且像闽、楚、南汉这样一些原属落后的南方地区，经济也有了很大改观。这与北方经济的衰退萧条形成了强烈对比。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之势，已不可逆转。

### （一）劝励耕垦，兴修水利

与北方诸政权的穷兵黩武不同，南方各国都采取了保境安民政策。在北方只是局部地区和一定时间里出现“小康之局”，而在南方却是生产普遍恢复、持续发展。关于南方各国招抚流散，劝课农桑，减免租赋的记载很多，最为成功的当属东南的江淮、两浙地区。如吴杨行密初定江淮，便听从谋士高勣的建议，招集流散，政事宽简，与民休息。很快，江淮间的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到李昇执政时又下诏，三年内种桑三千棵，赐帛五十匹；每丁垦田达八十亩，赐钱两万；而且桑田、农田均免租税五年。于是，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又如吴越，自钱镠始，就屡募民垦荒，其子孙继位者，又多颁令减免租赋。至钱弘佐时，积蓄已可支十年，于是下令境内免租税三年。钱弘俶继位，又以免租税募民垦荒，对提请调查漏报成年男子以增加赋税的官员，则予以杖责，



由是国人皆悦，境内无弃田。当时“米不过数十文”。由此可见五代时期中国东南地区的农业发展之迅速。另外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蜀中地区，也是南方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史载，后蜀孟昶初继位时，“百姓富庶，赋役俱省，斗米三钱”。米价如此便宜，表明了蜀中农业的发展。

南方农业发展还得力于水利灌溉的发达。当时南方诸国无不重视水利，各地兴修水利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绩，不仅维护、改造、扩建原有的水利设施，还开凿了许多新的陂塘。在南唐、吴越河渠较多的地区，修造了不少圩田。因当地水乡河身较高，田在水下，农民便在河渠两岸农田周围筑起堤坝，内以围田，外以隔水。沿堤有许多闸门（斗门），旱则开闸引水入圩，以收灌溉之利；涝则关闭闸门，以避泛滥之灾。

南方诸国兴修水利成绩最卓著的是吴越。经数十年努力，吴越境内浙水两岸到太湖周围，凡河流处都筑造了堤堰、闸门，可用人工控制水流，使其蓄泄有时，加强了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吴越还在西湖和太湖设有“撩湖军”或“撩清军”，专门负责修治和

定窑白釉刻花盖罐

五代

上海博物馆收藏

通高7.8厘米，口径5.7厘米

此瓷罐是当时定窑白瓷中的精品。





捍海塘遗迹  
吴越

疏浚工作。其最著名的水利工程，当属“捍海塘”。在钱塘江入海处，两岸田地经常遭受海潮冲击，那一带的农民早在五六世纪时，就开始修筑防海堤，但是随修随坏不能持久。910年，钱镠开始修建“捍海塘”，采用“石囤木桩法”，修筑起一条长达百里的海塘。石囤木桩法即编竹为笼，笼内填满石头，叠积成堤，再于其外打大木桩加以维护。1983年，在南桥铁路施工过程中，曾发现钱氏捍海塘遗迹。其基础采用竹笼沉石，堤里堤外的护堤木桩排列密集，纵横相联，以防堤土流失和塌方。堤埂用土夯筑，里坡用沙石铺面，坚固结实。这种筑塘方法，在当时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当时南方农业的发展，不仅表现在粮食的丰产和仓粮的充实上，而且表现在经济作物的增加上。其中最普遍的是茶树的栽种。闽、吴越、吴、南唐、楚、前后蜀等都大量生产茶叶，当时南唐向中原岁贡茶多达二十五万斤。唐朝楚地产茶本无名，五代时楚奖励百姓种茶，茶叶遂成为楚的贸易大宗和立

国之本。闽建州（福建建瓯）一带因产茶而闻名，家家户户均以种茶为业。这一时期桑树的栽种也更为普遍。南唐是“桑柘满野”，四川桑树尤多，每当蚕市时，有大量桑树苗出卖。另外，棉花的种植也逐渐推广，楚境内已种棉，当时称为“木棉”。唐时棉花在岭南、南诏、西域高昌已有栽种，五代时湖南棉花的生产可能是从岭南传入的。种茶、栽桑、植棉等经济作物生产的发展，不仅反映了农业的发展，也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 （二）活跃的手工业

五代时期，南方手工业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也活跃起来，特别是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使原属农副业的一些生产项目，其生产和经营的专业化程度提高，终与农业相脱离而独立发展。这直接促成了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繁荣。

### 1、染织业

五代时期，吴、南唐、吴越、前后蜀都以绫锦闻名于世。钱镠时，杭州城内的织锦工人就有二百余人。吴越向中原王朝进贡的纺织品数量很大，品种有越绫、吴绫、锦、缎、绮、纱、绢、绵（丝绵）等，贩卖到各地及国外者为数更多。江淮纺织业也很发达，吴以丝织品输税，说明民间家庭纺织的普遍。史载，南唐纺织品产量很高，绢价仅相当于北方的二分之一。当时流行一种“天水碧”，相传后主的宫人染碧，夜晚置于中庭，为露所染，其色极鲜翠，故名之。天水碧先在宫中流行，后传至民间，为时所尚，以至成为染肆的招牌。南唐灭亡后，宋人袭慕江南风流，天水碧更为盛行。蜀中自古为织锦胜地，成都素称锦官城。前后蜀时期，丝织品是当时的大宗商品。蜀中每春三月为蚕市，市面极为繁盛。楚地的纺织业本不发达，民不事



桑蚕。马殷命输税者皆以帛代钱，百姓不得不从事蚕桑与纺织，很快“民间机杼大盛”，丝织业也发展起来。另外，还出现了一种新织物，即木棉布与木棉所织地衣。在楚进贡中原的纺织品中已有“吉贝布（棉布）”。此外，唐朝时未见福建产锦，然而五代时有了，在闽给中原王朝的贡品中，也可看到锦、绮、罗等丝织品。由此可见丝织业在南方的普遍兴盛。

## 2、制茶业

五代时期的茶叶产地多在江南九国，无论在茶叶的质量还是制茶技术上，都比前代有所提高。其中江淮素为主要产茶区，杨行密初定江淮时，就曾派押牙唐令回携万余斤茶叶往中原汴、宋贸易，因被朱温所劫而与中原交恶。后唐时，江淮与中原的茶叶贸易才恢复。江淮茶原以阳羨茶为珍品，自南唐灭闽占有建州后，建州的京铤茶取代阳羨茶而成为茶中珍品。南唐时，境内茶场密布，产量极丰，官焙（茶）有38处，官私制茶共有1336处。楚地也是五代产茶区之一，这里的茶叶在唐朝并不出名，湖南诸州的贡品中没有茶叶。然而五代楚国茶叶的大量出产，已经作为贡品与主要商品了。即使像荆南这样三州之地的小国，茶叶生产也很发达，江陵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茶市。

## 3、制盐业

唐朝曾于扬州置盐铁使，榷取盐利。吴、南唐立国，仍以盐利为重要财源。淮南地区盐场密布，当时官府在泰州（今属江苏）设有海陵盐监。以后淮南入于后周，对南唐盐利收入影响极大。南唐中主李璟以江南无卤田为由，乞“海陵盐监南属”，但是后周不允，只答应每年支給南唐三十万石食盐。可知这里产盐量之大。蜀中地区则以产井盐著称。当时井盐生产形成了云安盐、富顺盐、陵井



盐三大生产中心，产量很高。其中陵州盐井曾“岁炼八十万斤”。盐利也成为前后蜀的重要收入。此外，吴越浙西的嘉兴、临平，闽的福州、泉州一带也生产海盐，产量亦不小。

## 4、矿冶业

五代南方诸国的矿冶业在唐朝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吴和南唐境内有铜、铁、银、铅等多种矿藏。吴武昌节度使秦裴在大冶（今属湖北）开了一个新铁矿，尽管这一带的矿藏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已有开发，但后来鲜有所闻。五代时期这里成为南唐的产铁要区，直到近代仍很兴盛。江淮地区的铜、银产量最为可观。经过五代时期的开发，这一地区成为宋代举足轻重的铜、银产区，每年的产铜量占全国总产量的二分之一，而银的岁产额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二。这种盛况的出

## 白瓷茶瓶

五代

传河北唐县出土

高9.8厘米，口径4.3厘米

茶瓶为点茶用具，点茶是将研磨好的茶饼末放于碗中，再用茶瓶中的沸水沏用。点茶法在唐代后期始逐渐取代煮茶法，成为饮茶方式的主流。



## 纯银阿育王塔

吴越

2001年浙江杭州雷峰塔塔基地宫出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  
塔高35.6厘米

塔由塔座、塔身、山花蕉叶、塔刹等组成，造型独特。塔座方形，侧面以壶门、小佛像装饰，意指大地。上面是长方形塔身，四面镂刻佛本生故事，四角各有一只金翅鸟，寓意四方世界。塔身内是盛放“佛螺髻发”的金棺。塔身平台寓意佛显现世，护佑众生，平台四角的山花蕉叶上是描述佛一生事迹的佛传故事画面。塔刹则由刹杆、五重相轮和火焰珠、宝葫芦等组成，象征解脱之道。佛塔工艺精湛，精美绝伦。



## 白釉瓷碟

五代

1980年江西景德镇窑址出土  
江西省博物馆收藏

高3.4厘米，口径14.5厘米  
此瓷碟胎白，透光度好，釉层薄而晶莹光洁，其白度达70度以上，已达到现代瓷的标准。

现，与南唐银、铜矿冶业的迅速发展有直接联系。宋初课银达到年平均十五万两左右，比之唐宣宗时期创造的两万五千两的高峰数字增加了五倍。这与五代南方诸国对银的积极开采有关，也为五代以后白银作为正式货币进入流通领域奠定了基础。五代楚地生产



铅、铁、丹砂和铜，楚用铅铁铸钱通行国内，并博取大利。潭州境内盛产丹砂，马希范用丹砂涂宫殿的墙壁，“凡用数十万斤”。保存至今的溪州铜柱（在今湖南永顺），高2.98米，重2500公斤，铜质精纯，铸刻精美。它代表了楚冶炼和铸造的技术水平。在广州光孝寺——禅宗六祖慧能受戒之地，有两座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年逾千年的铁塔，是南汉时所建。西塔建于963年，今已残。东塔是四年后以南汉主刘鋹的名义铸造的，形制仿西塔，四方形，七层，高7.69米，有九百多个佛龕，工艺精致。初成时全身贴金，有“涂金千佛塔”之称。塔身下莲花铁座的四周雕有“行龙火珠”与“升龙降龙火焰之宝珠”，造型生动。南汉盛产金银，南汉诸主以穷奢极侈著称，其宫殿以金银作“殿衣”、“地衣”，“饰一柱凡用银三千两”。当时南方诸国献于中原王朝的贡品中，金银的数量很多，反映了社会财富的增长。

## 5、制瓷业

宋代是中国制瓷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与五代时期南方制瓷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唐代以来就有的越窑、西山窑、岳州窑、洪州窑、潮州窑、琉璃厂窑等，入五代后继续发展。1956年发掘出来的浙江黄岩窑，是一座吴越时期的民窑，其出土瓷器与越窑很相近，应属越窑系统，反映了这时期民窑的发展。而江西的胜梅亭、石虎湾、黄泥头窑，则属于景德镇范围的早期瓷窑，这一带发现了质量很高的青瓷和白瓷，特别是白瓷，胎色洁白，瓷化度高，白釉色调纯正，白度达70度以上，这里是南方地区最早的白瓷产地。入宋以后，景德镇瓷窑不断增加，后来形成了驰名中外的景德镇瓷器。

这一时期最为精美的仍然是越窑青瓷。五代时期，越窑青瓷的产地扩大，生产规模





七子青瓷盒

吴越

1958年浙江嵊县出土

高3.8厘米，口径12.4厘米，

底径7.6厘米

瓷盒的盒体和盒盖间以子母口扣合。盒盖上雕有七个顽皮稚童，反映了中国传统多子多孙的观念，盒盖外侧刻有“千秋万岁”的吉语。

也很大。吴越国向北朝进贡的瓷器一次就达数万件之多，还大量倾销和出口越窑青瓷，成为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就现存的浙江余姚秘色瓷器看，无论是胎质、釉色、纹饰、造型，在当时都别具一格。秘瓷以青绿釉最佳。唐代秘瓷青绿釉少，青黄釉较多，而五代秘瓷中，青绿釉明显增多，说明当时施釉和烧制技术的进步。在装饰手法上亦有新的发展。刻花装饰极为流行，雕镂加工工艺精致，特别是在贡瓷中大兴涂金或贴金的金银加工方法，使器物更显华贵。装饰题材也达数百种，比之唐代更为丰富多彩。在杭州钱元瓘墓出土了一件浮雕双龙罍（瓶），腹壁浮雕双龙，龙昂首摆尾，飘须舞爪，龙身下朵云浮动，出神入化。出土时，龙身上尚有金片，说明当时曾在龙体贴金。

#### 6、造船业

五代时期南方造船业也颇为发达。江南诸国善水战，均有舟师之制。唐末运河交通

阻断，割据江南的吴越、闽与中原王朝的联系，几乎全凭海路先达登州（今山东蓬莱）或莱州（今山东莱州），再转陆路到开封。而扬州、金陵、杭州、明州、泉州、福州、广州等繁华都市，都濒临海洋，发展海外贸易均靠航行海上，没有规模庞大的造船业显然是无法进行的。

#### （三）兴商获利

五代时期，随着南方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繁荣起来。江南地区经济都会兴起的速度甚快，除了成都、广州这些历史久远的商业都会外，福建地区的福州、泉州也发展成为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特别是泉州，已经替代扬州、广州崛起为中国第一海港。王审之的侄子王延彬，在泉州二十余年，善于招徕南海商贾，致取宝货，时人称为“招宝侍郎”。闽亡后，留从效据漳、泉二州，重修泉州城，广植刺桐，美化城市。至宋，泉州商业极盛，其功不可没。地处浙江



## 十国钱币

十国时期，民间多使用唐代的开元通宝钱。南唐、闽、楚、前蜀、后蜀和南汉六国曾铸过钱币。

天元汉宝

前蜀

直径2.3厘米

大唐通宝

南唐

直径2.3厘米

广政通宝

后蜀

直径2.2厘米

乾亨重宝

南汉

直径2.4厘米

天策府宝

楚

直径4.4厘米

永隆通宝

闽

直径3.5厘米

的杭州，北通中原，南通闽、粤，西通蜀、楚，又从海路与国外通商，从而形成浙西的一个海运中心。经钱氏家族经营，杭州城美丽繁华，盛况空前。南唐境内的金陵，收长江舟楫通商之利，“制度壮丽，甚为繁荣”。小小荆南的江陵，作为南北交通要道和四方交会之所，商贾荟萃，已发展成为川蜀、江南、广南的一大都会。这一时期，因商品交易规模、范围的扩大，乡村间的草市（集市）也大批兴起，逐渐形成郡县城市以外的新兴工商业城市或市镇雏形，如荆南新辟沙头市为商业城市，即后世的沙市；入宋后与成都相匹的都会梓州城，在前后蜀时期，就是西川的一个草市。

五代时期，南方各经济区域间、南方诸国与北方及周边民族地区的商业往来也更加频繁，反映了区域性市场的扩大和市场网络的逐步形成。南方诸国对外贸易，特别是海外贸易也很发达。四川地区是中国最早与国外发生贸易关系的地区之一。至前后蜀时期，通过南方和西北的陆上丝绸之路，四川与东南亚、印度半岛、中亚、西亚的一些国家有着一定的贸易往来。而广州、泉州自唐

以来海外贸易就一直发展，商税为国用大宗。特别是泉州，更是后来居上，成为当时中国最繁盛的港口城市。1965年，福建福州闽国刘华墓出土了3件波斯孔雀蓝釉陶瓶，形制很大，高75厘米。其蓝绿釉皆以铜离子着色，而不同于中国汉代以来绿釉陶器上所施的低温铅釉。这是一种基本不含铅的碱金属釉，在高温条件下才能烧成。它的出现，为中国陶瓷工艺带来借鉴，同时也是五代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珍贵证物。五代吴、南唐、吴越的海外贸易也有发展，与新罗、高丽、日本、占城、大食皆有商船往来。

由于南方诸国商贸的发展，商业性税收剧增，成为南方各国致富的主要渠道之一。由于商利甚厚，统治者从单纯依靠地租致富，转而部分依靠市场发财。如徐温的儿子徐知谔居润州，身为一方长官，居然在城内开店铺，躬自贸易。南唐寿春的地方官员李彦真也“惟务聚敛，列肆百业，尽收其利”。又如前蜀后主徐太后姐妹，竟于“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夺民利”，而后蜀宰相李昊“秉利权资货，岁入无算”。官吏经商反映了商品经济在深度上的发展。与此相应的是商人地位的提升。中唐以后，商人的身份地位已经有所变化。至五代，商人凭借雄厚的资本，甚至可以入仕为官，贾人干政者亦时有之。入宋后，商人不再被列入贱民之中，而是与四民一样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可以做官了。这种变化实是与商品经济发展伴随而来的。

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是商业发展的一大标志。五代时期白银产量大增，为宋以后白银作为正式货币进入商品经济领域奠定了基础。其实贵金属作为货币进入商品流通市场，其背后最强大的推动力是商品经济发展本身。五代时期，由于商业发展，货币需求量大大增加，前蜀王建父子曾六次铸





钱，至于每次铸币量多少史无明言。据记载，后唐灭蜀时，掠走蜀中铜钱一百九十二万缗；大将郭崇韬搜刮铜钱一百万缗；后唐军队班师时，孟知祥征发成都富户及前蜀臣僚家，得钱六百万缗，犒军之余，尚有二百万缗。如果将这几次搜刮的数量加在一起，就达一千多万缗。有人据此计算，前蜀每次铸钱额为一百九十一万余缗，平均每年铸钱额为三十三万余缗。唐代铸钱最多的天宝年间，每年全国铸钱三十二万缗。由此看来，前蜀铸钱额高于唐朝全国的铸钱额。前蜀一国铸钱量就如此之大，其所寓含的意义无需多言。

### 第三节 科学文化的新发展

五代十国是介于唐、宋两个文化高潮之间的低潮期，但是也并非毫无成就可言。这一时期在火器运用、雕版印刷上，出现了一些新进展。尤其在文学艺术领域，更有其独特成就，对后世影响很大。这首先要归功于身处乱世的那些文人学士。他们在丧乱之际，或隐遁山谷，或流亡到比较安定的地方，保存和散播文化的种子，并继续进行创造活动。一部分热心提倡文化运动的统治者，他们保护和任用了一批文人学士，在一定程度上为文人学士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和条件。最为典型的是南唐和前后蜀的国主，他们吸收了大量避乱南来的政治、文化、艺术人士，从而使两地文化事业的发展既具有一定地域性特征，又足以代表这一历史时期的水准高度。北宋初年的文化重建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两蜀和江南地区所保存的唐文化模式，北宋的文治时代能够迅速到来，也与两



孔雀蓝釉陶瓶

闽

1965年福建福州刘华墓出土  
高75厘米，口径17厘米，底  
径16厘米

陶瓶状如橄榄，通体施孔雀  
蓝釉。肩颈部附三耳，外腹  
壁贴塑半圆弧条纹。其器  
形、釉色和纹饰都与在伊朗  
发现的9至10世纪的伊斯兰  
式釉陶瓶相同，是当时海外  
贸易的证物。

地文化人士的参与有极大关系。

#### 一、战乱中的火器

关于火药的初始知识，最初是由中国古代的炼丹家发现和积累起来的。大约在晚唐时，火药开始被用作战争武器。最早使用的火器是火箭和火炮，用以加强战争中火攻的效力。所谓火箭，就是在箭头上绑火药球，点燃后用弓把着火的箭射出；所谓火炮，则是把火药捆成火药包，点火后用抛石机发射。唐哀帝天祐(904—907)初，郑璠攻打豫章(今江西南昌)，曾发射火炮把城门烧毁。五代时，由于战争需要，除火箭、火炮外，还制造了火球、火蒺藜等用于抛射的火器。

石油在军事上的应用也始于五代。《吴越备史·文穆王》记载，吴越从大食国得猛火油，“以铁筒发之，水沃，其焰弥盛”，又“以银饰其筒口，脱为贼中所得，必剥银而弃其筒，则火油不为贼有也”。吴、南唐则从占城转输猛火油，还将猛火油转运契丹，并告



之用法。958年，占城王到汴梁向后周贡方物，其中“又贡猛火油八十四琉璃瓶”。猛火油应是利用石油燃烧性能制成的抛掷物。

有趣的是，在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五代绢画《降魔成道图》中，有一魔手持管状发火器，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管形火器图像。如果说宋元是中国火器发明史上的重要阶段，那么五代则是这一阶段的先驱。

## 二、走出民间的雕版印刷

雕版印刷在隋唐就已经出现，多半用于

印刷民间流行较广的佛经、历书、字书等，可见最先使用这项新技术的是市民阶层和宗教徒。五代时期，印书事业继续发展，开封、山东、南京、福建、浙江、四川及甘肃西部等地区都已开始印书。据统计，吴越钱弘俶命灵隐寺僧人延寿在974年雕印佛教经像咒图，有数字可考的达六十八万二千卷。钱弘俶笃信佛教，曾效法阿育王广建舍利塔。在1924年倒塌的杭州雷峰塔废墟中，发现了大量藏经砖。所谓藏经砖，即砖的一端有圆孔，呈管状通过砖心，供藏贮经卷。这些藏经砖所藏为《宝篋印经》（全称《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和《舍利塔图》，均为钱弘俶时期的雕版印刷品。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曾出土晋开运四年（947）曹元忠割据瓜州时期所刻印的观世音菩萨像和毗沙门天王像的单张印刷品，还发现了天福十三年（948）雕印的《金刚经》，已经是册子形式的书籍。后唐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请求根据唐朝石刻《九经》雕版印行。于是当时的国子监从932年开始刻经，至后周广顺三年（953）全部校刻完毕。因由国子监负责刊印，宋人称之为“旧监本”。这部《九经》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儒家经书刊本。后唐还规定以国子监印本经书为标准本，从而出现了国家对雕版印刷事业的控制，这一做法也为后来的宋代所承袭。953年，后蜀宰相毋昭裔也主持刊刻了《九经》等书籍，印刷行世。五代蜀中的刻本，今天尚有留存，极为珍贵。应该说，从唐代的卷轴变为版印成册，使书籍的保管、携带更加方便，这确实是五代时期的一个重大变革。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毋昭裔在成都还主持了刻石经的工作，即用楷书刻《易》、《书》、《毛诗》、“三礼”、《左传》、《论语》、《孝经》、《尔雅》十经。后来宋人又补刻了《公羊》、《谷

《降魔成道图》（局部）

五代  
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  
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  
彩色绢画  
高144厘米，宽113厘米







后蜀石经

后蜀

1938年四川成都出土

残高29厘米，残宽21.5厘米，厚7.5厘米

后蜀石经为稀世之珍。大多为四川省博物馆收藏。这块石经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两面均刻《仪礼·特牲馈食礼》。

梁》、《孟子》三经，共十三经。经文下有双行小字的注文，这是历代所刻石经中仅有的一例。遗憾的是，这部珍贵的石经留存至今的仅剩残石十余方。

### 三、书院制度的雏形

书院是最早出现于唐后期、盛行于宋的一种新型教育组织。它是在官学之外，传统私学发展的基础上创立的。唐末五代社会动乱、官学废弛以及印刷术的提高，为书院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当时许多名儒学者隐居胜

地，开学馆，立精舍，设书院，群聚讲习。后蜀宰相毋昭裔就曾出私财百万营建学馆。这些教育组织最初大都是由社会集资创建，后来演变为民办公助，或官办，主持人称洞主、山长或堂正，还有副山长、助教、书讲等。在北宋著名书院中，就有几个始建于五代，如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创建于南唐，河南登封嵩阳书院始建于后周（宋初曾赐名太室书院），睢阳书院则初建于后晋。

白鹿洞书院前身为940年南唐李善道创立的学馆，另一说为李昇所建，是当时著名



的藏书讲学之所，号“庐山国学”。南唐灭亡前的977年，这里的学徒多达数千。学馆招收生徒不拘一格，学徒来源十分广泛。当地不少世代务农之人亦释耒就学，有些后来成为文化界名人，如丘旭、黄载等。南唐时，庐山上下遍布公私之学，人才荟萃，成为当时中国的文化胜地。南唐国主李璟、李煜，以及宋代文人杨徽之、刘式等人也都曾就学于庐山国学。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宋代四大著名书院之一，对宋代文化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深远的书院制度，显然在南唐就已具雏形。南唐是五代时期中国文化氛围最浓厚的地区之一，私家兴办的书楼、书舍、书

院很多，南唐几代国主都重用文吏，特别是李煜时期，文墨之习浸染朝野。刘敞、李觏、王安石、朱熹、陆九渊等宋学名家，皆出自南唐故地，当不无南唐学风的熏染。书院作为新型的教育组织，目的是自由研究学问，受佛教禅宗影响，讲求身心修养，不同于汉学的重训诂考据，而注重义理的阐发，开有宋一代学风。

#### 四、艰难行进的史学

五代为乱世，特别是北方中原地区，战乱不息，王朝更迭频繁。尽管如此，史学发展却未中断。在不到六十年的时间里，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之一的《旧唐书》，是由北方王朝所完成。可见，在武夫称雄的时代，文人学士虽然饱经风霜，其功绩仍是不可泯灭的。

唐代历朝均修实录，累积到一定阶段，根据实录撰修国史，已成制度。五代诸朝沿袭唐制，以宰相监修实录、国史，选精通史学之臣任修撰事。五代诸朝的实录到北宋时尚存，为修撰史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司马光《资治通鉴》的五代部分，就大量采用了实录记载。这一时期，官修唐史，主要集中在中原的五代，私修唐史则大多出自偏安的十国。

五代政权官修唐史，以《旧唐书》为集中体现，从筹集史料到最后纂成，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三代，前后二十五年，其中搜集唐代史料就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唐朝实录、国史先后两次散失，至五代，唐代史书存者“百无二三”，特别是唐朝后期史料大多散失。后梁修撰唐史，史馆以资料缺乏，请令天下有记得唐武宗以后公私事迹者抄录送官。后唐明宗朝再次着手修撰，又四处寻访搜集史料。941年，后晋在前两代史料搜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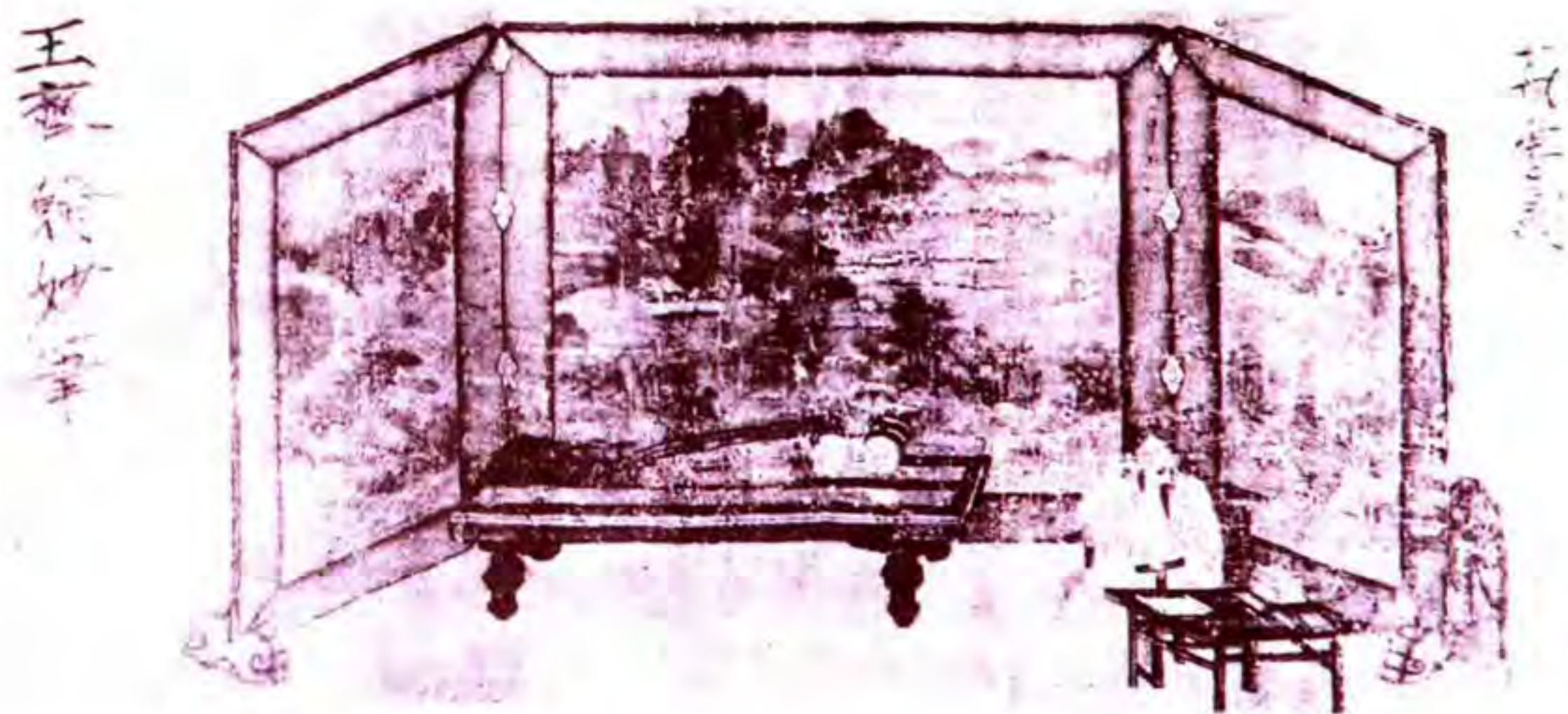
彩绘文官俑

闽

1965年福建福州刘华墓出土  
高62.5厘米  
俑神态生动，笑容可掬。







《勘书图》

南唐 王齐翰绘

南京大学收藏

绢本

纵284厘米，横65.7厘米

图中央为三叠屏风，屏风上绘着色山水，前置一长案，案上摆放小箱、书册等。右下脚有一书几，几上置卷册、笔砚。几后坐一长髯老者，似在校勘书籍后稍事小憩。此图无款，右上方有宋徽宗赵佶瘦金体书“勘书图”，左上方书“王齐翰妙笔”五字。

的基础上，敕修唐史。由宰相赵莹监修，修撰者有张昭远、贾纬、赵熙等人，至945年撰成。全书纪、传、志共二百卷，名为《唐书》。后宋代欧阳修等重撰唐史，后世遂称五代所修者为《旧唐书》，宋欧阳修等所撰者为《新唐书》。《旧唐书》成书时，适值赵莹罢相，刘昫继之，所以《旧唐书》以刘昫署名撰修。《旧唐书》公认的优点是保存唐朝的史料较多。前半部全部采用唐代官修实录、国史旧本，故较详明；后半部由于史料不足而杂采各书，因此或庞杂失当，或过简欠详。但是无论如何，在五代战乱而史料又大量散失的情况下，能够撰成这样一部史书实属不易。

## 五、词代诗之势

词是一种既适于歌唱又具有独立艺术价值的新诗体。词的全称是曲子词，或词曲。由于句子长短不齐，比诗更适合于填写歌词，表达情感。在依曲填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很多词牌，实际上就是歌谱；有了谱，就可以按其规则填写一定字数的词。最初的词牌与内容相关，有其特定内涵，后来演变为固定格式，与内容脱离，于是词便在形式上走向成熟。

词初创于唐代，最初流行于民间。在敦煌发现不少早期的曲子词，作者大多为乐

工，作品具有清新、质朴、活泼的特点。随着乐舞的繁荣，文人士大夫也开始偶尔为之，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都曾写过词。中唐以后文人写词日渐增多，词的表现艺术有所发展。晚唐的温庭筠精通音律，谙习词调，曾创作了不少词。他是由民间词转向文人词的第一个有代表性的词人，唐末五代文人多袭其风。一介武夫的朱温也曾作《杨柳枝词》五首，进献唐昭宗，可知唐末词已流行。相传，后唐庄宗李存勖喜欢填词，“凡用兵皆以所撰词授之，使扬声而唱”，以鼓舞士气。五代时期北方较有名气的词人是和凝，曾在唐、晋、汉、周四朝为官。他自费雕印的诗文集，后世已不见流传，曲子词是他年轻时所写，流传很广。蜀人所编《花间集》中收录其作品二十首，他是《花间集》作者中惟一的中原词人。

五代时期北方词作不甚发达，南方则大不然。特别是巴蜀（前、后蜀）和南唐是五代词人大量涌现的地区，可称为“词乡”。巴蜀是词发展得最早、最快的地区，这与唐末五代初中原衣冠缙绅大批进入富庶安定的蜀地有关。940年，后蜀人赵崇祚编成了一部《花间集》，这是中国第一部词作总集，收录了唐末五代十八家五百首词，其中十三家都是前、后蜀词人。作者有达官显宦、文人学



士，亦有普通平民。作品多写儿女艳情，风格香软浓丽，后人称之为“花间派”。《花间集》的问世，标志着传统词体风格基本形成，词也因此有了“艳科”的称号。另一个词乡在南唐，南唐词今存二百余首，以李璟、李煜、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派，词风大多清丽委婉，就总体而言，艺术成就高于巴蜀。其中又以李煜成就最高，他的词流传至今的有三十余首。李煜生于太平盛世，继位时国势已风雨飘摇，他最终由国主一变而为阶下囚，人生遭遇使他的词作感慨深沉，无论铺叙宫廷生活、刻画人物，还是描绘山川草木，皆具情思。特别是后期作品，其眼界由个人扩展到社会，不仅从花间派狭窄的领域中超脱出来，而且彻底摆脱了花间派镂金刻翠的写法，用白描笔法倾诉自己的情感，语言明净简约，提高了词的表现力和感染力。王国维曾评价说，词至李煜，眼界始大，感慨遂深，变伶工词而为士大夫词。

瓜棱白瓷水盂

五代

1976年江苏扬州出土

高6厘米，口径2.8厘米，足径4.5厘米

水盂属于文具，为盛水用以注水于砚。唐代以后文化发达，文具需求量大增，文房四宝及水盂数量明显增多，而且日趋流行。



总之，五代词为宋词的高度繁荣奠定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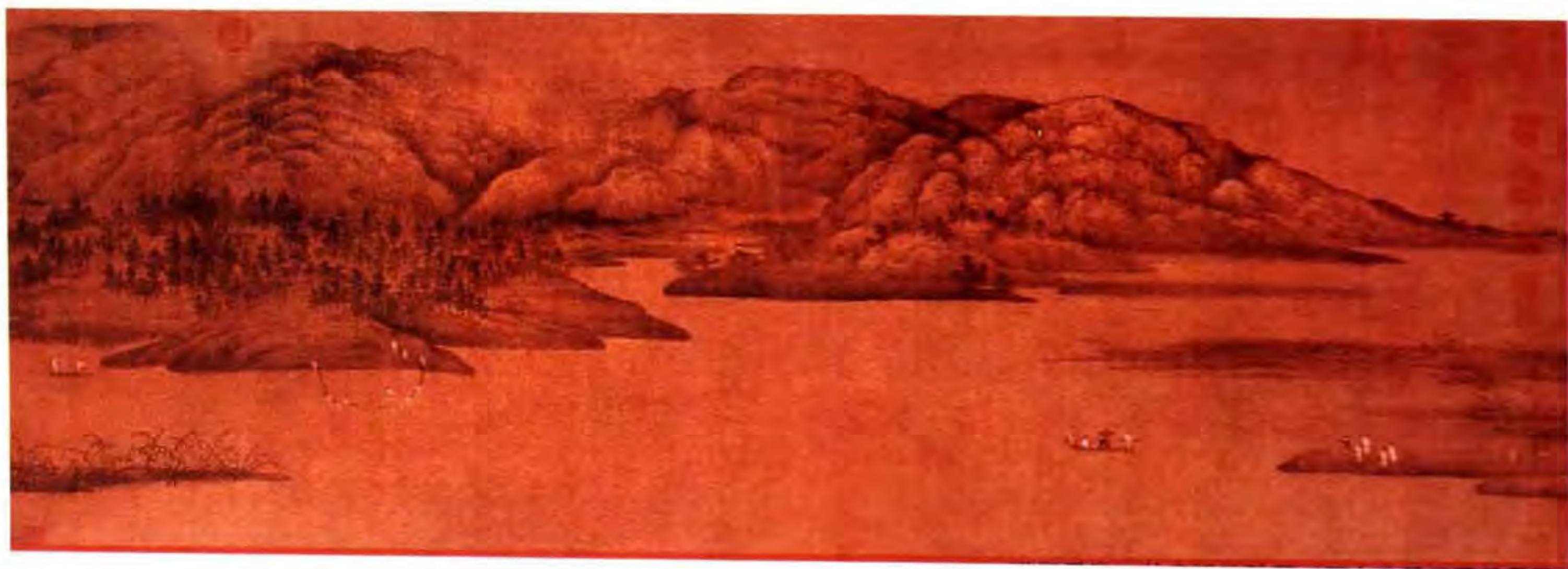
## 六、日益精致的艺术

五代时期在乐舞、雕塑、书法、绘画等艺术领域沿袭唐风，并有所发展。五代时，曲子词非常流行，关于乐舞的形象资料发现也很多，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乐舞的繁盛，这一时期的乐器仍以龟兹乐为主流。在河北曲阳王处直墓中，发现了数块汉白玉浮雕，其中后室有两块大型浮雕，长1.36米，宽0.82米。一块为散乐浮雕，乐女们头梳高髻，戴鲜花，身着襦衣长裙，手持箜篌、箏、琵琶、笙、鼓、横笛等乐器在演奏。浮雕均敷彩，形象生动传神，呼之欲出。在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北方，竟能出现如此精美的艺术品，的确令人惊诧。五代还出了一位著名书法家杨凝式，其用笔有破方为圆、削繁为简之妙，后人评有“天真烂漫”之趣。南唐后主李煜的书法也颇有成就。

代表五代艺术成就最高水平的是绘画。后蜀与南唐先后建立了最早的宫廷画院，并聚集了大批绘画人才。这时期绘画的写实技巧有了极大发展。作品虽然缺乏唐朝的华丽豪放，然而却开宋代典雅细腻的先河。与唐代绘画中宗教绘画占有很大比重不同，这时期文人士大夫画抬头，更注重现实的享受和对自然美的陶醉。这些充分表现在人物画的发展和山水花鸟画科的成熟上。

五代人物画以南唐画院画家顾闳中、周文矩为代表。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线描工整精细，设色绚丽清雅，达到了这一时期人物画的最高水平。图中的乐舞、家具、服饰及生活用具皆是写实，如图中舞伎所舞，是唐以来盛行的绿腰舞（六幺舞），伴奏乐器绝大部分是胡乐中的龟兹乐；从家具陈设





看，五代时期，古代的高型家具类型已基本具备；韩熙载（南唐工部侍郎）所戴轻纱制的高帽子，则是当时有名的“韩启轻格”；从陈设的杯盘颜色和形状看，都是越窑青瓷。因此这幅图画具有很高的艺术和文物价值。周文矩的人物画继承了周昉的传统，衣纹描绘上又吸收了李煜书法的“战笔描”，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代表作为《宫中图》、《重屏会棋图》等。

五代以后，山水画和花鸟画有了飞跃性的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确立了水墨山水画。后梁的荆浩、南唐的董源都擅长水墨画，由于画家深入自然，创造出不同的笔法，并表现了不同地区的山河气象，或峭拔，或旷

远，或雄杰，或秀丽，形成了南北两大画派。两派均对宋代山水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时期的花鸟画也分为以徐熙和黄筌为代表的两大画派。南唐的徐熙性淡薄，其画是以勾勒为主的淡彩画法，题材、内容、画法都表现出文人士大夫的情趣。黄筌为西蜀宫廷画家，其画法先用细笔勾出轮廓，然后敷以重彩，极其工细精整、富丽堂皇。二者分别被称为“徐熙野逸”、“黄筌富贵”，对后世花鸟画影响深远。

这时期的宗教壁画创作远不如唐朝兴盛，然而却更趋于世俗化。宗教壁画的这种趋势倒是与五代时期的绘画艺术大势相一致。

#### 《潇湘图》

南唐 董源绘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绢本

纵50厘米，横141.4厘米  
图中一派江南水乡的平远景象。水墨淡着色，山峦的皴法也很别致，以浓淡、疏密变化的小圆墨点（雨点皴）表现。人物仅作为点景之用，画得细小，却以粉白、青、红诸色渲染，在素雅苍茫的山水映衬下，显得醒目突出。



## 参考书目

-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 《中国大百科全书·隋唐五代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 《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
-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
- 沈起炜：《隋唐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
- 牛致功：《李渊建唐史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 胡如雷：《李世民传》，中华书局，1984年。
- 胡戟：《武则天本传》，三秦出版社，1986年。
- 武则天研究会、乾陵博物馆：《武则天与乾陵》，三秦出版社，1986年。
- 高世瑜等：《唐玄宗与泰陵》，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
- 李斌城主编：《中国农民战争史（隋唐五代十国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
- 张国刚：《唐代官制》，三秦出版社，1987年。
- 刘俊文校注：《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
- 韩国磐：《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 赵文润主编：《隋唐文化史》，陕西师大出版社，1992年。
- 黄留珠主编：《周秦汉唐文明》，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 《中华文明史》第5卷（隋唐五代），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
- 吴玉贵：《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 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 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研究》，首都师大出版社，1998年。
-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曲出版社，1984年。
- 王永平：《唐代游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
- 刘进宝：《敦煌学通论》，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
- 陈安利：《高贵的葬仪》，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
- 国家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古代科技文物展》，朝华出版社，1997年。
- 《华夏之路》第3册，朝华出版社，1997年。
- 陈垣：《火袄教入中国考》，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
- 《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 (日) 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
- (日) 関根真隆:《正仓院の宝物》,保育社,1988年。
- 《はるかなる陶磁の海路展》,朝日新闻社,1993年。
- (日) 崛敏一著、韩升编译《隋唐帝国与东亚》,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 (日) 三上次男著、李锡经等译《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
- 《唐墓壁画研究文集》,三秦出版社,2001年。
- 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 季羨林:《朗润琐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
- 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中国美术考古发现史》,文物出版社,1997年。
-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 安家瑶:《玻璃器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
- 王冠卓:《中国古船图谱》,三联书店,1997年。
- 《前后蜀的历史与文化——前后蜀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巴蜀书社,1994年。
-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管会:《五代王处直墓》,文物出版社,1998年。
- 《河南省博物馆》,文物出版社,1984年。
- 《古钱币精品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7·敦煌彩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
- 《中国陶瓷全集6·唐五代》,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 《中国历代景德镇瓷器·五代宋元》,中国摄影出版社,1998年。
- 《中国建筑艺术全集·佛教建筑1》,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
- 《敦煌石窟全集25·民俗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 《中国艺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 《浙江考古精华》,文物出版社,1999年。



# 图片索引

女子骑马俑 .....	3	方格兽纹锦 .....	35
董钦造鎏金阿弥陀佛铜像 .....	4	白瓷龙柄连体瓶 .....	36
嵌珍珠宝石鎏金蝶头饰 .....	5	双体船图 .....	37
隋文帝像 .....	5	青瓷鼠、牛、猴俑 .....	38
隋灭陈形势图 .....	6	《千字文》(局部) .....	39
隋五铢钱 .....	7	《游春图》 .....	40
青瓷武士俑 .....	8	敦煌莫高窟 419 窟造像 .....	42
彩绘陶甲马俑 .....	9	北京房山云居寺雷音洞 .....	43
陶武士俑 .....	10	晋阳古城遗址 .....	45
武士骑俑 .....	11	昭陵六骏 .....	47
武士像 .....	12	大明宫含元殿复原图 .....	48
骑骆驼俑 .....	13	方花砖 .....	49
虞弘墓石椁浮雕 .....	14	莲花纹方砖 .....	50
牵驼纹“胡王”字锦 .....	15	兽面花纹残砖 .....	50
东罗马金币 .....	16	昭陵外景 .....	51
嵌珍珠宝石项链 .....	17	唐太宗像 .....	51
玻璃瓶 .....	18	彩绘釉陶文吏、武官俑 .....	52
隋炀帝游幸江都图 .....	19	乾陵石狮 .....	53
黄釉陶壶 .....	20	乾陵六十一宾王像 .....	54
隋观阳县印 .....	23	《武后行从图》(摹本) .....	55
社仓纳粟砖 .....	24	武则天像 .....	56
灵山孕宝群兽铜镜 .....	25	《升仙太子碑局部》(拓片) .....	56
白瓷黑彩侍吏俑 .....	26	乾陵无字碑 .....	57
《大般涅槃经本》(局部) .....	27	《兴庆宫图》(拓片) .....	58
彩绘伎乐陶俑 .....	28	沉香亭 .....	59
陶文官俑 .....	28	莲花纹瓦当 .....	60
隋运河图 .....	30	华清池全景 .....	61
镶金边白玉杯 .....	31	贵妃汤 .....	62
《隋炀帝夜游图》 .....	32	杨贵妃墓 .....	63
赵州桥石栏板 .....	34	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图 .....	65



宦官俑 .....	67	白瓷唾壶（左） .....	101
唐人所书黄巢起义记事墨迹 .....	68	白瓷灯（右） .....	101
黄巢起义战略图 .....	71	绞胎瓷枕 .....	102
三彩文官俑（左） .....	75	寿州窑瓷汤瓶 .....	102
三彩武官俑（右） .....	75	花釉瓷壶（左） .....	103
唐时期（669）全图 .....	76	黑釉蓝斑瓷罐（右） .....	103
封泥 .....	77	青黄釉绘兰草瓷盘 .....	103
《制授张无价游击将军告身》文书 .....	78	青釉褐彩诗句瓷壶 .....	104
大雁塔 .....	79	狮纹金花银盘 .....	104
雁塔进士题名帖墨迹 .....	80	鎏金银熏球 .....	105
敦煌《唐律疏义》残卷 .....	80	莲瓣花鸟纹高足银杯 .....	106
赵怀满租田契 .....	81	双鸾铜镜 .....	106
庸调麻布 .....	82	高士宴乐纹嵌螺钿铜镜 .....	107
西州营牒 .....	84	唐长安城图 .....	109
描金石刻武士俑 .....	85	下水道铁闸门 .....	110
彩绘贴金骑马陶俑 .....	86	小雁塔 .....	111
《耕稼图》（壁画，摹绘） .....	89	唐洛阳城图 .....	112
曲辕犁示意图 .....	89	开元通宝 .....	113
铁犁铧（左） .....	90	西域人骑驼陶俑 .....	114
铁镰（右） .....	90	唐代北庭都护府、安西都护府示意图 .....	117
王祯《农书》中的筒车、高转筒车图 .....	90	突厥石人 .....	118
含嘉仓铭砖（拓片） .....	91	贾忠礼抄《论语郑氏注》残叶 .....	119
含嘉仓第160窖存谷物与底层结构 .....	92	绿地染缬 .....	119
棕色地印花绢 .....	93	回鹘文写本长卷（局部） .....	120
小团花锦 .....	94	高昌故城“可汗堡” .....	120
墨绿地狩猎纹印花纱 .....	95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外景 .....	121
红绢 .....	96	佛像壁画 .....	121
方格棉布 .....	96	《步辇图》 .....	122
三彩花瓣纹枕 .....	97	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像 .....	123
三彩武士俑 .....	97	松赞干布陵 .....	124
三彩女俑 .....	98	文成公主带至吐蕃的释迦牟尼像 .....	124
黑釉三彩马 .....	98	《张议潮统军出行图》（摹绘） .....	125
三彩天王俑 .....	99	有字瓦 .....	126
青瓷葫芦尊 .....	100	南诏德化碑（拓片） .....	126
秘色瓷碗 .....	100	南诏建筑材料 .....	127
白瓷长颈瓶 .....	101	千寻塔 .....	127



南诏王细奴逻及后妃从者像 .....	128	卷发陶俑 .....	154
上京龙泉府宫城第2宫殿遗址 .....	129	青瓷碗 .....	154
“上京”残砖 .....	129	青瓷水注 .....	155
“保”字板瓦 .....	130	牙雕佛传造像 .....	156
牡丹纹方砖 .....	130	鹿纹十二瓣银碗 .....	157
琉璃鸱尾 .....	131	环柄银杯 .....	157
绿琉璃釉兽头 .....	131	海兽葡萄纹铜镜 .....	158
陶骆驼 .....	133	连珠鹿纹锦 .....	158
骑骆驼胡人俑 .....	133	青瓷双螭耳尊 .....	159
胡人俑 .....	134	黄釉褐斑“何”字贴花瓷壶 .....	159
《米继芬墓志》(拓片) .....	134	李白像 .....	161
新疆地区丝绸之路示意图 .....	135	杜牧行书《张好好诗》(序) .....	162
身着胡服的唐人 .....	136	杜甫像 .....	163
波斯银币 .....	136	成都杜甫草堂 .....	164
鸾鸟戴胜纹锦 .....	137	白居易像 .....	165
写经纸 .....	137	韩愈像 .....	167
石观音头像 .....	138	《淳于棼》明刊本 .....	168
石金刚力士像 .....	139	《九成宫醴泉铭》(拓本) .....	169
《苏谅妻马氏墓志》(拓片) .....	139	《莺莺传》明刊本 .....	169
粟特文摩尼教徒书信 .....	140	《颜氏家庙碑》 .....	170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片) .....	141	《玄秘塔碑》(拓本) .....	170
大食人俑 .....	142	白瓷砚 .....	171
贴塑玻璃瓶 .....	143	《虢国夫人游春图》(摹本) .....	172
《玄奘取经图》(拓本) .....	144	《簪花仕女图》(摹本) .....	173
《高僧像》 .....	145	《观鸟捕蝉图》(壁画, 摹本) .....	174
兴教寺外景 .....	145	《五牛图》 .....	174
玄奘题名石佛座 .....	146	侍女壁画 .....	175
《大唐西域记》写本 .....	146	《阴线石雕侍女画》(拓片) .....	176
《大唐天竺使出铭》石刻碑铭(局部) .....	147	顺陵狮子 .....	176
释迦牟尼鎏金铜像 .....	148	乾陵翼马 .....	177
和同开珎 .....	149	女睡俑 .....	177
道贤法师经筒 .....	150	三彩骆驼载乐俑 .....	178
鉴真干漆夹纻像 .....	151	十二生肖陶俑 .....	179
《桂苑笔耕集》(清抄本) .....	151	三彩镇墓兽 .....	179
《客使图》壁画 .....	152	莫高窟外景 .....	180
青瓷凤首执壶 .....	153	泥塑供养菩萨 .....	180



《乐舞图》(壁画, 临摹)	181
奉先寺卢舍那大佛	182
四川乐山大佛	183
乐舞陶俑	184
骑马奏乐三彩俑	185
吹排箫乐伎壁画	186
红衣舞女壁画	187
参军戏俑	188
舞马衔杯银壶	189
《开成石经》	190
法门寺塔地宫遗址	192
金塔和佛指舍利	193
《陀罗尼经咒》(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本)	195
《金刚经》	196
写经纸	196
僧一行测量子午线示意图	197
孙思邈像	199
提梁银药锅	200
《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	200
带盖银药盒	201
男陶俑	203
麻鞋	203
《帝王图》(壁画, 临摹)	204
三彩女坐俑	204
穿男服女陶俑	205
绛红罗地蹙金绣半臂	205
戴帷帽骑马仕女泥俑	206
《宫女图》(壁画, 临摹)	206
《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供养像》(壁画, 临摹)	207
银簪、银钗	208
双髻、高髻陶女俑	208
镶绿白料饰鎏金铜镜	209
女舞俑面部	209
饺子、点心	210
陶磨、陶碾、陶碓和陶井栏	211
劳作女泥俑群	211

白瓷茶瓶	212
鎏金莲瓣银茶托	212
葵口浅底白瓷茶碗	213
鎏金飞鸿银笼子	213
三彩假山	214
三彩方柜	214
《宫乐图》(摹绘)	215
青白釉陶牛车	216
蓝釉陶驴	216
三彩骑马女陶俑	217
《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临摹)	217
骑马击球彩绘女陶俑	218
含光殿“球场”石志	219
三彩狩猎俑	220
狩猎纹高足银杯及局部	221
弈棋贵妇绢画	222
《婚礼图》	224
乾陵全景	225
乾陵永泰公主陪葬墓墓室及石椁	226
五代十国兴亡表	229
鎏金铜观音造像	230
玉堂富贵图	231
《匡庐图》	232
贴金彩绘浮雕武士像	233
鳞纹银壶	234
山西平遥镇国寺万佛殿彩塑	235
《射手图》壁画(局部)	235
《毗沙门天王像》(版画)	236
白瓷枕	237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238
钱镠铁券	239
高髻拱手陶女俑	239
铁剪刀	240
鎏金铜铺首	241
青瓷六系罐	242
沧州铁狮子	243



彩绘乐舞砖雕 .....	244	纯银阿育王塔 .....	254
后周世祖像 .....	245	白釉瓷碟 .....	254
青瓷刻花莲瓣托盏 .....	246	七子青瓷盒 .....	255
彩绘散乐浮雕 .....	247	十国钱币 .....	256
《扬场图》壁画（局部） .....	248	孔雀蓝釉陶瓶 .....	257
《农耕收获图》壁画（局部） .....	248	《降魔成道图》（局部） .....	258
五代钱币 .....	249	后蜀石经 .....	259
普贤菩萨像 .....	250	彩绘文官俑 .....	260
定窑白釉刻花盖罐 .....	251	《勘书图》 .....	261
捍海塘遗迹 .....	252	瓜棱白瓷水孟 .....	262
白瓷茶瓶 .....	253	《潇湘图》 .....	2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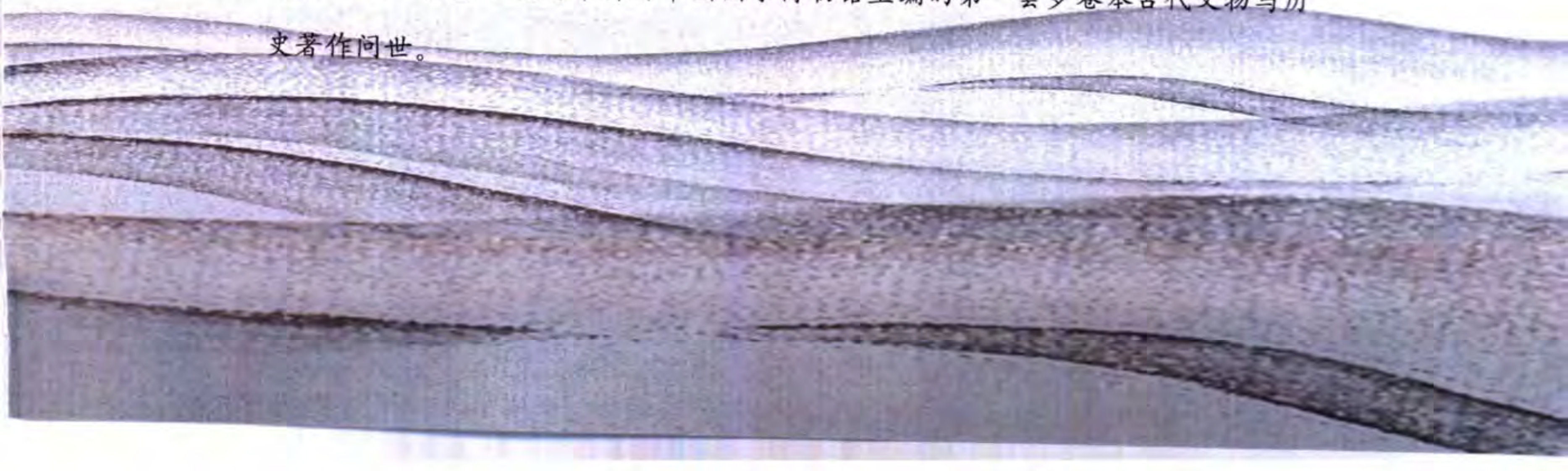
# 后记

1997年4月，我从国家文物局调动工作至中国历史博物馆，任陈列部主任。时值俞伟超馆长主持的中国通史陈列（隋唐至明清部分）修改后重新布展。同年9月，历时九年的中国通史陈列修改工作全部结束，以崭新面貌接待观众。在修改中国通史陈列的研究探讨过程中，俞伟超馆长、杜耀西副馆长等都有在理论研究和资料积累的基础上编一套书的想法，并积极支持我和陈列部的业务人员着手去做。

这个项目得到陈列部同仁的积极参与。从1997年下半年起开始启动，研究总体体例、编撰细则以及确定每卷撰稿人，接着讨论试写的样章、样条和部分初稿。在这一阶段，王冠英先生、安家瑗女士等给予很大的帮助。1998年先后担任副馆长的孔祥星先生和朱凤瀚先生都竭力支持这一项目。

2000年，朱凤瀚先生担任馆长后，继续把该项目作为馆里的重要任务安排。朱凤瀚先生作为编委会主任和主要审稿人，对全书从总体体例到各卷具体表述都付出了极大心血。展览部（原陈列部与美工部合并）主任董琦先生负责全书各卷的统筹协调，王永红女士承担了执行编务工作。该套书的编撰工作也不再局限于一个部门，成为全馆学术与业务协作的成果。

2003年2月，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组建中国国家博物馆，这部《文物中国史》也就有幸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主编的第一套多卷本古代文物与历史著作问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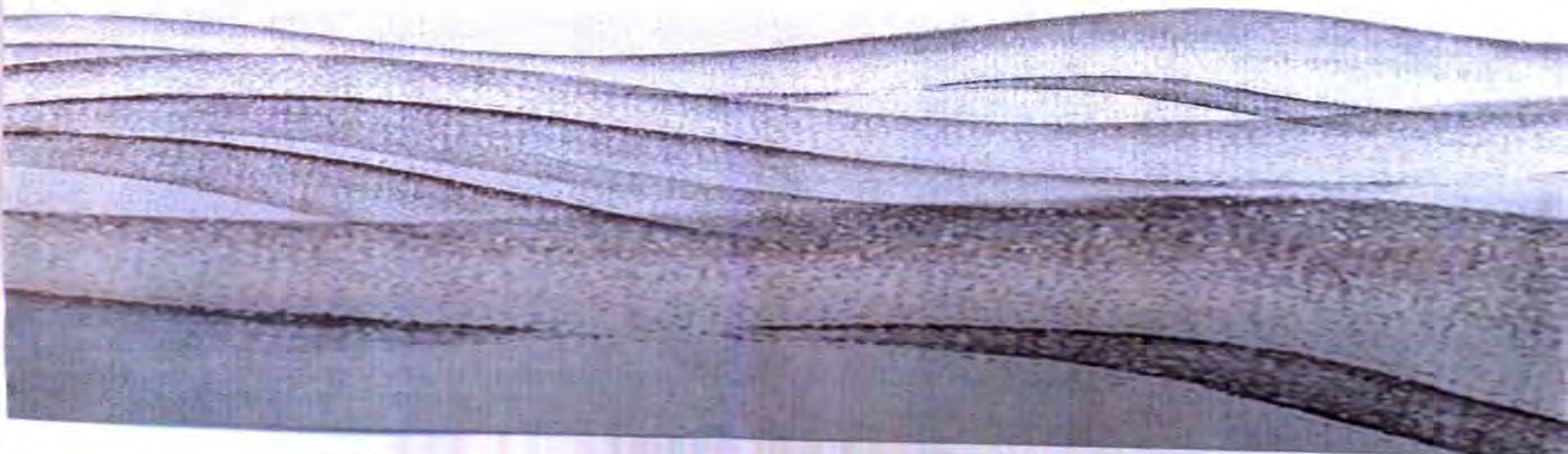
在开始构思这套书时，主要考虑到依托中国通史陈列的各位主创人员，将这套书的定位设计为：“以《中国通史陈列》的内容为主线，侧重反映中国远古以降的物质文明史，突出介绍历代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作为《中国通史陈列》成果的深化和延伸，充分体现学术界几十年来对历史文化遗产综合研究的学术水准，兼顾知识性、通俗性，以物带史，物史结合，全面介绍我国目前的文物考古和历史学科有关最新成果。”全书以中国历史发展的顺序，从原始社会到晚清，分为八卷。

几年来，各卷的作者为了实现本书的定位，作了大量的探索，特别是先动笔的前四卷更是数易其稿。有些作者甚至试写了相当篇幅的不同风格的样稿，不惜自我否定、推翻重来，为最后全书基本统一体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了保证本书的学术质量，各卷又延聘了专家学者审稿。他们严谨的学风和细致的校阅，为本书增色不少。

在本书编撰过程中，我们一直在研讨如何处理下列问题：

首先，《文物中国史》也是一种中国通史类著作，历史框架的完整性是必须的，例如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都不应该疏漏和缺席。但是作为博物馆编撰的中国史，主要特点表现在以历史文物为切入点和铺叙基础。难点在于，即使是中国历史文物藏品最丰富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使本书还借用了许多全国范围考古重要发现的资料，但文物相对于历史，总是极为残缺的、片段的。各位作者只能在书中粗略勾勒时代背景和演变线索，然后以物质文明史为主线，利用已有的文物，尽可能举一反三，展开描述，以求呈现远为宏大和复杂的历史场景。

其次，学术界最近的研究成果和各卷的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是本书的学术基础。正像我们在讨论新版中国历史陈列大纲时所表达的，要兼顾学术观点的前沿性





和稳定性。对于尚在争论的热点问题，应该清晰地表述主要的不同论点和作者的态度，供读者参考。但是本书的定位又使得上述表述局限于介绍性、结论性的文字，不过多进行考据和反映推理过程。相反，我们希望用生动活泼的、通俗易懂的笔调把学者思维所得向广大非专业读者娓娓道来。在学术与普及之间，这显然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分寸。

第三个问题是全书八卷，涉及十多位作者，前后行文的贯气与不同风格的个性如何协调。大家经过多次讨论，认为全书应该在体例和内容的基本要求方面保持整体性和一致性，而在叙事方式、语言组织等方面，针对不同时期历史与文物的差异，鼓励作者展现自己的才华，寻找最贴切的格调，在浑然一体中各有千秋、相得益彰。

最后应该特别感谢出版社的朋友们。为了此书的问世，他们也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辛苦共尝，自然值得一同庆贺。

李季

二〇〇三年八月六日

北京 中国国家博物馆

